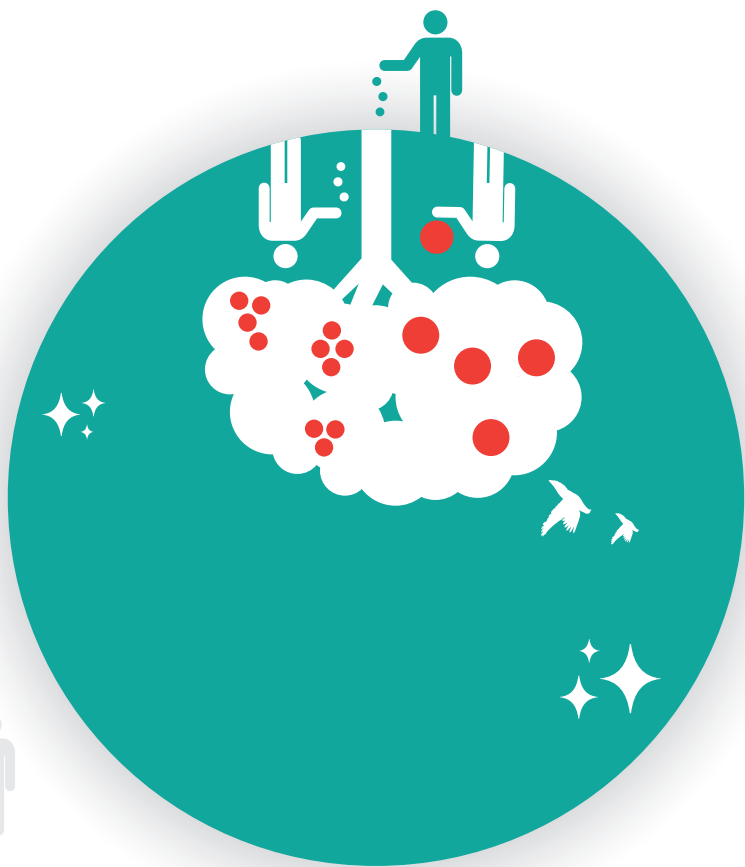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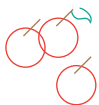
# 新實踐與地方社會

/叢書編輯/ 蔡瑞明、鄧育仁、陳東升  
謝國興、鄭麗珍、黃秀端

## 新實踐與地方社會



大學社區伙伴研究  
共學·共作·共享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  
計畫辦公室

出版



**MOST** 科技部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 系列叢書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系列叢書

# 新實踐與地方社會

主編：蔡瑞明

作者：蔡瑞明、謝國興、陳東升、戴興盛  
鄧湘漪、謝若蘭、謝柏宇、賴富庭  
程 廷、吳勁毅、婁之璘、鍾文觀  
張潔之、莊慕華、翁裕峰、蘇羿如  
陳怡方、林美珠、戴榮賦、黃資媛  
張力亞、鍾怡婷、蕭惠中、周睦怡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辦公室 出版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新實踐與地方社會 / 蔡瑞明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人社實踐計畫辦公室, 2018.12  
面；公分.--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系列叢書)  
ISBN 978-986-05-7892-8 (平裝)

1.高等教育 2.教育計畫

525

107022806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系列叢書

## 新實踐與地方社會

初版一刷 · 2018年12月

---

指導單位	行政院科技部
發行者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辦公室
叢書編輯	蔡瑞明、鄧育仁、陳東升、謝國興、鄭麗珍、黃秀端
主編	蔡瑞明
作者	蔡瑞明、謝國興、陳東升、戴興盛、鄧湘漪、謝若蘭 謝柏宇、賴富庭、程 廷、吳勁毅、要之璘、鍾文觀 張滌之、莊慕華、翁裕峰、蘇羿如、陳怡方、林美珠 戴榮賦、黃資媛、張力亞、鍾怡婷、蕭惠中、周睦怡
文字編輯	謝麗玲
封面設計	褚婉琳
出版單位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辦公室
地址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社會系420C室
電話	02-33661265
承印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78-986-05-7892-8

---

推薦序

## 實踐與創新

在人文社會領域，學術研究如何具體「實踐」，並不像是技術研發或新創產業那麼容易落實，尤其是在成果的呈現上，無法全然藉助量化數據來評估效益。人社研究成果通常表現在對於現象的新詮釋，建立或解構理論，以及對於成規的批判，價值的反思。那麼，這些基礎研究，如何可能對應當前社會、經濟與生活問題，並嘗試提出解方，是人社學者在研究過程中時時自我要求的想望。

2012年國科會人文處開始規劃「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當時我擔任「文學一」學門召集人，在鄧育仁處長主持的人文處會議上首次聽到陳東升教授報告此計畫的構想，老實說，並不能真正明瞭這計畫的執行方式。沒想到六年以後，我借調人文司，並且有機會親身體驗這計畫一路走來的紮實腳步，以及如何為「實踐」奠立典範的努力。

學術研究上我們盡可以將問題化約為單一領域的研究焦點，但是放回現實處境，才發現一個問題的解方，往往牽涉彼此纏繞的複雜脈絡。比方「發展地方經濟」，可能牽涉的面向就包含人口外移與高齡化，非都會區的交通網、產業分布，隔代教養與偏鄉醫療等等，因此如何重振地方活力，同時是經濟、家庭、照護、教育與認同問題，牽一髮而動全身。學術「實踐」的第一步，因此是「參

與」實境，而非停留在研究室的「分析」。而研究者進入社區並非易事。我聽過鄭麗珍教授提起北醫在基隆暖暖社區，施行居民換工互助計畫，居民願意「開門」讓你進去說明，就是最大的突破。我在今年六月下旬到台南拜訪成大團隊駐點銀同社區，年輕朋友開設的民宿隱藏在矮牆與花草的巷弄間，一樓的開放空間提供鄰居長者來製作天然檜木屑蚊香，老太太親切拉起我的手教我如何搓捲起木屑粉，如何適度沾水而不碎裂；接著拜訪一家咖啡館，提供高齡者參與沖泡與調理工作，她們穿上彩色圍裙，快樂又認真。這些看起來簡單的「樂齡」日常，其實背後是哲學、建築、護理學者們長期用心經營的成果；學人不再是旁觀的研究者，而是相互理解、共同分享的生活者。

走入社區，從學術「越界」到地方，這第一步也絕對是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獲得「信任」。東華大學謝若蘭教授以花蓮縣豐濱鄉港口部落社區與東華團隊等簽訂的合作備忘錄為例，建議原住民族研究倫理的討論，可以由集體同意權，轉向諮商平台。維護部落的主權如果是原民研究的第一步，在做法上必須避免訪談者武斷的侵入，所帶來的不對等關係，必須與部落共同規劃符合部落知識體系的課程內容與教學策略，另外，最理想是由耆老擔任文化傳承的主導者，並將學習成果回饋給部落。謝教授尤其提及在簽訂的合作備忘錄上，內容是採用阿美族語文撰寫，再輔以華語做對照，兩種語文呈現的先後次序，就是一種尊重並維護部落主體性的表示。

近年來  $PM_{2.5}$  在山城埔里成爲重要議題，從2010年以來，由醫師、民間文教基金會與家庭主婦組成的行動聯盟與自救會，長期關心空污造成的傷害，2015年暨南大學也義不容辭投入這場空氣品質大作戰。今年四月中我拜訪了暨南大學的戴榮賦教授，戴教授展示計畫實作成果—— $PM_{2.5}$  微型感測器與物聯網系統；有別於環保署設置於定點的標準監測站，戴教授的感測器布建到民衆生活圈中，不但可以隨時隨地掌握周遭空氣品質，也可以透過即時更新資訊，如中元普渡燃燒紙錢、農家燃燒廢棄物等，進行宣導與防治，一方面維護民衆自身的健康權

益，同時，也透過公民科學的力量，共同解決在地問題。參訪後，與附近民宿主人聊天，她談到戴教授研發的微型感測器非常輕便，比如設置在腳踏車上或繫戴在隨身包，無形中即形成最細密、動態的空氣品質感測網。學術研究的動力，可能就來自於生活小細節，來自於相互設想，從這位埔里在地人臉上明朗與自信的神情，正說明「學術」，從來不自外於社會，本來就是眾人之事。

社會「實踐」並非一廂情願的給予或指導，而是主動的參與、理解與形成共感，從而隨時修正與調整行動；讓所有習以為常的想法、做法都有更新的机会，透過慣習常規的逐步更改，學術「創新」將大有可能且無止盡的進行。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

鄭毓瑜 司長



# 主編序

台灣社會在經歷階段性的經濟快速成長後，進入另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生活水準大幅提高的同時，新的社會問題陸續出現，例如，環境污染、人口老化、經濟生產、分配不均、教育品質、長期照護等相關問題。針對這些複雜的難題，大部分先進國家挹注大量的資源，深入探討問題並提出各種創新的方案或政策，以因應社會結構的改變以及全球化所帶來的各種衝擊與問題。從其他國家成效頗佳的解決方案或政策可得知，現代社會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已經無法透過傳統修補性的治標方案獲得解決，而是需要有了新的思維與方法才能提出對治根本、具有長期效益的改善之道。「社會創新」是1980年代以來，以具有世界趨勢的新觀念與方法試圖改善社會問題。社會創新強調，把「實踐」納入「理論」，並呼應社會需求的「在地性」，這兩個新的觀點與徑路對大學的知識生產和社會責任，產生不同的視野。

大學的任務在於培育具備社會所需要能力與品德的人才，並且創造傳播知識，然而，大學亦兼具關懷社會問題、解決問題的責任。因此，源自於西方社會的「社會創新」引進台灣時，鼓勵並推動大學與社會連結，大學教授走入在地社區，學術生產結合在地問題解決，研究與地方創生結合的學術實踐，成為台灣學術發展一個新的研究徑路。在此一脈絡下，2013年7月行政院科技部「人文創



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啓動，有四所大學的研究團隊獲得補助，投入在地社區問題解決或提升社區福祉的社會實踐方案。

爲了協助各校推動這個計畫，科技部並補助成立「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總辦公室，總辦公室的推動委員與博士後定期到各大學了解計畫的執行狀況，透過例行的季會與計畫成員討論執行過程中的問題和可能的改善方式。總辦公室亦定期舉辦工作坊和研討會，鼓勵執行計畫的團隊發表研究成果，提升社會實踐的學術生產動能。在此同時，科技部亦要求研究團隊所屬大學檢討升等辦法，建議這類學術論文可納入升等著作中，藉此鼓勵更多的大學教師參與社會實踐類型的計畫。換言之，本計畫的推動不僅是一個科技部的計畫，其目標與願景是希望大學思考過去的傳統研究取向，以及對於大學／教師的期待與定位。

自「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推動以來，大學與社區的互動過程中，在大學專業知識與在地智慧協力下，至今累積了相當豐富的執行經驗與成果，本書的集結就是把這些寶貴的知識與經驗，轉化爲具有學術價值的研究論文。不同於一般的學術論文，這些論文都是在深入社區後，針對實踐方案產生的社會影響進行研究與探討，包含相當寶貴的場域實踐經驗。此外，社區的問題經常是多元複雜的，研究者需要具備跨領域的知識與訓練，才能提供給社區有助益的行動方案，進而產生社會影響，本書多篇論文亦呈現跨領域的特色，凸顯大學不同科系合作的重要性。

這本論文集的內容與原先規畫的規模有一些差距，原本投稿與邀稿共收到17篇論文，最後因爲種種因素，只有9篇通過匿名審查和編輯委員會審議。依據這9篇論文主題的性質，分爲「大學制度與地方的角色」、「課程／平台串聯機制」、「在地實作與具體實踐」三個部分。作爲系列叢書的第一本，我們期待未來有更多的出版品，可以涵蓋更多的議題，更深入地探討這些問題，進而提出解決之道。

本書得以順利出版，首先要感謝作者們的努力與付出，還有審查人熱心審閱以及提供修改意見。在此同時，我們要特別感謝參與本計畫的社區伙伴及社團組織，有了他們的協助與合作，本書的社會實踐目標才得以實現。再次感謝編輯的過程中，總辦公室的陳慧艷優質的溝通與協調能力，促使本書按部就班，最終完成本書的編修與出版；總辦公室的周睦怡博士提供許多出版架構與編排的建議，在此一併致感。另外，感謝謝麗玲協助進行本書各章的文字修訂，提升了論文表達的品質。最後，感謝科技部人文司歷任司長的支持，以及科技部謝易儒提供的種種行政支援，使得「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得以有效運作，並且能以本書呈現計畫的部分成果，與關心「社會創新」議題的朋友們分享。

原先以為出版一本書只要將論文集結起來就好了，應該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沒想到審查過程中涉及作者與審查人、編輯之間大量而密集的溝通，加上文字修訂、編輯和排版等，都是相當耗費時間與心力的工作。總之，這本書在眾人的努力下順利出版了。近年來學界對於學術公共性議題的關注，引發越來越多學者參與及討論，而負起大學社會責任的理念，更帶動了許多大學教授走出校園，開始以他們的專業嘗試解決社會的各種議題。因此，本書的主題與內容，應該可以提供學界參考。在台灣，本書算是一個較新的類屬，期盼作者們的研究成果能夠發揮拋磚引玉的效果，促使更多的研究者投入人文與社會創新實踐工作，提升大學對社會正面的影響力。

蔡瑞明 謹誌

2018年11月15日



# 目次

推薦序.....	i
主編序.....	v
導讀：大學與社區的在地連結.....	1
蔡瑞明、謝國興	

## 第一部 大學制度與地方的角色

第一章 地方社會公共實踐的外部結構與互動機制.....	17
陳東升	
第二章 東臺灣的真實烏托邦實踐：人社實踐計畫、社會賦權與參與式治理.....	53
戴興盛、鄧湘漪、謝若蘭等	
第三章 從港口部落的場域經驗談集體同意權與研究倫理的諮商平台.....	95
謝若蘭、鍾文觀、張滌之	

## 第二部 課程 / 平台串聯機制

第四章 公平分配教育資源：鄉村課後學習遠距系統建置.....	121
翁裕峰	

第五章	大學社會實踐課程操作與行動反思的回溯性初探.....	159
	蘇羿如、陳怡方、林美珠	

第六章	在地空氣品質物聯網推動經驗.....	193
	戴榮賦、黃資媛、張力亞	

### 第三部 在地實作與具體實踐

第七章	果樹認養行動方案中的社會經濟實踐.....	237
	鍾怡婷	

第八章	農耕實踐的永續轉型：成大團隊與東山小農的經驗.....	275
	蕭惠中	

第九章	能力取徑視野下的大學社會實踐.....	315
	周睦怡	

作者簡介.....		351
英文目次 (Contents) .....		355

導讀

# 大學與社區的在地連結

蔡瑞明、謝國興

這本論文集是近五年台灣幾所大學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以下簡稱人社實踐計畫）所產出的部分研究成果，由二十多位大學教授與研究人員一同撰寫而成，共有九篇文章，內容多元豐富，依主題區分成「大學制度與地方的角色」、「課程／平台串聯機制」、「在地實作與具體實踐」三個部分。全書主要探討大學與地方社會的角色和互動關係，特別是在新自由主義與國家行政的影響下，如何透過大學執行人社實踐計畫來了解地方社會的處境和問題，嘗試提供社會參與以及社會實踐的方案，促進在地居民的社會賦權、互惠信任、參與式治理，改善在地社區的生活品質。在這個計畫的執行過程，大部分的大學與社區之間保持著面對面的、持續的互動，呈現出一種獨特的大學與社區的在地連結。本書內容來自作者群在這幾年內親身參與在台灣各地進行的計畫，與社區一起社會實踐，這種參與地方社會的方式其實是相當少見且深具特色的實踐類型，本書因此命名為《新實踐與地方社會》。

---

蔡瑞明，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Email: rmtsay@thu.edu.tw。

謝國興，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 一、人社實踐計畫的緣起

1950年代以來，致力於發展經濟可說是台灣的全民運動，不斷地追求工商業的提升與規模的擴大，伴隨著人口的快速成長，台灣早已是對世界深具影響的經濟體。整體而言，台灣從早期農業為主的生產方式，歷經工業化，到現今成為以高科技、服務業為主的經濟活動形態，像是一個沒有終點的拚經濟競賽。社會的生活水準從戰後初期的資源匱乏，歷經經濟起飛、高速成長，平均國民所得到達富裕標準，名列已開發國家的一員。然而，在轉型過程中的快速發展，導致區域失衡與分配不均，有些社區與居民逐漸被忽略、被隔離、被排除，甚至幾乎被遺忘。面對這些過度追求經濟成長所衍生的社會問題，政府與學界慣常以「對症下藥」的方式來應對。不過，這種過於簡化扁平的對策卻無法藥到病除，最多僅能減輕症狀，無法根治這些發展失衡、長期累積下來的沉痾。近年來，除了台灣之外，世界各國紛紛嘗試透過國家政策帶入資源，來復振地方的活力，改善社區發展的困境。只是，一波波的政策雖然富含美好的理論投射，似乎仍無法達到預期的目標，難以有效地解決結構失衡的問題。世界各國仍在努力研究開發各種對策，以回應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持續衝擊。

本書的成果立基於問題導向的研究，在科技部的研究經費支持下，大學的教授、博士後研究員、研究助理走入社區，長期與社區居民一起盤點社區現況，探尋問題所在，一起思考可行的方案，嘗試透過具體的方案實踐來開啓解決在地問題的契機。有些方案取材於在地的智慧，有些則由大學帶入專業知識，更多的是兩個平時不太來往的社區與大學互動的結果。這一項2013年起由幾所大學（政治大學、暨南大學、成功大學、東華大學、台北醫學大學）先後執行、為期不一的人社實踐計畫是科技部新創的計畫（2018年起東海大學、中山大學繼續加入），研究架構與執行方式都具有高度的探索性，參與的學者對於研究目標的設定與方案的執行，起初不免生澀；然而，大學走入社區後，啟動居民的參與行動，活化了社區間的社會網絡，社區逐漸浮現正向的認同，也展現出大學可以對

地方社會產生實質的貢獻。不同於大學／實驗室的研究，走出校園，走入社區，與居民持續的互動，時而融入在地社區生活，時而回到書桌前思考，實踐研究其實是充滿了挑戰、挫折、興奮、喜悅，社區的活動充滿了不確定性，研究人員身在其中，感受特別強烈，經常會促動內心的情緒。這些計畫的成果相當多元豐富，展現在居民、社區、環境、制度不同的層次，然而，並非每個行動方案都達成預期的成果，也不是每一個成果都被記錄成一篇學術論文，本書乃是計畫執行成果中特別受到研究人員關注的議題，最終完成的學術成果。

過去學術界與社區互動合作的成果，經常停留在研究報告或是田野資料的階段，很多研究人員的行動效果、思維結晶，較少集結出版流通。學術界對於這一類的研究也因為成果較少而有陌生感，更加限縮刊行問世的機會。本書的出版除了希望將優質的實踐成果，提供給學界與大眾參考，更期盼藉此減少彼此的陌生感，促進不同研究成果有更多交流的機會。這同時也是科技部人社實踐計畫開始推動以來，初次將參與的研究團隊成員在各地進行實踐、觀察與研究所累積的成果，以專書的形式出版，具體呈現不同視野與多元議題的探索結果。對於在地社會實踐有興趣的讀者，本書提供初步的案例，作為未來相關議題推動時的參考。

## 二、大學與地方的有機連帶

本書共收錄九篇根據人社實踐計畫執行過程衍生或蒐集的資料所撰寫的研究論文。第一部分「大學制度與地方的角色」共有三篇論文，第1章開宗明義，是陳東升所寫的〈地方社會公共實踐的外部結構與互動機制〉，比較日本、英國與台灣地方社會公共實踐的主要內容與異同，對於地方社會在面臨全球化衝擊下所產生的問題，以及採取的政策取向。這三個國家的著力點都是地方社會，希望透過制度的創新，與在地的實踐，來解決核心問題，相對於英國與日本主要是因應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台灣則是同時關切政治與經濟議題。三個國家的比較有利於理解台灣過去與未來的問題所在。雖然地方社會是問題的所在，但是了解其運作



方式，了解如何建立一個「自主韌性」地方社會的機制，是一個關鍵。換言之，地方社會的問題是深具脈絡性，解決之道必然是在地的。作者認為居民的互惠性行為才足以帶動參與公共事務的良性循環，指出地方社會是不同社會關係連結的場域，是探究社會變遷、解決社會不平等的出發點；換言之，地方社會是在地實踐的主體，也是社會變遷的主要所在。因此文中提出地方社會作為社會變遷的理論意涵，指出社會的變遷相當複雜，無法依靠階級、性別等社會運動，由地方社會本身面對變遷才是全面解決問題的基礎。

研究人員與在地工作者在場域的努力可以達到社會學家所倡議的真實烏托邦嗎？面對資本主義與全球化浪潮的排山倒海之勢，社區可以離群遠居，過著另類的生活嗎？人社實踐計畫如何進行社會賦權？參與式治理如何有效施行？第2章由戴興盛、鄧湘漪、謝若蘭等11位作者合著的〈東臺灣的真實烏托邦實踐：人社實踐計畫、社會賦權與參與式治理〉，嘗試回答上述問題。文中探討東華大學研究團隊與三個場域的在地團體「共同打造超越國家權力與經濟權力的替代方案」。在理論上，本章與美國社會學家 Erik Olin Wright 的專書《真實烏托邦》所提出的社會賦權和參與式治理進行對話，探討大學與在地成員協力合作，以期超越國家、經濟權力的可能性。本文的結論是這個計畫所帶動的協力關係與社會實踐，確實提供了社會權力的影響作用。雖然難以清楚地說明這種影響的機制與程度，但是他們對於這個計畫所發揮的作用是樂觀的。作者根據 Wright 的研究架構思考國家資源的投入對於社會賦權、參與式治理的影響，並經由反思東華大學團隊與當地居民在花東所進行的社會實踐歷程，回應 Wright 所提出的理論架構。作者認為 Wright 的架構確實可行，並且根據台灣的在地情況對於通往社會賦權路徑提出具體的修正建議。這一篇論文勇於與社會學理論學者進行對話，顯示人社實踐計畫執行團隊對於台灣社會的永續發展有高度的期待。

人社實踐計畫的研究深入社區，蒐集各種資料，與社區成員互動密切，很難不涉及在地團體和居民的個人資訊與隱私等，因此從研究開始就無法迴避研究倫理的問題。第3章以花蓮港口部落的研究案例，聚焦討論人社實踐計畫在原住民

社區進行研究的倫理議題。謝若蘭、鍾文觀、張滌之在〈從港口部落的場域經驗談集體同意權與研究倫理的諮商平台〉，思考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係，特別是當原住民研究倫理受到《原住民基本法》保障的情況下，如何諮詢並取得同意，以進行研究工作。由於部落會議不易舉行，採行多數決的難度高，有些地區甚至沒有部落會議，使得研究倫理的規範難以完全落實。這個議題在人社實踐計畫的執行上，特別敏感，因為社會實踐中研究者與在地居民的關係，與傳統研究的主客明確相比，顯得相對模糊。當研究者不是以單純的觀察者，而是以參與觀察的方式進行研究時，如何與在地居民在事前有良好的溝通了解，就變得很重要了。三位作者以港口部落的經驗，提議建置以原住民為主體的研究諮商平台，透過這個平台容納多元的意見，以期更符合原住民族的文化意涵與社會結構。東華大學團隊在這個社區媒合了跨國間的部落合作，在力求合乎在地文化的訴求下，為參與的成員提供一個族群互動的美好願景。

### 三、結合社會實踐的課程與平台

第二部分「課程／平台串聯機制」同樣由三篇論文組成，關注課程內容與授課過程的學習成效。區域發展不平等導致的城鄉差距一直是社會科學研究者關心的議題，地區間教育資源分配不均，連帶加劇家庭間教育不平等的現象。翁裕峰根據成功大學計畫所強調的健康平等價值，思考「健康不平等」的起源是教育資源不均形成貧富差距／收入不平等，接著再導致健康的差異。第4章〈公平分配教育資源：鄉村課後學習遠距系統建置〉，以台南一個偏鄉村落的課後學習遠距系統的建置執行經驗，探討教育不平等的議題。文中嘗試說明建構一個大學支持社區的計畫，所涉及的單位與人事的複雜性，身處於以校內運作為重心的大學，想將資源分配到「額外」的社區，是極具挑戰性的工作。對於有心協助社區的工作者，如何透過網絡將訊息與需求送出，在例行的工作安排中，取得相關組織／單位的信任與資源，並不容易。同時，各大學的組織架構與文化的差異，也使得

這些經驗不容易複製。即使在科技已經很容易跨越距離的今日，要達到教育資源的平等分配，最終還是需要社會連結、社會資本來連接教育的兩個主體：教師和學生。大學與社區關係的實踐需要透過居民與大學成員，其實大學與社區都是「非個人」的組織或團體，自有其運作原則與慣性。在社區的社會實踐過程，了解組織的特性與結構的慣性，透過社會網絡取得應有的資訊與資源，顯然是社會實踐的工作者需要經常思考與面對的議題之一。

教學是大學的主要目的之一。人社實踐計畫的核心目標是結合教學、研究與社會實踐，鼓勵大學師生一起走入社區，陪伴社區尋求解決在地議題之道。然而，對於教師和學生而言，最重要的互動情境還是課程的教學過程。人社實踐計畫的目標之一，即希望透過計畫來提升教學的品質。第5章〈大學社會實踐課程操作與行動反思的回溯性初探〉，蘇羿如、陳怡方、林美珠從一個全面性的角度反思在社會實踐型計畫裡，大學相關課程的操作與挑戰。作者以三門課程的運作以及衍生的結果，評估人社實踐計畫下課程教學的優缺點。在這三門課中，教師都是第一次為人社實踐計畫開授課程，在力求跨領域、解決問題的目標下，教師對於課程少了過去的安穩感，也少了專業上的自信。經過多次嘗試後，三門課程的教師與學生，經由在實踐場域與社區成員多方互動，大家都跨出了舒適圈，並與過往少有接觸的對象有進一步的連結。這些跨界的互動提供創新的機會，讓不同學科的教師與學生在實踐場域中，交流討論彼此想法，激盪出新的火花。我們可以看到學生從陌生遲疑到了解接納，甚至於擁抱社區，發揮對社區的關愛情懷，真正達到走入社區的意涵。

教學是大學最核心的實踐，社會實踐課程其實是把這個實踐提升到更深的層次。近年來，台灣的大學持續推動「跨科際教學」(trans-disciplinary teaching)，由多科系的教師一起教授同一門課程，有些強調共時上課，提供同一課程、同一教學空間，多位教師根據個人的不同系所／學門／觀點，與學生一起討論同一個議題。這種教學法跨越科系的界線，提供學生多元的思考方式，強調實際問題的複雜性經常超出單一科系所能解決，需要不同學門的專業知識來協力合作。這種

教學模式聚合多個學系的師生，提供交流的機會，刺激參與人員更多的新想法。人社實踐計畫的課程帶領學生走入社區，面對的社區問題很少是單一系所可以解決的，因此，我們期待未來的課程可以透過跨科際教學，強化學生以多元的知識思考社會中本來就相當複雜的問題。在人社實踐計畫的執行過程中，我們經常反思為何很多政府政策都是結合專家意見所做的政策，實際落地執行時，卻遭遇反彈而難以達到預期目標。究其原因，很可能是理論上可行的事務，在實務推動上涉及在地的特性，衍生負面的作用，並不一定能直接推動。跨科際的知識在這時候可能有助於彌補這些政策實踐的縫隙。

當社區面臨重大事件時，利害關係人增多，大家關切的程度也會提高。空氣是我們生存不可或缺的物質，由於得來容易大家通常不太留意，但是，當空氣污染嚴重到足以影響生活與健康時，社區動員就具有高度的號召力。空氣污染所涉及的議題相當複雜，所需要的跨領域／跨科際知識，促成社區與在地的專業機構（如大學）互動的機會。近年來中台灣面臨空氣品質惡化的問題，向來被認為是好山好水好空氣的南投埔里，即使座落在中央山脈的內陸地帶，也面臨來自當地與外部的空氣污染，嚴重程度已經讓在地居民難以忍受。第6章〈在地空氣品質物聯網推動經驗〉，戴榮賦、黃資媛、張力亞以在地居民如何透過自力救濟推動改善埔里空氣品質物聯網的經驗，說明大學與在地團體合作所產生的效果。在過程中，大部分的問題都不是單一社區或行政部門，也不是大學內單一科系的專業可以解決的；不僅需要在地內部的連結一起面對問題，尋求大學專業的協力，更需要把連結網絡擴及到大台中，甚至中、南台灣，一起監測空氣品質，共同倡議降低污染的排放。這種將連結與互動的地理尺度擴大到更大區位的思考方式，不僅能有效地解決問題，也更容易透過社區連結取得行動的合法性，甚至可以獲得更高層次的行政體系的關注與資源。埔里的空污防治，獲得環保署的支持，結合民間與政府之力，讓台灣社會對於提升空氣品質，更具信心。大學走出校園，走入社區來解決在地問題時，最常導引出跨科際的路徑，這個例子呈現大學與在地居民合作不僅能解決在地問題，也能改變在地的社區，擴展了社會網路。

## 四、導入社區的大學社會實踐

第三部分「在地實作與具體實踐」共有三章，前兩章是在地實作經驗的探討，最後一章對本書主要內容進行總結討論。

人社實踐計畫的研究場域通常位處資源相對貧乏、分配不均、低度發展的地帶，因此，有不少社區屬於偏鄉或山區農村。台灣在全球化經濟體系的衝擊下，鄉村／農村面臨越來越嚴重的人口與產業的結構變遷。如何改善年輕人口外流、人口結構老化、農業生產邊陲化所衍生的問題，成為人社實踐計畫的關切議題。第7章〈果樹認養行動方案中的社會經濟實踐〉，鍾怡婷以成功大學團隊在果樹認養行動方案中所面臨的問題，探討不同於一般市場經濟的社會經濟實踐可能性。台灣農業長期以來採取市場導向的耕作方式，生產過程當然受制於市場，特別是全球化市場的宰制，耕作方法與產銷管道受到制約，導致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疏離。這種疏離不僅是地理上的空間隔閡，也是消費者與日常食物的疏離。在成功大學團隊支持下，幾位農友嘗試走出慣行農業的生產方式，改用環境友善的農法，並且透過果樹認養的方式尋求消費者的理解與支持。一般農友即使了解主流的慣行生產方式對環境、身體健康有負面影響，想要嘗試改變卻得面臨巨大的社群壓力，以及市場無情的競爭。社群協力農業所提供的社會支持，促成另類的農業產銷方式。本文的觀察雖然是一個獨特的例子，但也說明這種生產過程中，透過社會關係所展現出來的「利他」與「互惠」意涵，有別於市場的「理性」計算，提供一個建立另類生產與消費關係的新選擇。社群協力的產銷關係，減少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疏離，提供兩方更多「非利益」的連結，同時提升農業工作的成就感。然而，在慣行農業為主流、追求最大利益的生產方式當道的現代社會，如何說服更多人來參與，或者如何提高這種生產方式的利潤，依舊是十分嚴峻的議題。

當代社會處處都有人提倡有機飲食的生活方式，推行生態平衡的永續農法。有機食品看似生氣蓬勃，卻依然是昂貴、稀少的，因為以單一作物大量生產，採

用化學肥料、農藥來控制生產環境的慣行農業，仍然是主流。加上在全球化的競爭下，以大量生產來降低成本以維持農業收入的方式，似乎是難以迴避的路徑。已有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農業革命所發展出來的大規模生產模式，雖然帶來豐富的糧食產量，卻有極大的負面作用，不僅破壞生態環境，也傷害農民的健康。作為生產過程中的主角，農民面對這些具有傷害性的因素，經常是無可奈何的。第8章〈農耕實踐的永續轉型：成大團隊與東山小農的經驗〉，蕭惠中探索另類農業的可能性，以及農耕實踐的轉型過程。根據作者長期在台南東山的觀察，在主流慣行農業的架構下，農耕實踐的轉型相當困難，必須打破根深蒂固的思維與行為模式。在這個翻轉慣習的磨合過程，大學可以扮演重要的支持角色，提供農友相關的觀念與資訊。成功大學團隊推動的「農友共學堂」與「果樹認養行動方案」，鼓勵農友建構有別於主流的新農業場域，在農友、消費者與大學的社會網絡中，形成一個環境友善、產銷合作的農業模式。本文引用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生態資本作為農友追求自主和永續的路徑，引導讀者了解在慣行農業主導市場的現況下，改變雖然困難，但是藉由多方的相互扶持，能營造另類的產銷關係，這是值得大家持續努力的路徑。

人社實踐計畫的基本理念，在於提供社區居民更多元的機會並激發社區／個人的潛力，藉以提高生活品質。大學在此扮演的角色之一是傳遞知識，若能善加利用這些知識，便有可能提升參與者的自信與技能，進而有效解決社區面臨的難題。第9章〈能力取徑視野下的大學社會實踐〉，周睦怡嘗試以 Martha Nussbaum 的能力取徑解釋大學社會實踐與社區的關係。Nussbaum 提出實現有尊嚴生活的十種核心能力，社會若無法提供人們這些能力，人們將無法擁有健全獨立的生活。作者認為在地方社會面臨困境時，大學可以促進相關參與者的能力發展，來達成改善社會的目標。透過營造大學與社區伙伴關係的「共學」過程，所有的參與者得以提升自己在社會的相對能力，用以面對環境的挑戰，這也是人社實踐計畫的核心精神。本文以本書的埔里空污防制與東山果樹認養這兩個案例，綜合說明大學專業團隊與社區居民的互動，最主要的關鍵是提升社區居民的能力與行動

力，讓他們有足夠的知識來回應社區的問題、提高社區的生活品質。這種培育個人與社區韌性的行動，不僅強化個人的能力，也提高居民對於自身、對於環境的直覺與自信，有助於社區網絡的連結。本文以能力取徑來理解大學與社區連結的目標，對於人社實踐計畫而言，不僅提供大學推動計畫一個核心的內涵，更提供在地社區自我實現的機會與願景。

## 五、大學社會實踐的展望與期許

科技部人社實踐計畫已經邁入第6年，每個執行的大學團隊結合在地的區域特色，開拓進入社區的不同路徑，與居民密切互動，共同嘗試解決社區所面臨的問題。這本論文集以實質的研究成果初步展示人社實踐計畫執行的成效，並與大家共享這些寶貴的實作與研究經驗。

在資本主義覆蓋全球的情況下，有多少人可以脫離它的影響呢？本書的議題是否過於天真而不切實際，淪為烏托邦式的幻想？然而，正如東華大學團隊直接與 Wright《真實烏托邦》的研究架構進行對話，追求人類社會另類，或者說更高、更具理想的社會形態，雖然相當困難，但其實是可行的。在本書的研究者長期與在地居民的互動中，對於在地問題的理解，以及伴隨而生的緊密伙伴關係，恐怕是其他研究難以比擬的。這樣的合作關係可能是本書最重要的元素之一，也是學術研究中最難能可貴的真摯情意。

社會科學家以研究來了解社會問題，解決問題往往不是主要的關切重點。另一方面，學者經常是以保持距離的方式來進行研究，即使是進行田野資料蒐集，也很少與在地居民一起定位問題、解決問題。學界向來採取不去碰觸問題來維持學術中立，從這個角度來說，人社實踐計畫團隊的出發點是採取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積極取向。然而，在「先找問題，再去解決」的情形下，是否可能誇大問題的嚴重性，或是造成「先射箭再畫靶」的狀況，反而模糊焦點，忽略其中隱而未現的問題？這是一個值得反省注意的問題，人社實踐計畫團隊因此在場域中採

取長期觀察和參與的方式，不僅有別於一般短期資料蒐集的田野調查，再加上透過共同實踐來解決地方問題的研究取向，都讓第一線工作者和場域民衆有近身且緊密的持續互動，得以掌握問題的全貌，並且藉由協力共作的過程逐一回應。人社實踐計畫或許無法立即為社區居民實現美麗的願景，但是在彼此協作努力的期間，大學與社區間的情感不斷醞釀發酵，觸發更多人的參與，一起思考解決這些難題的可能性。當「可能」出現在曾經失去或快要失去希望的居民心中時，這個計畫可以算是往成功的路上走出了第一步。

台灣政府曾經滿懷信心地走入社區，企圖總體地「營造」社區。如今，我們了解到社區的經營不僅止於入口意象、環境整修、硬體的修建。即使是一個社區，「整體」是多元複雜的，居民是流動的。本書的主題，從國家層次、社區層次、個人層次去理解社區，希望透過各種創新與實踐行動來改善、解決在地的問題。我們固然不再像過去那麼自信，但是透過人社實踐計畫，得以更長期、更接地氣、更貼近現實地去面對台灣地方社會中，由外在與內在摻雜而成的複雜問題。更期盼透過人文社會科學向來「以人為本」的關懷精神，為改革社會困境的創新途徑投出問路之石。

本書的主要概念之一是「社會實踐」。在各篇章節中，社會實踐的目的是為了改善地方社會的現況。改善通常是為了改變舊習所累積的現狀，因此社會實踐經常隱含「創新」，以改變現狀。人社實踐計畫的創新之處，核心的部分在於大學與社區形成伙伴關係，一起研究社區的問題，除了應用大學的理論知識於實踐的場域，大學也可以從社區中汲取庶民的知識。換言之，在過程中需要大學專業知識和地方知識相互轉譯、對話，並且共同建構出「新的」知識，特別是在地的日常，卻隱而不現的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或是以在地知識為基礎的解決方案，與土地／居民連結很深的領土智慧（territorial intelligence）。從各篇實踐的例子或者是理論典範的討論，我們看到很多社會實踐的努力，以及概念建構的啟發，目標都是解決當地或本土的議題。這樣的知識建構取向，融合西方或國際的知識，以及在地居民的智慧，讓我們有機會提出台灣社會獨特的論述，又能接



軌國際的議題（無論是友善農業、空污防治），這些都是全球共同面對的困境，但我們嘗試去尋找具有理論根據且在地可行的方法。這種另類的研究取向，對於習慣以歐美知識架構來從事研究的大學研究人員，說不定可以提供發展出更具創意的研究取向起點。

人社實踐計畫由科技部提供經費給大學進行社會實踐的計畫，大學在這個社會實踐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這個計畫對於大學的意義，值得在此討論。無論是台灣或世界各國的高等教育，大學在傳統上主要扮演傳遞知識的高等學術中心或是研究發展的學術機構，因此，大學走入社區進行社會實踐以改善社區生活的行動，在過去其實是少見的。即使到今天，我們依然看到有些大學對於周遭環境視而不見，例如，大學旁違建林立、攤販紛雜，甚至對於貧民乞討、犯罪頻繁，也袖手旁觀。大學的教授群自視甚高，訓練出來的學生，更不想去處理這些難解的社會或環境問題。若從社會實踐來檢視大學的使命、學術的研究典範，對於大學本身來說，人社實踐計畫的社會實踐意義到底是什麼？對於研究者來說，多元學術典範的促進，有助於學術研究的能量和活力。至於大學使命和研究典範的轉移，其實也跟時代的特徵有所關聯性。社會實踐對於學生來說目的是什麼？在處處追求最大利益的時代裡，Nussbaum 大聲疾呼「不為利益」的人文觀點，就像暮鼓晨鐘，特別震撼人心。Nussbaum 強調大學應該要培育出能實踐民主的公民，而不是會賺大錢或有尖端技術的人。博雅教育、人文教育，也就是培養學生批判思考、設身處地換位思考、創造和想像力，必須是大學不可或缺的教學目標。另一方面，社會實踐讓學生有機會與不同專業和不同處境的社群接觸、對話、溝通和合作，這是讓學生在專業知識養成的過程中，與真實社會有所連結，知道自己所處的位置，去思考所擁有的知識和技能與這個社會要建立什麼樣的關係，知道自己為何努力、為何而戰。綜合言之，人社實踐計畫的執行，不僅對大學本身的定位，以及教師與學生，都具有深遠的影響。

最後，每個計畫都會有研究目的或願景。人社實踐計畫的研究人員通常在走入社區後才了解社區真正的問題，其原先設定的研究目的經常是模糊的。這個由

大學啓動，與社區協力合作的人社實踐計畫，對於社會創新與實踐，應該提出何種願景？大學作為計畫的執行者，大學與社區的在地連結是有機與動態的關係。大學專業與社區智慧相結合，試圖解決社區問題，必然需要思考一個議題：問題可以解決嗎？為誰解決？在地居民、當地社區、還是地方政府？換個角度來看，到底我們希望促進社會變革，使得社會變得更「好」的好，到底意味著什麼？更富裕？更幸福？更正義？人社實踐計畫的伙伴應該會覺得「更正義的社會」是共同的目標。但是，這個目標是我們可以選擇的選項嗎？還是僅停留在大家的願景？這些問題在本書的章節中，可能還來不及提問，卻是必須時時自問的議題。現在台灣很多的困境，都是大家看似有選擇其實是沒有選擇的，產業是如此、慣行農業是如此、環境保護也是如此，尤其當政府把發展經濟視為百病的唯一解方時，任何阻礙經濟發展的環境、人權、安全都可以先擺在一旁。人社實踐計畫執行的一個「象徵」意義在於，讓參與者覺得理想的生活是選項之一，他們可以有勇氣透過人社實踐計畫的在地實踐來追求這個看似遠不可及的目標。台灣的不同世代，對這個理想／願景或許有不同的想像和期待。至於人社實踐計畫透過大學投入地方社會，希望把社區的居民帶往何種生活形態？我們現在不一定有答案，但在實踐的過程中，或許會越來越接近大家共同期待的答案。



第一部

# 大學制度與地方的角色



1

# 地方社會公共實踐的外部結構與互動機制

陳東升

## 中文摘要

本文比較分析日本地方創生政策、英國社會創新與社會經濟倡議、台灣社會實踐推動政策，說明地方社會的變遷受到新自由主義全球盛行與國家權力的影響，國家相當明確地扮演全球自由經濟和地方社會變遷的中介角色，既要積極地把地方社會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又要解決經濟發展在國家內部與地方社會引發的不平等問題，以維持國家統治的正當性。地方社會的實作不能夠只從地方內部來討論，而是必須要先勾勒地方社會在整個社會體系中的位置。接著，地方社會要建立主體性牽涉到文化、經濟與政治的面向，社會成員基本生活資源要有保障，擁有能夠彼此支持的另類經濟體制，而經濟資源分配和其他公共事務的治理需要有地方成員積極參與，這樣才有可能創造具有自主性與韌性的地方社會。換句話說，外在結構是限制也是開創地方社會轉變的機會，但是需要透過地方社會成員共同參與運用團體規範、認同、互惠行為、集體記憶等元素，建立一些可以讓成員互惠與信任的機制，以實現這樣的內部轉變。

**關鍵字：**地方社會、地方創生、社會經濟、社會創新、強互惠、社群治理

## 一、前言

地方社會的理論思考是社會變遷中的重要議題，地方社會的定義在不同的脈絡下會有所差異，本文對於地方社會的定義是：在經濟、社會與政治變遷下，無法分配到合理的資源和享受到成果的社會空間單位；而其空間尺度是以台灣的縣、鄉與村里不同層次為參照。<sup>1</sup> 這些地方社會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經濟體系影響，以及國家因應全球經濟和內部政治運作的政策介入。面對這些外部與內部的結構性條件，地方社會如果能夠組織動員在地不同類型的資源，即有可能發展出在地社會具有主體性的變遷模式。有些學者因此提出地方社會是在地社會實踐的主體，並且集結不同領域學者出版地方社會理論文集。在這本論文集的導論中，黃應貴（2016: 36-37）將地方社會放在新自由主義的脈絡下探討，指出資金、人員、交通網絡、資訊等等的網絡建立，促成地方社會邊界的開放性與高度流通性，改變過去地方社會的同質性與單一性，而發展出來多重認同的群體，使得地方社會保持在區域再結構與文化再創造的狀態。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機制穿透到地方社會、破壞既有的框架，但是也可能帶來新的機會條件讓地方成員與新移入成員建立起新的社會想像，這種文化再創造（社會認同再建立）可能發展出與主流意識型態對抗的新文化。

地方社會的理解必須放在整體的經濟與政治脈絡下來分析，雖然黃應貴的論點指出新自由主義和文化認同的重要性，不過，從本文選擇日本、英國與台灣作為比較分析案例來看，這三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受到新自由主義的作用，然而受到影響的階段和產生的後果有所差異，而且國家都採取不同的策略來修補新自由主義對於地方社會的負面影響，因此國家對地方社會的運作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

<sup>1</sup> 地方社會的定義在形式上是以行政邊界為範圍，在一個特定行政邊界內的成員都是地方社會的成員，但是這樣的定義不是靜態的、也不是本質性的，而是一個分析研究的起始參照點。一個地方社會，就如同一個城市、一個鄉鎮不是自然區域，而是隨著內部社會關係與外部社會結構在歷史的軌跡中產生邊界和內涵的變動（Castells 1977）。



力。從日本政府因為人口少子女化且人口遷移趨向都會區造成地方社會快速崩解，國家因而提出地方創生的國家政策；英國因為弱勢群體的社會、經濟、政治權力受到排除，而組成直屬首相的辦公室來推動社會創新；台灣由不同部會資助的社會實踐計畫也是要解決區域不平等的問題。這些政策都彰顯國家在地方社會變遷的重要地位，因此必須納入理論分析的架構。

除了全球經濟結構性因素，必須再加入國家政治的作用，來探討地方社會持續的再結構化。此外，政治經濟結構影響的層面不會只限定在地方社會文化，也會發生在政治（地方公民治理）與經濟面向，因此探討地方社會面對外部環境的作用如何可能創生的問題，不僅僅是主張地方社會成員可能會發展出新的社會想像，而是要更深入地探討他們對於經濟資源分配和公共事務治理的願景，以及透過什麼樣的機制來建構地方社會。

本文比較分析日本地方創生政策、英國社會創新與社會經濟倡議、台灣社會實踐推動政策，說明地方社會的變遷受到新自由主義全球盛行與國家權力的影響，國家相當明確地扮演全球自由經濟和地方社會變遷的中介角色，既要積極地把地方社會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又要解決經濟發展在國家內部與地方社會引發的不平等問題，以維持國家統治的正當性。地方社會的實作不能夠只從地方內部來討論，而是必須先勾勒地方社會在整個社會體系中的位置。接著，地方社會要建立主體性牽涉到文化、經濟與政治的面向，例如，社會成員基本生活資源要有保障，擁有能夠彼此支持的另類經濟體制，而經濟資源分配和其他公共事務的治理需要有地方成員積極參與，這樣才有可能創造具有自主性與韌性的地方社會。換句話說，外在結構是限制也是開創地方社會轉變的機會，但是需要透過地方社會成員共同參與建立一些可以讓成員互惠與信任的機制，以實現這樣的內部轉變。

## 二、國家權力與地方社會變遷

透過跨國比較分析來探討台灣地方社會實踐的模式，可以更清楚地顯現全球

經濟與國家的作用，以及不同的地方社會如何回應外在環境的限制，開創出多樣的變遷路徑。本文跨國比較的案例選擇在東亞的日本，主要是因為台灣與日本的社會經濟情境比較類似，例如，兩個國家都積極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在國際競爭下部分產業外移或是停滯，導致失業、社會不平等、區域不平等問題，兩國政府都透過政策的介入試圖緩和經濟全球化的負面衝擊。另外，日本政府長期推動地方復振政策，再加上安倍政府近年來提出地方創生的重要政策，有豐富的資料可以進行分析。另一方面，英國和台日有非常不同的社會條件，英國是新自由主義的發源地，但私有化政策在二十世紀末就造成一些社會問題，福利國家的模式又因為財政負擔過重而必須修正，因此取代保守黨執政的新工黨發動社會經濟的方案，以經費補助公民團體和社會福利團體的方式，來協助社會弱勢和被排除的地方社會，並且期待一段時間後這些團體可以在經費上自給自足，不需要依賴政府的補助。台、日、英三個國家的比較可以凸顯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經濟體制下，不同的國家政權形態、政策推動重點和公民社會的能耐，可能會發展出不一樣的地方社會實踐模式。

### （一）日本的地方創生政策

根據日本運輸省的分析，2013年15歲到29歲的年輕人流入東京都會區的人數約為9萬人，而東京、大阪與名古屋都會區以外的地方則是淨流出約9萬人，顯現出少子女化與高齡化的日本社會裡，青年人口越來越集中到主要都會地區，對於地方社會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甚至有學者（如，增田寬也）提出「地方消滅」的觀點（川北泰伸 2015；張正衡 2017）。安倍內閣在2014年9月提出「地方創生」政策，為這個政策創設特別任務編組的「町・人・工作創生總部」，並且設立「地方創生大臣」的閣員職位。地方創生政策是針對日本人口快速減少並且往都會區集中的現象，提出活化地方產業，讓工作機會吸引人口移動到地方，而人口聚集後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建立一個良性循環。至於針對少子

女化的現象，必須在非都會區的城鎮構成養育子女的環境友善，讓留在地方工作的年輕人願意結婚、生育和撫養下一世代。根據日本內閣府的「町・人・工作創生總合策略」，推動政策共有四大面向，涵蓋19個具體方案。舉例來說，設立在非都會區的大學必須擔任地方創生的重要角色，地方大學活化與在地連結是19項方案之一，具體實施作法包括：地方大學和在地企業共同研發，增加在地學生就學比例，提高畢業生在地就業比例，提高地方政府、企業與公民團體對於地方大學在地貢獻的滿意度（閣議決定2014）。

日本政府設定推動地方創生的主要指標之一，是到2020年在都會區以外的地方讓30萬年輕人就業。除了設立地方創生大臣與地方創生事務局之外，安倍政府並投入大筆的經費，例如，日本總務省編列大筆預算讓地方公開募集年輕人加入「地域活化協力隊」，提供約20萬日元的月薪（相當於日本大學畢業生的基本薪資），進入鄉鎮農村執行振興計畫，為期三年。這個政策希望把人才從都市送到農村鄉鎮地區，協助農產品六級產業化、長期照護、閒置空間改造、創新創業、宣傳行銷等工作。根據統計，2015年、2016年、2017年已分別招募2,625、3,978、4,830位青壯年返鄉參加「地域活化協力隊」協助地方創生，同時解決了年輕人想去鄉鎮地方工作，卻找不到適合工作的問題。這些參與者有40%是女性，70%的年齡介於20到30歲，有60%在三年聘期結束後選擇在服務區域定居。<sup>2</sup>另外一項推動地方創生的作法是建立地方創生人才支援制度，主要是考量鄉鎮農村人才不足的問題，需要由外部的學者專家協助，因此日本政府招募大學教授、公民團體核心幹部、中央政府文官、企業界人士進駐地方，協助推動地方創生的相關政策。例如，北海道的清水町經由這個支援制度聘用小樽商業大學研究人員為計畫科長（長村知幸2017）。此外，日本政府也推出「故鄉稅」（ふるさと納）政策，讓國民能將自己應繳的稅金，直接繳納給自己所支持的地方

---

<sup>2</sup> 〈地域こし協力隊の概要〉，[http://www.soumu.go.jp/main\\_sosiki/jichi\\_gyousei/c-gyousei/02gyosei08\\_03000066.html](http://www.soumu.go.jp/main_sosiki/jichi_gyousei/c-gyousei/02gyosei08_03000066.html)

政府，有些並可獲得在地農產品當作謝禮。這個政策得到國民相當大的迴響。

位於地方社會的大學可以申請文部科學省<sup>3</sup>的補助，積極扮演地方創生的重要角色，回應地方創生政策所設定的人口與產業發展目標。首先，大學在招生上所做的努力是積極和在地的高中合作，透過不同的招生方案獎勵高中生在地就學。其次，開授與在地議題連結的通識教育或專業課程（如，國立千葉大學），並且建立地方創生學程（如，京都私立龍谷大學、縣立宮城大學、縣立兵庫大學）、學系（如，山口縣國立山口大學）、學院（如，宇都宮大學），讓大學生在求學階段可以充分了解地方社會的狀況，並且建立地方共同的生命經驗，未來可以在地就業。再者，建立大學與地方產業、政府與公民團體的合作機制，由這些地方組織提出重要課題，大學評估其專業和研究人力後形成協力合作團隊，例如，國立山口大學建立由副校長負責的地方創生中心，負責大學與地方社會的研究發展合作方案。最後，藉由人才支援系統，大學研究人員直接進入地方負責規畫並推動地方創生工作。整個推動方案是從招生、課程、學位、產學合作、就業等元素，結合成為一個政策體系。大學參與地方創生能否成功的關鍵，在於大學領導團隊對於政策的了解程度和真實投入的程度，學校教師是否願意積極參與並且跨學科合作，地方議題課程研發創新能力和落實課程的能力，以及中央政府的資源支持和協助程度等等。

日本政府為什麼要推動地方創生政策？這個問題必須從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發展和政權合法性兩個面向來探討。張正衡（2016: 49-61）指出，日本政府的社會政策基本上是在新自由主義原則下展開的，前首相小泉純一郎政權減少對於地方政府的經費挹注，並強調地方振興是地方政府與地方公民團體的責任，這樣的基調雖然在安倍晉三政權有所調整，增加投入地方的經費補助，但地方還是必須要重視經濟發展、自立自強。地方創生的關鍵性面向之一是地方經濟的發展與在地就業的規畫推動，提高地方產業競爭力、支持地方新創事業，五年內在服務

---

<sup>3</sup> 簡稱文科省，是日本中央省廳之一，負責統籌教育、科學、學術、文化與體育等事務。

業生產效率提高、農林漁牧六級產業化、觀光業旅客增加的影響下，在地方創造出19萬個工作。另一方面，自民黨政府的傳統支持者有相當比例來自農民和鄉村地區，安倍政權必須要提出地方創生政策，給予這些地方資金補助，以穩固這些地區選民的支持。川北泰伸（2016: 28）就指出，考量2015年日本地方選舉可能的後果，安倍政府必須提出地方振興政策，回應日圓走弱讓地方經濟和在地中小企業產生負面衝擊的問題，以鞏固自民黨的傳統支持者。日本學者與前總務大臣增田的「地方消滅論」其實就是在這樣的政治脈絡下提出的，形成支持地方創生政策的輿論意見。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地方振興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並沒有處理地方社會在長期的區域不平等發展過程中已經喪失人力、經費與產業條件，處於非常弱勢與邊緣的位置，大多數地方社會其實沒有能力自行承擔地域的使命，再加上地方社會振興必須在自由競爭的全國市場中取得資源，造成弱勢社區之間的激烈競爭，如果地方社會沒有發展出另類的經濟模式，卻仍積極地參與這樣的競奪（村上裕一等 2015；岡田知弘 2015），結果可能讓邊緣者更邊緣、弱勢者更弱勢。

以故鄉稅的政策為例，每個地方社會都費盡心思進行宣傳工作，並提出具有特色和價值的回饋禮物，在全國市場吸引民眾願意指定繳納稅款給特定的地方政府，並從原居地政府申請將捐贈金額退稅。以2015年來說，故鄉稅共徵得453.6億日圓，比起前一年增加3.9倍，主要是行政程序簡化和地方回禮的設計。精心設計禮物的地區高居稅收金額排行榜的領先位置，反之，沒有送回饋禮的地區不但收到的故鄉稅非常有限，居民捐贈到其他地方而申請退稅的金額也大幅提高；只有一些訴求保存文化資產的地區可以不送禮物就得到民眾的稅款支持（橋本恭之、鈴木善充 2015）。以未提供回饋禮的千葉縣松戶市來說，2014年收到的故鄉稅只有22件、228萬日圓，但是2015年松戶居民捐稅到其他地方的有2,001人，申請退稅金額高達4,608萬日圓（簡嘉穎 2016）。雖然故鄉稅的確造成部分地區產業經濟的發展，增加長期照護或是托育的公共資源投入，但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可能造成原本就沒有地方特產，或是沒有地方創意提案的邊緣地區，取得資源

更有限，落入更邊緣的處境。橋本恭之、鈴木善充（2015）利用整體資料進行分析，顯示故鄉稅對於縮小區域稅收差異幫助有限，也就是說，要透過故鄉稅全面改變都會區和非都會區財源差異的問題，並不容易。

日本政府地方創生政策是要解決長期經濟區域發展不平等的問題，以及少子女化和高齡化造成都會區以外「地方消滅」的課題，這些都是新自由主義原則下高度競爭的後果，國家介入是要修補經濟發展造成的社會問題。國家採取的立場是透過經費補助和制度創新（如，故鄉稅、地域活化協力隊）來復振地方社會，但是要求地方政府和公民團體自行擔負起地方創生的責任，並讓這些地方行動者在日本全國市場進行割喉式競爭，而不是鼓勵各個地方因應自己的特色和條件，發展出公民共同治理的另類經濟模式和社會體制。市川頭（2017）對於地方創生的競爭以及由上往下新國家政策指導的問題提出初步反省，指出日本少數地方創生成功案例，是由下往上的公民社會自發性推動，是地方居民共同參與治理並且建立生命共同體的認同所造成的結果。如果沒有在市場治理失效與國家治理失效後，發展出公民社會的治理模式，由地方居民連結內外部資源自主解決在地問題，那麼，地方創生政策可以造成的變革是有限的。推動地方創生這種由上往下的政策必然會設定地方社會發展的方向，不過，這種政策決定論的立場有必要修正，因為地方社會在面對外在的限制下，可以形成自己的組織和變遷的方向；換句話說，國家需要提供地方社會更多自主發展、共同參與的空間，而地方社會的公民組織要建立發展、相互支持與連結，開放更多管道讓內部與外部的公民有機會參與。至於地方大學更應該扮演中介、協力與共同推動者的角色，克服學校內部教學模式、研究重點、系所各行其事的組織慣性，深刻反思中央的地方創生政策，以發展出適合地方永續運作的目標和推動方案，不應該只是被動地配合上位的政策指導。

## (二) 英國的社會創新與社會經濟倡議

英國的例子可以說明被排除的社區推動社會創新與社會經濟政策的可能性和方式。完全就業的終結與福利國家的危機，是社會創新與經濟理念興起的重要經濟結構條件。我們必須追溯到大量生產的福特主義，加上凱恩斯經濟理論所主張的國家經濟干預，來理解1980年代以前的英國社會。當時國家管制和大量生產的經濟制度結合在一起之後，爲了確保有充足的工人、工作機會與消費能力，歐美社會逐漸發展出福利國家的形態。福利國家的優點之一是所有公民在就業、消費與公民權得到比較一致的保障，不過差異性會被消除或忽視，以及最重要的，公民社會在經濟上（合作經濟）與政治上（直接民主）的角色會被國家和市場所取代，高度地被邊緣化。1970年代發生的全球經濟危機，導致資本開始從歐美社會外移，失業與低度就業的問題浮上檯面。然而，國家的支出和稅收無法平衡，於是福利國家的危機顯現出來，全面性的社會福利制度不可能持續，必須選擇性地刪減。一方面，右翼的政治團體對於福利國家制度的國家角色擴張和無效率提出嚴厲批評，開展出新自由主義的論述；而中產與中上階級配合這種政治意識型態的想像，反對國家角色擴張、反對增稅，遊說透過減稅來促進經濟成長並解決經濟問題。另一方面，一些公民團體、工會和非營利組織提出透過社會連帶建立在地經濟或是合作經濟，由下往上共同來解決社會問題（Moulaert and Ailenei 2005: 2041）。

英國提出社會創新與社會經濟倡議的政治背景也值得探究。1997年工黨調整策略後建立了新工黨，擊敗柴契爾的保守黨重新執政。新工黨拋棄國家社會主義和統合主義的立場，不再提供全面的社會福利，也不再以大規模製造業爲經濟發展的重點，在接受全球化的事實之下，主張英國需要積極地發展金融和文化創意等產業。另一方面，新工黨爲了展現和新自由主義保守黨的差異，因此將解決社會排除問題當成國家政策，透過振興地方與社區經濟，試圖解決貧窮問題並降低貧富差距。新工黨接受全球市場經濟的體制，並且積極地參與這項現代性計

畫，但認為透過國家調解的角色，保護並鼓勵社區、非營利組織去滿足社會公眾的社會需求，就可以在全球市場經濟中達成社會正義和提升公共福祉的目標。新工黨回到社區、回到公民社會的主張中，彰顯公民必須要為提升自己的生活福祉負起責任，不能再完全仰賴國家所提供的服務，這個主張和市場經濟的原則是共通的。新工黨將全球化（globalization）、平等正義（morality）與在地經濟（localism）連結在一起，社區的社會經濟所具有的政治意涵相當的強烈。總結來說，這就是新工黨在首相布萊爾的首席智囊英國社會學者 Giddens（2013）建議下提出的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沒有完全往左派路線進展，而是將市場與社會經濟做妥協，以吸引更多中間選民支持新工黨。

英國政府特別成立執行第三條路的任務單位——社會排除辦公室（Social Exclusion Unit），這是一個跨部會、直接向首相負責的單位，參與的成員除了官方代表之外，還有企業、地方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代表，組成18個政策工作團隊，針對不同的議題研究並制定推動政策。這個辦公室在成立一年後（1998年），發表「將英國團結在一起」（*Bringing Britain Together: A National Strategy for Neighborhood Renewal and the New Deal for Communities, NDC*）政策白皮書，指出社會排除的問題必須和社區、地方建立伙伴關係，並且一起努力解決，而不是由上往下的指揮命令。再者，推動社區發展的新政策（NDC），提供英國最貧窮的88個社區9億英鎊的經費，進行社會經濟的相關方案，以解決社區貧窮、教育、公共設施不足、犯罪與毒癮、企業發展、家庭與社區管理等問題。中央和地方政府不直接參與方案的推動，而是由地方非營利組織、企業、慈善機構共同合作，扮演第一線操作者的角色，通常是以社會企業或是基金會的形式運作。2001年有39個社區組成各種社會經濟組織，申請政府經費並發展社區經濟。

英國透過國家政策和經費支援，積極地介入社區或地方經濟、社區社會問題的解決，是促成英國社區型社會經濟組織（包括：社會企業、社區利益公司、非營利組織等）蓬勃發展的政治背景。這樣的政策是因應全球化的經濟發展造成國家內部區域、社區不平等兩極化的現象，所提出的對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



府、地方公民組織、社區組織合作是相當適切的方向，也賦予地方和社區解決社會排除問題的責任。然而，新工黨政府的基調是在全球經濟體系下提升競爭力、降低政府的支出，以及公民社會必須擔負滿足社會需求的責任，因此政府提供地方社會經濟組織、地方社會的經費協助，大多是短期且限制性高，這對於必須長期投入資源才能解決的社會排除問題助益有限。

從英國政府的地方問題應由地方社會經濟組織解決的政策立場來看，首先，社會經濟似乎被限定在邊緣、弱勢地區，但是社會經濟可能是區域的、全國的替代資本主義選項，不是只能解決社會排除的問題。例如，西班牙的 Mondragon (Kasmir 1996; Whyte and Whyte 1991) 或是加拿大的魁北克省 (Quarter et al. 2017)。<sup>4</sup> 其次，由於邊緣的、弱勢的社區缺乏經濟、教育、社會網絡、產業、管理與創新人才等各種資源，要發展社會經濟會遭遇到許多困難。如果沒有來自外部的資源投入和協助，這些社區的社會排除問題不可能僅靠發展在地社會企業或社會經濟組織而得到解決。就像社會運動的研究指出，最底層的公眾是不反抗的，必須有良心的支持者和外來資源投入，社會運動團體才能組織動員起來。再者，英國政府以補助經費方式與地方合作，但將解決邊緣社區問題的責任歸諸於地方公民團體，使得中央政府可以推卸職責。最後，英國政府補助不同社區，發展出一套地方歧異性、多樣性的公私協力運作模式，但無法透過中央政府統一的政策方案解決區域不平等、社會排除的結構性問題，因此無法發展出完整的政策論述，以爭取中產階級或都市居民的支持 (Amin et al. 2002: 27-30)。

新工黨強調個人必須負責任地找到工作，必須當一個願意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問題是，如果失業是全球經濟結構的問題，這種基於個人道德論述所規畫出來的社會經濟方案，可能只會讓失業問題、貧富差距問題更嚴重。2011 年倫敦市區發生的暴動很快地蔓延到英國其他城市，就充分顯示新工黨的社會經濟政策

---

<sup>4</sup> Mondragon 是一個大規模的合作經濟企業，由所有員工參與公司運作與分配公司的利潤。加拿大魁北克省則是由政府、民間部門與私人企業一起發展非營利取向的合作經濟和社會經濟。

成效不彰。透過社區、非營利組織創造的工作機會，大多是低薪且短暫的，加上政府強制要求領取社會福利就必須工作，許多貧窮、弱勢者不得不接受這些工作安排，結果卻有四成以上的工作者後來還是失業或轉入地下經濟，經濟和工作狀況更惡劣。整個社會經濟政策將弱勢者排除在主流勞動市場之外，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工作技能和資歷（Amin et al. 2002）；政策最後成爲監督管制那些無法從失業狀態回到工作狀態的弱勢者，這些政治菁英未預期的後果，顯示推動社會經濟的困境。

### （三）台灣的社區與地方社會再生政策

台灣在1987年解除戒嚴令之後，地方社會政策的主軸是社區總體營造，由當時的李登輝總統指示文化建設委員會（後來更名為文化部）推動。有學者指出社區營造被當成國家機器塑造台灣國族認同的工具，由上往下提供資源、製造社區營造風潮，欠缺社區自主的目的（王振寰、錢永祥 1995；王振寰 1996；劉立偉 2008；翁註重 2001；黃麗玲 1995），只是強調國家對地方社會的支配，限縮地方社會的自主性。另外一種觀點則是地方、社區不是完全被動的，即便在國家主導和提供資源之下，仍然可以利用這樣的機會發展出由社區自行規畫或設定的目標；將地方或社區視爲被動的從屬者，會忽略所有國家所推動的政策都很有可能發生未預期的後果（王文誠 2011；李丁讚 2007；魏龍達、謝昇祐 2009）。社區營造計畫發動後，各個地方文史工作室紛紛成立，社區發展協會也在各地登記設立，雖然大多數都積極地向政府爭取經費補助，但這些組織設定的目標與發展的軌跡卻是異質且多樣的，並不是國家可以完全控制的。

1999年發生的921大地震，使地方社會的生活與經濟受到嚴重衝擊，除了賑災的常規方案外，政府試圖透過社區營造模式來恢復地方社會的基本生活機能（陳東升 2017；曾旭正 2013）。2000年以後，國家部門又透過不同的部會提供社區營造與建設資源，例如，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台灣社區健康六星計畫、農村

再生計畫等（容邵武 2013），以重振地方產業、縮減地域不平等為目標，對於社區營造產生了正面與負面的影響（方孝謙 2008: 129）。

台灣政府對於地方的發展政策可以說是從 1989 年開始，當時經濟部已經開始推動地方小型企業；1992 年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設立輔導社區小規模與地方特色產業輔導計畫，1994 年改為社區小企業輔導計畫；2008 年創設地方產業發展基金，發展「一鄉一品」計畫。另外，經濟部商業司推動的「塑造形象商圈計畫」（1995-1988），雖然不是針對社區地方產業，仍有許多地方產業得到補助和技術協助。

文建會在 1995 年發動「社區總體營造」，預算編列五千萬元；1996 年提出「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區隔所謂的文化工業；2000 年又推出「文化產業之發展與振興計畫」。文建會社區營造經費的投入，對於促成社區產業、地方產業是重要的，例如，2003 年客家委員會提出「客家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以客家文化為核心發展產業。2000 年勞工委員會推動的「多元就業方案」，雖然和地方產業發展沒有直接的關聯，卻是提供就業經費補助最重要的來源。

民進黨在 2000 年首度執政，擔任過宜蘭縣長並有豐富社區營造經驗的游錫堃出任行政院院長後，延攬許多具有社區營造實務經驗的政務官，在 2002 年 5 月 30 日核定「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其中特別提出「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整合 62 項工作，編列三年 171 億預算，成為一個跨部會（文建會、農委會、客委會、原民會、經濟部等）國家級計畫。2005 年謝長廷擔任行政院院長後調整為「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以治安、產業、景觀、衛福、文化、生態保育等六大主軸為社區工作推動重點。此外，農委會在 2002 年推出「農村再生計畫」，對於農村軟硬的議題進行資源挹注；為了增加農村資源，確保法源基礎和經費規模，2010 年立法院通過《農村再生條例》，在 2010 年 8 月 4 日公布施行，十年編列 1,500 億投入 4,232 個農漁村再生。協助農村產業發展是「農村再生計畫」的重點之一，也可以說是農村地方創生，舉例來說，到 2015 年底，共

有2,511個農村接受培訓，共受理736件申請案，通過578件。

2012年9月9日行政院函示，農委會應邀請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文化部、環保署、原民會、客委會等（沒有教育部），建立農村再生相關計畫的資源整合機制。行政院後來根據《農村再生工作小組設置要點》組成「農村再生工作小組」，<sup>5</sup>成員來自國發會、文化部、原民會、客委會和農委會；同時要求國發會的重大公共建設要優先結合農村再生。2012年，行政院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希望呈現人文科學研究的社會貢獻，開始推動「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補助大學以社會創新方法，結合地方社會的公民團體，以地方主體、平等互惠的原則，協力探討地方社會問題，共同發展創新的實作方案，解決相關問題。大學是地方社會的重要成員，開放大學的邊界，藉由大學的專業知識、研究發展人力、地方社會問題導向的課程、充沛的學生人力資源，可以促成地方社會積極地發展自主性與韌性。在此之前，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於2007年下半年啟動「智慧生活整合性人才培育計畫」的先期規畫與試辦，並於2011年起正式啟動至今，逐步擴大推動智慧生活人才的培育工作，共有三個分項計畫，分別為：「智慧生活跨領域基礎與服務學習課程規劃與推動」，「智慧生活國際教育發展規劃實施」，以及「智慧生活在地創新與企業育成人才培育平台推動計畫」。2015年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又推動「人文社會科學基礎及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計畫」和「大學學習生態系統計畫」，鼓勵大學進入地方社會，建立與地方團體的伙伴關係，共同解決地方社會的問題。教育部有關社會實踐的計畫，在2017年統整為「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全面性地推動大學實踐社會責任。上述科技部與教育部的計畫都是促進大學從純粹知識研究的角色，部分調整為進入地方社會實踐，將理論與實作結合、教學與真實社會議題結合。雖然這些計畫由不同部會補助，因此沒有一個類似日本地方創生政策的總體戰略，缺乏計畫間橫向的合作，

---

<sup>5</sup> 農村再生相關資訊，可參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建置的「農村再生歷程網」（<https://ep.swcb.gov.tw/ep/Default.aspx>）。

但是提供大學比較多的自由空間，能依照地方社會特色和大學知識能力，參與地方實踐工作。

2016年國家發展委員會推動「設計翻轉、地方創生」計畫，編列1,980萬補助9個計畫，2017年則增加到15個縣市參與。這是從地方文化藝術的角度來推動，主要是參考日本一些地方透過藝術季或是社區設計方式來建立地方品牌，復振地方社會經濟。以設計來推動地方創生，可以在短期內看到具體成果，然而，如果沒有掌握到地方社會的特徵，例如，地方政治的複雜與關係取向，農業與生產製造業萎縮，行政組織能量不足等問題，將無法促成長期且永續的地方社會變遷（張力亞 2017）。

前面的討論簡單勾勒出台灣政府部門面對不同形態的地方社會，各自提出種種經費補助方案或是推動計畫，很明顯地欠缺跨部會之間的協調整合，雖然有一段時期由行政院組成國家重大計畫，但從來都沒有落實跨部會的合作協調，往往是在國家重要計畫的名義下各自推動工作。這是台灣和日本、英國最明顯的差異之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台灣並非內閣制國家，行政組織的剛性結構，不同部會之間壁壘分明，很難跨越邊界進行合作，即便有政務委員的編制，但是都需要仰賴行政院院長充分授權才能夠抗衡部會本位主義進行整合，多數時候院長對於部會首長的支持高於政務委員。此外，部會組織的彈性調整必須要透過修法，緩不濟急，無法隨著任務、功能或是社會變遷的需求來進行。

台灣的地方社會發展政策向來由政府部門主導，早期著重在塑造台灣人認同，之後隨著重大災難發生，以及區域發展不平等問題日益受到重視，因此朝向產業經濟、生態保育和社會安全等面向。國家並沒有要求地方社會承擔企業式的自負盈虧責任，但仍然期待可以達成自給自足的目標，這一點是台灣和英國的重要差異。相對來說，台灣地方社會還是存在彼此競爭資源和市場的情況，但由於經費取得主要來自補助，所以並不會像日本邊緣地區在故鄉稅上激烈競奪，邊緣社區又區分為贏家與輸家的再階層化現象。此外，台灣地方社會的差異在於在地組織的能力，在地組織間的對抗和衝突程度，以及對政府資源的依賴程度。簡單

來說，在地組織的能動性越高、在地組織間的合作協調程度越高、對於政府資源的依賴度越低，則越能夠自主地掌握地方社會變遷的方向，居民並且可以透過集體努力嘗試建立共同參與的直接民主與社會經濟制度。

#### （四）比較分析

前面三個小節分別論述日本、英國與台灣促進地方社會變遷的政策。根據國家地方社會復振政策處理的核心議題，經費與人力補助的基本判斷準則，制度創新、法律或是行政變革，國家設定地方社會的角色，地方社會間的互動關係，地方社會自主性，以及地方社會提出和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不同的社會經濟模式的可能性等幾個面向，可以清楚看出三個國家相關政策的異同（如表1）。

三個國家所處理的核心議題有所差異，日本和英國比較接近因應經濟全球化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但是日本集中在人口和地方產業問題，英國則是以解決失業、福利國家支出不足，以及限縮政府角色為重點。台灣是政治和經濟議題並重，一方面，因為在解嚴民主化後面對來自中國的威脅，政府亟須建立公眾的國家認同，以及可以落實民主制度的地方社會；另一方面，經濟發展造成區域不平等，非都會區的經濟衰退與人口老化、外移問題日益嚴重，必須要維持地方社會基本的社會經濟機能。經費與人力補助的原則，日本是以產業與人口問題為主，地方政府必須提出規畫案後競爭有限的經費；英國是為了解地方社會和公民團體擔負解決健康、失業、家庭、教育、犯罪等問題的責任，因此地方社會的需求是國家支持的主要考量。台灣政府對於地方社會的補助，先是透過社區培力與社區營造的模式，因此著重需求的考量，後續則逐漸走向要求地方社會累積能力，提出具體方案爭取經費補助。

國家對於地方社會的定位，這個結構性因素對於地方社會是否具有自主性、足以形成地方主體的社會經濟模式至關重要。日本政府是從新自由主義的立場出發，雖然補助地方社會，但期待地方社會可以在市場競爭中自負盈虧，並且自立

表1 日、英、台促進地方社會變遷政策比較

	日本	英國	台灣
核心議題	地方振興與地方創生 (人口都會集中化及少子女化、地方產業衰退)	1. 經濟全球化產業外移造成失業和福利國家制度瓦解 2. 降低社會排除	1. 國家主體性的建立 2. 區域間不平等與地方產業復興
經費與人力補助	以能力為基礎	以需求為基礎	需求與能力並重
制度創新	故鄉稅 地域活化協力隊 地方大學活化 地方創生人才支援系統	社區利益公司	1. 農村再生社區培力課程 2. 導入參與式預算社造3.0 3.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促進大學和地方社會協力合作
法律或行政變革	設立地方創生大臣與地方創生事務局	隸屬首相的社會排除辦公室	1. 農村再生條例 2. 鄉鎮區公所社造化
國家對於地方社會的定位	地方社會自負盈虧、競爭勝出的自立自強	地方團體可以取得資源，解決失業、教育、犯罪、居住、家庭等問題	培力後公民共同參與的地方社會或社區
地方社會的互動關係	全國市場競爭	部分經驗交流	縣市內部經驗交流
地方社會的自主性	低	中	中
提出不同的社會經濟模式可能性	低	高	高

自強，往後不再需要國家的資助。相對來說，英國和台灣是將地方社會當成輔助政府功能的工具，因此不同地方社會的競爭相對緩和，但要求地方社會要有逐漸創造經濟資源的能力。地方社會之間的關係在日本是競爭的，無論是一鄉一產品或故鄉稅，都要在全國市場中激烈競爭以爭取支持；英國和台灣的地方社會之間則有空間自我培力，並且可以透過社區間的合作或觀摩來進行社會實踐。在國家政策的介入和政治權力的影響下，若不考慮地方社會組織的成熟度，英國和台灣的地方社會具有比較高的自主性，可以發展出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模式，以及不同於代議民主的直接民主體制。

值得注意的是，分析地方社會自主與實作的能力，必須擺在經濟與政治結構下來討論，因為地方社會受到這些外在條件的限制，同時也在這個外部框架內創造地方社會新的機會，透過比較分析顯示，若將地方社會內部條件當成是相同的，英國與台灣的政治結構提供地方社會比較高的自我治理和發展的可能性。面對不同的外在環境，地方社會內部如何建立組織動員的機制？在遭遇各種公共議題時可以由下往上改變不平等的現況嗎？透過深入的分析打開地方社會如何動起來的黑盒子，可以回答相關問題。

### 三、自主地方社會建立的機制

地方社會要能開創不同的可能性，社會成員必須透過一些機制條件進行充分討論，因此地方社會的公共實踐並不是一個黑盒子，也不是地方社會自然就會發展出自主公共參與和社會實踐。了解地方社會所面臨的經濟、社會與區域不平等的問題，組織動員地方社會的成員共同參與並尋找解決方案，挑戰外在的經濟政治結構，改變長期以來地方居民的慣行和價值，並且建構地方社會未來的願景，這些都是必要的。由於地方社會具有地域性，共同使用具有清楚邊界的空間，這些物理空間具有外部性，物理空間使用的排除性，聚集的正負面效益，非正式網絡的社會支持、信任與安全感、認同等因素，對於地方社會居民具有無可取代的使用價值（Logan and Molotch 1987: 103-110）。本文根據筆者（陳東升 2012）探討社群治理與公共參與機制的架構，首先從地方社會形成的初始狀態來探究居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機制；接著是地方社會持續運作後居民必須展現互惠性的行為，建立一個共同投入公共事務的良性循環。然而，地方社會並不會保持在一個穩定和諧的狀態，偶爾會發生重大的事件或危機，如果地方上有組織者或是比較積極的團體能妥善利用時機，重新書寫過去的集體記憶，並成為移入且異質居民的情感認同，那就可能動員居民參與公共事務，也就是說，情感與記憶的層面對於促進居民共同參與也很重要。最後，地方社會隨著時間進展而出現不同的社會團



體，彼此間可能和諧相處，也可能因為利益、情感或人際關係衝突而產生對抗，對於發展共同治理機制會有負面影響，因此必須要相當程度地解決內部衝突以促進公共參與。

這個分析自主性地方社會形成的架構並沒有涵蓋地方社會各式各樣複雜的議題，因此顯得過度簡化，在可應用性上有相當大的限制。不過，這個簡化的分析架構仍然具有意義，一個新的地方社會或社區開始創設時，在社群經營上如果可以建立促進互惠性的機制，有助於這個地方社會的公共參與。這個架構對於有歷史但居民並不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地方社會尤有參考價值，主要是因為地方社會居民即便是冷漠、疏離的，仍然可能在重大公共事件發生後，地方社會過去的歷史成為組織動員的資產，在建立居民的地方認同後，進一步參與地方社會的公共事務。

### （一）強互惠、合作與地方共同治理機制

公共事務的參與具有外部性，擁有公共財的特性，經常是公共利益優先於個人利益，或者至少是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同等重要，因此，對於社會行動者的行為和態度預設，需要一個不同於自利的個人主義預設，採取一種強互惠（個人付出成本創造公眾利益，但沒有具體的個人回報）或是有條件利他主義的預設，來探討公眾參與公共事務和社會實踐的情況。一個強互惠的行動者在最開始的狀態，即便沒有個人利益、社會連帶等誘因，仍然會參與公共事務，因此公共事務作為一種公共財，不會發生搭便車（Olson 2009）或公共財的悲劇（Hardin 2009）。

地方社會的行動者有不同的立場，有些是極端個人利益取向，有些是極端強互動，有些則是在兩者之間，他們如何互動來維持並擴大公共事務的參與，可以從社會互動的過程以及社會互動的機制來探討。這些行動者有理性計算的部分，也有情感的、意義詮釋的面向。

如果我們假設一個地方社會是由獨立的個人所組成，還沒有形成各式各樣的社會團體，彼此之間是弱連繫的社會關係。不同地方社會或不同的社會團體建立起弱連結關係，可以達到傳播資訊、公共討論、探討社會整體公共資源使用的問題，還可以創造整個社會更為蓬勃的強互惠和公共參與文化。在一個自利的社會裡，只有很少數的成員是強互惠的，他們可以從他人，特別是弱連繫的他者，流露的各種線索中偵測出對方也是強互惠的行動者，而減少被欺騙的機會，這些人的互動促成更多的合作，以及更多公共事務的參與，最後帶來正面的回饋，逐漸成爲一個小的社會團體（Macy and Skvoretz 1998）。這些以強互惠爲主要行爲模式的小團體，雖然一開始數量稀少，如果他們有開放、豐富的機會和具有弱連繫的其他自利團體接觸，並且產生持續的互動；假設彼此互動的基本架構類似於囚犯賽局，雙方有互信且願意合作，將會帶來長期的利益，最終會將原來的自利行爲規範轉變成強互惠的規範。當這些團體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密，他們將會逐漸地擴張，進而取代那些以自利爲主要規範的社會團體（陳東升 2012: 20-21）。有些地方社會的社會團體成員積極地參與公共事務，並且發展出自我治理公共資源的機制，當這些團體和其他地方社會的團體接觸後建立弱連繫互動，那種以強互惠爲依據的公共參與模式將會逐漸透過和這些弱連繫擴展，進而成爲整個社會的核心模式。

具有強互惠的行動者，若和其他極端自利的行動者進行頻繁的互動，根據 Fehr 與 Fischbacher（2003）的研究顯示，強互惠的行動者一開始會付出，不計較他人的反應而付出，但是隨著互動次數越多，對方卻仍不願意付出，這個強互惠行動者付出的行爲就持續減少，到停止付出爲止。強互惠行動者的不付出，和那些搭便車的自利行動者不付出的理由是不同的，他們是以消極的方式（不付出）來懲罰那些自利者。在公共事務參與上的不付出有不同的原因，當人們開創出一套新制度，例如，由社區公眾討論出一套新的規範，也有很好的監督懲罰機制，原來不願意付出的強互惠行動者就會帶動其他地方社會成員參與公共事務（Ostrom 1990）。

一個地方社會如果有少數的熱心公共事務人士（強互惠行動者），他們可以透過社會互動的過程找到志同道合者，形成一個小團體共同參與公共事務，這樣在地方上就開始有一點基礎來影響大多數冷漠自利的居民。倘若這個小團體可以逐漸建立一些處罰搭便車公民的規範，那就可以更積極地促成社會成員投入地方公共事務。一個已經有相當歷史的地方社會，居民之間的社會互動會更複雜，因為既存的人情關係取向的互動模式有明顯的親疏遠近區分，大多數人只考量自己和親友的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再加上地方頭人透過樁腳系統維持並強化自己的政治經濟利益，一般人難以打破這樣的傳統社會關係結構。不過，如果少數具有聲望的地方人士，願意帶頭進行公益活動，並且吸引公眾追隨，就有可能逐步造成改變。楊弘任（2007）的研究就指出，地方上退休的老師、工匠帶頭打掃街道或是淨川，在地公眾觀察一段時間後判斷這些人不是要累積個人的政治或經濟利益，有些人就會跟隨參與這些簡單的公共事務。

## （二）團體認同、團體規範與互惠性行為對共有資源治理的影響

共有資源的建立和維繫，光是靠地方社會建立社會規範來約束成員參與公共事務，基本上並沒有辦法持續。更重要的是，社會成員必須在社會互動的過程中，不斷地透過實踐的行為來傳遞願意信任別人與值得別人信任的訊息，讓其他成員了解自己不是搭便車的人。美國社會學者 Anthony（2005）蒐集紐約州貧窮地區儲蓄互助會（Microcredit Borrowing Groups）的案例，分析團體認同、團體規範與互惠性行為這三個因素如何影響社會團體公共財的創造（更多人參與創造更多資金）與維繫（團體成員按時繳付該繳的本金和利息）。研究結果指出，團體認同對於創生公共財（從政府部門募集儲蓄互助會的贊助資金）有正面的影響，對於維持和延續公共財（儲蓄互助會違約還款率低，讓政府部門持續投入資金並維持原有的資金規模）沒有正面的貢獻。再者，團體規範對於創生公共財有

正面的作用，對於維持和延續公共財沒有促進作用。<sup>6</sup>互惠性行爲才是創生與維繫公共財最重要的因素，因為透過互惠性（按時還款的行爲）的互動，參與者可以用行動證明自己是可信任的，可以評估別人是否值得信任，取得評量團體成員必要的資訊，了解自己參與及使用公共財可能的風險等等。如果缺乏這樣的持續互動所提供的行爲資訊，那麼團體的合作就不可能延續。任何一個地方社會，即便大家有很高的團體認同感，如果沒有具體的行爲實踐可以來評量，或是測試團體成員可信任程度與確實履行互惠行爲意願，這個團體就不可能持續創造公共財。公共討論和公共參與就是一種公共財，根據前述研究的結果，地方社會的認同、團體擁有處罰不參與公共事務的規範，這兩個因素對於促進社會成員開始參加公共討論，以及推動公共事務有所助益；至於要讓這樣的公民參與持續，則各個成員必須以實際行爲來持續參與每項公共事務，讓其他成員觀察到自己投入公共事務的舉動，才能維繫公民共同推動地方事務的能量。

張正衡（2016: 76）針對北海道社區的研究發現，地方公眾透過食物餽贈的方式來表現互惠性行爲，社區的主要參與者 Yama 夫婦將先前寄宿者寄來的禮物、朋友旅行帶回的伴手禮、在地漁民分享的海產、社區居民栽種的蔬果等，轉贈給有需要的民眾，贈送的原則是誰最需要、誰還沒有回禮、誰生病或未露面；利用送東西的過程來組織與維繫社區連帶，後續引發帶動更多的食物互惠性交換。這樣的社會互動是一個社區可以自主維持的重要機制。

### （三）重大事件、集體記憶與認同和公共參與

當然，鄉鎮居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社會互動中帶有感情，是一種習而不察的慣行。這種情感經常來自居住在某個地方而共同享有的集體記憶，這些記憶可以在

---

<sup>6</sup> 這裡提到的團體規範是在未按時繳款後才進行處罰，違規行爲和處罰之間可能時間相隔太長，無法發揮效果。所以，Ostrom（1990）主張的團體約束機制是逐漸但立即處罰的機制（immediate graduated sanction mechanisms）。

重大事件發生時，透過挪用與編成，重新書寫建構這個世代居民的地方情感和認同。具體來說，地方社會通常是一個有地域邊界的行政單位，在這個特定的空間定居後，社區和其他的社區之間存在著絕對空間和社會邊界，創造出相對空間的內涵。社區的成員只要有互動，接續這個絕對空間過去的歷史，並且開展未來的可能性，就能發展出意義的空間，也就是地方感。雖然，當代（後現代社會）人際網絡關係快速且廣泛的拓展，建立了不受絕對空間限制的社群組織；同時，社會行動者日常生活中必定有一段時間固定停留（居住）在某個絕對空間，這個空間的成員雖然停留時間長短互異，彼此間的異質性也相當高，他們仍然會在這個絕對空間內形成社區（類型多樣的社區），創造不同程度的地方感。

Prazniak 與 Dirlik（2001）就提到「沒有同時改變空間，地方的改變將不可想像」，這個論點可以進一步衍生為：沒有空間限制、需求與促成，社區的形成是不可想像的，地方社會的變遷也是不可想像的。社會行動者和絕對空間存在必然的連結，絕對空間的距離、絕對空間使用的需求（如，停車、居住、人行道、公園）<sup>7</sup>對於社會行動者是一個限制，也是一個作用的因素。透過持斷的空間使用（如，種樹、帶小孩在公園遊戲）、空間的移動（如，巷弄漫步），都有可能創造和地方的連結情感，發展社區共同的記憶。莊雅仲（2014）研究1995年永康街的社區運動，就是從一條巷弄道路拓寬將會縮小永康公園的面積，影響居民休閒和兒童遊戲的絕對空間，因此當地居民（特別是媽媽、未婚女性）發起保護樹木拯救公園的運動。這個絕對空間的使用需求，促使原來有點鬆散的社區人際關係及社區組織逐漸發展起來，顯示即便在一個類似社區瓦解狀態的社區，也可以組織與動員起來。社區成員開始透過一些活動來挖掘社區過去的歷史，書寫這個社區的共同記憶，進而建立社區認同和社區意識。社區作為一個具有絕對空間邊界的單位，彰顯社區具有的個別或集體的空間需求的重要性，因為這樣的絕對空間

---

<sup>7</sup> 空間的使用需求通常具有外部性，使用空間對於社區居民產生連動的影響。空間的使用需求問題很容易促成原來脆弱、薄弱的人際連繫發展成社區組織。

特性，可以發展出意義的空間（地方感），並且建立社區組織，社區這個概念因此具有理論上的重要性。

隨著保護樹木拯救公園運動的發展，社區團體（永康協會）進一步提議將永康公園西側打造成文化步道，卻受到當地商家極力反對，主要原因是縮小道路會影響到車流和生意，因此在社區內部產生衝突和對立，顯示社區運動、地方感持續存在矛盾或對立，社區和地方感不必然是具有共識且和諧的。莊雅仲（2014: 165）指出：都市人數增加、異質性提高、快速移動、遠距離人際關係的繁衍，並不會降低社區在都市的位置，以地域為基礎的社區，仍然是都市變遷革新的重要集體行動者之一，社區運動是可以作為一種集體都市生活的一個地方（改造）計畫。這個研究案例顯現，在一個社會關係零散的地方社會，因為絕對空間的共同需求，重大事件（拆除公園）發生，領導者組織動員，以及重新書寫過去集體記憶打造社區認同後，可以發動居民參與公共事務。

這些社會團體雖然建立動員網絡，仍然需要一些可以很容易發動的公共討論和公共參與平台，這樣的平台可以是實體場所或虛擬的網際網路。平台的存在，首先是讓有影響力的社會團體更積極地發起公共議題討論、推動公共參與，因為他們可以因此得到比較正面的肯定，而且可以發揮影響力（Willer 2009）。再者，如果這個發動公共參與的平台，有事件文字與影像紀錄可以傳播，發動者可以透過平台邀集不同成員參與，共同關心事件的後續發展，透過資訊更新傳播，隨時提供事件的相關資訊，有助於增加成員的情感連結，以及對於鄉鎮社群的認同，自然能夠提高這些社會行動者後續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以公共提案媒合的網際網路平台，就是發動門檻低，容易連結到廣泛的社群成員，並且有提供及時事件資訊的機制。

#### （四）地方社會內部的差異性與共同參與機制的形成

雖然地方的感情、地理空間的外部性和地方衍生的社會連結，使得在地居民

享有一定程度的公共財和共同福祉，必然會成為公共參與的群體。不過，地方社會公民的差異和異質性不會因而消失。地方社會中公共事務的參與，因為公民或是公民組織並非同質的，彼此有不同的利益和價值，所以經常充滿著內部的矛盾和衝突。由於本文在這裡要探討的是鄉鎮社會團體間的互動，因此將差異視為社會團體的，而非個人層次的，以方便討論。

地方社會的差異會來自社會類屬的差別。第一，宗族、血緣和地緣關係的連結程度不同，形成費孝通所描述的差序格局。第二，社會經濟地位的差別也是重要因素。社會經濟地位高的能夠動員的資源多，因此有比較多的時間投入公共事務，影響公共政策，獲取這個社會團體的獨特利益（蔡瑞明 2002）。另外，由於社會經濟地位高的團體，他們的訴求被認為能反映整個地方社會的普遍利益，例如，教育改革、富有社區的擴大發展引起外來投資等，因此會受到廣泛的支持。至於經濟不自主的社區或社會團體，參與公共事務的訴求，常常是為滿足自己團體的需求，而被其他公眾視為是自利的（Logan and Molotch 1987: 135-136）。社會優勢與弱勢兩種類型的地方社會團體，社區的參與能力、參與正當性不同，使得參與的結果產生差別性的利益，更強化社會經濟地位的差別，當然也不利於地方社會整體公共利益的追求。第三，地方社會的差異也會來自公眾的價值、信念或（政黨或族群）認同的不同。例如，對於地方社會變遷採取發展導向，和強調生態環境保育的團體或社區，會有不一樣的主張，使得公共事務的討論和推動產生歧異或衝突。有學者主張倡導成長發展的集體行動者比較容易整合內部的歧見，因為他們擁有比較多的資源可以進行整合，而成長發展所衍生的利益是明確共享的（Logan and Molotch 1987: 64-65）。最後，地方社會的差異有時會來自政府有限資源的分配，或者是經濟制度競爭所造成。

假設一個鄉鎮所有的居民都參與不同的社會團體，而這些團體存在著上述的差異性，那麼，這些團體在不同社會脈絡下進行公共事務的互動，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台灣鄉鎮最重要的公共議題是發展地方產業以維持居民的基本生活，因此大多數居民都會同意發展導向的成長主義，認為引入更多的投資，創造地方就

業機會，提高土地房屋價格，會對所有居民帶來正面的經濟後果。然而，鄉鎮內不同的社會團體在整個成長過程中，獲得利益的程度是不同的，受到經濟發展主義導致負面影響的程度也不相同。那些獲利最多的通常是政治經濟地位高，能夠積極遊說政府部門的政策，相反地，那些受益最少的可能受到最大的土地炒作、開發污染等傷害，卻是動員影響力最低的。這兩類不同的鄉鎮社會團體雖然都支持發展主義，即便從數字上看鄉鎮的經濟成長率增加，但是這樣的鄉鎮發展，結果很可能是排除了鄉鎮中的弱勢社會團體（Logan and Molotch 1987）。<sup>8</sup> 鄉鎮內的不同社會團體共同支持的公共經濟政策，可能也經過一些公共討論，結果卻造成鄉鎮內部更大的社會不平等。因此，鄉鎮公共事務的討論和決策應該建立在讓最弱勢群體得利的原則上（Rawls 2009），以避免公共參與的結果是社會排除與強化社會不平等。

那些被排除的社會團體在經濟上無法維持，或者說連維持基本生存的使用價值都有困難時，就會採取社會運動或革命等抗爭（Scott 2008），不同團體的衝突對抗可能發生，而且必然不利於後續的公共討論和公共事務參與。舉例來說，在某個鄉鎮中，當資源匱乏的農民灌溉用水被徵收作為工業用水，影響要繼續耕作農民的生存，以及他們維護土地農用的使用價值時，農民在有組織條件、抗爭資源的協助下，很可能採取激烈的社會抗爭。然而，若是缺乏資源和外來專業組織或成員的支持，抗爭的目標經常被其他優勢群體視為爭取私利，社會抗爭並不容易發動，或者即使發動了也很難得到支持。

簡單來說，缺乏一套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鄉鎮居民和社會團體的異質性會不斷地強化，不利於社會團體間建立信任和互惠，各個社會團體會以維護自我的利益為主，不願意考量鄉鎮整體的公共利益，如此便難以推動積極的公共參與。此外，如果公共參與的結果是製造社會不平等，這種公共參與的意義就很有限。

討論地方社會的公共參與，必須要分析地方社會內部不同空間尺度（如，聚

---

<sup>8</sup> Logan 與 Molotch（1987）所指出的城鎮升級的鐵則（Iron Law of Upgrading）。



落、村里、跨村、鄉鎮)的公民及公民組織的連結關係，否則便無法擺脫狹隘地域主義的限制，達成整個民族國家，甚至人類社會共善的目標。以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來說，在尋求利益極大化的過程中，必然會形成資本積累的危機(Harvey 2006)，但不同的社會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程度不同，受到資本積累危機爆發後的負面衝擊也有所差異，通常貧窮的國家區域、經濟不自主的社會群體受到的傷害最大，因為國家財政危機、通貨膨脹、失業率提高等，會先影響到這些弱勢區域和社群。然而，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一種內涵競爭的機制，不僅是資本家與資本家之間激烈競爭，也是國家與國家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社區與社區之間的競爭；當一方取得經濟成長成果，在缺乏重分配機制下，就會造成另外一方的損失。這樣的零和競爭擴大社區或社會團體之間的差異，社區間、鄉鎮間的對抗與衝突就很難避免。在這個意義底下，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利於整個國家、社會民主參與的經濟結構條件，也是從鄉鎮提高到縣市、國家社會的民主參與必須要克服的議題。

有許多公共資源(如，空氣、水資源、山坡地)、制度維繫(如，合理的年金給付、全民健康保險、國民教育)必定是超越鄉鎮邊界的，狹隘的地域主義將使鄉鎮、社區競逐自己的公共利益，排除其他人分配使用的權利，導致所有集體行動者在高度競爭、高度不確定的情況下，在當下立即使用可以掌控的資源，使得公共財悲劇隨之發生。

狹隘地域主義的公共參與如果沒有察覺到結構性的限制，可能產生的問題是虛假公共意義的民主實踐。當一個都市地價高的行政區透過公共參與、社會運動來保存自己地區的文化資產、濕地、住宅土地，但並非作為開放給所有公眾的社會公益目的使用，雖然保存這個區域的寧靜生活方式，但因此提升行政區的房屋土地價格，缺乏重分配與行政區以外的居民近用空間環境的機制，卻是助長都市房價的炒作，更為融入市場競爭、地方成長的體制，製造更多的社會不平等。都市行政區或鄉鎮區的公共參與需要有廣大對外連結的網絡，討論共同面對的問題，並且透過這樣的溝通討論來發覺結構性的議題。鄉鎮之間的組織連結要具有

更高的開放性，可以透過創新模式使用低廉方便的平台來連結不同的社區、組織或個人。例如，鄉鎮公共事務參與的換工住宿網絡登記平台，提供外地年輕人免費住宿，換取協助撰寫地方社區公共需求提案書，或是辦理社區居民審議民主的公共議題討論等，這樣可以很快速地帶入外來的人力資源、意見和操作模式，增加地方社會思考方向和討論內涵的多樣性與豐富性。

地方社會（在鄉鎮層次）的變遷與改革是台灣經濟和民主鞏固、深化的基礎，但是鄉鎮地域取向經常會對社會改革造成阻礙。第一，因為地方社會是建立在宗族與地緣的特殊主義之上，要轉變成以公共利益為取向的普遍主義的社會互動方式，並不容易。第二，地方社會的經濟結構是高度市場競爭的小農經濟，特別是長期以來的農業政策扭曲地方農業發展，在生產上能夠取得的資源相當有限的情況下，農民被迫考量立即但短暫的利益，對於犧牲部分個人利益、參與公共事務，以維護長遠的利益造成阻力。第三，地方社會的政治結構經常是以宗族、親屬和地緣關係發展出地方派系，透過領導者分配追隨者恩惠來運作的侍從主義，公共資源和公共利益都轉變成個人利益，地方政治的運作無法展現公共性，也無法依照政黨政策和候選人素質的良窳，來決定個人如何參與民主政治。第四，鄉鎮級的地方政府及民意機關在這種特殊主義、侍從主義運作下所選出的民選政治領袖的治理下，經常呈現失能與失效。鄉鎮面對地方產業的衰退、地方公民社會的弱化，以及地方民主政治體質不佳的挑戰，必須做出改變。

#### 四、結論：地方社會作為社會變遷基礎的理論意涵

本文的分析架構是將一個社會的變遷擺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經濟體系下，透過開放競爭的機制，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國家內部區域的不平等也隨著出現，許多地區或是地方社會無法獲得維持運作的合理資源，因而促使國家採取一些地方治理政策來回應這些區域不平等所造成社會排除的抗爭，以穩固國家統治者的權力正當性。本文透過日本地方創生政策、英國社會創新及社會經濟政策與

台灣社會實踐推動政策的比較分析，說明國家權力和政策對於地方社會的作用是必須系統性的探討，以便彰顯國家權力對於地方社會變遷與建立主體性的可能影響。相較之下，日本政府在中央部會的組織調整和資料分析的工作非常有成效，但是在地方社會的自主性建立，特別是公眾共同參與能力的提升和參與機制的建立上則是著力有限，可能是日本過於專注人口平衡分布和地方產業的發展。英國和台灣則是投入比較多的資源在建立具有自主性、在地居民共同參與的社會經濟和直接民主的模式。

其次，全球資本主義的拓展，深入到各個地方社會在生產、消費與交換，產生顯著的影響，改變地方社會的經濟模式、政治權力分配與社會互動關係，但是這些外部經濟結構介入也可能創造新的變遷機會，促使地方社會面對各種問題展開組織動員，建立在地合宜的生活方式。地方社會要建立主體性是牽涉到文化、經濟與政治的面向，社會成員基本生活資源要有保障，且能夠彼此支持的另類經濟體制，而經濟資源分配和其他公共事務的治理需要有地方成員積極參與，這樣才有可能創造自主性且具有韌性的地方社會。換句話說，外在結構是限制也是開創地方社會可能轉變的機會，但是需要透過地方社會成員共同參與運用團體規範、認同、互惠行為、集體記憶等元素，來建立一些可以讓成員互惠與信任的機制實現這樣的內部轉變。

地方社會內部的公共參與不是一個黑盒子，而是必須從社會互動的角度來探究地方社會的公眾在彼此交流和參與的過程中，如何給予那些一開始就熱心推動公共事務的成員正面的評價，讓他們願意繼續對地方社會付出，並且帶動其他成員參與公共事務。地方社會的認同、共享集體記憶、持續展現的互惠行為，都是可以鼓勵社會成員參與公共事務的媒介，但是必須考量合適的社會狀態，利用這些不同的元素來進行共有資源的建立和維繫。當更多民眾參與後，如果出現少數搭便車的行動者，必須要建立懲罰機制來防止自利的行為，以避免影響其他的民眾投入公共事務的意願。

## 參考文獻

- 川北泰伸，2016，〈地方創生における自治体の現状と政策実施〉。《同志社政策研究》（特集号）：27-43。
- 方孝謙，2008，〈社會資本與社區營造：比較林邊與北投〉。《社會科學論叢》2：127-164。
- 王文誠，2011，〈反身性的社區營造：實踐性的地理學想像〉。《都市與計劃》38：1-29。
- 王振寰，1996，《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台北：巨流。
- 王振寰、錢永祥，1995，〈邁向新國家？民粹威權主義的形成與民主問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17-55。
- 市川頭，2017，〈安倍政權の「地方創生」をどう見るか：競争と共感の必要性（Reference Review61-1号の研究動向・全分野から，リファレンス・レビュー研究動向編，2015年7月～2016年5月）〉。《産研論集》44：170-171。
- 李丁讚，2007，〈社造，一種生命工程〉。收錄於楊弘任著，《社區如何動起來？》，頁9-29。台北：左岸。
- 村上裕一、小磯修二、関口麻奈美，2015，〈「地方創生」は北海道に何をもたらしたか 道内自治体調査の結果とその分析を通して年報〉。《公共政策学》。
- 岡田知弘，2015，〈地域經濟衰退の要因と地域再生の処方箋：新自由主義的「地方創生」への対抗軸（特集破壊される地域：その眞の再生のために）〉。《法と民主主義》498：4-11。
- 長村知幸，2017，〈地方創生事業の創造プロセス——内閣府「地方創生人材支援制度」第1期生の経験から—〉。《地域活性学会研究大会論文集》9：422-425。
- 容邵武，2013，〈文化親密性與社區營造：在地公共性的民族誌研究〉。《臺灣社會學刊》53：55-102。

- 翁註重，2001，〈試論地場性產業——文化產業的地方特性與時空意義〉。《工業設計》29(2)：160-167。
- 張正衡，2016，〈根莖狀的社區：新自由主義下的日本地方社會〉。收錄於黃應貴主編，《21世紀的地方社會：多重地方認同下的社群性與社會想像》，頁47-100。台北：群學。
- 張正衡，2017，〈「地方創生」政策作為日本地方治理新模式〉。巷仔口社會學，<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7/03/28/changchengheng/>
- 莊雅仲，2014，《民主台灣：後威權時代的社會運動與文化政治》。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陳東升，2012，〈社群治理與社會創新〉。《臺灣社會學刊》49：1-40。
- 陳東升，2017，〈另類經濟模式的比較與探討：台灣的經驗〉，收錄於林宗弘、李宗榮主編，《未竟的奇蹟：新世紀台灣的經濟社會學》，頁571-610。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曾旭正，2013，《台灣的社區營造：新社會、新文化、新「人」》。台北：遠足文化。
- 蔡瑞明，2002，〈臺灣的社會階層化過程〉。收錄於王振寰編，《臺灣社會》，頁165-200。台北：巨流。
- 黃應貴，2016，〈多重地方認同下的社群性與社會想像〉。收錄於黃應貴編，《21世紀的地方社會：多重地方認同下的社群性與社會想像》，頁1-45。台北：群學。
- 黃麗玲，1995，《新國家建構過程中社區角色的轉變——「生命共同體」之論述分析》。台北：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弘任，2007，《社區如何動起來？黑珍珠之鄉的派系、在地師傅與社區總體營造》。台北：左岸。
- 閣議決定，2014，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総合戦略について。
- 劉立偉，2008，〈社區營造的反思：城鄉差異的考量、都市發展的觀點以及由下

- 而上的理念探討)。《都市與計劃》35(4)：313-338。
- 橋本恭之、鈴木善充，2015，〈ふるさと納税制度の検証〉。日本財政学会第72回大会報告論文。
- 魏龍達、謝昇佑，2009，〈民粹威權主義？從社區總體營造的推行重探1990年代的民主論述〉。《國家與社會》7：87-138。
- 簡嘉穎，2016，〈繳稅換牛肉 故鄉稅正反熱議〉。上下游新聞市集，<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83899/>
- 農村再生歷程網，<https://ep.swcb.gov.tw/ep/Default.aspx>，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 Amin, Ash, Angus Cameron and Ray Hudson, 2002, *Placing the Soci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 Anthony, Denise, 2005, "Cooperation in Microcredit Borrowing Groups: Identity, Sanctions, and Reciprocity in the Production of Collective Goo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0(3): 496-515.
- Castells, Manuel, 1977,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Fehr, Ernst, and Urs Fischbacher, 2003, "The Nature of Human Altruism." *Nature* 425: 785-791.
- Giddens, Anthony, 2013,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 Harvey, David, 2006, *The Limits to Capital* (new and fully updated edition). London: Verso.
- Kasmir, Sharryn, 1996, *The Myth of Mondragón: Cooperatives, Politics, and Working-Class Life in a Basque Tow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Logan, John R. and Harvey L. Molotch, 1987, *Urban Fortun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cy, Michael W. and John Skvoretz, 1998, "The Evolution of Trus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Strangers: A Computational Mode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3(5): 638-660.
- Moulaert, Frank and Oana Ailenei, 2005, "Social Economy, Third Sector and Solidarity Relations: A Conceptual Synthesis from History to Present." *Urban Studies* 42(11): 2037-2053.
- Olson, Mancur, 2009,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strom, Elinor,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razniak, Roxann and Arif Dirlik, 2001, *Places and Politic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Quarter, Jack, Laurie Mook and Ann Armstrong, 2017,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Economy: A Canadian Perspectiv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Rawls, John, 2009,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Edition*.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ocial Exclusion Unit, 1998, *Bringing Britain Together: A National Strategy for Neighbourhood Renewal and the New Deal for Communities*. London: The Stationery Office.
- Scott, James C., 2008,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Whyte, William Foote and Kathleen King Whyte, 1991, *Making Mondragon: The Growth and Dynamics of the Worker Cooperative Complex*.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iller, Robb, 2009, "Groups Reward Individual Sacrifice: The Status Solution to the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4: 23-43.

## **External Structures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s in Local Taiwan Community Social Practices**

Dung-Sheng Chen

###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most important influences of global economic systems and policies enacted by individual nation-states on local communities, this article compares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olicie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Japan, and Taiwan. Under variou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straints, communities are still capable of encouraging individual members to engage in public affairs and to establish social economic systems, but only if they successfully establish bottom-up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mechanisms such as social group identities, group norms,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reciprocal behaviors.

**Keywords:** local societies, loc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social economy, strong reciprocity, communitarian governance





## 2

# 東臺灣的真實烏托邦實踐： 人社實踐計畫、社會賦權與參與式治理

戴興盛、鄧湘漪、謝若蘭（Bavaragh Dagalomai）、  
謝柏宇、賴富庭、程廷（Apyang Imiq）、吳勁毅、要之璘、  
鍾文觀（Sifo Lakaw）、張滌之、莊慕華

---

戴興盛，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

鄧湘漪，通訊作者，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Email: hiteng@thu.edu.tw。於2016年8月至2018年1月任職國立東華大學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博士後研究員。

謝若蘭（Bavaragh Dagalomai），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教授。

謝柏宇，於2014年10月至2018年6月任職於國立東華大學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專任助理。

賴富庭，於2014年10月至2018年6月任職於國立東華大學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專任助理。

程廷（Apyang Imiq），於2015年7月至2018年2月任職於國立東華大學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專任助理。

吳勁毅，於2013年8月至2016年6月任職於國立東華大學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博士後研究員。

---

要之璘，於2015年4月至2018年6月任職於國立東華大學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專任助理。

鍾文觀（Sifo Lakaw），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博士生，於2016年2月至2018年6月任職於國立東華大學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兼任助理。

張滌之，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與澳洲麥考瑞（Macquarie）大學地理與規劃學系雙聯博士候選人，於2016年7月至2018年6月任職於國立東華大學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兼任助理。

莊慕華，於2015年10月至2018年6月任職於國立東華大學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兼任助理。

## 中文摘要

東華大學人社實踐團隊以「安居東臺灣：社會賦權與參與式治理」為主題，與在地的協力伙伴共同打造超越國家權力與經濟權力的替代方案。本文探討計畫聚焦的三個場域，以及三個貫穿各場域的議題，包括支亞干、中平及太平、磯崎三個場域，以及文化照顧、原住民族土地、民族教育等三個議題。本文在理論層次上與 Wright 在《真實烏托邦》一書中所提出的七種社會賦權與參與式治理模式進行對話，探討替代發展方案在東臺灣的可能進展與所面臨的限制。

整體而言，在本文的三個場域中，由東華團隊與場域議題伙伴協力的人社實踐計畫，到目前為止已經產生正面的影響，究其原因應來自多方協力伙伴的態度與作法，包括：以知識為基礎的行動，謹慎地考量計畫資源進入場域可能產生的影響，以及對場域倫理的重視。

本文根據 Wright 所提出的分類進行分析，發現計畫各場域及議題所涉及的實踐模式，主要為國家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結社民主，次要為參與式社會主義、社會民主式國家主義的經濟管控，目前還沒有進入社會資本主義與合作市場經濟這兩種模式。這顯示目前涉及的實踐模式主要是處理社會權力與國家權力的互動，較少觸及與經濟權力的互動，而這也指向未來所需要加強投入的方向。從社會賦權的角度而言，社會權力的確已經發揮作用，開始對國家權力與經濟權力展開民主控制，至於社會權力本身的民主化，也已經在部分場域中展開。在理論層次上，本文建議可以修改 Wright 所提出的架構，將各種通往社會賦權路徑連結中的路徑4，由單向的社會權力影響國家權力，修正加上國家權力可能影響社會權力的路徑。然而，這個理論修正建議並不意味國家權力是社會權力主要或唯一的來源，事實上，在地社群長期自我組織培力所累積的能量，是社會力更為長遠的根基，同時，在適當地運用國家權力下，類似人社實踐計畫的國家力量或許能在既有的基礎上加入培育社會力的新能量。

在參與式治理的三種制度形式中，目前運用最廣泛的途徑為結社民主，我們

可以看見結社民主強化了直接民主；直接民主的進展，則可見於部分場域與議題中；透過代議民主進行參與治理目前尚未發現。總結而言，結社民主的確一定程度地達成四個目標，包括：協助減緩資源不平等的問題，促進公民教育，協助政策執行者解決資訊問題，以及成爲集體解決問題中的關鍵行動者。

**關鍵字：**社會創新、社會賦權、參與式治理、東臺灣

## 一、前言

國立東華大學於2013年7月開始加入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以下簡稱人社實踐計畫）團隊執行第一期計畫時，以「新世紀東臺灣的脈動：經濟生活、人文創新與社會培力」為主軸，面對資本主義下結構性壓迫關係的區域特殊性，進入實踐場域以釐清相關面向的挑戰。東華團隊透過結合各層級的組織，串聯不同專業背景的成員進行傳統知識的蒐集、建構與傳承，以陪伴與協力的方式醞釀出鄉村社福和醫療、民族教育、土地共管機制、法律服務與專業人才培養、藝術介入、知識體系的建構等議題，並透過相關課程的規畫以及師生進入場域的實作，參與學習在地文化傳承，並且積極地與在地長者、文創工作室、社區發展協會、部落青年組織成員、非營利事業組織等進行共同培力，確認「互為主體鑲嵌模式」的角色。

在第一期計畫的實踐過程中，東華團隊理解到，東部區域的人口、地理、經濟、政治與公民結社雖有特殊性，在根本問題的理解或是針對問題的解決路徑可能有不同論述，但是在本質上，東部區域問題仍指向全球化下的資本主義壓迫，以及國家體制下不正義結構的限制，<sup>1</sup>因此影響了整體區域發展走向。舉例而言，東部過去即有相當多的公部門專案介入扶植經濟發展，但因為這些經費挹注並未針對根本問題的解決，反而造成更多的族群、階級與性別的多層次剝削，導致更多的結構性不平等問題。因此，東部的區域性發展遲遲未能發展適合區域特殊性的經濟模式，創造多數人期許的「安居東臺灣」的境況。

為了回應東臺灣的特殊議題，東華團隊的問題意識聚焦於在地社群如何透過培力與參與，去面對資本主義與國家體制結構性各層次的多重剝削，邁向多元替代性社會經濟的可能性。因此，我們必須尋求適切的理論出發點，因為東臺灣固

---

<sup>1</sup> 例如，延續至今對原住民族土地與自然資源權的法制現況，即為限制原住民族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並為主要的轉型正義議題。

然有特殊的脈絡，但資本主義與現代國家作為影響全球的體制，人類社會在不同脈絡下已經累積許多不同深度與厚度的超越實踐經驗嘗試，可以成為東臺灣創新與實踐的參考對策。

東華團隊在經過第一期計畫三年的實踐經驗後，決定延續「安居東臺灣」的總目標，以 Erik Olin Wright 的著作《真實烏托邦》（2010）作為跨領域理論的對話基礎，並將探討議題聚焦於「社會賦權」（social empowerment）與「參與式治理」（participatory governance）的在地應用和具體行動方案的操作。我們試圖掌握理論的探討，透過這個計畫在東臺灣與在地的人們共同促成社會賦權與參與式治理，找尋超越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並積極有效地回應資本主義已經帶來的負面衝擊，促成可以安居的東臺灣理想烏托邦。計畫團隊在實踐場域中探討東部區域性的重要公共政策議題，包括：社會、經濟、參與式地方治理、原住民族土地與發展、文化照顧、民族教育、文化、環境治理、法律等，以及上述各議題如何透過「社會賦權」與「參與式治理」的理念，具體實踐可操作性方案。透過團隊中不同專長教師社群的自主性參與，互補各領域的專長與視野，共同在開放性參與平台的理念下，提出屬於在地性的學術關懷與思辯核心，致力於以問題解決導向的方式，找尋東臺灣替代性社會經濟方案的可行性（國立東華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中心 2016）。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針對問題意識、東臺灣脈絡、理論基礎、社會賦權與參與式治理模式進行反思之後，探討東華團隊在人社實踐計畫實作場域內的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議題，包含各項以「社會賦權」與「參與式治理」為基礎的行動方案。本文試圖回答在歷經四年的研究與實作的相互反饋後，社區／部落、公民社會、經濟組織、政府機構與大學已經展開協力合作，試圖解決東部地區面臨的重要議題，那麼，Wright 在《真實烏托邦》一書中所提出的七種社會賦權與參與式治理模式，在東臺灣的可能進展與所面臨的限制為何？這個階段性的反思，或能為計畫團隊與協力伙伴本身，以及為臺灣方興未艾的社會創新工作，提供未來實踐的參考點。

## 二、文獻探討

在推動人社實踐計畫的過程中，計畫團隊本身與團隊外人士經常提出的主要問題是：何謂人社實踐計畫所追求的創新？針對這個議題，我們認為人社實踐計畫的主要目的不是追尋資本主義體制運作下所強調的創新，因為當代體制下已經不斷強調，並給予經濟利潤導向的創新活動相當的空間。相對地，人社實踐計畫所試圖探究並有意識地實踐的，應該是當代體制下所欠缺的社會創新。

陳東升（2012, 2013）認為，社會创新的主要目的是創造公共財與提升社會福祉，強調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調和，注重參與、合作、互惠、分享、平等和公民情誼等特質；社會创新不僅是為了滿足公民的基本需求，也努力改變既有不正義的經濟、社會與政治權力分配體制，因此，社會创新涉及治理與政治的變革。在當代市場失靈與國家失靈的脈絡下，社群治理（communitarian governance）應是重要的替代模式，因此其應用是社會创新的具體實踐。

從學理上而言，創造公共財與提升社會福祉經常涉及到兩種市場機制難以處理的財貨（goods）與服務（service）形態：公共財（public goods）與共有資源（common-pool resources）。公共財指涉的是沒有排他性（excludability）與消費敵對性（rivalry in consumption）的財貨或服務，共有資源則具有消費敵對性、但不具有排他性。這些特質造成公共財與共有資源在治理上的古典難題：人類社會需要集體行動以治理公共財與共有資源，但人們傾向於以搭便車（free-riding）的行為逃避應負的責任。這是典型的社會困境（social dilemma）（Ostrom 1990）。

社會困境雖然不容易解決，但並非無解。例如，在過去數百年來，人類社會逐漸仰賴國家權力來試圖克服社會困境。另一方面，面對常見的市場失靈與國家失靈，許多學者也主張社群治理應是重要的替代模式（Ostrom 1990; Bowles and Gintis 2005）。同時，Ostrom 雖然呼籲世人應重視社群治理的重要性，但她也透過廣泛的研究指出人類社會不應期待有萬靈丹可以解決所有形式的問題，她強調應在市場機制、國家管制與社群治理這三個路徑間，視脈絡靈活調整作法，以



及很多時候人類社會需要的不僅是單一路徑，而是兩種或多種路徑的混合措施（Ostrom 2005）。

在上述的問題意識脈絡下，尤其是針對現今資本主義主導的社會，Wright（2010）提出一個宏遠的思考，主張透過國家權力馴服資本主義的願望有其局限，透過革命消滅資本主義更難取信於人，因此：「真實烏托邦為人們指出了一條超越資本主義的不同路徑：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內的空間及間隙，打造替代資本主義之方案，同時竭力捍衛並拓展這些空間，藉此侵蝕資本主義」（Wright 2015: 30）。

真實烏托邦意指創新的替代方案，注重社會正義與政治正義，強調社會賦權及民主參與。Wright 為了精確釐清分析概念，定義三個權力與互動的領域：國家、經濟與公民社會，其中，公民社會是指「人們因為不同目的而自願形成各種團體的社會行動領域」（Wright 2015: 173-175），公民社會的權力，或稱社會權力（social power），即為「根植於動員人們在公民社會進行各種合作性、自願性之集體行動的能力」。Wright（2015: 453）主張，若要超越資本主義，必須讓社會賦權掌控經濟與政治，明確而言，「社會賦權」意味著以下三個層面：（1）社會權力對國家權力進行有意義的民主控制，（2）社會權力對經濟權力進行有意義的民主控制，（3）社會權力本身需要民主化。Wright 並指出促成另類發展模式的社會實踐有三個主要路徑：一是公民社會透過國家影響經濟行動，二是公民社會透過介入資本家或企業組織的經濟權力影響經濟行動，三是公民社會直接參與和控制經濟活動，並透過這三個路徑組成多種可能模式。

圖1 顯示各種通往社會賦權與參與式治理路徑的連結可能，根據 Wright 的分析，可以進一步細分為七種不同模式。以下逐一說明：

（一）國家社會主義（statist socialism）：意指公民社會不直接控制資源配置、生產與分配，而是透過參與式民主控制、運用國家權力，以達成目標（如圖1 中的路徑4 至路徑2）。這是部分國家最主要的模式，經常用於公共財（如，教育、公共交通）的生產分配，但其主要問題在於如何深化民主參與。

(二) 社會民主式國家主義的經濟管控 (social democratic statist economic regulation)：社會權力透過民主方式控制國家權力，而後國家權力管制經濟權力，以影響資源配置、生產與分配（如圖 1 中的路徑 4 經路徑 5 至路徑 3）。這是各國常見的模式，典型如涉及對勞動市場、環境保護等的管制。這個模式是否能成為有效社會賦權模式的癥結在於，社會權力能否透過民主方式控制國家權力。

(三) 結社民主 (associational democracy)：意指由公民社會的各類團體與國家權力、經濟權力，三方共同參與各類治理工作（如圖 1 中的路徑 1、路徑 2 及路徑 3）。這類模式的重點在於，整個公民社會內部及外部治理過程須符合民主參與的原則，而非被國家、經濟權力或社團組織菁英所操控。

(四) 社會資本主義 (social capitalism)：在此模式中，公民社會透過各種方式以影響經濟權力的運作，最終影響資源配置、生產與分配（如圖 1 中的路徑 6 至路徑 3），典型案例如工會協商、參與企業治理，或晚近的公平貿易運動等。

(五) 合作市場經濟 (cooperative market economy)：這個模式延伸社會資本主義，加上公民社會直接進入經濟體運作（如圖 1 中的路徑 6 至路徑 3，加上路徑 1），最常見的方案是合作社。

(六) 社會經濟 (social economy)：公民社會的各類團體直接組織資源的配置、生產與分配（如圖 1 中的路徑 1），典型如自願團體提供的社會福利、社區工作服務等，其資源可能來自私人、非政府組織捐助或政府補助。

(七) 參與式社會主義 (participatory socialism)：這個模式為國家社會主義加上賦權參與，公民社會透過兩個途徑影響經濟體：第一，透過民主方式控制國家權力運作，間接影響經濟體運作；第二，循社會經濟模式，直接涉入經濟體運作（如圖 1 中的路徑 4 至路徑 2，加上路徑 1）。典型的案例如參與式預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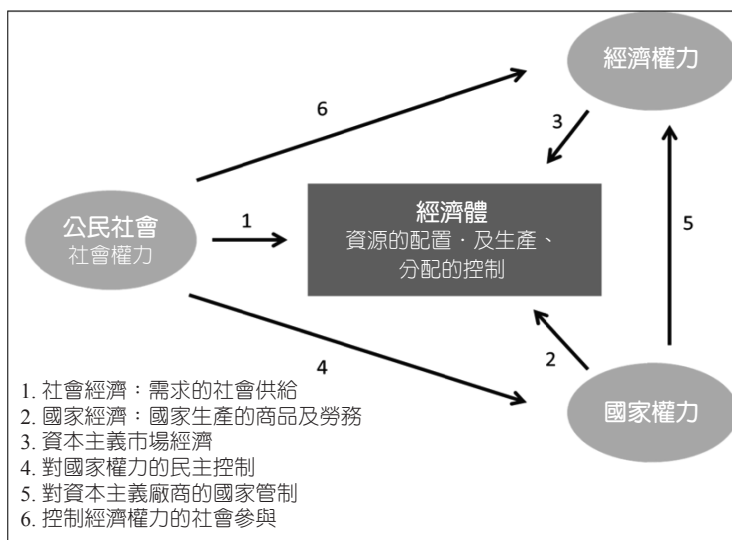


圖1 各種通往社會賦權路徑的連結

資料來源：Wright (2015: 185)。

在資本主義的另類社會經濟組織的發展過程中，公民社會所扮演的推動社會實踐角色相當重要。Wright 也指出社會賦權與參與式治理促成公民對改進公共生活的投入與熱情，政府透過公民參與的過程來進行政策決定，政府官員與政治人物也必須負責改善政策，使得國家政策更符合社會正義。值得一提的是，「賦權式」的參與和「表面上」或「象徵性」的參與不同，不僅讓公民可以表達對公共議題的看法，也能夠擁有直接參與決策的權力。在當今的資本主義體系中，一般公民藉由各種代議民主制度的選舉選擇決策者，或者透過其他管道表達對公共議題的看法，但在賦權式的參與中，一般公民可以直接參與決策過程（Wright 2015: 151-254），包括結社民主與直接民主。Wright (2015: 219-226) 並基於過去的研究，提出賦權的參與式治理的制度設計基本原則，包括：由下而上的賦權式參與，實用主義傾向，審議，權力下放及分權化，重組分權化，以國家為中心的制度化，有組織的抗衡力量等等。

另外值得提醒的是，在實踐各類社會創新模式的同時，不應忽略思考並改革既有的政治經濟結構，否則這些方案將陷入解決末端問題的困境，而無法解決結構性的問題（陳東升2012）。然而，社會創新模式既需要克服前述社會困境所帶來的內部集體行動難題，另一方面，若是真誠地面對並挑戰既有政治經濟結構，卻又無可避免地將遭到結構的壓制，在這內外因素的雙重限制下，社會創新成功的機會將低於一般以創造利潤為主要目的的創新活動（陳東升2013）。這個理解絕不意味著我們應該放棄社會創新的理想，而是在理解困境的本質後，應尋求突破之道。

### 三、研究方法與過程

#### （一）研究方法

東華團隊參與人社實踐計畫，擁有相對豐富的有形、無形資源，得以關注原住民民族與公民社會面向的相關公共議題，透過三種角色環狀式地完成田野工作與公共議題發展進程分析。倘若環狀工作模式的圓心為場域和議題，那麼，自圓心向外擴張的參與者分別為：（1）第一線實地與在地協作者，諸如部落伙伴、社區發展協會、在地組織、民間團體等，近身討論並執行特定工作項目的專案經理人；（2）與第一線專案經理人共同參與田野工作，並負責諮詢、商議、規畫及研究任務的博士後研究員；（3）從整體架構視野，提供各領域專業諮詢與行動決策的大學教師社群。以上三種角色與圓心場域、議題間各有不盡相同的半徑距離，代表各自擔負相異的任務與分工，透過各個任務分責所形成的圓周，共構一個以場域、議題現況為基礎，同時經由協作而完成的社會實踐命題。

東華團隊以環狀式參與形式涉入原住民族部落發展事務以及在地公民運動，浸身田野工作與場域中的人事物開展關係連結，並且以「身為其中一分子」的共作關係與場域協作伙伴發展各社會議題的實作嘗試。Talal Asad 以「是人們在說

話」(1986: 155)一語道出田野工作與民族誌的文化意義，浸身田野成爲知識建構與文化寫作的基礎，透過深入接觸在地多元聲音，知識得以朝向具備在地觀點的建立方向，並與研究者本身既有的知識體系呼應或對話，形成以田野經驗爲論述基礎的研究取徑。

因此，東華團隊在社會實踐介入的現身姿態，主要分爲兩個層次：一爲投入場域、議題實作的參與者，在實作歷程中與場域協作伙伴共商落實行動和工作細節；屬於具體操作的行動面向。二爲抽離現場經驗，就場域或議題發展現況進行深入的分析與再議，將團隊工作放置在結構和抽象的層面上，以宏觀的觀點批判分析場域實踐經驗，目的在於整體性地理解實作現場所面對的政經社會文化結構角力，並以批判觀點協助實作現場突破當下困境，尋找在時空條件中最適切的社會實踐模式。最後，則是透過上述環狀式的三種參與角色，以及兩個層次的現身姿態，進行反覆循環的討論歷程，將實踐經驗轉化爲論述語言，得以建立實踐與理論間的對話，並從中闡釋社會實踐的各種意義和可能性。

這個社會實踐取向的研究歷程，奠基於行動研究中不預設研究進程，強調實作現場脈動並隨之反應的研究動能，中心主軸仍舊根繫於場域和議題現況，計畫團隊在參與過程中透過親身協作、日常對話、規畫性訪談、在地組織共作等研究策略所累積的田野筆記進行文本分析，這樣的研究立場能適切回應以場域、議題爲圓心，並貼近場域、議題現況發展的環狀式研究參與模式。行動研究源自於對古典社會科學研究的批判，Donald Schön (2004) 提出對於事物的認識隱含於「在行動中認識」(knowing is in our action) 的邏輯裡，同時，知識的形成根植於「知道如何做」(knowing how) 並在「做」之中反省實踐 (reflecting in practice)。另一方面，John Gaventa 認爲參與式行動研究的功能不僅是生產知識的手段，同時也是「教育、意識發展以及動員行動的工具」(Gaventa 1991: 121-122)。透過行動研究方法不但能對科技理性提出挑戰，同時也重新形塑專業知識建構的途徑，藉由親身參與，自「做」中累積知識經驗，從中反省並回饋到行動本身，再次修正行動認識與邏輯，並進一步達成社會意識、教育與動員的效益，

如此能夠成為帶著研究企圖的行動所內涵的行動研究價值與意義。

## （二）研究團隊核心成員背景與專長

參與本項原住民族部落發展、公民社會運動等社會實踐計畫的成員，以東華大學教師為軸心，核心教師分別為原住民族學院與環境學院專任教授，以原住民族議題、人權、環境與自然資源治理見長。專、兼任工作者則以取得博士學位的博士後研究員，完成碩士訓練的專案經理，以及協助議題發展的在學博士生為團隊第一線工作主力。團隊成員的專業訓練背景以人文社會科學為基礎，專門領域則涵蓋族群、土地、語言、教育、健康、社區發展等不同面向；核心參與者的背景和專長表列說明如附錄。

## （三）參與介入歷程

東華團隊開展場域與議題雙向在地實踐，在場域工作中分別參與花蓮縣萬榮鄉支亞干部落、卓溪鄉中平及太平部落、豐濱鄉磯崎村的原住民部落發展。在議題發展上則著重文化照顧、民族教育、土地政策及環境開發、公民運動等。

場域工作參與和介入多以「社會組織」、「社會關係」與「人際連帶」三種社會連結形式展開接觸，例如，（1）支亞干部落工作啟動，主要透過場域主責工作者返鄉服務，藉由工作者回到自己的部落，嘗試尋找投入部落公共事務的方式，因而與人社實踐計畫合作。另外以在地青年、計畫專案經理人的雙重角色參與部落社區發展協會工作，進而透過選舉進入理監事會決策機制，以推動支亞干部落的各項公共事務發展。（2）太平部落的介入參與，以部落既有社會組織——社區發展協會為初始合作介面，在地頭人、領袖、耆老等則成為太平部落工作發展的主要聯繫管道。中平部落則以專案經理人在求學時期與部落青年建立的人際連結為基礎，進場參與部落青年已經推動，但成效與品質仍有進步空間的文化出版理

念和事業。(3) 磯崎村的投入以核心教師與在地社會關係連結為起始點，後來經由計畫與部落接觸時在地所面臨的發展議題——山海劇場開發，而自公共議題介入並衍生到在地實踐工作細節的推動。(4) 議題發展以主責人本身學術訓練、專長背景為基礎，在計畫範疇中選定研究主題，並在三個場域中與既有的工作累積、參與行動、專案經理人及在地伙伴合作等，進行田野調查與研究發展。

無論場域或議題的推動，在上述的參與介入並形成合作關係後，工作方向與細節規畫都由第一線工作者與場域在地協作伙伴共同討論設計而成，藉由資源、人力與想法創意的交互刺激，在場域既已發展的工作中，更進一步地設計協作內容。因此，貼近部落的現況、需求與資源能量，成為團隊投入部落並形成協作關係的重要原則。由於各部落當下所面臨的發展議題各有不同，東華團隊因此在三個場域中形塑出相異的工作內容與形式，諸如支亞干部落工作軸心為青年集結、文化傳承，公共議題如礦產開發討論；中平及太平部落實踐軸心為文化出版、語言傳承與文化照顧；磯崎村實踐主軸則為社會經濟、文化照顧與公共議題發聲。最後，第一線場域工作者、部落協作伙伴的實踐經驗，透過博士後研究員在各主責議題的研究工作中加以概念化、結構化，以形成結合實作經驗、實務現場敘說的理論論述和思考。

一般而言，研究團隊在參與特定場域或議題時，所面對的主要挑戰是：如何在合乎倫理準則的前提下，與場域議題所涉及的社群建立互信與長期合作關係。對此，東華團隊成員具備豐富的實踐經驗與社會網絡基礎，團隊成員中的教師、博士後研究人員、專案經理人與兼任工作人員，都長期投入在地原住民族發展與公共議題，且多為該網絡中的重要成員。同時，如前面所述，東華團隊以「互為主體」的原則參與，使場域議題、計畫團隊雙方都是行動與研究的主體。在這樣的背景與作法下，東華團隊與在地合作伙伴一起面對實踐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

## 四、各場域與議題的實踐

東華團隊在歷經第一期計畫三年的實踐經驗後，根據既有人力與教師專長能量，決定將實踐場域集中於支亞干、中平及太平、磯崎三個場域，同時聚焦於文化照顧、原住民族土地、民族教育三個議題，這些是跨場域都可能會涉及到的議題。團隊在個別議題中，分析比較不同場域的實踐經驗，並試圖跨越部落層級，將基層實踐經驗反饋到更高治理層級的法制架構上，以解決結構性議題。

以上實踐場域與議題主要涉及原住民族，然而，考量東部地區的公民社會力量（包括原漢成員）與原住民族在地實踐間長期維持合作關係，無論就「安居東臺灣」這個廣義的目標，或是就原住民族發展這個細緻的目標，人社實踐計畫都應關注與部落行動有合作關係的公民社會之主要進展，因此本文亦納入另一議題：花蓮在地公民運動。

在分別簡述各項場域實踐與在地公民運動的進程和意義之前，先就各場域的基礎資訊勾勒實踐版圖樣貌（參見表1），以及在總體性的社會結構與資訊之中，得以進一步理解各項工作推動的細節。

### （一）支亞干場域：部落地圖開啓傳統結社形式的現代再結社歷程

東華計畫團隊於2015年7月起與支亞干部落協力發展部落事務，參與青年及公共社群組織（以社區發展協會及部落會議為主）相關工作，並以「青年組織集結」為實踐重點標的。然而，部落工作事實上更早前便已經展開，例如，太魯閣族青年大規模且有制度的集結，以成立於1999年的「臺灣原住民族太魯閣族學生青年會」（以下簡稱學青會）為代表，集結跨部落的大專青年共同實踐文化傳承、政策倡議及民族發展等相關工作。在多年的串聯努力後，學青會部分成員意識到部落深耕的重要性，紛紛回到部落，進行單一部落整合的青年組織工作，



表1 各場域基本資訊

場域	地理位置	人口總數	族群分布	產業形態
支亞干部落	萬榮鄉西林村	1,343人、 453戶	90%太魯閣族	現有農業：山蘇為大宗 服務業、勞動力輸出都會區
	實踐軸心： 青年組織、部落地圖、文化傳承與照顧、公共議題討論發聲			
	衍生獎補助型計畫（104-106年）： 文化部、花蓮縣政府、信義房屋等共7件，總金額約250萬元			
中平及太平部落	卓溪鄉太平村（含太平、中平與中興部落）	887人、 258戶	布農族巒社群（Takbanuaz）與郡社群（Isbukun）為主	現有農業：水稻、梅李等經濟作物；小米（maduq）、紅藜（bukun）與各種豆類（bainu）等民族植物；日治時期伐木業
	實踐軸心： 文化圖書出版、語言保存、民族植物紀錄、長照2.0文化照顧			
	衍生獎補助型計畫（103-106年）： 文化部、原民會、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共6件，總金額約260萬元			
磯崎村	豐濱鄉磯崎村（芭崎、磯崎、龜庵和高山四個聚落）	326人、 125戶	阿美族、噶瑪蘭族、撒奇萊雅族、布農族、閩客，以及一戶太魯閣族	農產栽種、採集、漁撈等一級產業
	實踐軸心： 社會經濟、公共議題申聯發聲、文化照顧			
	衍生獎補助型計畫（105-106年）： 文化部、花蓮縣政府文化局共2件，總金額約43萬元			

資料來源：人口統計部分取自2017年各鄉戶政事務所統計數據。

支亞干青年集結的三名起草人都來自學青會。

人社實踐計畫參與支亞干部落工作的核心問題意識是：「回到部落」是一連串抽象又具體的概念與行為，支亞干部落的青年在特殊的民族文化性、歷史經歷與空間環境中，如何「回到部落」？東華團隊又在參與過程中，如何協力、記

錄，進而催化青年組織的凝聚？

青年的參與在原有部落政治結構下產生某些質變，青年熟悉如何申請計畫（找尋資源）及媒體資訊宣傳，透過辦理各種大小社區活動讓原本沉寂的協會有「動」起來的感覺，並且逐漸改變一般人對協會的看法。這些協會及青年號召下舉辦的行動包括：（1）透過文化部「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搭建立體部落地圖的平台；（2）舉辦「支亞干草地音樂會」；（3）擴大青少年的參與；（4）成立部落會議；（5）透過部落會議及串聯大學、非營利組織討論公共議題，如礦業、文化遺址、狩獵等；（6）發行部落刊物。

東華團隊在參與支亞干青年回鄉的實踐合作上，主要採取兩種模式，第一為提供人力資源，第二為專業領域的陪伴討論、諮詢及媒介引入，如石礦、支亞干遺址、文化照顧議題，藉由校內組成的博士後研究員、文化照顧教師社群、原住民族土地議題社群進行後勤的支援。

總結而言，支亞干的部落工作聚焦於「集結青年社群」，兩年下來的部落工作發現，青年的集結有助於部落既有各年齡層社群的互相串聯，並且促成對部落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

## （二）中平及太平場域：從文化行動切入的社會賦權

東華團隊在人社實踐計畫第一期時進入到太平村，是經過部落社區發展協會的討論與確認後得以展開合作，而在經過幾次的活動後，部落的老人家漸漸認可東華團隊的進入。2014年因部落選舉導致人事變動，計畫團隊開始不透過單一組織與部落接觸，而是直接與部落的個人及個人所屬的社會網絡合作，更寬廣地展開對部落的認識與組織等文化行動。

東華團隊在卓溪鄉太平村與部落協力的工作分成兩個主軸：一是與中平部落的返鄉青年沙力浪（Salizan Takisvilainan）合作，建置「一串小米族語獨立出版工作室」，並從工作室向整個花蓮的布農族擴散，拜訪不同地區、不同亞群的部

耆老，進行田野調查發展語言及文化記錄、保存與出版工作。同時陸續受邀參與其他部落個人或團體的出版工作，更進一步將工作重點鎖定在族語出版、成爲唯一的族語出版社，並以此作爲部落青年返鄉與社會實踐的途徑。二是與中平及太平部落的中壯年合作，由個人的生命史與傳統知識出發，再擴散至群體。跳脫過去與部落社區發展協會的合作方式，透過陪伴來參與部落事務的討論及發想，並在過程中記錄耆老的日常生活（包含農事、文化祭儀、手作等），作爲未來開展文化照顧工作的基礎。

在這段期間裡，東華師生將課程帶入場域，大學與部落間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的互相學習與協力效果。部落與大學並啟動文化照顧的跨域合作，由於卓溪鄉太平村爲衛福部長照2.0政策的示範點，東華團隊與太平部落、門諾醫院團隊、卓溪衛生所等進行多方會談和協調，希望長照站的運作能朝向與在地文化脈絡連結的設計。於此同時，團隊也開始與中平及太平部落從事農事工作的耆老互動，進行布農族民族植物的田野調查，以及農業相關訪問調查與資源、資訊嫁接工作，希望能連結各方農業資源，並試圖集結農友的聚會，共同規畫發展適合中平及太平部落現況與環境的耕作及產銷模式。

### （三）磯崎場域：青年返鄉投入社會經濟

磯崎村具有特殊的人文背景，境內族群組成多元，計有阿美族、噶瑪蘭族、撒奇萊雅族、布農族、漢人移居者等，而原住民族多半也是從其他地區遷移至此地定居。東華團隊自2015年10月開啓與豐濱鄉磯崎部落合作契機以來，積極建立在地情感連結與信任關係，並與在地青年合作，發想青年返鄉後在部落的行動方案，在第一期的計畫期程中以在地百年老屋爲基地，修復、加強老屋結構與環境；蒐集歷史器具文物、口述歷史資料調查等；並結合課程進場實作，使在地居民與青年重新檢視並再現傳統文化，使有意返鄉或是旅居臨近城市的居民開始與家鄉重新產生連結。除此之外，高山部落也集結青年力量，結合東華大學的課程

進場，進行部落基礎家戶資料、居民健康狀態與需求調查，作為規畫行動方案的基礎。

近兩年，計畫團隊與部落延續既定規畫與共識，以部落青年為主體，持續串聯增強在地能量，相關工作包括：(1) 發展多元族群的傳統知識；(2) 創業與部落工作的組織及培力，成立「磯崎好聚落工作室」，組織「青年會」，由返鄉青年推動公共議題發聲、資源串聯、照顧弱勢、返鄉拉力等工作。最新的進展是，東華大學教育學院的洪清一教授，同時也是磯崎村的長輩，在2017年擔任「磯崎社區發展協會」新任理事長，以理事長的身分持續深化東華團隊與在地組織、青年的合作，協助部落自主發展深具文化脈絡的文化照顧模式。

#### (四) 文化照顧議題：實踐原住民部落自主照顧體系

文化照顧議題延續計畫團隊從第一期起著力於「鄉村社福」的累積，透過成員協力盤點場域現況、議題發展想像、族群特殊性，以及衛福部長照政策實施等多面向聚合，於2016年7月定調「原住民族部落文化照顧」，希冀藉由貼近原住民生活面向的文化邏輯與社會關係，開展具備文化觀點的原住民族照顧體系。為了達成這項目的，由下述幾個行動策略推動議題發展。

東華團隊參與支亞干、磯崎兩個場域中既已運作的長者日托關懷站和復健站，在參與過程中與部落協力伙伴討論部落照顧的想像，並且協助調整部落現有運作的障礙。

在磯崎村，以花蓮醫院申請衛生福利部「獎勵偏遠（含山地離島）及長照資源不足地區設置在地且社區化長期照護服務據點計畫」為起始運作契機。各類計畫參與者從在地需求出發，自主性發展的長者復健站，其照顧模式以鑲嵌進地方屬性，由地方頭人帶領發起推動，結合醫療院所復健專業，並以在地力量回應資源缺乏的照顧條件，再加上以母語為溝通主體，舉辦野菜採集與分享等文化活動，形塑復健站參與的共同與集體性。

在支亞干，門諾基金會透過花蓮縣政府釋出長照計畫經費，並藉由日間照顧站與部落社區發展協會合作，共同推動部落的長者照顧服務計畫。社區發展協會協作伙伴不斷地與門諾基金會溝通協調，以部落為主體規畫日照站課程。目前，部落協作伙伴已取得課程規畫主責權，透過長輩熟悉的生活空間和事物，與長者共同完成課程運作。

隨著長照2.0 新增卓溪鄉太平部落為試辦點，東華團隊以長照服務串聯三個場域的文化照顧議題。團隊目前已與衛生所、門諾醫院達成協作討論，透過教師、課程與學生的參與，企圖鬆動太平部落示範點開站初期呈現的制度性、規格化管理模式，並且期待經由人社實踐計畫的投入和協力，使得以醫護為前提的工作方法，能與部落組織更為緊密連結，促進政策資源在落地實踐的過程中，能更貼近部落生活，達成健康照顧、社會照顧與文化照顧三層面的實踐取向。

東華團隊並組成教師社群與研究團隊，透過讀書會、分享會、場域部落協作伙伴參訪學習團等形式，將參與者聚集起來，共同思考文化照顧在理論與實踐場中的內涵。

### （五）原住民族土地議題：面對國家權力的結社變動

東華團隊在土地議題的面向上，針對社會權力如何回應「土地成為自由市場商品」的大環境，以花東地區原住民族土地，作為社會賦權與參與式治理的觀察、研究和實踐重點。主要的實踐策略包括：組成跨校教師社群，與部落實踐觀點互相反饋資訊，持續參與相關論述與草擬工作。

兩個場域分別面臨土地開發的壓力。縣政府在磯崎場域推動山海劇場計畫，面對山海劇場建設計畫的進駐，地方青年與公民團體合作發聲，表達不同的意見，卻引發磯崎村內部的衝突，甚至因為村民不熟悉建設計畫的作業進度，而誤傳地方青年與公民團體是造成建設停滯的原凶。這個衝突雖然在第二次的居民說明會中被澄清與化解，但地方青年參與非屬自身族群的傳統文化活動，或多或少

會遭受異樣的眼光，對於地方青年從事自身的事業，或是協助一般性的公共事務，都必須非常謹慎。

另一個場域支亞干部落，除了長年抗議 138 個地號被納入平林遺址列冊追蹤外，部落青年整理出支亞干溪上游共有 16 座礦場，但部落對開礦無置喙之處，另外尚有支亞干溪興建堤防，造成河川治理線的以內土地因《土地法》第 12 條的規定而自動消失，連堤防用地都沒有任何的換地與補償。對於上述的土地爭議問題，支亞干部落以部落會議為平台，居民的意見與決議相當團結且明確。

計畫團隊發現，大學在土地議題上的專業資訊、實踐上的長期陪伴等，都有助於有力量的部落社群成形，發展自主的治理模式。

## （六）民族教育議題：建構全主場的原住民族教育場域

過去以來，原住民族實踐原住民教育權利的運動，在主流教育制度的牽制下，能發揮的空間極為有限。自從 2014 年 11 月教育部公告《實驗教育三法》之後，原住民族教育工作者從體制內盼到了希望。自 2015 年起，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的運動紛紛展開，希望藉由實驗教育法建立一個能滿足原住民族教育需求的「實驗」學校。基於此，東華團隊在 2016 年協力成立阿美族學校籌備工作小組，目的在推動原住民族教育的實踐，協助「阿美族實驗小學」的設立。

阿美族學校籌備工作小組固定每個月聚會一次，平時則透過網路社群進行聯繫與討論；小組成員多數來自花蓮和臺東兩縣立國民小學現職的阿美族教師。經過多次的討論，為了跳脫現有教育體制的框架，阿美族學校的經營模式將採取自主化更高的「公辦民營」學校。由於在現有的法律條件下，東華團隊協助以民族文化為主體規畫，不受《國民教育法》限制的全主場學校<sup>2</sup> 仍無法實施，於是籌備工作小組以實際行動規畫於 2017 年展開阿美族教育模式的建構、課程的設

---

<sup>2</sup> 此為原住民族教育之專業用詞。

計、部落宣講，以及設立阿美族語沉浸式互助教保中心；規畫將於2018年寒假以營隊的方式招募學生進行教材試行，逐步完成各項籌備工作。換句話說，在沒有政府資源協助之下，籌備工作小組將徒手建造一所以公辦民營，實踐先行的阿美族 masatamdaw（成爲人）學校，以確保實現原住民族教育的主場環境，同時以行動帶領台灣原住民族教育的改革與發展。

### （七）在地公民運動議題

自1990年代開始至今，花蓮在地公民運動已經有一條環境與永續發展運動的清晰軸線。東華團隊與地球公民基金會花東辦公室合作，透過實踐探討議題式的公民運動近兩年在花蓮的進展。

花蓮過去因爲少有政黨更迭、社會衝突不多見，整體氛圍以和爲貴，卻造成多數人不接受以社會運動呈現的公共倡議形式。直到2015年4月發生的193縣道拓寬案中，數個非營利組織共同合作，帶動在地部分積極公民開始理解和分析，並逐漸具備參與的能力。整個193案的爭議過程中也引發有興趣參與的潛在公民，展開對於其他在地公共議題參與討論的想像。

東華團隊也與部落、地球公民基金會花東辦公室合作，協力處理部落所面對的土地與環境議題。例如，在磯崎場域所面對的山海劇場建設計畫案，以及支亞干部落所面對的礦場開發案中，部落、大學、非營利組織進行串聯，發展出部落與部落外公民社會間的協力方式，並有效影響公共政策的走向，使重大開發案必須踐行在地參與的要件。

綜合上述三場域、三議題的實踐進程說明，可以看出東華團隊在地實踐的具體操作方向，以貼近各部落、場域生活現況與條件投入協作。儘管場域和議題的工作介面不盡然完全相同，但核心價值仍呈現共通性，亦即在生存的土地之上，透過大學有形、無形資源的介入，與城市或部落有志之士協力，共同爲特定的公共事務而努力。同時，藉由第一線的親身參與，在行動中思索公共議題的前進策

略、意義與價值。

這個企圖由單點現場實作經驗開始，進而影響對應中央或地方政策的行動路線，在各場域及議題長時間的累積當中，都呈現出實質的效應，例如，在支亞干場域，大學計畫支持部落青年回鄉生活，共同創造具備生計生產與部落公共價值的生存策略。透過部落青年的討論、集結與行動，有意識並有效地進入社區發展協會理監事社群，一方面經由實質擁有部落事務溝通協商的正式權力，影響地方公共議題的發展方向；另一方面則是青年改變了社區發展協會幹部向來以部落長輩為主要成員的運作結構，不但使社區發展協會年輕化，並且在地方事務決策機制中扮演關鍵性角色，帶入貼近社會脈動或社會意識的相異觀點。返鄉青年積極參與部落會議討論，為支亞干部落石礦議題、文化遺址議題等，貢獻具備部落意識的觀點。這樣的青年參與，使得社區發展協會、部落會議成為既能刺激部落行動，凝聚文化意識以發展其主體價值的行動者之外，亦能有效透過部落合議組織促成或抵抗來自中央或地方政策的各項開發計畫。

計畫團隊透過支亞干部落的實踐分析，帶出另一個關於中央施權、地方如何回應與對話的討論。在三場域、三議題的實踐中，青壯年的集體行動總有一個企圖溝通的政策，無論該政策來自中央或地方縣市政府。諸如支亞干部落青年集結、部落意識對應於石礦與遺址等公共議題；中平及太平部落族語出版回應原住民族內部被忽略的差異性，以及在中央原民政策中族群代表性單一化的困境；磯崎村社會經濟策略呼應資本化社會抹除了生計生產與再生產的多元面貌；文化照顧試圖回應並鬆動長照2.0政策中，標準化的資源運作與服務輸送模式；民族教育、原住民族土地議題都嘗試建立更具自主性的族群教育與環境治理模式；花蓮縣境內的公民運動則集結上述關於青壯年投身公共事務，在地社會組織串聯，公民意識與集體行動養成，地方或族群主體性展現等各項實踐企圖。

整體而言，計畫各場域對政府政策的回應，大部分涉及中央政府政策，包括原住民族土地與自然資源權、原住民族教育、原住民族語言文化、長照等政策；另外小部分則涉及地方政府政策作為，如山海劇場、193縣道拓寬案，然而，這



兩個個案主要是源自中央政府政策，如山海劇場來自《花東地區發展條例》與其所衍生的花東發展基金，因此中央與地方政府在施政／管制作為上都扮演重要角色。最後，儘管場域與議題實作都發生在尺度較小的特定區域或地方，然其意圖實則指向更結構性的政策方向與全球思潮運作邏輯。在東華團隊所落腳的花蓮在地，地方政府政策施作固然具備有別於其他縣市的政治風格和施政策略，然而，地方的施權仍具有政治經濟權力由上而下輸出的共通性，東華團隊正是在這由上而下的政治經濟權力中，試圖介入並開創出政府施權與地方自主的多元可能性。

以文化照顧工作中關注的長照2.0政策為例，各場域涉及長照事務工作，看起來是地方縣市政府或鄉鎮層級的服務單元與工作細則，然而，這套長照服務規章與邏輯，仍舊承襲中央（衛福部）設計的長期照顧資源輸送政策與立法，且服務模式延續主流社會對於老者殘弱的刻板印象，以及規格化、標準化的服務供給流程。無論在支亞干部落、中平及太平部落、磯崎村這些在行政科層架構中的最小單元，關於長照服務提供與設計邏輯，仍然透過鄉鎮部落的較小施權單元，貫徹中央較大尺度的施權邏輯。因此，在既有政治經濟權力運作架構中，地方與中央的施權差異或許有政治風格的歧異性，但究其施權本質，仍舊是同一的政治經濟權力邏輯。東華團隊與社區、部落的協作行動，最終觸及與挑戰的是在各政治單元尺度中都展現出的單一邏輯政治經濟權力。

除了上述支亞干部落的實踐意義與影響層面分析外，東華團隊實作場域有著不盡相同的行動策略、進程與效應。表2彙整說明各場域實作累積的效益和具體影響。

表2 各場域與議題實踐成果

場域一	支亞干部落
實踐效益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青年積極參與公共事務，部落亦對青年投入抱持正向鼓勵態度。</li> <li>2. 有效改變社區發展協會的社會觀感，翻轉工作模式，由「頭人」決策轉向「團隊」協議。</li> <li>3. 發展創新性文化活動，透過爭取外部資源以完成文化傳承工作。</li> <li>4. 投入公共事務的青年幹部增加，同時年齡層擴大，有效誘發中小學年齡層部落孩童的部落意識。</li> <li>5. 居民參與部落會議的意願和人數增加。</li> <li>6. 帶入大學5門課程，30名學生。</li> <li>7. 辦理文化活動36場，千人以上參與。</li> <li>8. 透過寫作傳達部落主體價值，共發表6篇。</li> <li>9. 衍生計畫約250萬元經費。</li> </ol>
對部落的具體影響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社區發展協會組織運作正常化、年輕化。</li> <li>2. 部落會議組織運作正常化，且積極行使《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鞏固部落自主權，有效行使同意權以反對礦業採礦、反對支亞干遺址設立。經濟部礦業局並首度發文要求申請採礦的廠商須踐行《原住民族基本法》相關規定。</li> <li>3. 形成並建立溝通順暢的部落青年平台組織，有利於青年參與公共事務與發聲。</li> <li>4. 多方公部門資源挹注，將人力與經費轉化的文化行動留在部落。</li> </ol>
場域二	中平及太平部落
實踐效益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將具備文化涵養的在地知識，透過正式圖書出版，進入主流出版市場，讓被忽略的邊緣聲音得以發聲。</li> <li>2. 推動民族教育前驅行動。</li> <li>3. 帶入大學11門課程，200餘人參與。</li> <li>4. 辦理文化活動11場，600餘人參與。</li> <li>5. 透過寫作傳達部落主體價值，共發表3篇。</li> <li>6. 衍生計畫約260萬元經費。</li> </ol>
對部落的具體影響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出版文化知識專書共6本，包括2本布農族語辭典。</li> <li>2. 大學課程參與結束後，留下約10名學生，組織成為常設任務型工作團隊，持續投入部落發展事務。</li> <li>3. 協助爭取多方公部門資源。</li> <li>4. 青年回部落成立工作室，鼓勵更多年輕人投入文化事業。</li> </ol>
場域三	磯崎村
實踐效益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與部落青年協作，透過田野調查、文化行動保存傳遞在地知識。</li> <li>2. 協助推動在地社會經濟產業模式。</li> <li>3. 帶入大學5門課程，50餘人參與。</li> <li>4. 辦理文化活動11場，600餘人參與。</li> <li>5. 透過寫作傳達部落主體價值，共發表5篇。</li> <li>6. 衍生計畫約43萬元經費。</li> </ol>

對部落的具體影響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促動在地和旅外青年關注及參與公共事務。</li> <li>2. 透過各項大學課程及文化交流活動，增進國內外參與者認識與理解原住民族文化與當代生存處境。</li> <li>3. 陪伴建立部落的在地產業，共創部落經濟共同體。</li> </ol>
三個場域共同議題	計畫整體、文化照顧、民族教育、土地政策、公民運動
效益與影響	<p>結合場域工作現況發展的各議題研究，構成研究論述、實作參與、大學課程、學生投入的理想型大學社會實踐模式。同時，藉由行動與寫作發展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實踐思考，以及公民運動倡議。這些議題研究都企圖與現行政策對話，擴展各項政策框架中未能涵納的各種差異，透過研究發聲，並以行動引發政策變革與社會意識改變。具體影響如下：</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文化照顧：建立三個在地的老人健康照顧站的參與培力與創新照顧模式。</li> <li>2. 民族教育：完成一份阿美族教育資源中心設置計畫書；設立一所原住民族學校。</li> <li>3. 原住民族土地：建立固定管道提供部落專業的法律諮詢與陪伴。</li> <li>4. 友善農業：陪伴一個部落進行有機作物與傳統作物復耕，以及傳統農耕知識傳承。</li> <li>5. 青年留鄉：六位原住民青年返鄉定居，成為部落公共事務的主力。</li> <li>6. 公民運動：實際改變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措施。</li> </ol>

## 五、現階段與理論的對話

東華團隊在參與各場域與議題的實踐合作上，主要透過三種路徑：第一為提供人力資源，第二為專業領域的陪伴討論、諮詢、相互培力，第三為與合作伙伴協力連結更大的實踐網絡，共同推動實踐工作。那麼，這些各方協力伙伴的共同推動實踐經驗，在哪些面向呼應或反思了既有的理論？以下分幾個主題討論。

### （一）通往社會賦權的不同模式

在支亞干場域，東華團隊的實踐主要透過「青年組織集結」，建立部落內部組織性的社會力，而這個社會力則逐步影響國家權力，進而節制經濟活動運作，主要可見於透過部落會議討論決議，使得礦石業者無法重啓開礦作業，這是很明顯的社會民主式國家主義的經濟管控（social democratic statist economic

regulation)。同時，一個初步的結社民主模式（associational democracy）正在開始，例如，透過社會力去鬆動社福機構提供社福資源（但缺乏多元文化關照）的制式模式，儘管目前還是以非正式的方式進行，而且國家權力代表尚未進入討論與決策過程中，但國家權力的確是透過社福計畫隱身於後。此外不能忽略的是，部落申請各種公部門計畫以維繫部落工作，一方面透過社會力善用公部門資源，另一方面公部門資源成爲支持部落內部建立社會權力的力量之一，這當然也包括國家體制透過大學所推動的人社實踐計畫。

在中平及太平，則是透過文化工作進行社會賦權。經過數年的努力，「一串小米工作室」已經發展成爲跨部落的社會網絡，工作室本身也成爲提供文化經濟活動的組織。當然，政府透過各類計畫資助「一串小米工作室」的工作，是工作室可以站穩腳步不可忽略的基礎，屬於社會經濟模式（social economy）。同時，隨著長照2.0政策開始運作以及太平村長者關懷站的成立，類似在支亞干場域，正努力透過結社民主模式鬆動社福機構提供社福資源的方式。

磯崎場域中部落青年與東華團隊的合作，最早開始於對政府提出的山海劇場建設計畫案的回應，這個過程中結合了公民團體的參與，屬於國家社會主義（statist socialism），以社會權力控制國家提供公共財的過程。返鄉的部落青年組成「磯崎好聚落工作室」，除了承接政府計畫推動文化工作，進行部落內部組織工作外，亦開始直接涉入經濟活動，因此也具體實踐了社會經濟的模式。此外，由地方領導者發起推動，結合政府社福計畫的磯崎復健站，直接涉入社福活動的組織與生產，充分展現了部落的文化自主性，成功地實踐文化照顧的理想，這屬於參與式社會主義模式（participatory socialism）。

在議題部分，各場域所涉及的文化照顧與原住民族土地議題，參與模式已如上述分析。至於在民族教育的議題中，阿美族民族教育的推動，先是透過阿美族內部的網絡串聯形成工作小組，接續透過倡議及政府協商的過程，以影響民族教育此一公共財的提供方式，這屬於典型的國家社會主義模式。在地公民運動議題部分，同樣透過公民社會內個人與組織的串聯擴散，從而影響公共建設的提供，

也屬於國家社會主義模式。

整體而言，各場域及議題所涉及的模式，主要為國家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結社民主，次要為參與式社會主義、社會民主式國家主義的經濟管控，目前還沒有進入社會資本主義（social capitalism）與合作市場經濟（cooperative market economy）這兩種模式。換言之，目前涉及的模式主要是處理社會權力與國家權力的互動，較少觸及與經濟權力的互動。這個現象或許相當程度可以歸因於東部地區較晚才發展的資本主義經濟權力，國家仍掌握（相較於台灣西部）更多的資源配置與生產分配活動。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經濟權力在東部地區的擴散並非最近的情形，所以社會權力較少延伸至經濟權力，是否存在其他原因？例如，是否因為東部公民社會對經濟權力運作較為陌生？這是值得長期觀察的議題。

此外，在三個場域的行動者都逐漸意識到，部落若沒有一定程度的自主經濟力，將很難延續長期且有效的集體行動，因為年輕、沒有穩定工作的行動者不容易留在部落裡。因此，三個場域也規畫將更多心力放在發展社會經濟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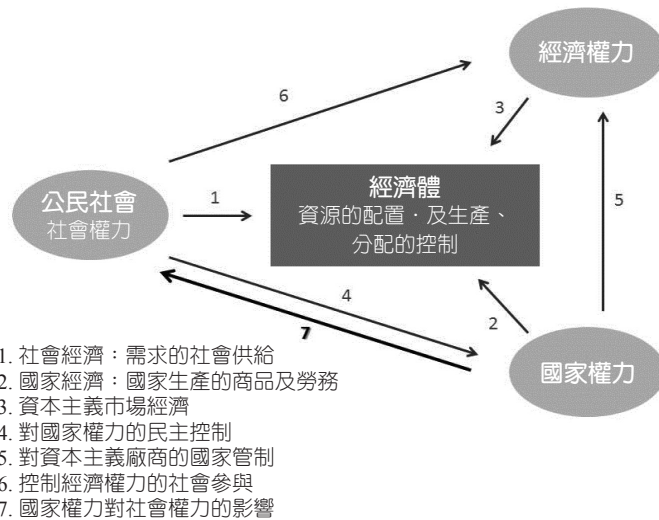
根據 Wright（2015: 453）的界定，「社會賦權」意味三個層面：（1）社會權力對國家權力進行有意義的民主控制，（2）社會權力對經濟權力進行有意義的民主控制，（3）社會權力本身需要民主化。在人社實踐計畫的場域與議題中，社會權力的確已經發揮作用，開始對國家權力與經濟權力展開民主控制。至於第三點社會權力本身的民主化，在支亞干場域中可以明顯觀察到，不同年齡層青年與少年組織的廣泛參與，還有最重要的，部落會議得以順利成立並常態性運作，並以民主會議形式對國家權力與經濟權力展開控制。在中平及太平、磯崎場域中，目前已經形成鬆散的組織與社會網絡，但它們本身是否民主化，目前沒有明顯跡象，尚待後續觀察。這個情況，同樣也適用於幾個議題中所發展出的組織或社會網絡，包括民族教育及在地公民運動議題。

在理論層次上，有一點值得吾人重視。Wright（2015）歸類的七種實踐模式，主要著眼於社會權力對國家權力及經濟權力進行有意義的民主控制。然而，我們在實踐過程中其實會遭遇一個深遠的議題：公民社會的社會權力從何而來？

甚至，就人社實踐計畫的關懷而言，這個議題與 Wright 對實踐路徑的分析，其重要性應是相同的。在東華團隊參與的三個場域中，社會權力的發展除了既有各方行動者的努力形塑，也不能忽視國家權力所扮演的角色，亦即，國家透過各種政府計畫資助，相當程度支持了社會權力的萌芽與茁壯。

政府各種計畫對社會權力的培力意圖，固然未必會在每個個案中成功，很多時候甚至會造成負面影響，這是政府干預的主要歷史教訓之一。然而，在本文探討的三個場域中，由東華團隊與場域議題伙伴協力的政府計畫（例如，科技部人社實踐計畫、文化部「原住民青年村落文化發展計畫」），到目前為止的確產生正面的影響，究其原因，應來自於協力伙伴的態度與作法：以知識為基礎的行動，謹慎地考量計畫資源進入場域可能帶來的影響，包括對場域倫理的重視。我們也可以觀察到，若沒有這些政府計畫，目前場域及議題中主要的集體行動，部分可能無從發生或者弱化。當然，政府計畫的這種正面角色能否延續到未來，端視行動者如何繼續運用國家資源的槓桿。同時必須強調的是，在實踐過程中，場域對計畫團隊同樣產生增能賦權效果，換言之，這個過程是參與各方互相支持培力的過程。

根據上述討論，至少在臺灣的脈絡中，我們應該可以修改 Wright（2015: 185，圖 5.1）所提出的架構，將各種通往社會賦權路徑連結中的路徑 4，由單向的社會權力影響國家權力，修正為加上國家權力可能影響社會權力（路徑 7），這意味著，通往社會賦權之路也包括社會權力與國家權力的交互影響。修正後的各種通往社會賦權路徑的連結圖，請參見圖 2。



**圖 2 修正後的各種通往社會賦權路徑的連結圖**

資料來源：東華計畫團隊參考Wright (2015: 185) 繪製。

最後，關於公民社會的社會權力從何而來的問題，雖然在本計畫中國家權力有意識地介入而達成一定程度的正面效果，但我們不應忽略的是，這些社會力來源的根本，更多來自地方社群長期自我組織培力所累積的基礎。以支亞干部落為例，幾位主要的青年行動者，其社會力事實上來自1990年代以來太魯閣族學青會在族人青年間所培育的組織與社會網絡基礎，近幾年青年返回部落，發起青年集結，並結合國家計畫的支援，終於能具體地影響部落的公共事務（類似影響在花蓮非本計畫場域中也可以觀察到），而太魯閣族學青會的組織與社會網絡發展，其實也和花蓮地方公民團體及學術界長期互相串聯與奧援息息相關。同樣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太魯閣族學青會的發展，很大程度是臺灣原住民族運動中的一個分枝，深受全國性運動的滋養，而與其合作的花蓮地方公民團體，有許多是全國性公民組織的地方分會或辦公室。此外，各場域與議題所能普遍見到的青年集結，包括在地青年與外部青年的整合合作，觸發點可以部分歸結於人社實踐計畫的投入，但其長遠的基礎，更在於廣泛社會運動對青年世代所啟發的文化主體性

展現與社會意識，以及大學教育改善的影響，例如，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各大學所培育的青年，現在都在各場域與議題中扮演重要角色，這是社會運動與國家權力交相揉合所衍生的結果。

換言之，現今在個別部落或議題所發揮影響的社會權力，事實上來自幾個來源，以及這幾個來源間的交互影響：(1) 全國性與地區性公民社會長期所培育社會力的基底；(2) 長期的國家權力介入，主要是高等教育培育青年內涵上的轉變；(3) 近期國家權力介入（如人社實踐計畫）所串聯整合的既有社會力，以及所孕育的新社會力。整體而言，至少單以時間尺度的角度觀之，公民社會自我培育的底蘊與國家權力在高等教育領域的介入，是現今社會力的根本基礎，但我們也可以期待有新的可能性，亦即，在國家權力適當的運用下，類似人社實踐計畫的國家力量或許能在既有的基礎上加入培育社會力的新能量。

## （二）參與式治理

Wright (2015: 211-213) 指出，參與治理的三種制度形式包括代議民主、直接民主與結社民主。在本文探討的場域與議題中，目前尚無透過代議民主進行參與治理；直接民主的部分，則可見於支亞干場域中，例如，透過部落會議達成決議，以管控在礦石業中既存的國家權力與經濟權力，以及在地公民運動中先是透過結社民主，而後支持公民在環評會議中積極參與。

目前運用最廣泛的途徑為結社民主，透過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的組織，直接參與各種治理過程，這幾乎發生在每一個場域與議題中。同時，誠如 Wright (2015: 213) 所言，不同民主參與形式間的彼此支持及強化，是邁向更深層民主的重要工作，在本文所涉及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看見支亞干場域的結社民主工作，的確強化了直接民主，亦即支亞干常態運作的部落會議。類似的結果也可見於在地公民運動。

有鑑於結社民主在現階段實踐場域與議題的重要性，我們應該更深入地分析



結社民主到底達成了哪些目標。結社民主可以透過四種途徑促進民主：(1) 補救資源不平等的問題，(2) 促進公民教育，(3) 協助政策執行者解決資訊問題，(4) 成爲集體解決問題中的關鍵行動者 (Wright 2015: 239)。關於這些可能性，本文所探討各場域與議題的實踐工作，其結社民主過程的確發揮了正面影響，總結而言，結社民主的確協助減緩資源不平等的問題，以及資源被誤用的問題，例如，長年以來社福資源在缺乏民族主體認知下被制式化運用的問題，在本文所關注的案例中已經開啓改善的可能性；結社民主一定程度促進了公民教育，這可見於支亞干場域與在地公民運動中；結社民主協助政策執行者解決資訊問題，這進程明顯可見於文化照顧與民族教育議題上。結社民主也的確成爲集體解決問題中的關鍵行動者之一，這不同程度地發生在每一個場域與議題中。

另外，本文在第四節的分析中曾指出，東華團隊所合作的各場域與議題，主要是回應中央政府層級政策，少部分則涉及地方政府的施政作爲，而且從部落的層級而言，中央與地方政府政策背後的國家權力本質是類似的。然而，從參與式治理的角度而言，兩個不同政府層級在政策思維與施政風格上仍有差異，而這差異的確影響基層社群參與各類公共事務治理的可能性。簡言之，相較於中央政府，目前東華團隊各場域所處的花蓮縣地方政府，對於社會權力參與公共事務治理的理念較爲陌生，一旦公民社會力量對於特定公共政策的主張與地方政府有相當差異，則地方政府與公民社會力間的關係經常演變爲對抗。這個關係直接的影響是，地方社會力的政策對話對象主要是中央政府，而非地方政府，並且造成了一個特殊現象，亦即，公民社會權力在尋求參與公共治理的過程中，經常是繞過地方政府，直接尋求與中央政府的對話。

上述花蓮在地的特殊現象，姑且先不論對於參與式治理的正負影響（例如，一個可以整合在地國家權力與社會力的在地治理平台還難以實現），在本文試圖對話的《真實烏托邦》論述中，的確引發了一個理論的思考：Wright (2015) 在分析國家權力時，並未特別區分不同政府層級的國家權力行使，若從其書中內容分析之，則各種案例包括了全球各地從地方到中央的實踐路徑。然而，不同層

級的國家權力，以及這些層級權力與社會權力的互動，終究會深刻影響參與式治理的結果。在 Wright 所歸類的七種實踐模式面向上，若再進一步將模式細分為子模式，或許會使得理論過於龐雜，但學界與實務界在和這七種實踐模式對話時，切莫不能將國家權力視為單一的整體，應該探究不同層級間的國家權力與社會力、經濟力的互動，而這類細緻的對話應可以透過個案細節的描述與分析來展現。

## 六、人社實踐計畫對大學教師與學生學習的影響

人社實踐計畫的重要核心目標之一是，建立大學新典範，因此，這個計畫如何影響東華大學的教師，以及如何反饋到學生學習，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教師社群是大學投入社會實踐的主力。東華團隊在建立教師社群的過程中，歷經數次嘗試，包括以區域為主或是場域為主，至今我們學習到，若考慮到大學教師的專業導向，建立數個以議題為導向的教師社群可能是較為適宜的方式，可以機動地協力解決各場域所發生的類似議題。此外，為了有效整合個別場域的整體發展，各場域需要有專責教師擔任統籌角色，而且為了有效解決問題，這個社群應該不限於東華，應該是跨校性質的，並且應包括非大學教師的專業工作者。東華團隊以這個方式調整擴大教師社群參與範圍，目前已經成功建立以下教師社群，以及在三個場域設置場域專責教師：在人社實踐計畫聚焦的議題中，包括「文化照顧」、「民族教育」等兩個社群；以人社實踐計畫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但在計畫目前執行範疇外的教師社群，包括「環境友善農業」及「原住民族狩獵與自然資源治理」社群。這些社群都具備跨院、跨校、跨科際的性質，並透過實際解決問題，逐漸形成較為厚實的學術、實踐與政策網絡。具體的影響是，其中數個教師社群，已經成為中央政府機關在研擬政策法規時的重要諮詢與協力推動伙伴。這些進展，固然主要源自大學教師過去長期的努力基礎，然而，人社實踐計畫的確也在凝聚教師社群實踐力量的過程中扮演一定角色。

關於人社實踐計畫對課程的影響，東華團隊是以問題導向的方式思考，亦即，任何課程模組的設計、課程帶入場域的努力，應是以解決問題為方針。課程帶入場域的努力，目前主要涉及個別課程與場域的合作。東華團隊在過去數年經驗的主要教訓是，場域基於種種考量，無法承受過多課程與學生進入，尤其是經驗尚淺的學生。因此，計畫團隊採取謹慎地根據場域需求，選擇與場域合作的課程內涵和師生。至今，已開授場域實作課程累計21門，修課學生人數為309人。東華團隊更鼓勵學生在課程結束後，以正式或非正式方式長期地參與場域的實踐，目前已經有部分同學依循此路徑實踐理想，具體的影響是至少已有10名學生，加入組織成為常設任務型工作團隊，持續投入部落發展事務。

## 七、結論

本文所探討的核心主題，是在東臺灣的脈絡下，社會權力對國家權力與經濟權力施加民主控制的現階段進程，特別是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開展後，這個進程的狀況。

本文在與 Wright (2015) 的理論分析進行對話後，發現東華團隊參與的場域與議題中，涉及到 Wright 所提出的七種通往社會賦權模式中的五種，尤其是國家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結社民主模式較為常見。惟目前涉及的模式主要在處理社會權力與國家權力的互動，較少觸及與經濟權力的互動，這個現象已經被各場域的行動者所認知，更多直接涉入經濟權力的行動，將會是三個場域未來共同的努力方向。

關於社會賦權，我們發現到，雖然 Wright 的理論分析中並未特別處理國家權力對社會權力的影響，但這無疑是重要的問題，因為，包括人社實踐計畫在內的各種國家資源所挹注的計畫，以何種方式影響社會力的培育，的確是現代國家體制下必須特別關注的。在東華團隊所參與的人社實踐計畫實踐場域與議題中，我們與協力伙伴以互為主體的體認，謹慎地處理計畫資源進入場域，與在地社群

合作所應秉持的方式，以及倫理層面的議題。到目前為止，這個模式已經在各場域及議題得到一定程度的合作進展，我們應該可以以審慎的態度，繼續未來的工作。

關於參與式治理，目前應用最廣泛的途徑為結社民主，結社民主透過四種途徑促進了民主治理。直接民主較少被應用在實踐場域與議題中，可見於支亞干場域與在地公民運動。至於代議民主則是目前還未直接觸及的參與治理途徑。

以上在東臺灣的實踐圖像，代表著 Wright (2015: 30) 所言：「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內的空間及間隙，打造替代資本主義之方案，同時竭力捍衛並拓展這些空間，藉此侵蝕資本主義」的各類努力。最終，我們還是應該要問，這些行動方案將透過何種路徑，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去影響既有的結構。這的確是超越本文目前所能回答的問題，是未來的實踐工作必須念茲在茲的問題。我們或許可以用一個案例先進行可能的想像。東臺灣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內的礦業資源開採議題，一直是影響在地居民並涉及國家整體原住民族政策、環境保育與經濟發展的重大議題，但始終受限於既有的國家體制限制，長年未能有所突破。東臺灣的部落行動者、原住民族運動、臺灣環保聯盟、地球公民基金會等公民社會力量，已經長期投入這個議題，建構了基本的社會力，而在部落集體層次，近年則有類似支亞干部落的集體行動，在基層透過社會賦權與參與式治理去鬆動既有結構，同時也與部落外的社會力協力合作。對於所有這些實踐者而言，試圖改變結構的努力歷經多年的漫漫長路，卻似乎總是見不到突破點。但就在2017年6月，由於齊柏林導演不幸辭世，意外地打開了機會之窗（window of opportunity），使得《礦業法》的修正，終於在多年的結構僵固後見到契機。這個案例的啓示在於，我們或許可以如此期待，人社實踐計畫與各方協力伙伴的工作，便是努力打造各種既有結構下的空間，同時也應有意識地去處理結構性的議題，然後當機會之窗打開時，順利地以準備好的方案，去修正、甚或取代既有的結構。

## 附錄 東華計畫團隊核心成員背景與專長

姓名	職稱	專業領域
裴家騏 環境學院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院長	計畫主持人	野生動物族群生態學、經營管理及保育哺乳動物學、保育人文學、野生動物研究方法學
戴興盛 環境學院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	計畫共同主持人	永續發展、社會生態系統韌性、共有資源治理、社區保育、保育與發展、自然資源經濟學
謝若蘭 原住民族學院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教授	計畫共同主持人	人權研究、法律與社會、性別族群階級研究、全球原住民族運動、文化創新、研究倫理
鄧湘漪	博士後研究員	族群研究、全球化移動與離散研究、難民移民研究、跨文化社會工作、社區組織與發展、原住民族健康與照顧
吳勁毅	博士後研究員	土地與鄉村發展、原住民族發展、國土空間規畫、農業政策
程廷 (Apyang Imiq)	專案經理人	主責萬榮鄉支亞干部落實踐 田野調查、組織工作、寫作
謝柏宇	專案經理人	主責卓溪鄉中平及太平部落實踐 田野調查、組織工作
賴富庭	專案經理人	主責豐濱鄉磯崎村實踐 田野調查、組織工作
婁之璘	專案經理人	主責各場域議題行政協調
鍾文觀 (Sifo Lakaw)	議題統籌	原住民族教育、語言復振、原住民族健康促進
張滢之	議題統籌	原住民族健康研究、醫療人類學、當代歐陸哲學思想
莊慕華	議題統籌	公民運動與環境議題

## 參考文獻

- 陳東升，2012，〈社群治理與社會創新〉。《臺灣社會學刊》49：1-40。
- 陳東升，2013，〈社會創新的理論與實踐：臺灣經驗的初探〉。頁205-228，收錄於林建甫主編，《全球化時代的王道文化、社會創新與永續發展》。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國立東華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中心，2016，〈安居東台灣：社會賦權與參與式治理第二期計畫書〉。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人文與環境研究及社會實踐中心。
- Asad, Talal, 1986,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Pp. 141-164 in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edited by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owles, Samuel and Herbert Gintis, 2005, "Social Capital, Moral Sentiments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Pp. 379-398 in *Moral Sentiments and Material Interests: The Foundations of Cooperation in Economic Life*, edited by Herbert Gintis, Samuel Bowles, Robert Boyd, and Ernst Fehr.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Gaventa, John, 1991, "Towards a Knowledge Democracy: Viewpoints on Participatory Research in North America." Pp. 121-131 in *Action and Knowledge: Breaking the Monopoly with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edited by Orlando Fals-Borda and Muhammad Anisur Rahman. New York: Apex Press.
- Ostrom, Elinor,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strom, Elinor, 2005,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chön, Donald 著、夏林清譯，2004，《反映的實踐者：專業工作者如何在行動中

思考》。台北：遠流。（Schön, Donald, 1983,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Wright, Erik Olin 著、黃克先譯，2015，《真實烏托邦》。台北：群學。（Wright, Erik Olin, 2010,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London: Verso Books.）

**Practicing Real Utopias in Eastern Taiwan: The Humanity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Project, Social Empowerment an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Hsing-Sheng Tai Hsiang-I Teng Jolan Hsieh Po-Yu Hsieh  
Fu-Ting Lai Apyang Imiq Chih-Ying Wu Chih-Lin Yao  
Sifo Lakaw Ena Ying-tzu Chang Mu-Hua Chuang

---

Hsing-Sheng Ta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First Author.

Hsiang-I Te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Tung-Hai University (Post-doctoral Fellow at the Office of Humanity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from Aug. 2016 to Jan. 2018) Corresponding Author.

Jolan Hsieh,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thnic Relations and Culture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Po-Yu Hsieh, Research Assistant, Humanities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Project,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Fu-Ting Lai, Research Assistant, Humanities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Project,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Apyang Imiq, Research Assistant, Humanities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Project,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Chih-Ying Wu, Chairm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Post-doctoral Fellow at the Office of Humanity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from Aug. 2013 to Jan. 2016).

Chih-Lin Yao, Research Assistant, Humanities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Project,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Sifo Lakaw, Part-time Research Assistant, Humanities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Project,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Ena Ying-tzu Chang, Part-time Research Assistant, Humanities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Project,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Mu-Hua Chuang, Part-time Research Assistant, Humanities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Project,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 Abstract

Given the banner of “Stable living in Eastern Taiwan: Social empowerment an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the Humanities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Project at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collaborates with local partners to seek alternatives to state power and economic power.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ocus of this project in term of the three sites (Ciyakang, Tavila and Nakahila, Jiqi indigenous communities) and the three main issues that link them (cultural care, indigenous land and indigenous education). Theoretically, this paper engages with the seven models of social empowerment an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formulated in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by Erik Wright to investigate possible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encountered as they are practiced in the context in Eastern Taiwan. The positive outcomes that have emerged from this project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various collaborators’ attitudes and approaches: knowledge-based action, careful consideration of potential site-specific impacts of resources, and an emphasis on field ethics.

This paper analyzes according to categories put forth by Wright and finds that models operating in the three sites and three subjects in this project are primarily statist socialism, social economy and associational democracy. Secondary models are participatory socialism and social democratic statist economic regulation. Evidence of social capitalism and a cooperative market economy was not found.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current operative models are focused more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power and state power and less on economic power, which signals a direction for future involvement. We therefore believe that Wright’s structure requires adjustment—particularly in the fourth pathway toward social empowerment, adding the idea of state power affecting social power, and making what is currently a one-way relationship reciprocal.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state power is the primary or only source of social power, since long-term self-training can serve as a foundation for social power held by local groups. Further, appropriate state interventions such as the Humanities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Project can add new vigor to social power initiatives.

Regarding three institutional forms of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associational democracy is currently the most widely observed and the most likely to strengthen direct democracy; the development of direct democracy can be observed to be in emerging in some sites and subjects; to date, little in the way of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has been observed in representative democracies. Our conclusion is that associational democracy has, to varying extents, achieved the following goals: reducing imbalances in resource distribution, advancing civil participation, resolving information-related issues for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serving as a key factor in collective problem-solving.

**Keywords:** social innovation, social empowerment,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Eastern Taiwan



### 3

## 從港口部落的場域經驗談集體同意權與研究倫理的諮商平台

謝若蘭（Bavaragh Dagalomai）、鍾文觀（Sifo Lakaw）、  
張滌之

---

本文研究計畫主要由科技部補助之整合型計畫：「建構原住民族研究倫理治理架構之子計畫二：原住民族研究倫理諮詢機制的治理與管理建置」（MOST 104-2420-H-259-004-MY2），以及「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MOST 104-2420-H-259-001-HS3；MOST 106-2420-H-259-002-MY2）。三位作者特此致謝科技部計畫補助經費。部分內容曾發表在《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2015年6月，16(3)：34-52）。

謝若蘭（Bavaragh Dagalomai），通訊作者，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教授。E-mail: jolan@gms.ndhu.edu.tw。

鍾文觀（Sifo Lakaw），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博士生。

張滌之，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與澳洲麥考瑞（Macquarie）大學地理與規劃學系雙聯博士候選人。

## 中文摘要

原住民族研究倫理在臺灣的實踐受到《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的保障，要求「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然而，目前多數關於原住民族研究倫理的討論聚焦在後者，也就是集體同意權，鮮少針對諮商過程進行探究。集體同意權實踐的困難在於第21條定義「部落集體同意權」為部落會議的多數決，但由於部落會議召開的難度極高，況且並非每個部落都有部落會議，使得集體同意權難以落實。此外，部落在傳統上都有自己的公共事務決議機制，並且因各部落和族群而異。在此背景之下，本文提倡將焦點從同意權轉向諮商，建構一個由部落族人、原住民族知識專家及學者的諮商平台，以利跨文化理解及對話。我們認為諮商平台將有效地幫助部落和學者準備研究的合作關係，而後續的集體同意權也將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做出決定。本文透過檢視與花蓮縣豐濱鄉港口部落合作的過程，反省當代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倫理的處境，並借鏡紐西蘭和美國的實作案例，思考如何建置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研究諮商平台，為未來的研究倫理提供更理想的實踐模式。

**關鍵字：**原住民族研究倫理、集體同意權、Kāupapa Māori、原住民族基本法、場域倫理

## 一、前言

2015年6月，包括花蓮縣豐濱鄉港口部落社區發展協會、國立東華大學「新世紀東臺灣的脈動——經濟生活、人文創新與社會培力」港口團隊等六個單位組織，在港口部落簽訂合作備忘錄。備忘錄的用意在於促進原住民族教育，並建構一個以部落為主體的多方互動模式。簽訂此備忘錄的原因之一在於實踐《原住民族基本法》（以下簡稱原基法）第21條：在部落從事學術研究應取得部落同意。然而，在備忘錄簽訂之後，部分部落族人質疑「誰」可以正確及有效地代表港口部落行使集體同意權。這個經驗告訴我們，即使取得集體同意權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但由於目前執行上的複雜性和困難度，如果有某種機制得以先行，使部落族人及研究人員透過充分對話達成共識，那麼集體同意權實行的精準度將會大幅提升。

原住民族研究倫理的實踐受到原基法第21條保障，要求「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然而，目前多數關於原住民族研究倫理的討論聚焦在後者，也就是集體同意權，缺少對諮商過程的探究。集體同意權實踐的困難在於第21條定義「部落集體同意權」為部落會議的多數決，但由於部落會議召開的難度極高，況且並非每個部落都有部落會議，使得集體同意權難以落實。例如，港口部落並未成立部落會議，通常以「人民團體」形式產生的部落社區發展協會擔任部落與外部間的窗口，然而部分族人認為社區發展協會不足以代表整個部落行使集體同意權。此外，部落在傳統上都有自己的公共事務決議機制，並且因各部落和族群而異。<sup>1</sup>

---

<sup>1</sup> 經過不同時代的管理政策，傳統公共事務的決策機制已經被轉化。臺灣各原住民族群決策機制不一，又因區域性差異有不同影響，但是一般而言，以社區發展協會作為對外聯繫窗口是常態。近年來則推動部落劃定並鼓勵部落會議，並且啟動部落公法人政策，加上各族所推動的民族議會，都是試圖回歸族群與部落治理的倡議。本文重點在於場域「集體權」行使與諮商的必要性，不另詳加敘述各項政策。

目前關於原住民族研究倫理的討論，專注於取得集體同意權的複雜性和困難度，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本文提倡將焦點從同意權轉向諮商，建構一個由部落族人、原住民族知識專家及學者的諮商平台，以利跨文化理解及對話。這群諮商顧問將能提供專為不同部落和研究計畫量身訂做的建議，以確保研究者在遵守倫理規範並符合部落狀態下取得同意權。我們認為諮商平台能有效地幫助部落和學者準備研究的合作關係，而後續的集體同意權也將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做出決定。

本文主要是透過檢視東華團隊與花蓮縣豐濱鄉港口部落合作的過程，反省當代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倫理的處境。本文回顧在港口部落沒有部落會議的前提下，尋求簽署備忘錄作為取得集體同意權，以保障部落與多方合作建構原住民族知識的另類途徑經過之後，第一節聚焦於人類研究（而非人體研究）領域，進行原住民族研究倫理現況概述；第二節從國立東華大學將研究倫理視為場域倫理的角度談起；第三節以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的視角強調部落作為主體的重要性；第四節借鏡紐西蘭的原住民族研究倫理的精神，思考如何建置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研究倫理。最後結論一節則是透過港口經驗的反思，結合紐西蘭毛利價值 *Kāupapa Māori* 以及美國亞利桑納州的實作案例，提出透過建立諮商平台而化解當前研究倫理取得集體同意權的困境之建議。

## 二、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倫理現況

1986年《醫療法》通過後規定衛生署應設置醫事審議委員會，開啓臺灣研究倫理審查制度。然而，直到2006年衛生署公告新版〈研究用人體檢體採集與使用注意事項〉，才明定研究計畫與同意書必須先經機構倫理委員會審查（陳叔倬、陳張培倫 2011）。2011年頒布的《人體研究法》，更清楚規範研究倫理審查的範圍、條件和程序等，根據2017年衛生福利部的核定，臺灣有28個人體研究倫理審查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

科技部於2009年依據行政院當年「第八次全國科技會議」決議所通過的「98-101年國家技術發展計畫」，當中明定政府應鼓勵大學及研究機構成立「研究倫理委員會（IRB）」，公告徵求兩年期「人類行為研究倫理與人體研究倫理治理架構建置計畫」。2010年，臺灣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及成功大學接受計畫補助，建立研究倫理審查會（Research Ethical Committee, REC）。2013年，科技部試辦研究倫理審查，要求涉及人體及人類研究的計畫，需經過以上三所分別代表臺灣北中南三區的委員會審查。教育部同年也頒布「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查核要點」，要求各大學成立研究倫理審查機構。

臺灣目前關於研究倫理審查機制的文獻很少，幾乎都涉及侵入性最高的醫療人體試驗研究，並且大多探討法律和醫療管理層面。<sup>2</sup>在人文社會科學人類研究方面，文獻更是缺乏，主要以國立成功大學執行國科會「人類行為研究倫理與人體研究倫理治理架構建置計畫」的戴華教授（共同主持人之一）及團隊為主，論述內容除了概述臺灣人類研究倫理治理的建構過程，主要探討人文社會科學與生醫領域的研究倫理議題差異，集中在三項議題：第一，研究參與者的招募：由於研究目的不同，人文社會科學不在於驗證假說，而是闡述現象、發掘事實、建構論述、解決問題、尋找較佳政策等，因此無法在研究前決定參與者的數目和對象。第二，知情同意：知情同意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裡最主要的挑戰是，「有些研究方法在於觀察人們在某些情境下的反應或行為，或是試圖揭露、挖掘、拼湊某些現象背後的事實或所隱藏的意涵，以致這些研究時常必須在研究參與者不知實情的狀況下進行，否則就無法達到研究目的，因此，這些研究不是無法事前提供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的機會，就是所提供的知情同意內容與實際研究目的不符」（戴華等 2010）。審查制度的基本假設是要提供知情同意，倘若不能提出而成為例外得另外申請，便會造成研究困難，甚者造成研究者為了避免繁複手續、

---

<sup>2</sup> 例如，以全國碩博士論文系統進行搜尋，關鍵字「研究倫理審查 / 治理 / 諮詢」的搜尋結果為0，「研究倫理」有6篇碩士論文，「人體試驗」有39篇（29篇是法律相關研究所），「人體研究」有3篇。



難以通過審查，而不再以應受到注視以改善現況的弱勢和邊緣狀態當作研究主題。第三，風險評估：有別於人體研究，人類行為研究可能造成的傷害不是身體上，而是心理上的，例如在訪談中回憶痛苦往事，因此較難事先評估。再者是匿名的困難，因為諸多研究參與者的特殊性明顯，「去身分連結」的方法無效，因為知情者仍然可從內容以及其他描述和細節中判斷出報導人身分。

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倫理在 1990 年代因為基因研究爭議，出版的文獻大多與基因研究有關（李崇偉 2007；陳叔倬 2000；陳仲麟 2009）。原住民族研究倫理議題與一般人體／人類研究的差異主要在於，原住民族研究受《人體研究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被排除在免審案件之列，也受原基法第 21 條和《人體研究法》第 15 條規定，相關研究計畫必須事先諮詢並取得各相關原住民族集體同意。原本原基法第 21 條只提及「在原住民族土地內」的學術研究才受規範，原住民族委員會在 2012 年公布《人體研究諮詢及取得原住民同意辦法》，預定在修正通過後，原住民族將有專屬的族群同意權。2015 年 6 月 9 日立法院通過原基法第 21 條修正案：「在原基法第 21 條規定政府或私人的開發行為；除了原住民族土地，也增列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的公有土地，如果要土地開發或其他資源利用等等，都應諮詢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參與，而當政府或法令限制原住民族利用前項土地及自然資源時，除了要取得原住民族同意，也加入部落的同意權」（原民台 2015）。簡單來說，原住民族研究除了個人同意外，尚需原住民族或部落集體同意。然而，部落行使集體同意權相當具有挑戰性，困難在於誰、哪個單位能適當代表部落全體？

在上述整體研究倫理推行的脈絡下，本文僅探究涉及原住民族的人類研究（而非人體研究）。事實上，即使有一套倫理審查機制的規範和準則，研究者也依照制度層面要求完成各項程序，涉及原住民族的社會科學研究仍然有許多瓶頸，其中包含了集體參與機制的運作。臺灣當前的倫理規範（治理層面）與實作機制（管理層面）狀況尚不明顯，對於整個研究領域的知識生產或是原住民族本身發展來說，並非是正常與正面的發展。即使多數研究人員願意共同維護原住民族集

體同意權，並在尊重族群文化意願與知識拓展的前提下進行研究，但在缺乏實踐面向的導引下，致使遭遇難以處理的尷尬狀況。對於原住民族社群來說，若因為規範不明確所引致的各項可能狀況，導致某些有助於族群發展與知識建構的研究計畫，因為無法獲得集體同意而受阻，受損的可能是學術領域和原住民族雙方。因之，在倫理規範之外，探究並建構實際操作策略與方法，才是機制與集體權落實的雙贏之道。

### 三、研究倫理作為場域倫理：東華大學港口團隊<sup>3</sup>

一般而言，研究倫理著重學術自律，而對「原住民族研究」而言，進入場域的「場域倫理」實際上就是以「信任」為基礎的關係。我們選擇用「場域倫理」取代「研究倫理」，因為前者涵蓋後者，同時涵納一系列如關係建立、人際互動等非狹隘定義下研究範疇中的活動。港口執行團隊從規畫初始即意識到必須在兼顧研究倫理與確認集體權保護下進入場域，因此，團隊成員中不論對港口有多麼熟悉或陌生，都試圖面對集體權、積極有效參與、族群文化理解、利益與資訊分享等課題，以場域倫理的信任為中心，減少因為主流知識與詮釋權威下的弱勢化或污名化所造成的不同層次傷害，並且在所有程序中注重「分享」與「積極有效」參與的機制，避免造成知識、權力與資源不對等的無形壓迫。再者，在利益與資源分享務實面上，則遵守重建族群傳統上的「集體分享」原則。

上述原則使團隊與各個參與單位以「共同學習」的倫理為基礎來重建「場域倫理」。舉例來說，團隊中時任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的排灣族 Kui Kasirisir（許俊才）老師以「沉浸式教學（文化營隊）的正向螺旋動力，啟動學生部落主體意識的養成與部落建構主體性」為思考，先讓「文化營隊」課程變成該系的核心必修課程，透過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以下簡稱花蓮部落大學）的協助與

---

<sup>3</sup> 本文部分資料引自執行團隊在場域中的田野筆記與反思。

協調，在進入場域之前先邀請部落講員到課堂討論進入場域的知識後，再與花蓮部落大學與港口國小等各單位共同討論、設定進入場域的學習方向，最後決定以「家」的概念為主軸，進行不同梯次的學習。在以部落為主體的考量下，Kui 針對「民族教育」提出：

教育對原住民族來說，就是生活方式，它是活的，所以部落的環境以及人、事、物都是教育我們長大的重要養分，讓我們知道我們是誰？也讓我們就像一家人一樣彼此養育、彼此照顧、彼此教育，因為我們都是部落的孩子。但是，走入所謂的主流化教育方式，慢慢的我們看不到我們自己，因為我們被環境修正成我們是不如他們的。所以不適切的教育方式將造成我們生活的改變，亦會改變我們對於生命歸屬感的看法，因此本次開設的文化學習課程，就是要把部落，變成學生學習的場域，將文化教育的主體，交還給部落。<sup>4</sup>

因此，當課程第一次在部落進行時，就由花蓮部落大學協助進行三方（港口部落、花蓮部落大學、東華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的合作備忘錄簽訂工作，藉此向部落表達課程對於部落主體的尊重，同時成為團隊成員進行「場域研究」的依據。團隊成員在這些基礎「倫理」原則下，以「擴展部落最大效益、減低傷害到最小程度」的心態進入場域，落實包含加強以部落主體知識建構的產出，思考有益於部落優先排序上的議題與策略等，更重要的是，執行團隊也在原基法第21條精神的解釋狹隘或是曖昧狀況下，建構一套獲得部落同意的場域倫理機制。

進入場域幾年下來，我們與花蓮部落大學、港口國小、港口村、港口部落發展協會和相關在地文史工作室所建立的合作模式，從目前規畫的方向與內容來看，主要是在建構部落知識體系上尊重集體權行使，並且藉由進入場域來共同實踐倫理，包括實踐部落關係的重建與分享學術產出。團隊成員很清楚知道即使有

---

<sup>4</sup> Kui 老師與計畫團隊討論辦理文化營隊的工作會議中提出的口頭分享紀錄。

熟悉的互動，「信任」仍需要深耕。團隊成員成爲進入場域的相互「仲介」者，透過與場域比較熟悉的團隊成員來介紹帶入其他團隊成員。因此，當團隊成員進入場域與部落相遇後，會有許多的可能性，其中包含挫折下的省思所帶來的轉向，以及如何自省長期以來學界對於場域的權力關係的拿捏，所造成的不信任與傷害。港口村長曾經說過，在歷史脈絡下原住民的記憶中是每簽一次契約就失去土地，因此，當東華團隊、港口國小、花蓮部落大學共同擬訂互利合作契約，以白紙黑字來「保護」部落爲計畫的場域，村長仍然猶豫了許久。

花蓮部落大學的執行長 Sifo Lakaw 受到紐西蘭毛利人與英國簽訂《懷唐伊條約》(Treaty of Waitangi) 的啓發，<sup>5</sup> 提議以阿美語及華語雙語撰寫備忘錄，以宣示促進在理解契約內容上的平等基礎。2015 年 6 月中旬，本計畫正式進入場域將近滿兩年後，我們隆重地在港口國小舉行六方（港口社區發展協會、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國立東華大學「東臺灣人文與環境研究及社會實踐中心」、花蓮縣立港口國民小學、藝文職人工作室）的備忘錄簽約儀式，除了具體落實雙語版文件之外，也約定分享回饋學生進入場域的學習，部落並以傳統的殺豬分食儀式來教導進入場域的倫理實踐。

除了在港口部落的實踐經驗外，東華大學及花蓮部落大學成員更因此遠赴紐西蘭毛利大學，針對主體性的民族教育與場域倫理進行具有「他山之石」效果的移地研究。執行團隊希望實際參與原住民族部落倫理的建置與恢復，並且參與記錄如何在不失去部落主體性下，以區域整合概念來補足部落人力資源不足的困境，藉以保護社群的集體權與研究參與。

---

<sup>5</sup> 英國皇室與紐西蘭的毛利領袖於 1840 年 2 月 6 日在懷唐伊簽訂了《懷唐伊條約》，被視爲是紐西蘭的立國文件，近來成爲毛利人向政府主張權力和賠償的重要依據。該條約有英文與毛利文兩種版本，雖然雙方對條約內容的文意及解讀不同，特別是針對主權的擁有和放棄，時至今日仍常造成紐西蘭政府與毛利人間就條約解釋的爭議，但卻也意謂著在被統治的處境下，毛利的主體性透過毛利語文的使用與文化詮釋被加以伸張。

## 四、維護部落主權：花蓮部落大學的參與

在阿美族語中，niyaro'（意指「在圍籬中的人」）是翻譯當今「部落」一詞最適切的字。每個 niyaro' 都是一個防衛組織，而部落與部落之間的關係是對等而非從屬的。如此說來，niyaro' 是擁有主權的實體，有著明確定義的界線，以集體行動來進行農業、狩獵、儀式及外交等功能。

建構原住民族傳統知識向來是花蓮部落大學的核心任務之一。花蓮部落大學透過「部落賦權」的實踐，帶動族群部落討論在地知識傳承的需求與實作方式，目的是讓族群部落實行權力，能自行規畫在地知識教育的作法並運用資源，進而建立在地化的傳統知識教育體系，再依照族群部落的意願與花蓮部落大學合作，共同開發在地學習的課程及教材。綜合言之，部落終身教育的主體來自各族群部落本身，具體實踐傳承教育的自主權與自決權，讓部落成員不再只是被動的教育「接受者」，而是有具有主體意識的教育「規畫者」。

過去，學校是政府實施同化教育的基本場域，教育內容通常忽略了原住民族知識的傳承，甚至否認原住民族的文化。近年來在原住民族權利思潮的推波助瀾之下，除了一般教育，學校也開始實施民族文化和語言課程，只是課程時數僅每週一堂課（40 分鐘），致使原住民族知識的教授內容淺薄化甚至被邊緣化。有鑑於此，推動民族教育的發展，加速原住民族傳統知識的建構，成為當前花蓮部落大學推動傳承教育刻不容緩的議題。

「東華港口團隊」採用原住民族世界觀中循序漸進，「慢慢來，比較快」的心態與場域互動。在「理智」層次的規範下，執行團隊努力減少因為主流知識與詮釋權威下的污名化或弱勢化，避免造成族群污名化或任何層次的傷害，不論是過程中的應對態度或是發表詮釋與論述，一再提醒即使是「善心美意」也務必要避免知識上的壓迫。基於參與成員對部落主體的尊重有共同的認知，東華港口團隊、花蓮部落大學和港口國小，在 2014 年 5 月針對傳統知識建構、促進在地知識傳承召開會議，會議中建立了以下四點共識，成為接下來在地合作的重要基礎。

1. 研擬合作備忘錄，選擇適當時間進行簽署。
2. 港口國小學校提供空間資源，作為聯合辦公室。
3. 協助海岸部落建構傳統知識，配合學校探索教育主題製作教材。
4. 港口團隊依在地需求提供人力及教學資源。

即使計畫團隊願意共同維護原住民族集體同意權，並在尊重族群文化意願與知識拓展的前提下進行合作，當時 Cepo' 和 Makota'ay 部落並沒有代表出席該會議。基於尊重部落的主體性，2015 年 4 月的沉浸式文化營隊（culture camp）課程，即透過部落賦權的機制，由部落組成諮詢團體，共同規畫符合部落知識體系的課程內容與教學策略，提供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的學生進入部落學習的在地化課程。沉浸式文化營隊課程以阿美族「家屋」（loma'）為核心課程（Core Curriculum），內容除了家屋的概念，組織結構，家族與氏族的親屬關係，家屋的位置與構成，還融入與家屋生活有關的知識範疇，如製陶（採土、練土、燒陶、取陶）、水源（水源會議、尋找水源、引水與分水、民生用水與農業用水、水源維護）、造船（形式、材料、工具、工法）、衣飾（服飾裝飾技法、刺繡針法、刺繡圖紋、繡線種類與顏色），以及其他與家屋生活相關的儀式等知識內容。由於文化營課程由部落主導，師資都由部落耆老擔任，讓學生沉浸在傳統家屋的文化環境中，由部落中熟悉族語與華語的中生代引導提問。這種部落自主的文化傳承活動不僅讓學生可以直接學習在地核心文化知識，也得以記錄整理成為部落知識的保存與分享。

在課程進入部落之前，港口部落社區發展協會、花蓮部落大學、東華大學、港口國小與在地非營利組織，就彼此的合作項目共同簽署課程合作備忘錄。這是一個基於部落自主，融入在地、貢獻部落的理念，藉此向部落表達文化營課程對於部落主體的尊重，以及學生在部落的學習與成果都將回饋給部落。這一次的課程進入場域，有賴於部落的支持與協助，藉由部落擔任文化教育的主導者，將原本面臨斷裂的傳統知識體系，透過課程重新建構與實作，並讓修課的學生了解部

落脈動與現況，進而透過與部落講師的互動及部落生活體驗，學習在地知識與文化，培養在地文化視野與知識觀點。

以部落為主體的雙贏結果，仰賴合作備忘錄所發揮的引導功能，一方面展現部落的主體性，另一方面成爲未來高等教育與研究機構和原住民部落合作的典範，鼓勵在地培育原住民族高等教育人才，同時促進原住民族研究的正確發展。課程合作備忘錄的簽訂建立了一套合作的模式，也帶動了以「部落爲主體」的合作備忘錄討論與簽訂。

繼文化營課程的合作備忘錄簽訂之後，著眼於民族教育的必要性與迫切性，港口部落社區發展協會、花蓮部落大學、東華團隊、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港口國小共同擬訂「建構傳統知識體系，推展民族教育作法」的合作備忘錄。這個合作備忘錄最大的特點是，內容採用阿美族語文撰寫，再輔以華語做對照，在語言文字使用的順序上，不僅是促進理解契約內容上的平等基礎，更是宣示在地族群部落的主體性。備忘錄合作項目如下：

1. Mapapadang a mihalaka to malodemak a mipasifana' to sowal no Pangcah. (協力設計族語教學活動)
2. Mapapadang a mikadkad to fenek no Pasawali, to malokakawiten a mihalaka to sapasifana'. (協力進行海岸部落知識調查資料暨製作教材)
3. Macacoker a mitanam (i lesafon no serangawan to macacayatay ato serangawan a nananamen) (共同推動文化體驗 [文化營] 相關課程)
4. Masipalada' to kinaira na matatahic a mikadkad lakaw no caway no Makota'ay, 'arec, ato fenek no pariyar i Pasawali. (共享合作機制中產出的港口文史、藝術、海岸知識等相關資料)
5. Romaroma o nihadaan no enemay ano eca tosaay a kasakapot. (其他六方或雙方同意的計畫)

在六方確認備忘錄內容、阿美族語文和華語字所表示的意義之後，<sup>6</sup>6月19日依循部落的傳統儀式簽訂雙語版的合作備忘錄，儀式由港口部落的耆老 Kaco Lekal 執行，港口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及港口村的村長（都是部落領導階層）陪同。Kaco Lekal 在儀式中朝向東邊對阿美族的祖先說：

你們才是創造阿美族美好生活的人，阿美族的文化將不會被遺忘，因為我們還堅持著傳承來自於你們的知識……現在要將我們所知道的知識教給他們，由他們來協助把這些知識彙整起來（製作教材），繼續傳給我們的下一代……

Kaco Lekal的禱詞清楚地說明了備忘錄的核心價值，就是以阿美族和傳統知識為主體，透過來自各合作單位的資源，協助港口部落建構傳統知識，並有系統地透過部落和學校進行知識傳承，學校因此成為民族教育亟待收復的場域。面對港口國小裁併校的問題，Kaco Lekal也語重心長地說：「看看我們的學校，這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學校，可以作為傳承文化的基地，不要遺忘了這個學校，照顧它，把它留下來。」

執行團隊希望實際參與原住民族部落倫理的建置與恢復，並參與記錄如何在不失去部落主體性下，以區域整合概念補足部落人力資源不足的困境，藉以保護社群的集體權與研究參與。港口村的 Sakoma 村長在簽約時提到：「以往有很多學術單位來到部落，有的是個人、有的是團體，他們一來就把我們的傳統智慧跟創作資產拿出去，沒有留下一點紙本資料。」在原住民的世界觀裡，健康的研究關係是研究人員與被研究人、被研究社群的關係平衡，而所謂的平衡則包含尊重、負責與分享。很顯然地，由於部落與研究參與者之間的文化、語言、制度所

---

<sup>6</sup> 合作備忘錄的華語內容先由花蓮部落大學與各單位進行討論，交換意見後擬稿而成，交由港口社區發展協會、港口國小與東華大學團隊確認合作項目及文字內容後，再請阿美族耆老 Namoh Rata（吳明義）老師翻譯成阿美族語文，並再次交予上述單位檢視與確認阿美族語和華語內容之後，成為最後簽署的版本。



造成的差異，唯有透過信任關係的深耕，以落實部落主體性針對「研究」的倫理進行互助共利規範，並且建立實踐原基法第21條規定保障原住民族集體同意權的典範，藉以規範學術或其他單位在進入部落執行研究時，能夠尊重部落的意願及需求，透過簽署合作備忘錄取得同意。

## 五、研究霸權與紐西蘭Kāupapa Māori經驗

紐西蘭學者 Linda Luhiwai Smith 在「解殖民方法」(*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 1999)一書中指出，原住民族研究、歷史、書寫和歷史等詞，都充滿了殖民意味，而「研究」大概是原住民的世界裡，最骯髒的字眼之一。身為毛利人，Smith 自小便聽說／親眼看見學者以研究的名義進出部落，她深知在部落裡提起「研究」兩字，會帶出多少充滿暴力和傷害的回憶。西方學者總是認定原住民是可以被理解的，於是使盡各種方法要將各種差異化為能夠度量的比較。「光是想到有人將小米填滿祖先的頭顱，用來測量我們的認知能力，完全抵觸了我們對自己的認知，就令人憤怒」(Smith 1999: 1)。面對這些不堪的歷史，Smith 認為當代原住民族研究的首要任務是解殖民，而解殖民的方法在於「研究回去」(researching back)，讓原住民不再是被研究的客體，而是共同生產知識的主體。

延續研究在某種層面上即是殖民手段的思維，將學術研究視為一種暴力，其實也可以用理論做不同的理解。法國社會學者 Pierre Bourdieu 在《語言與象徵權力》(1991)一書裡，探討受到各式權力與不平等所牽制和形塑的語言實踐，檢視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詞交換，可以看見那些語言所表述和再生產的社會結構。Bourdieu 認為語言的效力就是象徵權力，並非來自語言本身，而是來自支撐語言的社會結構。象徵權力是看似溫和甚至隱形的暴力，不同於一般顯見的暴力，象徵權力的運作需要被支配者的承認 (recognition)。也就是說，象徵交換的作用要有效力，依賴施展權力者和服從者雙方的共謀，承認 (或著誤認 [misrecognition]) 權力機制的效力。說話並非報導或描述，而是一種行為，因此

詞語的力量來自外在的社會條件，僅來自發言者被授予的權力，或者說，發言者只是語言的載具，本身並沒有發言的權威。被授權的發言者之所以能夠發聲並在他人身上產生作用，是因為他的發言集合團體的累積象徵資本，是團體所選擇的發言代表。因此，言說作為行為是否成功，取決於發言者的相稱性，也就是他所擁有的社會功能。

學術研究作為知識與語言的生產和再生產，便非單純的抽象概念思考，而是受到各種權力關係和社會條件等現實條件牽制和約束。更進一步地說，如果說學術研究所生產出來的知識被視為某種社會依循和相信的典範，便不能忽視生產過程中的各種武斷和壟斷性。以官方語言的設立為例，法國在革命後才取巴黎方言作為官方語言，這實際上是上層階級透過純化語言來統一思想的獨霸方式。上層階級直接受惠，被統治階級的語言淪為方言，這樣的階級化透過教育不斷被鞏固。由此可見，相對而言，語言資本在市場中形成的象徵暴力，其實並不來自語言本身，而是來自支撐語言運作的社會結構。

Bourdieu (1999[1993]) 在〈理解〉(Understanding) 一文中，明確地探討研究如何可能成為暴力，以及該如何避免。研究之所以與其他日常生活中的交換有差異，在於純粹以取得知識為目的，但無論如何，研究仍是一種社會關係。然而，在研究關係的結構裡面存在各種扭曲 (distortion)，無論是研究善意的意圖造成傷害，或是在詮釋過程中曲解了原意。學者因此提倡以反思社會學作為實踐的方法，檢視研究本身的假定。Bourdieu 以訪談這個研究方法為例，指出要了解訪談的意義，必定要先意識到這個舉動的「武斷的侵入」(arbitrary intrusion)，以及訪談者與受訪者的不對稱關係所帶來的影響 (Bourdieu 1999[1993]: 608-609)。訪談關係在田野的結構裡是不對等的，因為訪談者掌握了遊戲規則以及決定訪談內容目的和意義的權力，在語言和文化資本的市場裡，社會階級更加深化這樣的關係。要讓研究關係達到理想狀態，或者說非暴力的溝通，除了降低在訪談過程中象徵暴力的運作，另一個可能性是研究者本身也投入訪談內容，分享自身經驗。此外，Bourdieu 也提出謄寫訪談稿作為一種重寫 / 翻譯的概念，訪談稿

在從口語轉錄成文字的過程中散失口語中的雙關語和模糊性、語調起伏等，可以看見研究者所握有的操作空間和權力（Bourdieu 1999[1993]: 625）。

港口部落合作備忘錄的簽署，各方同意對於港口部落的傳統知識建構及原住民族教育促進，都應以部落需求和利益為前提，揭示一種外界進入部落但仍然維護部落主權的方式。然而，以 Smith 的論述檢視研究者的角度，存在於研究方法、倫理規範及部落利益之間的空間，是「微妙的場域」（tricky ground）（Smith 2005: 85）。縱使擁有各式行為準則和倫理規範得以參考，在不同的研究計畫中，究竟該依循哪個研究方法或採取什麼角度並不見得明顯。倫理（ethics）一詞來自希臘語的 *ethos*，有個人、社群或民族的特色或首要信念的意義；倫理是智慧的實踐，一種自然引領前往正確的道途和規範的哲學。如此一來，原住民族研究倫理應當是順應並以原住民族世界觀、價值和哲學為基礎。

長久以來，毛利族是各種研究（如，醫學、基因、公衛、資源管理、人類學、歷史、政治與藝術）的客體，而毛利人的研究經驗從整體來說是負面的，不僅是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和不道德的行徑，更是殖民意識型態與西方文化價值和知識論被強加於身上。紐西蘭的研究倫理以 *Kāupapa Māori* 為主軸，研究依據毛利民族自決和本身富含倫理的哲學為原則，與一般條列式確保研究倫理的實踐方式相當不同。*Kāupapa Māori* 原意為「毛利之道」，功能在於遵守毛利世界觀與價值觀，並且抵抗和批判西方研究霸權。這樣的研究是「由毛利人透過毛利價值為毛利人而做」（by Māori, for Māori, with Māori values），「研究由毛利人構思、發展並執行，而最終也有利於毛利」（Walker et al. 2006: 335）。

縱使毛利人占紐西蘭人口的14%，並且有《懷唐伊條約》保障，但130年的殖民歷史以及一世紀的同化教育幾乎完全摧毀毛利文化和語言。直到1960年代，當學者研究發現毛利語已瀕臨消失時，才興起毛利文化復振運動。1970和1980年代，各式運動團體，包括知名的語言巢（*Kōhanga Reo*）提倡毛利權益、主權以及復振毛利文化及語言的重要性。在這樣的社會運動歷史背景發展下，毛利學者企圖翻轉西方範式的支配，積極地尋找以毛利世界觀和知識論為主體的

研究方法。Kāupapa Māori 因此不是爲了避免不道德研究的條例式規範，而是在「做毛利」的架構下理解世界並挑戰現今研究概念的途徑。這是一種研究主體的形塑和轉換，如同 Smith (1999: 85) 曾提問：「當被研究者成爲研究者時會發生什麼事情？」毛利人從以往被研究的客體，變成主導研究的主體。

有人說 Kāupapa Māori 的特色之一是書寫者通常不會說該如何執行 Kāupapa Māori，而是描述它是什麼以及造成什麼影響 (Walker et al. 2006: 335)。Kāupapa Māori 究竟是什麼，或許可以從「非毛利研究者是否可以參與」這個眾說紛紜的問題談起，有些學者採取嚴厲的立場，有些學者則跳脫本質主義並挑戰「做毛利」的意義。例如，Cathy Irwin 將 Kāupapa Māori 定義爲「是文化安全的」（文化敏感是不夠的）並且「有耆老的帶領」，研究者應該是毛利人而非是剛好有毛利血統的研究者 (Walker et al. 2006: 186)；Russell Bishop 根據懷《唐伊條約》相關論述架構和定義 Kāupapa Māori，認爲「非毛利人有支持毛利人的任務」(Walker et al. 2006: 186)。在關於「做毛利」定義上各方所據的不同位置，適切地反映出毛利傳統文化裡辯論的激烈程度。

呈現 Kāupapa Māori 原則的方式也同樣展示了毛利堅定的民族自決態度。Kāupapa Māori 有五個原則：tino rangatiratanga、社會正義 (social justice)、毛利世界觀、te reo 和 whānau。Tino rangatiratanga 有絕對主權、民族自決、自治和獨立等意，延伸的意義是在毛利脈絡中，毛利的價值和知識是基準而且是正當的。這對於長期內化殖民價值的毛利人來說，是翻轉以往認爲任何與毛利相關都是比主流意識型態要低等的重要態度。社會正義關切的是研究關係裡的權利不平等，以及研究必須要對毛利有益；毛利世界觀指向提出一套有別於西方典範的知識論的必須性；Te reo 意指理想的研究應使用毛利語才能較爲完善和透徹地理解毛利知識；Whānau 指的是家族，意味著集體性在毛利傳統中的重要性。相對於西方研究的個人主義色彩，毛利人認爲沒有部落族人參與，知識和研究便不可得 (Walker et al. 2006: 186)。

## 六、結論：集體同意權與諮商平台

在備忘錄簽署之後，港口部落族人在社群網站上熱烈討論，其中最具爭議的議題之一是，究竟誰有足夠和有效的代表性替港口部落行使同意權？在沒有部落會議的部落裡，社區發展協會通常具有連結部落及外部的功能。另外一個被討論的議題是，部落為何要將部落知識與東華大學及花蓮部落大學分享？雖然部分部落成員提出的質疑，很快就在充分溝通中獲得理解，但這個議題呈現出集體同意權實踐上的困難，以及建立某種可以促使各方充分溝通、理解和建立信任過程的必要性。

從港口部落企圖以簽訂合作備忘錄作為取得集體同意權的另類途徑受到部落質疑的經驗，促使執行團隊反思以集體權為基礎的研究倫理在實踐上的挑戰，並且參考紐西蘭和美國的原住民族研究倫理進行討論。我們建議設置一個平台，在研究前、研究執行時和研究結束後提供諮商。這樣的諮商平台並無意取代集體同意權的實行，但能更適切地維護部落主權。原基法第21條明定：「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如同本文先前所述，當今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倫理的討論聚焦於集體同意權，而我們建議探究實踐諮商的可能性。

美國原住民族研究倫理並沒有聯邦層級訂定的流程（Kelley et al. 2013: 47）。有些州，包括亞利桑納州，要求各大學自行制定規則和辦法（University of Arizona, Office for Research & Discovery 2016: 3）。舉例來說，亞利桑納大學（University of Arizona）的「原住民族參與研究及教育指南」（*Guidelines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Engagements with Native Nations and Indigenous Peoples*）指出：「這份指南致力將以往在原住民族身上做研究的模式，轉換成與原住民族一起從事教育合作。」這份指南中明確說明主權、諮商和職權都是與原住民族合作研究應具備的基本要素。亞利桑納州和亞利桑納大學都承認各民族及部落為主

權實體，而州與原住民族的關係為政體對政體（government-to-government）。此外，指南也指出文化能力的培養需要更謹慎和細緻的考量。

亞利桑納大學的原住民族技術協助辦公室（Native Peoples Technical Assistance Office, NPTAO）與多個原住民族／部落共同合作，提供在該地從事研究活動應遵守的規範和程序。NPTAO 網站上的部落概況提供當期的部落領袖名單、亞利桑納州最新的部落資訊，以及聯邦與不同部落自行設定的研究活動和相關法規。NPTAO 也有部落諮商策略，當中提及大學及董事會對於與原住民族主權實體建立關係的重視。這個策略反映出理事會致力於透過尊重和肯定諮商的基本原則，來建立政體對政體的重要關係。

從 Kāupapa Māori 到亞利桑納大學的諮商策略，可以看到研究倫理不僅是教條式的學術倫理規範，所涉及的其實是原住民族主權。以 Kāupapa Māori 為根本的紐西蘭毛利研究倫理，展示從原住民族世界觀出發的研究取徑、研究過程及成果必須符合毛利價值並有利於毛利，意味著研究倫理已經涵納在「研究」這一概念中。考量臺灣及紐西蘭歷史和族群脈絡的差異，我們並非主張完全學習紐西蘭經驗，而是借鏡高度以毛利為主體的研究方法，提升原住民族自決的能見度。我們提議設置諮商平台，其諮商顧問可以分成三類：（1）在地代表，（2）原住民族知識專家，（3）學術研究者。這樣的顧問組成，將能有效提供專門為不同部落和研究計畫量身訂做的建議，確保遵守倫理規範並符合部落狀態，以取得集體同意權。此外，顧問們也會參與研究計畫設計、執行與研究成果發表。這樣的諮商平台將能有效地幫助部落和學者準備研究的合作關係，在不取代集體同意權的前提下，讓集體同意權能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做出決定。本文將當今臺灣原住民族研究的焦點，從集體同意權轉至諮商平台，至於原住民族與研究機構和個人間的關係若能成為合作的伙伴關係，亦能確保研究成果有利於原住民族部落及族人。我們期望藉由原住民族研究倫理諮商平台的建設，原住民族知識的（再）生產能落實捍衛原住民族主權、世界觀和價值的目標。

## 參考文獻

- 李崇儋，2007，〈原住民基因研究之倫理課題與規範初探〉。《台大法學論叢》36(3): 465-518。
- 原民台，2015，〈立院三讀過 原基法部分修正條文〉。<http://titv.ipcf.org.tw/news-13161>
- 陳仲嶙，2009，〈從研究自由之觀點論基因研究的社群參與〉。《臺北大學法學論叢》71: 1-40。
- 陳叔倬，2000，〈臺灣原住民遺傳基因研究之倫理爭議與立法保障〉。《生物科技與法律研究通訊》8: 7-29。
- 陳叔倬、陳張培倫，2011，〈社群研究同意權在臺灣的實踐——以噶瑪蘭社群否決與西拉雅社群同意為例〉。《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4(3): 33-59。
- 戴華、甘偵蓉、鄭育萍，2010，〈人文社會科學與研究倫理審查：執行研究倫理治理架構計畫的考察與反思〉。《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2(1): 10-18。
- Kelley, Allyson, Annie Belcourt-Dittloff, Cheryl Belcourt and Gordon Belcourt, 2013, "Research Ethics and Indigenous Communi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3(12): 2146-2152.
- Bourdieu, Pierre,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Oxford: Pol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1999[1993], "Understanding." Pp. 607-6276 in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Linda Tuhiwai, 1999, *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 Research and Indigenous Peoples*. London: Zed Books.
- Smith, Linda Tuhiwai, 2005, "On Tricky Ground: Researching the Native in the Age of Uncertainty." Pp. 113-143 in *The Landscap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ited by Norman K. Denzin and Yvonna S. Lincoln. Beverly Hills, CA: Sage.

University of Arizona, Office for Research & Discovery, 2016,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Engagements with Native Nations and Indigenous Peoples*.

Walker, Shayne, Anaru Eketone and Anita Gibbs, 2006, “An Exploration of Kāupapa Māori Research, Its principles, Processes and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9(4): 331-344.



**From Collective Consent to Consultation Platform:  
Indigenous Research Ethics in Makota'ay**

Jolan Hsieh Sifo Lakaw Ena Ying-tzu Chang

**Abstract**

While the practice of indigenous research ethics in Taiwan is bound by the *Indigenous Peoples Basic Law to consult and obtain community collective consent*, most current discussions have focused on the latter. The challenges of collective consent are not only because the article defines ‘consent by indigenous community’ as majority vote of the tribal council, of which meetings are difficult to call, but also that not every indigenous community has a tribal council. Furthermore, indigenous communities traditionally have their own decision-making structure/organization, which varies from community to community, nation to nation.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we propose to shift the emphasis to the process of *consultation* and that a consultation platform should be in place, where indigenous community members, indigenous knowledge professionals and academics work together to facilitate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dialogue. Our belief is that consultation platforms will better prepare communities and researchers for collaborative activities, with collective consent based on informed decisions. In this paper we reflect on current indigenous research ethics and practices through our experiences working with the Makota'ay community and scrutinize examples from New Zealand and

---

Jolan Hsieh,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thnic Relations and Culture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Sifo Lakaw,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Ethnic Relations and Culture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Ena Ying-tzu Chang, Cotutelle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Ethnic Relations and Culture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Macquarie University.

the US in order to locate pragmatic tools for building consultation platforms that uphold indigenous sovereignty, worldviews, and values.

**Keywords:** indigenous research ethics, collective consent, Kāupapa Māori, indigenous peoples basic law, field ethics



第二部

# 課程 / 平台串聯機制



# 4

## 公平分配教育資源： 鄉村課後學習遠距系統建置

翁裕峰

---

致謝：本文能夠完成，要特別感謝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的補助，助理朱俊彥、所有參與遠距學習的大小學伴、公館社區發展協會、岡仔林教會、左鎮國小、左鎮國中、成功大學總圖書館、成功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蚵寮漁村小搖滾、林福清導演、綠色奇蹟、輔仁大學台灣偏鄉教育關懷中心、T22 教育聯盟；後續參與公館社區社區經濟方案、社會支持方案（高齡照護）的老師與同學；對本文提供修改意見的朋友：戴華、湯京平、謝國興、呂寶靜、張世雄，以及匿名的審查人。

翁裕峰，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助理研究員。E-mail: wongyuk@gmail.com。

## 中文摘要

健康不公平的社會決定性因素相當多樣，收入分配是造成健康不公平較明確的決定性因素之一（Wilkinson and Pickett 2006; Deaton 2003）。Marmot（2002）鮮明地闡述說：「這可能是因為教育影響健康，精確地說，是因為受較多教育的人有較高的收入……這反映影響一個世代健康的不同經驗、幸福與不幸。」也就是說，教育資源的可取得性可能導致收入不公平，進而影響健康。

如何改善教育資源可取得性，是重要的議題。一些研究或回顧教育公平的文獻，聚焦討論的重點之一是資源與分配。這些研究或回顧，透過蒐集執行教育改革機構的一手或二手資料，呈現資源不足的類型，提出政策上應考量的資源類型、再分配的對策與可實施的措施，有的更與分配結果的有效性連結，特別是學生的學習表現。在這些研究或回顧中，鄉村是一個重要的教育資源分配場域，由於位於交通不便之地，數位學習成為補足學習資源的方案。

然而，這類研究或回顧過度集中在制式教育制度下的資源與分配，未論及制式教育機構外學童的需求；其次，雖有研究者提出系統性資源分配的建議，並包含課後學習在內，但是這類系統性建議，是依照法律制度下既成的資源分配系統，分析各利害關係人在此結構下進行教育資源重分配的結果，缺乏各利害關係人如何形成資源再分配的過程，因此對於如何在非制式教育機構下，建置課後學習資源再分配，並填補鄉村教育需求，仍有落差。

為了補充這個不足，本文以遠距學習案例顯示，大學在台南左鎮交通不便的公館社區，與當地教會、社區發展協會、小學協力，與十餘個不同組織或單位聯繫並合作，建立相對穩定的數位學習體系，改變資源分配方式的過程。

**關鍵字：**教育資源、分配、公平、遠距學習

## 一、前言

健康公平與健康落差（health disparities）的文獻指出，健康不公平與醫療和非醫療的決定性因素有關（Deaton 2003: 130; Braveman et al. 2011: S152），即便因果關係還未得到健康公平領域學者的共識（見 Deaton 2003: 114; Braveman et al. 2011: S151; Coogan 2007: 4; Marmot 2002），教育已被認為是健康不公平的社會決定性因素之一（Sen 1990: 54-55; Braveman et al. 2011: S152; Deaton 2003: 129; Ruger 2010: 44）。Coogan（2007: 4, 47）因此呼籲：「健康政策必須擴大致力於制定教育與環境政策」，作為人類健康的目標，「這樣的政策應該保證所有年齡的學童能得到合適的學習管道，包含中等教育以上的教育」。

健康不公平的學者已經認知，各種研究觀察到的結果涉及社會不利群體可用資源的不公平分配，包含設備在內（Whitehead 1991: 221; Marmot 2005: 1101），他們可能沒有什麼選擇，只能生活在不利於健康的環境中（Whitehead 1991: 220）。為了解決這項問題，必須在政策上使他們有能量進行資源重分配（Braveman et al. 2011; Ruger 2010）。

教育政策研究學者不見得結合健康不公平的觀點與研究，但研究結論也強調教育資源分配的公正與適當性（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99; Alexander et al. 2000: 26-27, 30-31, 33; Pan, et al. 2003: 2-3, 5, 72, 83, 99；陳麗珠 2006；余孟和 2011；江嘉杰 2016；何俊青 2017: 16；張婉珩 2016: 34-36；李淑惠 2017: 128）。

### （一）國家立法、預算作為教育資源分配的手段

前述文獻回顧顯示，教育政策研究學者或倡議者不僅與健康公平的研究有相似的發現，有的甚至具體採取法律或政策，透過制度與預算，提供資源重新進行分配。例如，美國近 15 年來最主要的教育改革之一是 *No Child Left Behind*（NCLB）立法（Pan et al. 2003: 4, 82），台灣則是依《憲法》、《教育基本法》等，



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攜手計畫課後扶助」、「離島地區計畫」、「縮短城鄉數位落差計畫」、「夜光天使點燈專案計畫」、「偏鄉數位關懷推動計畫」、「特色學校發展方案」等（陳麗珠 2007；江嘉杰 2016: 23）。

什麼資源需要被重分配？特別是在不利群體最有可能居住的鄉村地區。處於不利地位的學校，有各種類型的資源缺乏困境，包含：教室空間、建築維護、例行教學科目的材料、教學課程、專業發展、有利的薪資、規畫的時間、減輕班級負荷、有經驗的師資等（Goertz and Natriello 1999: 126-127; Pan et al. 2003: 63-71, 74）。當中最大的問題是薪資不具吸引力，其次是工作量增加造成時間不足，再者是老師適應新增工作的能力與時間缺乏政府支持（Pan et al. 2003: 77）。類似的狀況也發生在台灣，例如，「教育優先區計畫」所列的補助指標，絕大多數集中在教室空間、設備與課程（范雅惠 2008: 5-6）等困境；師資不足的困境則出現在不同的教育研究回顧或教育評論專文中（黃聖元 2015: 10, 15-16, 18, 20, 23；黃淑玲 2013: 107；范熾文、張文權 2015: 74-76；蘇珍慧 2017: 137-139），也有時間不夠、班級負荷大（黃聖元 2015: 21），乃至超時兼課、專業發展進修不便等問題（蘇珍慧 2017: 141）。

爲了回應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平的處境，上述文獻討論最多的是**國家層次的資源投入**，特別是透過教育法制而來的預算，這些預算會轉換成財務性質，以及非財務性質的預算（Carr and Fuhrman 1999: 153），分配到各個學校對應的教育措施項目當中，兩者同時納入資源分配的考量，才是適當的資源分配（Guthrie and Rothstein 1999: 210）。Pan 等人（2003: 23）提供一個將教育預算轉換爲貨幣或非貨幣分配的架構圖，本文以此爲基礎，將前述各文獻直接論及的，以及由前後文脈絡可以看出資源需求與資源分配關聯性的貨幣或資源，整理成以下列表。

表1 教育資源分配對應表

貨幣性	轉換成以下資源	具體內容
預算、獎助或基金（含政府、非營利組織、企業贊助等）	教學	薪資、學業學習方案（instructional services）、聘用教師（降低師生比）
	人力（教師）發展	新的職務發展、教學策略發展、教學內容發展、協同教學發展、專業發展、補償性薪資誘因、代理人
	時間補償	時間縮減轉運用（如，整合課程、蒐集資料與分析、參加訓練、批改作業、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物質	電腦硬體、軟體、學校設備、建築物
	家長或社區參與	支持學生學習的志工、課程學習的導師、服務學生的志工、生涯諮詢的志工、募集資金

資料來源：Pan et al. (2003: 23, 63-71, 74)；Goertz and Natriello (1999: 99, 101-102)。

部分美國教育資源分配文獻提及，政府資源投入若是不足，各地區學校可以透過招募方式，引入企業、基金會、家長或是社區參與，提供包含捐款、設備或各種支持學習的服務（Goertz and Natriello 1999: 115; Evans et al. 1999: 93）。台灣的相關文獻，主要集中在國家部門的資源與分配問題，較少論及結合政府以外的資源。

前述回顧的主要文獻，提到預算資源分配問題時，會採用資源分配公平與適當的概念，例如，不能再以無效的成本效益這種市場概念作為解決方法（Carr and Fuhrman 1999: 153）。Pan 等人（2003: 15-16）回顧有效教學實務研究時指出，師生比低有助於提高學習表現，也就是說每個學童所用的教師成本越高、表現越好，並非大量生產式的低成本才是有品質的教育。這也涉及資源如何分配給這些表現不同的學童，包含最低能力、最大潛力等（Berne and Stiefel 1999: 20-21）。

直接將教育資源分配政策進行學生成效量化的對應實證研究，在台灣並不

多見，資源再分配之後學童表現方面的文獻更少。黃聖元（2015: 16-24）回顧23篇關於「教育優先區計畫」實施的碩士論文，只有一篇有學生的質性訪談資料，但內容不是教育優先區預算投入後學生課業的表現，而是教師在課業輔導方面的表現；其餘論文都是教育工作者或行政成員對於教育資源重分配效果的觀點。在「教育優先區計畫」執行之後，有八篇研究指出教育優先區的預算不足，五篇認為師資仍不足（黃聖元 2015: 16-24）。蘇珍慧（2017: 139-140）更指出，重要的問題之一是資源分配的項目錯置造成資源不足，特別是師資與物資之間的錯置：缺的是能關心、引導孩子學習的有經驗師資，預算配置結果卻是物資豐富、教師流動率高。

## （二）遠距學習作為鄉村教育的選項

課後學習是美國與台灣對包含鄉村在內不利地區教育資源配置的共同項目之一，教育資源不易到達的鄉村，可能面臨地理區位孤立導致交通不便，師資不足，離學校遠，不易參加課後學習，沒有足夠利益誘因而缺乏師資等。通訊遠距學習因應而生，隨著通訊技術的改變，從單向的、非即時的書信函授，發展迄今以電腦透過網際網路連結學習接收者與學習提供者的即時互動遠距學習，也成為課後學習的選項（Reeves 2003: 6, 8-9; Owens et al. 2009: 53-54; Moore and Thompson 1990: 2-4）。

台灣與數位有關的遠距學習服務對象發展，和英國、美國類似，都是先應用在高等教育，再延伸至中小學教育。遠距學習有兩種形態，一種是有進度、按時進行的課程，包含基本的、補充的與提升進階的三類（Moore and Thompson 1990: 3, 22），在教育資源重分配的 NCLB 脈絡下，以補充學習為主（Reeves 2003: 6, 7; Hobbs 2004: 5, 21-22）；另一種則是線上導師<sup>1</sup>（e-mentoring），側重協助

<sup>1</sup> 根據 Google 學術繁體中文查閱的結果顯示，E-mentoring 在中文學界的翻譯，教育輔導類的研究採用「線上導師」，其他商管類文獻則採用「師徒制」。由於本文聚焦於學校教育，故採

建立成功經驗與自信。本文參與的遠距學習，即是建立成功經驗與自信，搭配符合學童能力的課程進展，屬於線上導師形態的遠距學習。教育部自2006年起，以「數位學伴」<sup>2</sup>計畫在台灣實施線上導師遠距學習，因此本文以「線上導師」與「數位學伴」來指稱這種遠距學習。

### （三）導師形態遠距學習的環境配置

所有透過網際網路進行的遠距學習，包含線上導師在內，都需要有一定的資源配置結構，建立老師與學生遠距雙向互動的科技是重要的第一步。根據美國與台灣的經驗，至少需包含網路通訊基礎設施（如，網路、伺服器），設備（如，電腦、耳機、麥克風、視訊會議軟體／平台），操作知識，通訊技術人力（即電腦科技素養），線上導師人力，引導線上導師人力，並形成經營網絡，以克服前述包含地理區位等在內的學習資源不足問題（Reeves 2003: 7; Hobbs 2004: 7-9, 11; 林麗娟等 2014: 22-23; 教育部 2017: 1; 王雅芳、呂慈涵 2012: 164）。

美國與台灣建置中小學遠距學習系統的步驟或機制，共同之處在於：（1）了解在地學習需求，（2）建立在地學校的支持，（3）了解視訊環境需求（服務提供者與服務接受者），（4）尋找有興趣的結盟伙伴，（5）發展營運計畫，（6）決定傳輸設備選項，（7）尋找能提供遠距設備需求的包商投標，（8）了解遠距教室操作控制與訓練，（9）執行效果評估，（10）拓展遠距學習場域（Hobbs 2004: 11; 王雅芳、呂慈涵 2012: 163-165）。其不同處，參見表2。

---

用前者。另外，林麗娟等人（2014）以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所發表的論文，雖採用 online tutor 一詞，經比對 Single 與 Single（2005）“E-mentoring for Social Equity”一文顯示，tutor 提供導生密集且客製化的引導，是維持 e-mentoring 關係所必須的。顯然，從學校教育的觀點來說，線上導師一詞也適用於本文所指的數位學伴。

<sup>2</sup> 本文針對主要經費來自教育部補助之遠距學習系統稱之為「數位學伴」；本文案例主要經費非來自教育部補助，僅數位教室屬於教育部資源，故以「遠距學伴」做為案例陳述上的區別。

表2 遠距學習系統建置步驟（機制）

步驟	美國	台灣（數位學伴文獻中的機制順序） <sup>3</sup>
1	了解在地學習需求	了解（在地學習）需求（0）
2	建立在地學校的支持	尋找有興趣結盟伙伴（0）
3	了解視訊環境需求	建立在地學校的支持（2.1）
4	尋找社區、高教有興趣結盟伙伴	發展營運計畫（2.1）
5	決定傳輸設備選項	了解視訊環境需求（2.2）
6	尋找提供遠距設備需求的包商投標	決定傳輸設備選項（2.2）
7	了解遠距教室操作控制與訓練	尋找能提供遠距設備需求的包商投標（2.2）
8	發展營運計畫	了解遠距教室操作控制與訓練（2.3/2.4/2.5/2.6）
9	拓展遠距學習場域	執行效果評估（2.8/2.9/2.10）
10	執行效果評估	拓展遠距學習場域（2.11）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Hobbs（2004: 11）；王雅芳、呂慈涵（2012: 163-165）。

第一個不同是，美國在需求界定與建立在地支持、尋找結盟方面，是由有需求的在地學校啟動（Reeves 2003: 7），Hobbs（2004）整理出來的步驟也強調在地學校的角色；台灣的步驟1至4，是由高等教育機構以先前的經驗整理、界定需求，形成高等教育機構間的結盟，再與在地學校討論，師資則由大學提供（王雅芳、呂慈涵 2012: 164）。第二個不同是美國由在地學校進行課程服務、網路服務的採購，台灣的在地學校則較少進行課程服務與網路服務採購，大多以採購電腦、資通訊設備為主。第三個不同之處是資源來源，遠距學習是資源密集的投入（Single and Single 2005: 316），對鄉村學校來說，成本高與科技支援近用受限，加上缺乏科技設備維護費用，都會阻礙遠距學習的設置（Hobbs 2004: 8, 17）。美國遠距學習資源即使有 NCLB 的預算與各州政府的立法稅收，仍需尋求能提供各種資源協力的伙伴；台灣實施遠距學習，特別是數位學伴，雖然也鼓勵參與者尋求外部資源協力，仍以教育機構申請政府部門的資源為主，特別是教育部門的經費。至於美國與台灣在建置機制上的相同之處，除了形成結盟團隊，協定行

<sup>3</sup> 台灣欄位中括弧的數字表示台灣數位學伴的步驟順序，以便讀者理解兩國的步驟不見得一模一樣。

事曆、指定帶班人員以及各自籌募需要的硬體資源之外（Hobbs 2004: 11；王雅芳、呂慈涵 2012: 164），在人力方面都以大專學生與導生配對，作為導生學習成功的典範對象（Single and Single 2005: 304, 307-308, 312；王雅芳、呂慈涵 2012: 164-165）。

#### （四）放學後的孩子：遠距學習未處理的問題

以上關於教育資源分配的研究案例或評論，都是建構在國家教育政策下，透過制式教育機構申請預算，轉換成財務資源與非財務資源，提供補充教育的服務。有些教育服務資源是配置在課後學習上，以因應在地不利的條件與需求。雙向即時互動的導師制遠距學習，則進一步注重建立學童的成功經驗，由大學生擔任學童的客製化導師，搭配視訊會議科技設備，補充班級式課程無法針對個別學童設計符合需求與程度的學習方式或內容。

此外，有些學童有下課離校後的學習需求，但是在鄉村交通不便之地，沒有老師或補充教育服務機構願意不計成本提供服務。文獻顯示，導師制即時遠距學習的資源進到鄉村是要面對這些問題，但是當學習所需的各種資源需要透過學校申請，並且主要設在學校時，對居住在地理隔閡區域的鄉村學童來說，下課放學後無法有適當的補充學習資源可用。

即使台灣的數位學伴特別顧及這個面向，運用視訊會議系統協助有需要的鄉村學童，在學校以外的地方設立數位學伴教室，然而，與透過制式教育機構申請設置的數位學習相比，可用資源有相當的差距。例如，一個核定通過的伙伴大學必須建立 50 位或以上，有需求的中小學學生導師制遠距學習，才可以申請到包含專任助理、導師師資、課程教材、通訊周邊設備、網際網路使用服務、實體見面、教育訓練等補助資源；導生端學校也有相應的學習資源可以申請（教育部 2017: 2, 3, 11-12）。

一樣的規模，或是服務對象少於 50 位，設置在非制式教育機構的情況，大

學必須自行籌募各項能促成導師制遠距學習的資源，學習端的單位也是，但這幾乎完全不在本文蒐集整理的教育政策與資源配置公正性文獻的討論範疇中。教育公平是一個涉及多重利害關係人協力的主題，資源分配要達到人們生活的永續目標，需要解決一些複雜且彼此相連動的議題。相關文獻提到的遠距學習建置機制，包含如何籌募資源、形成參與團隊等事項，只有原則性地點到，很少明確提到關於機制中各步驟的細節，特別是如何進行各種相應的溝通、協調以達成目標的過程，似乎找不到令人有信心的案例作為參考。這對完全新手的遠距學習籌辦者來說，幫助較小。本文正是針對這項不足，以從無到有的籌辦協調過程為基礎，以實證資料提出其他的可能性作為補充。

## 二、進入不利群體社區的背景與研究成員配置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成大）、政治大學、暨南大學、東華大學四所大學，自2013年7月起獲得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的支持，分別於大學當地，針對不利群體提出各種創新的解決方案。成大一開始由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戴華主任負責整合，依當時即將完成的「台南市社區總體營造白皮書」山、海、平原、都會的「分區構想」，透過公民參與、公共衛生、生活與空間、交通與資訊、育成平台五個子計畫，各一位博士後研究員，進入山（東山區嶺南、左鎮區公館），海（南區松安），都市（中西區銀同）三個屬性不同的不利群體社區，各搭配一位駐點專任助理。其後為了使團隊問題導向式實踐研究運作，在資料辨識與整合上更貼近在地需求，2014年初調整組織運作，將議題型團隊改組為社區為本的研究團隊，駐點成員配置是每個社區一位博士後研究員與一位專任助理，外加含有課程發展任務的整合平台，搭配一位博士後研究員與一位專任助理。原參與子計畫的老師轉為各社區團隊的支援諮詢導師。筆者在此時進入公館社區研究團隊，與既有的專任研究助理，形成第一線公館社區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或小組）。

2013 年底到2014 年初，工作小組與育成平台支援諮詢醫學系王秀雲老師，連續拜訪當地資深文史工作者茅明旭、蘆葦啓智中心創辦人康文榮、岡林村前村長李伯仁、左鎮前鄉民代表羅周文、公館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陳柳足、雜貨店老闆娘等，初步了解公館社區的歷史背景、發展處境與未來發展的想法，為正式進駐社區做準備。工作小組於2014 年1 月正式進入公館社區展開協力。

### （一）資源不公平問題的背景

我覺得成大最適合做教育，因為你們是大學，比較有能力教小朋友念書。我覺得這邊的小朋友很需要有人來教，我看教會牧師娘做得很辛苦，要載小朋友到教會，教他們念書。社區發展協會做產業、關懷據點都沒問題，但是教育這部分，我們真的沒辦法。（2014/01，田野筆記）

這段田野紀錄是我們初次拜會社區發展協會時，總幹事對成大的期盼。但是小組沒有馬上回應，主要原因之一是，所有受訪者中只有一位提出教育議題；其次，不論是第一線駐點成員，第二線支援諮詢成員，乃至整個計畫團隊，沒有人有初等教育背景；最後，教育面的投入如何與原計畫中健康平等和社區增能連結，也未確定。這些都是成大團隊當時對社區、對自己，都無法回應的問題，特別是最後一點。

成大工作小組選擇公館社區，是因為該社區的不利狀態：處於鄉村公共交通不便的位置，土地不利於農業生產，人口外流，高齡人口比例高等等。但這些無法說明到底有多不利，需要更細緻的調查。我們透過個別拜訪當地的意見領袖，參加公館社區會議接觸居民，與公館社區發展協會合辦一場工作坊，蒐集與社區有關的次級資料，包含歷史研究、人口統計、傳記、公車班表、google 地圖路線規畫等，整理出較具體的社區樣貌特性。

公館社區由三個面積廣大的小村里組成，距離成大所在的繁華台南市區約



25 公里，車程約一小時。這是一個寧靜的鄉村，路上少有人行走，當地實住居民大約只有 500 名，土地面積約 37.5 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住 13.3 人，人口密度極低。人口構成方面，65 歲以上者占 40%，學齡兒童 10%，其餘是負責養家的中壯年人口，以及極少數的無工作人口。開車沿著當地南 168、南 162 與南 171 道路繞社區一周，大約一小時又六分鐘（圖 1）。



圖 1 公館社區周長圖

資料來源：Google Root Planner。

過去數百年來，公館社區是個高度文明與文化多元之地。附近發現的人類化石經證實，至少有 3 千年（臧振華 2015）。荷蘭人在十七世紀引入當地原住民使用的新港文書（李瑞源 2012），在公館社區新發現一份，書寫於 1798 年（李壬癸、黃秀敏 2015）。十八世紀，中國清朝乾隆皇帝在這裡部署武力（把總）（李景行 2012, 2012；阮宗興 2016），根據歷史研究記載（康豹 2006），這項武力可能在 1895 年由日本殖民政府設置的岡仔林派出所取代。大約 1871 年，岡仔林教會的禮拜堂正式獻堂啓用（阮中興 2016）。當地最早的教育機構岡林國小，創設於 1918 年（左鎮國小 2010），國家現代衛生服務則是直到 1980 年代才出現。從在地的眼光來看，過去這裡曾是附近區域繁華的市中心，也有豐富的農產。

然而，隨著工業化以及道路的修築拓寬，交通效率導致人才外流，人口逐漸

減少至2015年的1,000人左右，公館社區的地位轉趨不利。社區與社會公平有關的三項重要因素資源，於1990至2006年之間被撤除。首先是公共服務的衛生室，接著是派出所改與左鎮分駐所合署辦公（台南縣警察局 2008: 18, 20-21），最後是比較相同層級學生每人的預算成本後，將當地的岡林國小裁併至市中心的左鎮國小（監察院 2013: 4, 43, 46, 218）。政府雖然有補償作為，包括提供校車接送、增加警察巡邏次數、設置巡迴醫療等，但這些歧視健康權的作法，導致當地社區與人口的健康能量遭到嚴重的威脅。例如，有些學童因為交通不便而無法獲得學校安排的課後學習，當地長者無法便利享有中央健康保險署或社會及家庭署提供的健康服務與社會活動，沒有駐地警察及時處理治安問題等等。

當這些健康、教育、治安等公共服務的結構性資源被撤併至8公里外，約15分鐘車程的左鎮市中心以後，公館社區內部在2006至2013年間，出現滅村的恐慌達七年之久。

面對滅村危機，公館社區發展協會在2007年動員社區居民，以志願性人力重新整理被廢棄的岡林國小校區。之後，左鎮月世界生態旅遊資訊服務中心於校園中成立（台南市觀光旅遊局 2011），2011年起，隨著農委會支持的農村再生計畫，社區發展並執行自己的願景（水保局 2011）。願景的原始想法是以在地豐富的歷史、文化、自然資源（如，低海拔日出、大規模月世界地質景觀）、友善耕作，創造人文生態旅行。旅遊活動與農產品銷售產生的部分利潤，成為協會在社會局補助不足之下，所進行的高齡照護基金，並希望建立當地學童的獎學金。從高齡照護的健康公平、社區經濟、教育與就業等觀點來看，這是一種資源重分配模式（參見圖2）。要執行這麼多包含中央政府層級與地方政府層級的不同計畫，不僅是個複雜的資源整合工作，也需要大量人力。公館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曾對小組成員說，他們沒有能量可以再僱用需要的人力，只能向外界呼籲需要的資源和人力投入，以邁向社區發展的願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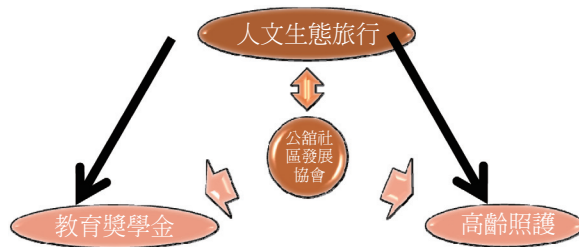


圖2 公館社區的資源再分配模式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上述脈絡正是工作小組形成參與式協力，與公館社區發展協會一起從社區生產和消費層次，朝向教育公平，處理社會決定性因素的資源重分配的起點。

### 三、社區經濟、高齡議題的挫敗：大學界定在地需求與協力能力的反思

2014年初一場在左鎮公館社區發展協會理監事與會員聚會的場合上，戴華教授正式宣布成大進駐社區，一起協力在地發展工作。接著透過當年6月的農業論壇，邀集社區發展協會理監事與會員，一起討論並決定優先關注的議題，依序是社區經濟（行銷）與農作物疫病兩項，高齡健康則是醫療服務的議題。教育議題並未在這個場合出現；不是沒有需要，而是從生存的角度來說，與會者必須先考慮生活的維持，要有技術能力種出少受病害的農作物，行銷有品質的農作物，以增加收入。

遠距學伴方案進行之前，工作小組分別拜訪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總幹事與會員，或者以論壇方式，建立兩個行動方案：疫病防治、農村體驗營（行銷）。這兩個行動方案在籌畫與執行過程中，遭遇到一些困難。

邀請農改場的人來討論楊梅黑瓜子的問題，要花錢嗎？我們是沒有錢喔！（2014/06，田野紀錄，農業論壇，農友A）

舉辦農村體驗營，預計收二十人，分三組，到三個不同的農場進行體驗，由年輕人的經驗來設計行銷策略。理事長詢問大家，誰的農場可以參與？沒有人回應。但有農友表示：年輕人不會辨別哪個嫩葉該摘，哪個該留，把作物玩壞掉怎麼辦？理事長為促成合作，打圓場說，那就以比較簡單的農事，蒲瓜、芭樂為主，說服三個會員提供農場參與體驗農事耕種與摘採的過程。（2014/08，田野紀錄，農業論壇）

這些協力過程清楚顯示，參與社區協力行動方案的會員，各有發展需求的項目，在沒有信任基礎下，難免對工作小組存疑。第一個考量是會虧本嗎？例如，成大有無能力或決心從事農業經濟的發展（相關費用由誰支付），要避免參與者投入的經濟風險（玩壞作物）。因此，沒有任何社區經營經驗的成大小組要優先解決的是：建立與社區的發展關係。

經歷前兩次的失敗經驗，2014年9月，小組調整引入社區需求人力的策略，以「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通識課程作為長期累積行動方案能量的工具，向課程同學介紹社區的特性與需求，提供健康不公平的概念性引導，鼓勵同學擬訂行動方案，並安排與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理事長討論。這個課程執行模式在9月初獲得總幹事口頭上的同意，但遲至11月中才以參與愛心接駁車義賣方案開始。當時社區發展協會主要的考量是：

社區這段時間很忙，無足夠時間人手與我們討論，我們等11月，社區完成成果發表之後再來。（2014/10，田野筆記）

這個經驗的啟示是，一個沒有社區經營經驗的團隊，對社區協力需求的季節性變化缺乏充分的調查、了解與掌握，反而會成為社區協力的阻力。外部團隊界定社區需求之前，需要對在地例行性活動建立行事曆地圖，才能降低協力的阻力。

## (一) 議題轉向：回到教育與資源重分配

牧師、牧師娘任職迄今一直尋求資源來從事課後輔導，近來人數急速增加，社區（發展協會）在做農村再生與社區營造過程中，剛好成大出現在我們社區，我們嘗試過兩、三個案子，到現在這個學伴方案。整個社區的感覺，學伴方案最重要，因為社區這麼大，但人少，這些孩子可以在資源這麼少的地方，享受到至少有外面（都會區孩子）一半的國家應該給予學習的權益空間。如牧師、牧師娘說的，讓孩子在讀書的過程對這個地方有感情，將來他們還會回來故鄉做事情。（2015/06，田野紀錄，第一期遠距學伴結業典禮）

確實，這是工作小組從2014年經歷三次與社區經濟有關的方案失敗之後，第一個建置完成的重分配網絡。建立這個遠距學習網絡的跨部門行動，獲得在地與社區外組織的廣大支持，也成為建立後續兩個具有支持社區發展人文生態旅行生產潛能的資源重分配網絡的驅力。

2014年11月下旬，「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通識課程同學及工作小組應邀參與社區發展協會舉辦的社區成果展，負責協力愛心接駁車義賣攤位的設置、銷售與結算。在隔週進行的兩天一夜課程中，醫學系同學希望了解馬雅各與岡林教會的關係，作為學期作業，這為停了近半年未與教會牧師聯絡重新接上線。小組在12月6日的拜會中，正式從在地經營28年課後輔導的牧師與牧師娘口中，了解課後學習對教會與社區居民的意義和困境，並引發後續工作小組優先議題的順位，逐漸以課後學習取代社區經濟與高齡支持，最後與社區發展協會、岡林教會、左鎮國小形成協力。

引起這個行動議題轉向的重要推力，是當日拜訪過程中教會與成大同學對課後學習需求因應方式的對比反應：

教會過去一直有提供聘人的經費，但是沒有課輔老師願意沿山一路來到社區。在此同時，教會照顧的孩子從國小至高中，在獻堂之後明顯增加到 50 位左右，壓力也升高。（2014/12/06，田野筆記，課程拜訪教會，牧師娘）

成大的學生要來擔任課後輔導的志工當然也是很好，但是大學生有自己的生活，要走一趟這段山路來教小朋友，一次、兩次可以，頂多一個月一次，要固定每週來，恐怕不容易。（2014/12/06，田野筆記，課程拜訪教會，牧師）

經當場詢問一起造訪教會的同學們，有誰願意每週或每個月來擔任一次課後學習服務？僅有一位願意偶爾來。無法密集來的原因包含考試頻繁、有社團活動等。（2014/12/06，田野筆記，課程拜訪教會，學生們）

當場大家雖然提到以電腦進行遠距教學，但是無法克服互動式教學過程中，遠端的老師如何在同一時間對混齡的孩子進行平行教學的困境。大家都沒有經驗，當場只能依據邏輯推演提問和回答問題，加上拜訪的時間短促，也無法進一步討論。課程當中有一位同學表示願意以寒假駐點在社區發展協會，整理出租帳篷作為期末作業，並至教會陪伴小朋友先觀察案例。顯然，偏鄉缺乏師資，要求大學生進社區面對面教學，不太具有吸引力；其次，關於問題的樣貌與解決方式，部分同學認為需要更多資訊。工作小組雖然意識到教育資源配置不公的問題需要解決，對於如何解決則毫無頭緒。

## （二）第一個教育資源重分配網絡建立：技術與知識資源網絡

拜訪教會的隔日（12月7日），公共電視台報導一個成功的遠距課後學習案例，恰巧回應前一日遠距學習的問題。小組隨即在網路上搜尋故事主角的電子通

訊信箱，聯絡故事主角 T22 中小學教育聯盟（簡稱 T 22）召集人何清人，具體陳述社區背景與遠距教學需求，諮詢建置設施的可行性。小組在 2015 年 1 月正式拜訪該組織，說明公館社區學童數目、就學年級現況，成大與社區發展協會的協力關係，以及教會以往的角色與困境之後，與會的 T22 三位主要成員表示樂意南下支持：

如果社區跟成大同意的話，我們樂意南下（免費）協助移轉建置遠距學習系統的知識（know-how），提供學習平台。兩年前我們有遠距學習的技術，但是沒有可教的學生；你們跟我們剛好相反，需要學習的學生很明確。（2015/01/09，田野筆記，T22 召集人何清人）

我們可以提供 Joinnet 線上教室，目前我們公司員工也在下班後參加遠距課輔。（2015/01/09，田野筆記，T22 成員黃筱雯）

實際教學訓練以及線上操作技巧、故障排除等課程，可以由全國學生學習成就測驗協會負責提供（2015/01/09，田野筆記，T22 成員張旗風）

根據前文整理的遠距學習建置機制步驟來看，這時，小組已經概略完成美國的步驟 1、3、4、6 至 8，或是台灣的步驟 1、2、4、5、7、8，具有結盟的雛型或可能性。T22 承諾做到把 know-how 移轉給成大（依照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的經營模式，由大學扮演教學服務提供者的角色），並與輔仁大學負責執行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營運中心的呂慈涵主任聯繫，完成移轉的先期準備。

當然，先期準備並不因為既有的成功模式而完全順利推進。在視訊會議軟體設備方面，原本預計提供遠距教室的 S 公司，由於最多只能在同一時間開設 10 間教室給教會與成大進行配對，離實際需求 20 至 40 間教室，還有一段差距。這對毫無經驗的成大團隊來說，不知有何差別。有經驗的 T22 成員在確認短缺 10 至 30 間教室之後，直接請輔大數位學伴營運中心主任呂慈涵協助解決問題：

已知會輔大呂慈涵教授，有關線上課輔志工培訓，以及 JOINNET 平台資源使用等，請直接與呂教授聯繫（2015/01/21，電子通信）

教室不足的後果是學生數多於教室數，有些學童因此無法配到大學伴，或是有大學伴卻沒有可上線的教室。輔大營運中心主任呂慈涵於1月23日工作小組初次電話聯繫中表示，線上教室可以由輔大的平台提供，解決原本 S 公司不足的問題。

### （三）建立在地支持與決定傳輸設備：社區內部結盟與資源重分配

在數位學伴技術資源備妥後，接下來是尋求教會與社區發展協會建置遠距系統的意願，因為這包含社區端需建置相應於技術資源端的各種設備與場地：教室、網路管線、電腦、網際網路（含頻寬）等。2015年1月16日，岡林教會牧師、牧師娘，發展協會理事長、總幹事與工作小組兩位專任成員，齊聚岡林國小舊校區，針對 T22 遠距教學技術移轉方案進行討論。這些資源的調查和整合，大約經歷兩個小時的討論，除了統計各利害關係人能夠參與提供的資源，並透過討論逐一解決各參與人可能會遇到的困難，互補整合可用資源，啟動成大端第三階段整合工作。

會議討論中，社區端的教會樂意提供教育館三樓前面三分之一的空間作為遠距學習教室，並將教會的網路分享到這個學習教室，但是電腦與周邊設備、網路配線、教室裝潢等，是有待解決的重點。當時連一部電腦都沒有，要如何籌措到讓40個孩子上線的電腦及周邊設備？教會牧師擔心一人一部電腦、配對上線，會造成設備投入的浪費：

若購置電腦浪費，同時可能有閒置的問題，如果有大學或高中輔導志工前來，可以讓他們住在教會裡頭沒問題。如果硬體建置的費用不大，可



以由教會募款支援。(2015/01/16, 會議紀錄摘要, 劉哲民)

這個預算考量的議題, 勾起陳柳足總幹事回想到左鎮國小李智賢校長曾經提過的事, 於是立即電話連絡李校長前來一同討論可能的資源:

李校長之前說有一批電腦希望放在社區發展協會這邊使用, 但是我們不知道要做什麼, 所以沒有結果。現在遠距學伴缺電腦, 所以請他來, 看可以怎麼在教會建立遠距教室。(2015/01/16, 田野紀錄, 遠距系統建置會議, 陳柳足)

李校長到場, 聽完根據 T22 建置方式修改的遠距方案建置規畫報告後, 重複三次慎重地提問:「你們成大確定要做嗎?」成大駐點助理研究員不假思索地回答三次:「是, 我們要做。」李校長接著很有經驗地建議:

我們的小朋友幾乎都在這裡(接受課輔), 做遠距很辛苦, 一次40個小朋友可能太多, 要不要從10個開始做? 我們數位機會中心有左鎮國小汰換堪用的電腦, 已經整理好了, 可以提供給教會使用。(2015/01/16, 田野紀錄, 遠距系統建置會議, 李智賢)

從10名開始無法滿足教會當下的課輔需求, 因為每名學童每週需要上線兩次的規畫, 會造成有人無法上線, 即使只能上一次線也會有落單的現象。經過討論取得共識, 以至少一週上線一次為目標, 安排電腦20部, 以及周邊設備的分工, 同時由李校長主持的左鎮數位機會中心(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業務)負責教育館電腦室的網路配線:

李校長表示可以捐贈10台電腦主機, 電腦桌也有全新的, 只是缺螢幕。捐贈電腦一事可由社區和成大團隊共同進行……(網路)線路架設方面他可以協助。所有的電腦整理與網路線裝配工作會在過年前完成。(2015/01/16, 會議紀錄摘要; 2015/01/16, 田野筆記)

這個遠距系統建置案發生之前，工作小組在台南市大學路巧遇設在崑山科技大學的台南市數位機會中心的經理鄭美婷小姐等人，討論了數位機會中心在鄉村的任務，因為性質有相近之處，因此邀請鄭小姐找時間到左鎮公館社區看看。不到兩個月的時間，社區決定要進行遠距方案之後，小組連絡鄭小姐，左鎮國小也同時告知崑山數位機會中心此事，順利募集到欠缺的電腦螢幕。不足的10部電腦，也在3月由成大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汰換下來的堪用機器，以公務機構間財產移轉的方式，捐贈給左鎮國小，再配置於岡林教會。相關過程將於後面第三階段大學端部分陳述。

最後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電腦教室的隔熱問題。電腦室位於教會教育館三樓，是屋頂加蓋鐵皮而成的空間，四周圍以一般隔熱泡棉鋼板作為牆壁，夏季相當燠熱：

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指出，現在是冬天還好，到了4、5月之後，溫度會熱到讓人受不了。需要在電腦室的位置做隔間、加天花板，這樣裝冷氣，冷氣才不會漏掉。(2015/01/16，田野筆記，羅周文)

教會的困難是不容易募集到室內改裝的經費，因為半年前新建的教堂仍在還貸款，希望可以另有解決辦法：

教會新建完的教堂還有八百萬貸款要還，目前做裝潢這條錢有困難。(2015/01/16，田野筆記，劉哲民)

李智賢校長建議找曾經來左鎮參與左鎮音樂會的蚵寮漁村小搖滾負責人幫忙：

之前來左鎮演唱的蚵寮漁村小搖滾，林福清導演認識他們。他們有人是做家具裝潢的老闆，經常去有需要的地方，用剩餘的木料製作課桌椅，送給當地使用。看誰要與他們聯絡。(2015/01/16，田野筆記，李智賢)

討論之後，由公館社區發展協會與工作小組接下這項聯絡工作。因為該團體在高雄，小組中住高雄的成員聽過該團體，加上社區發展協會人手不足，因此由成大負責開啓聯絡，並與社區發展協會保持聯繫。小組於1月25日透過臉書發送訊息，說明需要他們協力的原委：

我們在左鎮岡林一帶協助中小學生課後輔導……遠距教學所需的電腦經左鎮國小校長參與討論後由該校提供10部，將安裝在教會的圖書室。但是教會圖書室需要做一個簡單輕鋼架的隔間，讓小朋友們不至於在夏天時過於燠熱。經左鎮國小校長建議，由我們出面商請貴小搖滾來評估協助此案的可能性。(2015/01/25，臉書訊息通訊紀錄)

小搖滾的成員康小姐很快地回覆，希望以電話了解詳情。通話中，經確認我們是從李智賢校長與林福清導演知道他們過去的善行之後，對方回覆會再與這兩位推薦人聯繫。工作小組判斷，小搖滾要確認邀請認贈電腦室隔間的真實性，一旦為真應該會回電。所以，小組沒有繼續追蹤，就是等待消息。約莫五天仍無音訊，教會與社區發展協會也沒有收到對方音訊，我們決定再以電話詢問，在確認會進行隔間工程後，傳訊給社區發展協會，以便周知社區關心此事的人：

今天已經跟蚵寮小搖滾聯絡過，他們說因為最近系統家具忙，所以負責現勘的成員還沒打電話跟牧師娘連絡。聯絡的康小姐會再與這位成員提醒一下，他們最快過年前會來，最慢過年後現勘。(2015/02/02，電子信，筆者)

春節後，蚵寮小搖滾依照與李智賢校長討論過的教室圖樣(2015/01/29，電子信)，前往施工。施作範圍超出大家原本討論的電腦室隔間範圍，在整個三樓架起輕鋼架天花板，周圍泡棉鋼板牆全部加釘木製牆壁，再進行電腦室的隔間。工程耗時一週左右，電路則在遠距教學開班前幾天順利完成。一切就等成大第三階段的資源籌措完備啓程。

#### (四) 成大內部結盟與資源重分配：從無到有的協力網建置

在社區端的可用資源整合之下，小組帶著這個方案回到成大尋找可以跟社區連結的電腦教室與設備。總計接觸成大內部七個單位，獲得四個單位的支持，包含通識教育中心、圖書館、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以及總務處資產管理組（支持汰換電腦移轉給左鎮國小，支持社區端遠距教室電腦）。志工招募訓練、準備課程材料，以及故障排除等則得到教育部遠距計畫支持的輔仁大學數位學伴線上課輔計畫營運中心主任呂慈涵與助理王雅芳的全力協助。這是成大團隊完全沒有的經驗，以下整理這個網絡結構發展過程、遭遇的問題與解決方案，奠定第一期遠距學伴能順利上線與持續發展的基礎。

至2015年2月2日為止，距離正式上線的3月17日一個半月前。300公里外的北部技術資源移轉協力方式，25公里遠的社區端能夠搭配的電子通訊與線路等周邊設備、硬體空間、教師和交通人力等協力資源都已確認之際，工作小組直接能與上述兩個遠距學習資源網絡銜接的確定資源，包含：最基本的電腦空間與設施，大學伴人力，配對需要的小學伴名單與課業需求，遠距操作技術訓練等卻幾乎付之闕如。在輔大營運中心來信的引導下，第一個籌措的資源是電腦教室。團隊透過經驗或既有私人關係介紹建立擁有一定數量電腦室的單位名單，以電子信或電話同時洽商聯繫，以爭取在最短時間內找齊需要的資源。小組總計接觸成大通識教育中心、永齡希望小學成大分校、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總圖書館（總圖）、醫學院圖書分館（醫圖）五個部門。

在醫學院 STM（醫學、科技與社會）中心會議中，育成平台王秀雲老師聽完本案認為與教育有關，介紹工作小組與時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的教育研究所陸偉明老師聯絡。小組約訪陸老師，敘述計畫緣起和需求之後，陸老師認為永齡希望小學也提供課後補救教學，有教材開發、輔導老師到場教學等，可以一試。然而，小組到了設在成大人文社會科學院的永齡希望小學成大分校現場，經分校負責人介紹實際操作模式與服務範圍後，判斷無法與社區遠距相容而放棄。主要是

該校採面對面教學，但服務範圍尚未包含左鎮，而且教材是基金會獨自開發使用，尚未公開。

第二條線是負責成大全校網路服務工作，擁有數間電腦教室的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以下簡稱計網中心），在尋求協力可能性的電話聯繫中，負責電腦教室的王小姐聽完本案需求之後表示：

就其業務範圍的理解，該單位樂意提供電腦設備環境協力遠距學伴；程序上要申請使用時段，實務上需要請人社中心主管與計網中心主管先行見面，相互知會一下。（2015/02/06，田野紀錄，電話聯繫）

嗣後，由於計網中心擔心學期間電腦教室會滿載，王小姐另提建議，以該中心剛汰換下來的一批電腦作為參與遠距協力的方式，並安排雙方主管見面討論電腦室議題。2月12日，工作小組隨即聯絡發送信件：

非常感謝您對公館社區遠距學伴方案硬體設備的建議……  
謹將商請 貴中心捐贈 10 部螢幕與 10 組鍵盤滑鼠的企畫隨信附上說明  
電子檔案。敬請查閱，並協助促進偏鄉教育發展。

2月24日雙方主管見面具體交換各種可能性之後，確定一週支援四個時段無法負荷<sup>4</sup>（詳見下述第四條線），故未成案。電腦室雖無著落，戴華主任考慮以人社中心既有空間募集電腦架設遠距教室，這個替代方案解決了募集電腦的問題。後來，成大總圖提供電腦教室（見下述第四條線），這10部電腦轉為前述成大要負責補足社區端電腦的來源。

第三條線是成大醫圖的電腦室。護理系陳靜敏老師於2月3日迅速地回覆工作小組的詢問：「我知道醫圖有40人可以同步使用的電腦設備。」正式信件也立刻寄送給醫圖主任，小組在2月4日下午獲得回覆：

<sup>4</sup> 當時規畫的遠距時段是：週一與週四每晚三小時（19:00~21:00），週三則有兩個時段（15:00~17:00、18:00~20:00）。

根據醫分館空間使用要點與場地借用服務說明規範，申請電腦教室之課程須符合醫學中心與教學有直接關係之上課及研習者……計畫中的遠距課程具有醫學院教務分處填具之正式課程碼則可不用繳交使用費。若無，則需要經醫學院圖書館管理委員召集人或副召集人核定。  
(2015/02/04，電子信，醫圖)

第四條線是成大總圖書館，工作小組的助理研究員知道館長王健文老師剛上任，兩人過去在大學法人化議題上的價值理念有些共同交集，因此，在詢問醫圖的同日也寄信給總圖館長，啟動這條線。就在醫圖回覆不到兩小時後，王健文館長回覆：

這是很有意義的工作，在可能範圍內我盡量幫忙。目前我還在學習熟悉館務……電腦……我再了解一下，也問問計網中心是否可能協助？  
(2015/02/04，電子信，王健文)

王館長隔日（2月5日）再度來信指出，醫圖的環境、委員會處理程序，以及總圖的電腦室：

醫圖……告知你提出電腦教室申請一事，尚需經過醫學院圖書委員會通過，我看了那個環境，讓你的計畫來使用應該沒問題。

是不是先等那邊的結果？……總圖三樓也有一間60人的電腦教室，是否方便借用我再進一步了解。如果醫分館有困難，我再看看總館如何？  
(2015/02/05，電子信，王健文)

小組雖然因此可以開課，但是不足以涵蓋前述需要上線的4個時段，與醫圖電話討論的結論是：相同時段整個學期由一個單位使用，而不是不同單位，不符電腦室的使用效率。這條線於是失敗。

至於計網中心也沒有可能性。工作小組在2月24日回到王館長的建議，寫

信詢問總圖可能性：

人社中心主任戴華跟計網中心主任談過……因為計網中心只有四間教室，每間50部電腦，學期間都是滿載的，無法撥出一週四個時段，每個時段兩小時的空間。不知道總圖這邊的電腦室是否有可能用？  
(2015/02/24，電子信，筆者)

隔日上午，總圖隨即請資訊服務組羅主任與工作小組討論三樓教育資源室的可用空間與時段。這個場所主要用於上班時間進行校內外的教育訓練課程，下班後不會使用，且週三下午的時段不一定會有訓練課程。雙方經過討論並現勘後同意，若網路測試沒有問題，就以此為大學端的遠距教室，依照圖書館規定辦理申請程序，同時商請計網中心王小姐安排網路通訊人員，協助測試電腦設備與輔大遠距教室系統的連線功能：

關於遠距課後學習方案的電腦設備方面，不知道可否請您或相關技術方面的同事協助進行電腦規格的檢視。

事情是這樣的，經圖書館館長委請總圖羅主任調配總圖的電腦室之後，已有空間。接下來需要確認總圖電腦教室的電腦硬體，是否符合 Joinnet 線上軟體運作的需求。(2015/02/25，電子信，筆者)

非常感謝圖書館全力支持。上午請小朱代為參與測試，已知採用實體網路接線有助於改善通訊品質。我們將採此方式，借用 貴館教育訓練室。紙本表單稍後送出。(2015/03/03，電子信，筆者)

在電腦教室與設備有著落，完成測試，並申請使用之後，工作小組助理開始張羅耳機、麥克風、網路攝影機與手寫板，為即將進行的志工大學伴訓練以及3月的開辦做最後準備。

## （五）成大內部結盟與資源重分配：遠距學習大學伴招募

大學端的遠距教室雖塵埃落定，還有至少37位擔任數位導師的志工大學伴需要招募到位。這又是另一個資源網絡的建置，分為三個管道同時進行：第一個是校內業務單位的合作管道——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第二個是成大計畫任務分工管道；第三個是教師個人的課程學生管道。

第一個管道發生在2015年2月24日，正當遠距電腦教室籌備張羅最繁忙與膠著之際，計網中心確定沒有教室，只能捐贈電腦；總圖的部分還不知道能否搭配成功。工作小組透過網頁搜尋發現，成大內部的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設有遠距課程，並且招募線上課輔補救教學的志工。工作小組當時從網頁中簡單的資訊判斷，該中心也是採用遠距，如果能同時擔任本案遠距學伴的志工，或是藉由該中心招募的志工管道進行本案志工招募，甚至共享該中心的遠距教室，可以是個高效能的結合。小組當下以電話與負責人黃紀茸博士聯絡，口頭上說明及約定拜會時間，並隨即以電子檔寄送本案畫案。工作小組到訪深談後發現，不論是電腦設備、空間共享，或是師資人力的交替運用分享，乃至最初階的招募管道協力都很有挑戰性：

我們主要是針對高中以及大專院校的學生進行課後輔導，招募成大的志工擔任遠距的線上老師，依照所填時間來值班，有需要的學生，先註冊成為會員，在值班時間上線，向值班老師提問，進行教學。志工老師可以用自己的筆電或是資源中心的筆電，在資源中心辦公室有空位的地方上線值班，沒有固定的教室與電腦進行遠距教學。每學期招募到志工老師在十位以下。（2015/02/26，田野筆記，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工作小組了解該中心的實際狀況之後，知道要在僅剩不到的三週內招募到37位或以上的大學伴，以中心作為遠距教室，或是以中心的遠距志工作為大學伴，都是不可能的任務，只好放棄這條線。



第二個管道是成大「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的課程組同事，根據計畫分工，該組需要依據社區需求尋找有意願的成大老師，設計規畫能與需求銜接的實作型課程，在社區裡面開設大學生課程。小組將遠距學伴方案企畫書寄給該組博士後研究員方雅慧博士，由她召集的五位課程老師轉寄給各自的課程學生，增加該案的曝光度與學生的參與興趣。學務處的老師也將企畫案轉寄成大學生社團「台南地區校友會」社長，希望建立以在地學長姊協助學弟妹的方式進行學生社團。從結果來看，當期有一位外文系老師開設醫用台語實踐型課程，<sup>5</sup>有一位同學報名擔任遠距學伴志工；另有一位教育學程的老師，鼓勵學程學生參與志工，抵減該學程規定的教學實作時數，共有三位學生參與。至於學生社團則沒有連上線。

第三個管道是工作小組成員拜託認識的老師寄發信件，或是在課堂上介紹志工方案，鼓勵學生參加。這個是基於朋友關係自願協助的管道，因此未特別詢問到底有多少志工來自這群熟識的老師。粗略估計部分老師與第二管道重疊，因此至少四位大學伴來自當中的兩位老師。

第四個管道是青年學生社群，小組嘗試透過先前建立的農村生活體驗營學生、「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課程學生、計網中心全校送信平台等機制，盡量把招募訊息傳送給成大學生或是校外青年學生。為了使招募內容能夠具有主題，喚起參與熱情，故請將於1月份駐點公館社區，陪伴教會小朋友的三位「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課程同學——林彥邦、呂艾凌、翁瑞陽，參與第一次拜訪 T22 的活動，並商請他們製作一支約十分鐘的遠距學伴影片介紹公開播放。

以上的努力截至2015年2月27日上午止，線上報名的大學伴只有三人，兩人表示有意願但尚未填表。此時離3月4日的招募說明會只剩5天，為了能順利招募足夠的大學伴，工作小組決定請輔大南下，以其經驗於招募說明會中相助：

---

<sup>5</sup> 該課程以正覺與公館兩個社區為實作場域。

正式公開說明會——排在下週3（3/4）晚上6點，這場說明會需要邀請輔大團隊派遣高手前來助陣，讓有興趣的同學們能透過問答互動，增強參與的信心。（2015/02/27，電子信，筆者）

這段時間，小組再發七封私人信件給校內熟識的教師，請他們給予工作小組10-15分鐘時間，在課堂上介紹志工方案。成大教務處課務組也在3月2日接到「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課程組方雅慧博士轉寄此信後，發布到開設服務學習課程老師的信箱。

招募說明會當天，由輔大呂慈涵老師主講，從公益的角度與孩子改變的經驗，激勵同學當場在電腦文書表格上簽署報名，並投影到說明會布幕上。當天總計有16位報名，離37位還有一段距離。

招募不足的可能性自拜訪 T22 那天即存在，因為成大團隊一直到當年的2月2日之前，完全沒有已經確定或掌握的遠距教學資源，包含人力。如何能在大學端籌募人力不足下，還能準時滿足社區37名學童的需求？當時筆者已做最壞打算，把自己該學期開設的「資本主義與當代醫療」轉為學伴課程，透過陪伴孩子學習的過程，帶領選課同學看到鄉村健康不公平的社會決定性因素，也就是教育資源分配不公與遠距學伴的關係。此應變在確定大學伴招募人數後啟動，15位選課同學加入學伴，3月17日順利開課，未配到的6名小學伴，在一個月內透過第二次招募，也配到大學伴。

## （六）成大內部結盟與資源重分配：大學伴的專業支持性諮詢

學伴系統要求大學伴與小學伴寫下學伴日誌，包括教了什麼、有何回應與經驗感受等。工作小組檢視這些日誌，並與大學伴、小學伴、教會等分別或是一起討論重要的議題，修改學伴帶領的方式，以及後續訓練的準備。隨著時間發展，有些議題超出小組的專業能力範圍，小組進而與社區遠距學習端的教會牧師娘進

行諮詢會議，讓大學伴確認各自對小學伴的個性、學業水準與學習態度的認識，協助大學伴規畫適合自己小學伴的教學時程、學習內容與步調。這是所謂的帶班功能，協助大、小學伴建立學習陪伴關係的方式。

在大學端的大學伴不是專業教育工作者，也需要這種帶班老師的引導協助。因此，工作小組在建置遠距學伴系統的過程中，也同時邀請成大諮商輔導中心的專業教師參與，形成大學伴的支持性諮詢人力，讓大學伴認識小學伴學習的實務狀況，更易於安排規畫各自的學伴內容，發展適合小學伴的教學計畫，希望降低孩子學習過程的認知負擔，並減少大學端與社區端在學習過程中出現的壓力。

為此，小組在2015年2月10日以電話與電子信聯絡上述單位的鄭淑惠老師。當時該單位正在搬家，無法詳談而擱置。所需要的協助，暫時由具有心理學學士資格，曾任臨床心理師一年半的工作小組成員負責。一學期之後，再度與諮商輔導組的老師連繫上，建立這個網絡資源的動力。

## 四、結論

這個非制式教育結構下的導師制遠距學習資源網絡建立迄2018年底，已經進入第四年。建置過程顯示，工作小組作為連絡不同群體的積極聯絡人，串成面對問題的三區溝通網絡平台，各成員極力找尋有效解決問題的資源，重分配到有需要的網絡中（見圖3）。

前文的論述與圖3顯示，首次的遠距系統建置模式採取實作參與策略取向，透過包含會議、信件、電話等方式，討論與決定資源重分配，具體回應表1的教育資源分配對應表。不一樣的是，傳統制式教育政策下的遠距預算或資源，在美國或台灣都是依法來自政府部門，投入學校現場為主；本案第一個資源網絡是政府投入為主要的基礎設施，但不是以投入第二個資源網絡為主要標的。第二個網絡中，左鎮國小與崑山科技大學數位機會中心屬於政府資源的意外投入，其餘則來自教會及蚵寮小搖滾。第三個網絡資源中，成大工作小組本身的預算不到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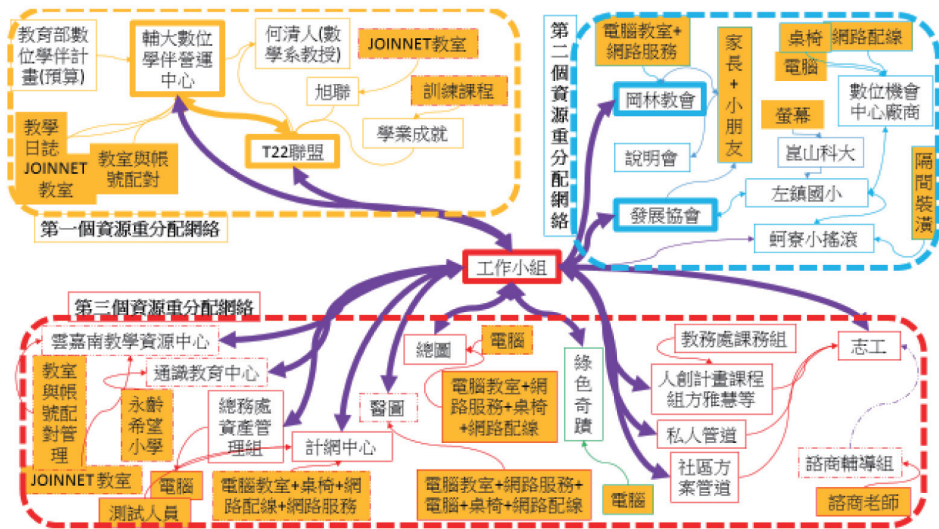


圖3 遠距學伴系統資源重分配建置圖

萬，其他單位所屬的資源也是意外投入。

其次，將本案的建置過程與表2的機制相互對照可以發現，這種將實務經驗整理成的建置機制，有可能脫離既存社會的現實生活脈絡，建置過程不見得是一步接著一步，可能是同時，或來來回回地重複過程，例如本案在社區端與大學端的電腦設備建置。因此，與其說是步驟、機制，不如說是建置項目比較貼切。

再者，真正的機制在於辨識在地需求後，尋找合於需求的資源，辨識其社會正義支持性質高低，以及可供應的能量和條件，再進行相互的協商，達成協議後即邀請加入，並以此結果繼續尋找其他尚未取得的資源，擴大結盟對象（見圖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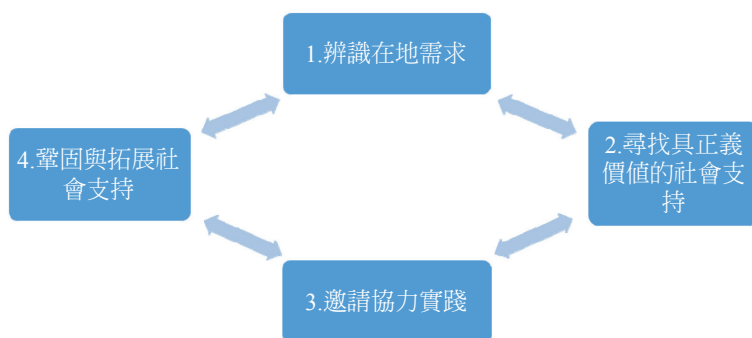


圖4 遠距學伴系統建置機制

最後，美國與台灣的政策實務與研究都提到形成結盟團隊，特別是美國，例如，前面談到美國的結盟發起人以在地學校為核心，台灣則是大學；顯然這種結盟需要有專人負責，最好有一個主任。從成大工作小組開創的模式看來，確實需要有一位從事資源接觸、連結、再分配的結盟運作組織與人員。美國與台灣的研究比較少詳細陳述資源整合再分配的過程、挑戰與持續解決的模式，本文某種程度上補充了這部分的操作機制。

## 參考文獻

- 水保局，2011，〈公館社區農村再生歷程記錄〉。南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https://ep.swcb.gov.tw/EP/Community.aspx?RG\\_ID=RG2014041414512100](https://ep.swcb.gov.tw/EP/Community.aspx?RG_ID=RG2014041414512100)，取用日期：2017年2月26日。
- 王雅芳、呂慈涵，2012，〈數位學伴計畫——「偕同」概念與機制〉。GCCCE 2012 第十六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桃園：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學會。
- 台南市觀光旅遊局，2011，〈左鎮——月世界生態旅遊服務中心啓用〉。《市政新聞》，1月28日。[http://www.tainan.gov.tw/tainan/dep\\_news.asp?id={6DE611A3-C317-4730-A575-239F6238A81D}](http://www.tainan.gov.tw/tainan/dep_news.asp?id={6DE611A3-C317-4730-A575-239F6238A81D})，取用日期：2017年2月26日。
- 台南縣警察局，2008，台南縣警察局工作報告。取用日期：2015年8月27日。
- 左鎮國小，2010，《左鎮國小校史》。<http://www.tjes.tn.edu.tw/90year/from.php>，取用日期：2017年2月26日。
- 江嘉杰，2016，〈我國城鄉教育均衡發展之挑戰——偏遠地區國小校長的視域〉。《臺灣教育評論月刊》5(2): 21-25。
- 何俊青，2017，〈偏鄉教育問題的迷思〉。《臺灣教育評論月刊》6(9): 15-19。  
<http://www.ater.org.tw/journal/article/6-9/topic/04.pdf>
- 余孟和，2011，〈台南縣市合併後教育整合評論〉。《臺灣教育評論月刊》1(1): 24-26。
- 李壬癸、黃秀敏，2015，〈新發現四件新港文書〉。《臺灣史研究》22(4): 167-189。
- 李淑惠，2017，〈偏鄉學校之創新與社區永續發展之探討〉。《臺灣教育評論月刊》6(9): 128-133。  
<http://www.ater.org.tw/journal/article/6-9/topic/25.pdf>
- 李景行，2012，〈火把、信鴿與聖樂〉。《台灣教會公報》，11月30日。<http://tcnn.org.tw/archives/13901>，取用日期：2017年2月26日。
- 李瑞源，2012，〈從新港文書看16-19世紀的平埔族〉。《原住民族文獻》，第三

- 期。<http://ihc.apc.gov.tw/Journals.php?pid=609&id=655>，取用日期：2017年2月26日。
- 阮中興，2016，〈談「岡仔林」的幾個歷史懸案——從武官李順義家族到岡仔林教會〉。《賴永祥長老史料庫》，11月22日。<http://www.laijohn.com/articles/Ng,CHeng/Kong-a-na.pdf>，取用日期：2017年2月26日。
- 林麗娟、林宏彥、呂慈涵，2014，〈線上學伴服務大學生社會參與指標之建構〉。《教育傳播與科技研究》108: 17-29。
- 范雅惠，2008，〈教育優先區計畫之分析〉。《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第六十九期。<http://mail.nhu.edu.tw/~society/e-j/69/69-26.htm>，取用日期：2017年2月26日。
- 范熾文、張文權，2015，〈花蓮縣偏鄉地區國小教師流動問題與改進策略〉。《臺灣教育評論月刊》4(6): 74-77。
- 康豹，2006，西來庵事件的歷史地理研究：染血的山谷——日治時期的噶吧哖事件。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http://thcts.ascc.net/doc/katz.html>，取用日期：2017年2月2日。
- 張婉珮，2016，〈從教育機會均等談城鄉教育均衡發展〉。《臺灣教育評論月刊》5(2): 33-37。
- 教育部，2017，《「107年數位學伴計畫」實施說明》。台北：教育部。
- 陳麗珠，2006，〈從公平性邁向適足性：我國國民教育資源分配政策的現況與展望〉。《教育政策論壇》9(4): 101-118。
- 陳麗珠，2007，〈論資源分配與教育機會均等之關係：以國民教育為例〉。《教育研究與發展月刊》3(3): 33-54。
- 黃淑玲，2013，〈失衡的師資培育結構及其對公共教育品質之影響〉。《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1): 107-108。
- 黃聖元，2015，《教育優先區計畫實施成效之研究——以南投縣國民小學為例》。嘉義：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公共政策研究碩士論文。

- 監察院，2013，〈「國中小學廢併校後之閒置校舍活化成效與檢討」專案調查研究報告〉。台北：監察院。
- 臧振華，2015，〈「左鎮人」的幻滅帶來新的期待〉。《國家地理》，12月29日。  
<http://www.natgeomedia.com/news/ngnews/25222>，取用日期：2017年2月26日。
- 蘇珍慧，2017，〈偏鄉師資的問題、迷思與解決途徑〉。《臺灣教育評論月刊》6(9): 137-143。
- Alexander, Celeste D., et al., 2000, *Resource Allocation Practices and Student Achievement: An Examination of District Expenditures by Performance Level with Interviews from Twenty-One School Districts*. Austin, TX: Southwest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Laboratory. <http://www.utdanacenter.org/downloads/products/resource.pdf>
- Berne, Robert and Leanna Stiefel, 1999, “Concepts of School Finance Equity: 1970 to the Present.” Pp. 7-33 in *Equity and Adequacy in Education Finance: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 Braveman, Paula, Shiriki Kumanyika, Jonathan E. Fielding and Adewale Troutman, 2011, “Health Disparities and Health Equity: The Issue Is Justice.”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1(S1): S149- S155.
- Carr, Melissa C. and Susan H. Fuhrman, 1999, “The Politics of School Finance in the 1990s.” Pp. 136-174 in *Equity and Adequacy in Education Finance: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 Coogan, Elizabeth H., 2007, *Rawls and Health Care*, Honors Theses. Paper 501. <http://digitalcommons.colby.edu/honorstheses/501>, accessed August 3, 2015.
- Deaton, Angus, 2003, “Health,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1(1): 113-158.
- Evans, William N., Sheila E. Murray and Robert M. Schwab, 1999, “The Impact of



- Court-Mandated School Finance Reform.” Pp. 72-98 in *Equity and Adequacy in Education Finance: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 Goertz, Margaret E. and Gary Natriello, 1999, “Court-Mandated School Finance Reform: What Do the New Dollars Buy?” Pp. 99-135 in *Equity and Adequacy in Education Finance: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 Guthrie, James W. and Richard Rothstein, 1999, “Enabling ‘Adequacy’ to Achieve Reality: Translating Adequacy into State School Finance Distribution Arrangements.” Pp. 209-259 in *Equity and Adequacy in Education Finance: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edited by H. Ladd, R. Chalk and J. Hanse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 Hobbs, Vicki, 2004, *The Promise and the Power of Distance Learning in Rural Education. Policy Brief*. Arlington, VA: Rural School and Community Trust.
- Marmot, Michael, 2002, “The Influence of Income on Health: Views of an Epidemiologist.” *Health Affairs* 21(2): 31-46.
- Marmot, Michael, 2005,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Inequalities.” *The Lancet* 365(9464): 1099-1104.
- Moore, Michael G. and Melody M. Thompson, 1990, *The Effects of Distance Learning: A Summary of Literature*. Research Monograph Number 2. University Park, PA: America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istance Education,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99, *Equity and Adequacy in Education Finance: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438373.pdf>
- Owens, Janet, Lesley Hardcastle and Ben Richardson, 2009, ”Learning from a

- Distance: The Experience of Remote Stud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arning & Distance Education* 23(3): 53-74.
- Pan, Diane, et al., 2003, *Examina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n Education: Connecting Spending to Student Performance*. Research Report. Austin, TX: Southwest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Lab. <http://www.sedl.org/pubs/policyresearch/resources/AEFA-2003.pdf>
- Reeves, Cynthia, 2003, *Implementing the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Implications for Rural Schools and Districts*. Naperville, IL: North Central Regional Educational Lab.
- Ruger, Jennifer Prah, 2010, “Health Capability: Conceptualization and Operational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0(1): 41-49.
- Sen, Amartya, 1990, “Development as Capability Expansion.” Pp. 41-58 in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the 1990s*, edited by Griffin Keith and J. Knigh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Single, Peg Boyle and Richard M. Single, 2005, “E-Mentoring for Social Equity: Review of Research to Inform Program Development.” *Mentoring & Tutoring: Partnership in Learning* 13(2): 301-320.
- Whitehead, Margaret, 1991, “The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of Equity and Health.” *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 6(3): 217-228.
- Wilkinson, Richard G. and Kate E. Pickett, 2006,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pulation Health: A Review and Explanation of the Evidence.”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2(7): 1768-1784.

**Distribution Justice in Education:  
Establishing an After-school Learning System in a Rural Village**

Yu-Feng Wong

**Abstract**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inequalities are varied, with income distribution a key factor. Michael Marmot argues that education affects health because more education generally means higher incomes, therefore education is likely a better indicator than income for some soci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health. Regarding education equity, the literature contains evidence indicating that sufficient educational resources distribution or accessibility is one of the keys for sustainable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Results from primary and secondary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have been used to identify various types of resource shortages in education, and to suggest solutions for problems involving resource redistribution. One important aspect of resource distribution involves the geographic isolation of some rural schools, with distance learning as one of several remedial options. However, the literature contains few discussions of resource requirements or stakeholder interactions during resource redistribution processes for after-school learning programs, which often involve local institutions such as churches. This chapter analyzes resource redistribution for pupils in church schools, and discusses the topic of supplementing shortages created by official educational policies.

**Keywords:** educational resources, distribution, distance learning, equity

## 5

# 大學社會實踐課程操作與行動反思的 回溯性初探

蘇羿如、陳怡方、林美珠

---

蘇羿如，通訊作者，國立東華大學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第一期博士後研究員。E-mail: sueantonia99@gmail.com。

陳怡方，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副教授。

林美珠，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教授。

## 中文摘要

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是臺灣試圖為高教轉型尋找出路所進行的創新與嘗試。本文探討東華大學執行計畫，在鉅觀的高教快速轉變環境中，藉由三位授課教師微觀的回溯性行動研究紀錄，說明三種類別屬性不同的社會實踐課程，所進行的課程教學歷程、操作方式與經驗反思，期望以此作為未來有意願推動社會實踐課程的教師，先備知識的認識基礎。

本文指出大學學科在各自界域內養成的訓練不同，學科發展也不一樣，推動社會實踐課程首應考量學科發展的特色。此外，「跨域」課程可以是不同學科「領域」之間的合作，也可以是不同「場域」的人力匯集，本文所探討的跨域課程屬於後者。準此，跨域課程的重點除了著重技術創新的價值，更應包含人文價值如何透過課程操作的中介機制，落實到實踐過程中，並以此引導高等教育走向人文價值與社會實踐相輔相成的路徑。

**關鍵字：**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社會實踐課程、跨域、場域、人文價值

## 一、前言

2015 年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Switzerland 出版了兩本論文集結的書籍，分別針對當代高等教育的創新面向進行討論，這兩本書是 *Global Innovat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Transgressing Boundaries* (Layne and Lake 2015)、*New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Integrating Economics, Innov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Ullberg 2015)。隨著環境變遷和經濟全球化等趨勢的影響，面對時代變化能否提出合適的解決策略，先進國家將深重的期望放在高等教育的「創新」，除了凸顯大學多元智能的知識體系被賦予高度期待之外，能否同時針對複雜的現況有效地進行跨域整合並提出因應之道，也直指人類發展及所應擔負的責任，不再只限於政府組織、民間團體及企業組織，大學在人類行為、各項發展、環境課題上，必須肩負更大的使命感並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

個人行動與集體行動，微觀結構到巨觀結構，乃至於行動與結構之間的課題，不僅僅只是傳統社會學探問的課題，此一課題演化至今成了行動與系統之間，不同層次的行動與不同範疇的系統之間，如何產生跨域交雜的相互作用，並且共構生存與生活世界之間難以道盡的存在樣貌。

本文<sup>1</sup>以東華大學所進行的三種社會實踐課程為例，依著如此龐雜的行動與體系背景，嘗試聚焦探問一個在高等教育現場，藉由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以下簡稱人社實踐計畫）的資源與橋接，將日常生活中的社會各場域引入，藉由社會實踐課程為中介，讓不同場域的行動者得以匯聚，繼而檢視能否帶來創新的契機，遇到的挑戰為何，授課教師的行動反思又是什麼等問題。這樣的提問不僅涉及何謂社會實踐課程界定或想像的探問，同時也回觀高等教育創新

---

<sup>1</sup> 本文不是傳統學術研究論文先有研究假設，再有研究操作方法，之後產生研究結果，而是比較接近行動研究強調經驗理解的過程與反思性的探索性論文。內容重點在於描述課程內容改革的過程與經驗，而非探討研究對象的相關變項。

與所面臨挑戰的意義？

## 二、高等教育的「大挑戰」

在英國西南部以研究取向著稱的愛塞特大學，在近幾年嘗試進行一項名為「大挑戰」(Grand Challenges)的實驗型計畫，以大學一年級學生為主，加上大學教師、研究生和外界專家，一同探索二十一世紀的全球議題。Burkill (2015) 以〈挑戰教育規範〉(Challenging Pedagogic Norms: Engaging First-Year Undergraduates in an Intensive Research Informed Learning Programme)一文，敘述在當代高等教育脈絡之下，此一實驗型計畫如何帶來高等教育的改變，共同關注包含自身處境以及更大的全球議題，同時反思所有教師、工作同仁和學生所面臨的挑戰。

Burkill 指出「大挑戰」計畫中以獨特、密集課程的方式進行，比起傳統上冗長的課程更能取得結構和能動之間的平衡，主要證據在於密集式課程是一個**載具**(vehicle)，能夠提供學生和參與課程的教師及同仁更大的個人能動和創意，不像其他課程可能受限於機構的運作機制、學科的意識型態，以及爲了計畫管理所導致的額外和非必要的諸多複雜因素。在「大挑戰」這類矛盾組成的團隊中(dilemma teams)，相對地給予更大的自由可以獨立發展教學的取徑，並以直接採取實驗空間作爲主要原則，而成爲這項計畫的特性(Burkill 2015: 86-87)。

臺灣對於高等教育轉變的嘗試與論述，同樣也未曾停歇。2006年「社團法人臺灣高等教育學會」發行的《高等教育》期刊，在第一卷第一期中由協會理事長楊國賜教授所撰寫的〈高等教育的藍海策略：明確定位、有效治理〉發刊詞，即針對全球化下國際競爭的趨勢與教育發展，提出臺灣高等教育的走向。文中指出在新管理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影響下，不少國家的高等教育改革政策已走向市場機制和大眾化的趨勢；同時更指出大學的功能不僅在「教學」和「研究」，並已擴大到「服務」。

除了教育部啓動各項高等教育的卓越計畫之外，學術界也從2012年由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開啓徵求「全球架構下的臺灣發展：典範挑戰」跨學門整合型計畫。同年9月再度公開徵求「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計畫目的是希望大學能深入了解在地面臨的重要問題與困境，履行大學的社會責任，並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案（謝易儒 2014: 12-13）。

在市場化、企業管理化的大學走向，幾乎成爲歐美和臺灣各大學力求生存的主要方式時，戴伯芬、林宗弘（2015）主編的《高教崩壞：市場化、官僚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提出臺灣高等教育在全球化、國家政策、教育治理與人口結構轉型的複雜交錯影響下，已經朝向崩壞之途，而這非單純的市場經濟邏輯即可解決，臺灣高等教育的現況必須有更全觀的視野進行理解。陳東升在該書的推薦序文中指出，必須由制度和教學現場並進改革，一方面建立大學教師研究和教學的合理環境，另一方面以學生爲主體的課堂場域創新與教師的教學精進，嘗試提出可能的解方。

事實上，陳東升（2012）曾於〈社群治理與社會創新〉一文中，指出以強互惠與考量公共利益的社會行動者出發，探討社群治理如何可能在市場或層級組織之外，成爲一種調節管制社會的可能，其中社群成員的自動參與和治理，以及成果分配，立基在增強社群成員的福祉與社群公共利益上，創設新的社會經濟組織，乃至以基進社會改革運動作爲社會實踐，都是可行路徑。

綜上所述，就英國及臺灣高等教育現況而言，在趨向市場化和高等教育制度官僚主義難以撼動的共同處境上，各自藉由執行大挑戰計畫和人社實踐計畫，企圖改變岌岌可危的高等教育，並且不約而同地朝向大學內部的課程制度與內容改革路徑，而非立即性地挑戰外部的市場機制或國家教育制度。

### 三、東華大學社會實踐課程與高等教育

社會實踐課程能否作爲高等教育創新的契機，以及可能面臨的挑戰爲何？在



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有必要先界定本文所指稱的社會實踐課程。相較於一般課程主要以課程名稱所建構出的知識主體，社會實踐課程重點放在教師規畫課程時所欲給出的認識圖像，即便課程中可以規畫業師或達人進行分享與討論，終究是較為被動式地接收課程規畫所給出的認識。另外，行之有年的產學合作的實習課程，直接將學生的學習規畫與業界進行連結，讓學生得以在就業市場中先取得某種利基，為畢業後就業先進行準備工作。此種產學合作的實習課程，有相當高比例出現在以技職體系的大專院校升格為大學的課程規畫中。之後，更有政府補助產業或企業直接聘用產學合作的學生，成為產官學三方合作的機制。這類以就業市場為導向的實習課程規畫，亦不同於集研究、教學和服務的綜合型大學的課程規畫。

東華大學的社會實踐課程規畫，不以就業市場導向的產學或產官學的課程規畫方式進行，亦避免學生缺乏主動性與深入探究動機的學習狀態。相反地，課程著重在以大學作為高等教育創新的實踐場域，包含在大學現場的個人行動者，大學內部因不同行動者有意識地聚集而成的集體行動單位，擴大至大學本身成為社會行動中的一個組織，都需要共同面對高等教育隨著社會及環境變遷而產生的創新轉變。此外，高等教育的創新能否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創造和引領臺灣社會改變，不僅有著個人行動者和集體行動者的行動作為，同時亦涵蓋行動的非預期效應，以及個人和集體的共同責任承擔。

就此而言，如何串聯不同範疇的行動者，包含個人、大學內部群體、大學組織、計畫執行人員、外部在地行動者和組織等，共同參與高等教育的轉型，首先需要一個匯集的**中介轉化處**，此一匯集處即是「課程」。因此，當我們思考在現今著重專業分科的大學制度裡，有沒有一種類型的課程所關心的是如何回應自己、地方、社會變遷的種種疑難呢？透過凸顯不同行動主體的能動性，以課程為中介，讓不同行動者在課程中現身，從場域的認識與討論進入現場的直接照面，以及行動實作方案的規畫，此即東華大學所進行的「社會實踐課程」。以此觀之，社會實踐課程主要是以現實處境為基礎，在教師的教學引導下，計畫執行人

員、師生和場域行動者共同學習，讓實作本身呈顯在日常生活的現場中。因此，課程十分重視親身置入現場經驗與場域中的行動者互動，繼而產生可行的行動方案構想。相較於傳統的課程規畫方式，著重在讓師生「看到、聽到」發生中的社會現象，亦即社會實踐課程試圖讓來自不同場域的行動者，從「感受」到「體會」乃至「動腦和動手的實作」，更進一步產生自我轉化。

此外，社會實踐課程是帶著特定理念的行動者在實踐歷程中行使理念或實踐理想的軌跡。進入社會實踐課程的行動者，必然都具有主動的能動性，從而使課程本身充滿非預期性的變化。然而，這也使得課程不僅難有立即上手的簡易操作手冊，也無法從實作過程確切地說明得到什麼，反而經常會在實作中所產生的既向外又向內的作用力，又出現某種意想不到的狀態。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太早用理想上應該會如何的「概念」取替「具體經驗」，因為如此一來很容易看不見在具體經驗中才會發生的情況，並且因為過於專注在理想上設定的概念，反而形成缺乏彈性的步驟行動。放任毫無方向的隨意嘗試，是不是也算累積經驗的實作？進一步反問，既往照表操課的課程規畫是否就無法給出經驗的累積？倒也不是如此的漫無目的。社會實踐課程同時重視行動方案構想，或更進一步的方案執行產出，當課程中不同行動者在共構行動方案構想時，也就是在進行經驗的學習和積累。

在社會現象場中有許多構想和規畫的事務在進行，而投身進入現象場則形成另一股進行中的動力，行動者帶著原本設想的圖像進到社會現象場，從紙上談兵躍成近身肉搏的作用力，於是投身在當前社會現實的處境後，許多可知和不可預期的作用力同時出現，行動方式成了隨時調整的機動狀態；但原初的願景並非隨著行動場的變化而不停更換，而是在具有理想概念和具體行動之間，有某種主體隱含的朝向，行動者在朝向過程中明白自身行動具有完成其獨異性的意涵，從而使得行動方式在現象場中不斷改變。以此觀之，創新和現象場的變化有著緊密的依存關係，正是現象場的變化蘊生創新的可能，這也意味著高等教育除了需要承繼以往的專業學科內涵，也必須隨著社會變遷而有所開創。

以社會實踐課程作為中介匯聚，讓教師、學生、計畫執行人員和場域中的關係人或承接者，這四類不同行動者在場域中形成協力關係，彼此在關係結構中或是針對實際生活中的課題，抑或針對特定議題，相互討論並彼此支援。更重要的是，來自不同場域的行動者因為匯聚的共同行動，更進一步產生自我轉化的可能性。以下以東華大學執行人社實踐計畫中的課程創新為例，說明場域經營，三類社會實踐課程類型的創新，挑戰與行動者的反思，以及行動者與關係結構—社會實踐課程的異質匯聚等課題。

#### 四、三種社會實踐課程類型案例的操作與反思

社會實踐課程在高等教育中並非新興產物，早在2001年推動「大學通識教育改進計畫」時，鼓勵通識教育課程從制度、教師和學生入手，希望帶來大學教育轉變，避免與社會現況脫節，至今已有十多年的經驗累積。就社會實踐課程中所強調的行動層面而言，在方法論上最直接關聯的即為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是實務工作者研究（practitioner research）的一種形態，用來改善各種不同工作場所的專業實務（professional practices）。換言之，實務工作者研究就是經由研究者個人進入自己的實務工作來完成研究（McNiff and Whitehead 1996），此外更涵蓋行動者對於行動與情境脈絡之間的反思，以及反思後的再行動（Schön 2003; McNiff and Whitehead 2005）。

本文選擇執行人社實踐計畫的三門不同科系類型的課程，以此討論如何藉由課程為中介，連結到不同的實作場域，並以行動為基礎繼而帶來自我轉化的可能性，以及所面臨的挑戰為何。筆者認為或許現階段尚無法著力在整個大學課程架構的翻轉，目前東華大學中許多老師嘗試從單一課程的行動研究出發，以社會實踐課程的操作方式，冀望可以帶來些許改革之效。本文三名作者曾參與東華大學執行的人社實踐計畫，同時擔任授課教師，在社會實踐課程的操作過程中經過相互討論，歸納出社會實踐課程所共同面對的課題，並以此進行經驗分享與探討分

析。三種課程具有屬性不同學科的差異性，包括：**專業屬性明確**的「生涯探索與實務」課程，**社會發展與變遷下的新興學科**「社區藝文產業發展」，以及**基礎通識教育**的「寒暑期密集課程」。

## （一）擺脫證照本位的思維——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的「生涯探索與實務」課程

### 1.課程操作

在諮商與臨床心理這個學科屬性與定位相對來說明確的學系，學生入學時通常懷抱成爲心理相關領域專業人才的志向，但是學科定位明確卻同時局限了生涯想像，加上偏好心智操作而不諳身體勞動的學習慣習，導致學生難以走出生涯發展的既定框架。有鑑於當代許多非典型青年的生涯實踐，關鍵在於能否走出「舒適圈」，貼近在地社會的脈絡，並接受諸多挑戰與考驗。那麼，能否藉由一門生涯探索的課程，可以兼顧個人內在自我探索與向外進行某種真實的社會行動，同時打破過往過於著重心理介入的學習，而從自身所在的周遭發覺案例，接著有能力走入在地，在適性的基礎上提出創新行動方案，進而回應自身的生涯需求與社會脈動？

回顧這門課程，最早的設計理念是想挑戰傳統升學主義式思維模式所產生的「集體轉換」生涯認知，這項認知意謂著學生在各個生涯發展的轉捩點，呈現出集體的共同性選擇，彷彿集體的選項就是自我的選項。尤其集體轉換的教育架構主要是一種「直線敘事」(linear narrative)爲主軸的設計(林美珠 2015)，假設學生隨著時間的累積，一學期接著一學期地修課，大學畢業繼續攻讀研究所，自然會累積出專業養成與教育成果，接著就有邁向生涯康莊大道的機會。然而，即便大學生也明瞭現實生活並非如此，許多大學生畢業後即面臨失業，或者是進入與大學專業訓練無關的職業，使得個體生涯規畫的自我認同延續性受到干擾，導致生涯自我的發展斷裂或碎裂(林美珠 2015)。

那麼，我們要進一步追問的是，若要解決這樣的議題，除了媒合更多的就業機會，大學教育要給出的或創造的是什麼？是否有可能讓社會現象場的真實處境，透過社會實踐課程的設計，成為大學師生在大學教育中共同面對、一起尋求解方的試煉基地？而這種透過社會現象場真實處境的試煉，是否可能轉化成集體轉換之外的其他可能性？

解構既有的習慣及認知框架並不容易，授課教師選擇先從生涯視野的擴展著手，透過跨界移動生涯的實踐講座，邀請非典型青年生涯實踐者蒞臨課堂演講，包括：場域經營的「客城之春：國際田野工作站」創辦人、「歐北來團隊」創辦人等。藉由不同生涯故事的啟發，協助學生了解不同於過往的生涯視野。此外，為了培養學生對鄉村田野的觸覺與感受，以及後續週末換工活動的進行，在學期初期，授課教師即安排學生進入花蓮中南區的鄉村，認識多為高齡長者的村落與鄉村生活的樣態，以及鄉村的在地產業。接著學生利用週末時間直接到鄉村場域進行換工體驗，包括：除草、磨鏽、拆房、釘木板、清潔等勞動性工作，透過移動和身體勞作認識生長的這塊土地上的人群，以及正在發生的事。以「客城之春：國際田野工作站」為例，羅永清博士在承接東華大學課程導入時不以清潔廢棄老房為主軸，而是介紹學生認識在地植物，認識玉里在地人文風情，還有認識一群充滿夢想的「奇客邦」在地青年，與學生一起協力訂木板床、蓋 pizza 窯，並鼓勵學生對類似的鄉村廢棄老房做實踐行動的發想。

正式課程的期末作業要求學生針對場域議題，提出符合個人生涯興趣，能回應社會需求，又有永續思考的微型行動計畫，並以壁報發表的方式進行。學生分成數組，發表小組透過壁報回應換工在地議題的行動計畫，並接受授課教師與外部評審的提問和評量。到此，課程告一個段落，但授課教師仍繼續鼓勵學生團隊參加校外競賽及學術發表。例如，從客城之春工作站這個場域醞釀出關心偏鄉兒童教育的學生「延長線」團隊，由四位大三學生組成。他們在正式課程結束取得學分後，繼續參加校外競賽與投件（TiC100 社會創新創業競賽投件並獲獎、教育部青年署尋找感動地圖計畫等），在羅永清博士擔任業師的指導下，有了將行

動計畫付諸實踐的機會。換句話說，藉由參加外部競賽轉化為內部的行動能量，從而產生行動的延續力，同時由在地場域承接者擔任業師，這似乎是一個可行之路。另一個學生團隊「舊予新知」則純粹從換工活動中體驗農務，帶領學生從事農務體驗的農事主人都是高齡老人，東華大學計畫團隊並沒有長期探勘或蹲點，農事主人本著鼓勵年輕人的立場而答應學生換工體驗。出乎意外的是這個「舊予新知」團隊在正式課程結束之後，自發性地繼續務農活動，並從心理學跨界到農業領域，參與校外論文發表（靜宜大學現代思潮學術研討會）以及提案（農委會「好 Young 的 Idea」計畫投件並獲獎），後續更將農事體驗與老人陪伴經驗撰寫成專題研究報告。

## 2. 行動反思

這門課程一開始是期望學生發展出多軌生涯敘事的想像，從學生自發性的行動方案中，似乎可以觀察到多軌發展的可能性，好比是在單一直線的軌道上植入一個「社會實踐」介面，由之再生成多元生涯認同的可能性。不過，這些溢出主軸的生涯發展畢竟短暫且零散，個體可以透過這些行動方案，在多大的程度上產生身體上、認知上和實踐上的地方真實感受？另一方面，這些短暫的「蛻變」是否能持續地朝向更寬廣的遠景發展？這些目前都無法確定。雖然有「延長線」與「舊予新知」學生團隊的生成，但對照選修課程的多數學生來說畢竟是少數，多數學生其實在完成課程要求之後即無後續行動。這樣的教學效果是否意味著以課程為中介的行動效益不高，需要思考其他替代方案，像是社團、服務學習或其他非正式課程？若以學生後續行動的多寡來看，似乎是如此。

在這個正式課程的創新實驗中，由於授課教師事前與場域及場域承接者已有連結，使得學生一進入課程的架構時，可以免去漫無目的的摸索。雖然授課教師對於學生的行動方案，大多鼓勵學生發揮創意，但是對於什麼是「友善」、「共好」與「在地連結」的行動，授課教師與場域承接者仍有所堅持，同時一步步引導學生思考並導向在行動方案中體現核心價值。此外，從這樣的課程實驗當中，

可以看到學生自發性行動的可貴處，對於未來學校課程的改革，包括如何讓學生從田野現場中培養自發性的社會關懷的實踐力，以及如何讓學生在高等教育中逐漸產生自主學習的能動性，仍然有所貢獻。

具有續航力的兩組學生團隊，實踐的取徑實不相同。「延長線」團隊有明確的在地承接者及場域，在地承接者同時是在地社會實踐的行動者，「舊予新知」團隊則是以勞務體驗進場。再從不同範疇的行動者串聯層面來看，「延長線」團隊對於在地議題的關切，以及串聯在地資源的方式，更接近集體層次社會實踐的行動，並能對其實踐行動進行反思。至於「舊予新知」學生團隊比較像是學徒，在農事主人既有的家族務農中學習，是以承接者個人及家族的需求為主，行動初期較缺乏進一步對應更大的在地脈絡的議題。以此看來，在地承接者是否也是在地社會實踐行動者，以及是個人層次或集體層次的社會實踐，是這類創新課程需要考量的。然而，若從學生生涯認同的多樣性來看，兩者似乎都跨出了不一樣的第一步。

再者，從外部競賽轉化到內部動力，當中亦可能是起起伏伏的心路歷程，例如，「延長線」團隊在獲得校外競賽的肯定後曾經歷一段高原期，一度落入茫然。加上在地承接場域的非預期變化，像是「客城之春：國際田野工作站」因為場域承接者另有個人規畫而停止承接與協力的關係，迫使「延長線」團隊開始思索要不要延續行動。幸好學生團隊能在短時間內自我整理再出發，在行動場域中另外架接新的承接者——偏鄉國小，得以繼續對偏鄉兒童教育的關懷行動。

最後，對於行動現場的擾動效應，可從行動現場關係人的回饋中得知學生團隊帶來正向積極的意義，不過，若從行動的永續層面來看，這類創新課程本身由於是單一課程，學生在來來往往之間，與在地承接者的關係也容易中斷；但是中斷並不意味連結就此停止，「延長線」團隊中有成員後來自願回到偏鄉國小（上述新架接的承接者），服替代兵役，繼續他關懷偏鄉兒童的行動。

對於授課教師這位行動者來說，可以有三層置身位置的省思。（1）身為授課教師自身位置的省思：授課教師長期在高等教育機構培育專業心理師，教授內容

不可諱言大多來自心理師的培育知識系統，據以傳遞給學生，學生是被訓練者、被教導者，授課教師多以直線敘事的角度來看學生在專業上的學習與訓練。但在這門生涯探索課程中，授課教師先暫時懸置心理學知識系統，鼓勵學生親自感受動手作，從體會中去建構行動的知識。然而，不給學生標準的答案，對授課者的「教師」位置來說，無疑是個挑戰。(2) 授課教師與學生關係的省思：在正式課程結束、移出正式課程的框架後，授課教師一度以為沒有後繼課程接續，學習即可能中斷，事實上反而正因為沒有正式課程的結構，師生彷彿更能對等地以行動者的角色做討論，在場域中同為觀察者或行動者。亦即授課教師從教導者位移到學生的行動伙伴，一起在場域摸索與學習。(3) 授課教師、課程設計與場域承接者關係的省思：以「客城之春：國際田野工作站」為例，因創辦人對於工作站的發展藍圖抱持開放性態度，一開始並沒有結構性的規畫，因此當學生進入場域時亦不知從何開始。這似乎是社會實踐課程介入常會遇到的問題，若場域承接者已有清楚的規畫，學生照著畫葫蘆，就難有創意發想；另一方面若太無章法，學生會在探索的初期不知所措甚或容易挫敗。再者，授課教師雖然在正式課程之前經由執行人社實踐計畫已與場域承接者建立連結，但引進學生以及學生的行動後，授課教師一方面要培力學生創新與實踐，另一方面亦需與場域承接者維持協力伙伴的關係。授課教師體會到在面對實踐現場的種種預期與非預期時，需要保持「非專家」之心，這對授課教師來說也是一種跨域轉型。

## (二) 社會發展趨勢下新興學科的創新調節——藝術創意產業學系的「社區藝文產業發展」

### 1. 課程操作

相較於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這類著重專業屬性與定位明確的學系，藝術創意產業學系（以下簡稱「藝創系」）可說是「非典型」科系。東華藝創系是一個年輕的科系，於2010年度首屆招生、至今僅有四屆畢業生，在相當程度上，藝創



系可以視為大學市場化的一部分，或者是大學積極回應市場與產業人才需求所創設的科系。<sup>2</sup> 對應於國內外方興未艾的社會現象與發展，包含：文化創意產業、社會企業、社區與部落營造、策展、藝術經紀、空間活化、城市再生、地方創生等；系所徵聘不同專業領域的教師，包含：藝術教育、藝術創作、工藝創作、藝術史、人類學、設計、劇場、商業管理等，以此對應系所的專業化，進行整體的建構與次領域的區分。由於是新興的科系，所謂集體轉換的生涯發展往往不太容易發生。

雖然科系的設立與市場緊密連結，產業和經濟面向也在系所專業化的過程中一再強調，然而，在培養學生專業性的過程中，透過藝術進行思辨、進而對社會現象有所反思，亦是養成的重點。「藝術」在過去往往被視為創作與欣賞的對象，藝創系的課程規畫具體帶領學生認識到，藝術不僅與經濟密切相關，藝術與公共領域的關係也讓藝術具有公共性與社會性；「藝術介入社會」、「藝術進入社區」即是這個概念下的實踐。以此，藝術可以作為推動公民社會溝通及教育的媒介，藝術的社會實踐也因此具有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在這些基礎上，以藝術的社會實踐為內涵的課程目標為：（1）激發學生學習的動力與自主性，（2）培養學生在新形成的專業領域中的專業能力（如，藝術經紀、文創產業的中介人、藝文空間的整合者、策展人等），（3）培養學生在畢業後有能力面對變動的未來，並能運用能力解決問題。

由於系所的教育目標在於培養學生有能力在前述的新興領域中發展，專業能力的養成即以相關學科領域為基礎。因此，在當前高等教育強調跨域整合的氛圍中，藝創系內部的教師群事實上已經是跨域整合的組成，雖然可能因此讓學生有學科屬性定位不明確的焦慮。另一方面，當前的教育趨勢是讓學生有能力在快速

---

<sup>2</sup> 藝創系創立的核心與目標是以「文化創業」（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為重點，透過「傳統與創新」、「創意與產業」整合策略，培育重點專業人才進行「研發具特色的藝術產業行銷國際，與全球文化創意產業接軌」的工作。資料來源：<http://www.artci.ndhu.edu.tw/files/11-1060-2707.php>，取用日期：2017年11月30日。

發展與變動的社會中，適應、就業並尋求問題的解決與創新，因為當學生大四畢業時社會上大部分的工作，可能在大一入學時都還不存在。在這樣的情況下，帶領學生進入到真實場域親眼看、親身做、實際體會、看見問題、嘗試解決，就變得非常必要且重要。

對應前述目標，爲了讓學生在真實場域中學習，課程內容如何讓學生能夠真正「看見」現況和議題，進而從「無感」到「有感」，甚至進而形成行動的可能和方案，是課程設計時的主要思考。以社區藝文產業發展爲例，社區營造的核心概念是由下而上參與，以及公民意識的催生，然而，若是學生普遍缺乏社區參與的經驗，也就無從理解其概念上的重要性，以及實際執行上的困難度。更重要的問題是，每一個人的身邊每天有那麼多的事情發生，是否都能看見、都有所感，甚至想要以行動產生改變？在系所內的正式課程結合社會實踐，與通識課程最大的差異在於，每一門課程都是在系所學程規畫下、專業養成的一部分，因此，如何扣合系所專業，同時又能連結到地方，甚至進而切合地方發展需求並解決問題，都是難度頗高的挑戰。

在能夠帶領正式課程的學生進入在地場域之前，教師群和計畫團隊必須先行建立與地方協作的關係，經過幾個學期的摸索前進，教師在失敗與成功的合作經驗中逐漸累積、逐步形成一套可以操作的方法與步驟。

首先，邀請在地社會的協作者到課堂上演講。如前所述，要讓學生從無感到有感並不容易，因此透過在地協作者的現身說法，系統性地呈現多年來在社區中努力進行的各種面向，幫助學生理解社區現況與面臨的問題。例如，「社區藝文產業發展」課程邀請卓溪鄉中平部落「一串小米族語獨立出版工作室」負責人 Salizan Takisvilainan 到課堂上演講，與學生談論工作室成立的歷程，以及現階段營運的方向。

其次，帶學生前往社區實地參訪，讓學生親身體驗並深刻理解社區所面臨的問題，以及所需要的發展。授課教師帶著部分（時間上可以配合且有意願的）學生前往太平部落參加小米開墾祭，學生在活動過程中接觸到部落的老人家與中壯

年居民，嘗試理解傳統祭儀（復振）的當代意義，以及部落生活的現況。在小米開墾祭之後，有學生自主而持續地前往參與部落舉行的打耳祭、小米播種祭等傳統祭儀。

再者，藉由前述方式，在學生充分認識部落的文化傳統與現況之後，授課教師便鼓勵學生開始發想，是否有可能跟社區的人們一起做些什麼？一方面可以發揮學生的所學專長，另一方面也可以回應社區發展的需求。以此，具體形成協力的作法與內容。有興趣的學生逐漸形成協力的團隊和方式，主要分為硬體和軟體兩個方面，硬體是為工作室改造老屋，從無到有打造工作室的內外部空間，並在其中傳遞文化內涵；軟體是以布農文化為基礎，設計以族語推廣為目標的明信片，工作室印製之後在工作室與「部落圖書館」等地販售。

教室內的課程，主要提供學生概念與案例作為思考和實踐的工具，讓學生能夠帶著工具進入到真實的場域中實踐與反思。這麼做的目的，是為了解決真實社會問題的能力。

## 2. 行動反思

在規畫社會實踐課程的過程中，由於必須配合場域的需求與時程，以及仍然受限於學制尚未全面彈性化的學期授課時間，課程規畫往往傾向於實踐先行的課程安排，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在有限的一學期時間內，得以盡早認識場域，並有更長的時間發展適合的社會實踐方案。然而，課程也必須再從實踐回到理論或學院的思考與分析，畢竟實踐仍然需要一定的基礎與養分。

藝創系學生的專業性不同於傳統學科，學科本身就已經是一種跨學科的專業，系上的老師來自各種專業領域，在系內形成跨領域的師資團隊。藝創系的出現，一方面是快速回應社會發展的趨勢，以及社會的新興發展需求而存在，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新興科系也必須思考並建立學科的專業性，並且在大學四年提供學生完整的專業訓練。在進行社會實踐課程的過程中，藝創系與其他（傳統）科系或許有一些共同面臨的處境，差異之處則在於，學科的基礎與出發點是相異

的。藝創系學生的專業性，是建立在文史哲、藝術創作、藝術教育、商業管理之上的非典型專業，對應的是社會上的策展、藝術經紀、文化資產保存再利用等需求，亦即，在科系內部的專業訓練本身就已經是跨領域的養成過程。因此，在進行社會實踐課程或是回歸學科自身，藝創系都面臨不斷反思自身定位、專業性，以及如何與社會脈動連結等問題。此外，和前述諮商與臨床心理系課程相同的是，我們同樣追問：「大學教育可以給出和創造的是什麼？」

在社會實踐課程進行的過程中，教師的角色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授課教師以個人所具有的人類學專業來發展課程內容和支持社區協作，就如同人類學家進入田野工作的方式，授課教師在教室內先行給予學生人類學的基本概念和方法，以及提醒學生進入社區時應有的學術倫理。第二，學生進入社區之後，教師並不主導、僅協助安排，讓學生自己親身理解並建立關係，期望藉此過程發展出學生持續的協作，以及創新的動力和可能性。第三，教師必須同時關注學生和場域承接者的狀態。授課教師的經驗是，觀察到協作對於場域承接者所造成的「甜蜜的負擔」（雖然提供所需的人才與人力，卻疲於承接），教師必須即時做出適當的調整。

作為藝創系的教師，在人社實踐計畫的媒合下，帶領學生進入實作場域的歷程，整體而言促使授課教師不斷反思藝創系要給學生學習的是什麼？如同前述，藝創系是大學中的新興學科，學科本身不論是走向定位或學科知識都和社會發展有強烈的關聯。試想若是未來的工作大半並不屬於現在制式體系下所能提供，那麼，藝創系這門學科能在未來社會發展中扮演什麼角色？就當前社會趨勢而言，以藝術與人文為基礎所進行的創造，在各個領域中逐漸受到重視，例如，在個人創作之外，將藝術帶入社會的概念、透過集體創作過程，進一步讓創作具有公共性意涵，進而帶來社會的改變，亦即，讓藝術成為引領社會價值變遷的發動機，這些都是藝創系師生可以發展的向度。以此而言，回歸到授課教師自身在參與人社實踐計畫之後，逐漸確定的是，發展對應於新興社會發展的專業能力非常重要，例如，培養學生展覽策畫等相關企畫的專業能力，而非停留在自我創作的

層次，讓學生在學習企畫能力的過程中，同時深切體認當前社會的變遷與發展趨勢。

令人欣喜的是，社會實踐課程進行至今已經有一段時間，竟已可以看見在學生身上的影響與改變，以下舉三位學生的發展為例說明。第一位學生，從大一的選修課中即參與社會實踐課程，此後便持續在同一社區中協作一直到大四，在各項大小協力工作之外，她也為社區中的工作室最新出版的專書完成美編與文編工作（擔任主要負責人）。不僅專書作者滿意學生的專業協作，學生也認為這是個人大學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件事。第二位學生，是授課教師投入社會實踐課程的第一門課堂上的碩士班學生，下一個學期他成為課程助教（也就是社區藝文產業發展課程的助教），帶領學弟妹進入不同於之前課程的協作場域；結束助教工作後的暑假，他為了協助工作室的改造，主動到學校圖書館大量翻閱水電專門用書，自學掌握水電裝修技術，最後真的主導完成工作室改建。更重要的是，他在碩士畢業不久之後，成為某一國家型重要計畫的專任研究助理，留在東臺灣工作，並且是和之前協力的工作室負責人 Salizan 繼續一起工作。第三位學生，最初在碩士班選修課程參訪時認識中平部落、工作室和 Salizan，因為對 Salizan 在做的事情深有所感，於是學期報告、碩士論文都以此為主題，在論文寫作期間雖然暫時離開東臺灣，卻仍持續與身邊的原住民朋友討論、關注原住民議題，並且著手撰寫短篇與長篇的電影劇本，準備將來要拍攝一部以 Salizan 為主題的電影。從三位學生的例子可以真實地看見，我們期待學生超越課程與學分（不是因為有束縛才做）的協力，真的發生了，而且學生也從藝術的專業出發，進行具有開創性的社會實踐工作。

### (三) 通識教育課程——跨系所的密集式課程設計「東臺灣生存樣貌、人文想像與社會實踐」及「東臺灣田野調查」

#### 1. 課程操作

通識教育課程原本就屬於讓不同科系學生，可以匯聚在不同課程中的跨領域學習，開設在通識教育課程中的寒暑假密集課程，主要是因應人社實踐計畫所進行的通識課程設計變革，並藉由密集的課程設計，展開寒假課程「東臺灣生存樣貌、人文想像與社會實踐」，以及暑假課程「東臺灣田野調查」開課計畫，成為能夠直接在場域中生活，培養學生行動方案的創新課程設計與授課方式。

學生踴躍選課的情形出現在第一次的寒假課程，將近七十名學生想要選修二十五名的限修人數課程；第二次的暑假課程則是想選修的人數，剛好達課程限修的門檻。寒暑假選課人數的落差，很可能與學生對於寒暑假的規畫有關。其次，對於來自不同科系的學生而言，社會實踐課程是新的嘗試，多數教師和學生會在暑假進行長時間的規畫安排，較無意願進行開課和修課計畫。

寒暑假課程最大的特色是希望將不同科系的大學生匯集到某一共同場域中，以密集課程操作方式為地方帶來改變。藉由在當地集體生活，讓來自不同科系的學生可以培養伙伴情感，並且透過居住和生活在當地，讓師生真實體驗在地的日常生活，同時創造大學和在地居民面對面實質互動交流的機會。

可以說，不同於著重一對多（一位教師對學生們）的教學方式，課程一開始的設計就是以社會實踐導向為優先，再回頭規畫教與學。換言之，最先要確定的是，課程要具體實作的課題是什麼？之後才進一步規畫如何實作。就寒假課程「東臺灣生存樣貌、人文想像與社會實踐」而言，具體實作課題是認識與理解地方生存（生活）方式；暑假課程「東臺灣田野調查」則為培養學生進入現場，具備運用現代通訊科技完成田野調查與構思行動方案的雙重能力。

此外，學生進場之後，如何在不過度干擾地方日常生活的情況下，透過地方的業師和達人理解地方等，這些協調工作在實作課程中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由

於密集課程的學生在實作當地生活，當學生認識地方之後，往往會依照個人體驗的深淺程度，在課程結束之後自發性地回到實作當地，促成學生後續進場的效應。就計畫執行成員事後了解，參加寒假課程的學生中，有四位自發性地留在花蓮南區繼續參與地方事務。其中兩位分別是中文系和藝創系的學生，在寒假課程結束後，便自發性地到「奇客邦」基地打工換宿，並協助奇客邦幾位主要成員，申請玉里鎮公所的在地小旅行計畫案推展；另外兩位同學則前往花蓮南區其他社區幫忙。不僅如此，寒暑假課程的四位助教，有三位畢業後至今仍在花蓮地區工作。另外，在課程結束兩年之後，修課同學中也有兩位在畢業之後留在花蓮鄉村社區工作，分別是富里竹田社區發展協會和豐田社區的百合花農場。

## 2. 行動反思

開設寒暑假課程主要的創新面在於，利用寒暑假時間「調節」傳統大學的兩學期制，突破時間與空間上的教學限制，並以密集式的授課及進入在地社區生活方式，讓師生和在地達人或團體，有較長時間的互動交流，而不是傳統上由教師做單向式講說。這樣的方式最大的優點是，在不大費周章改動兩學期制既有修課制度的規範之下，能提供大學師生和在地達人、團體或居民，有較長時間「面對面」的互動，這種實質的互動才有可能產生真實情感的交流。因此，就寒暑假課程的實質效應而言，透過在當地生活，師生自然地和在地人產生連結、不解或矛盾等等，進入「認識」真實世界，也才堪稱情感互動的開始。

值得高興的是，延續寒暑假課程師生進入地方場域的精神，之後東華大學開設「深碗課程」，由人文學系和藝創系跨領域的師資共同合授，本文第二作者亦參與其中。讓老師與學生共同從「認識」地方、地方個人或團體做起，才能進一步建立有合作意願的關係。

至於寒暑假課程遇到的挑戰面，主要是如何面對學生退選及籌組永續性的課程執行團隊兩大課題。由於通識課程長期被想像為營養學分，學生大多傾向以容易取得學分，課程輕鬆有趣為主，為了避免出現學生想像和實際操作產生過大的

落差，影響未來課程的延續性，因此在課程說明會中先清楚表達社會實踐課程的精神與要求，才開放選課。然而，即便舉辦寒暑假課程說明會，在聽取說明會後確定選修的學生，在充滿熱情或好奇地參與課程後，有少數仍反應這類實踐課程造成學習的負擔。

現場的突發狀況，則有選課學生到了場域後提出想「退選」課程，由於寒暑假課程開設不同於一般課程，學生無法在課程說明會時立即判斷自己對於課程可以負荷的程度。加上考量場域的承載力與選修人數門檻的限制，計畫執行人員必須在學生進入場域之前，即確認所有確定的修課名單，而此修課名單的認列則是在執行課程結束後的下一學期，才會出現在學校的選課系統中。因此，實際到了現場仍有部分學生難以調適，對於選修社會實踐課程感到許多的不適應。授課教師雖然可以理解學生想要退選的原因，並選擇是否讓學生「退選」，更重要的是，授課教師如何能讓想「退選」的同學明白，社會實踐課程的精神原本就不是一帆風順的想像，因此如何學習咬牙「承擔」，也是重要的歷練。授課教師更必須有「做壞人」的一面，並接受學生給予負面評鑑的體悟。

就此而言，當不同行動者匯集到場域現場後，又會形成不同的未知狀況需要逐一面對與克服。其中學生面對不習慣的課程教學模式，會萌生退選的想法，而教師在學生評鑑的影響之下，可能會選擇考量評鑑績效，更勝於付出心力去促成合作的意願與實踐。再者，實踐課程透過學生分組評量他組與自評的方式，得到學習成績，已經是最不易產生爭議的方式。然而，若細究修習通識課程的精神是希望涵蓋跨領域科系，那麼差異過大的學科，例如，理工學科和人文學科，能否在一次性的修課經驗中開創出激盪與合作，而不是科系之間養成的差異過大，導致光是要磨合小組向心力已然不易，遑論合作共識的發想。在寒假課程的操作中，最後能夠提出可以實作合作方案的，大多是小組有某一特定主導者，而該特定主導者也是小組的統合者，因此，如何持續培力小組中的特定主導者，落實初步規畫的方案構想，是社會實踐課程中最大的挑戰，也是最值得投入的地方。

在通識教育中開設寒暑假課程，最困難的部分是如何引發學生選課動機，以



及如何促成不同科系學生共同討論，乃至產生具有實際可行或願意親自實作的行動構想和方案。由於多數學生仍習慣將重點放在課程成績的評比，而非具體行動方案的產出與實作，最主要的因素恐怕還是缺乏對於在地生活的情感所致。許多選修密集課程的學生大多非本地學生，對於學校以外的鄉鎮充滿觀光旅行的想像，而非懷抱對地方或社會要有所貢獻的意識。

身為通識教育授課教師，如何成為協調溝通能力的中介角色，以及如何籌組社會實踐課程的事前規畫運作小組，亦須考量校方對通識教育的整體規畫。寒暑假課程採取密集授課的方式，師生一起在當地生活，這是一般性學期間課程無法做到的安排。再加上課程必須組織起學生、場域行動者及大學行政單位等多方聯繫與權衡，不僅是單純的課程活動，更是一個組織運作。授課教師與場域行動者針對課程內容進行事先討論，凝聚課程目標共識，在開設課程期間和行政系統協調，並在課程結束後和學生一起討論方案構想。從而使得授課教師、學生、實作場域的伙伴，能持續保有投入社會實踐的熱誠，並願意從關心周遭人事物做起，彼此才可能獲得共同創造的情感連結。換句話說，授課教師、學生、在地團體和大學組織都需要共同承擔了解地方，重新培養對待自身生長環境的情感，帶動關心地方公共事務與整體臺灣社會發展的責任。

#### （四）三種課程操作的比較分析

接下來進一步比較三種課程的操作方式與行動反思（如表1）。三門課程在最初執行時，三位授課教師都是「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安居東臺灣」於地方合作啟動的「縱谷團隊」執行團隊成員。三種課程規畫一開始由個別老師自行安排，依照不同的學科屬性，共同執行社會實踐帶入場域的課程規畫。三位授課教師集體討論是在課程結束之後，亦即透過寫作的過程，多次面對面地討論，以回溯性的方式呈現學術視角的反觀，希望呈現屬性不同的學科如何操作社會實踐課程，並且具體說明行動反思的面向。三位授課教師在回觀的過程與討論中，

各自發現課程操作的異同與特色，亦從行動反思中體會到授課教師與學生自我轉化的可能性。

**表1 三種社會實踐課程操作與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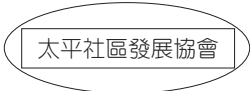
生涯探索與實務	社區藝文產業發展	(寒) 東臺灣生存樣貌、人文想像與社會實踐」 / (暑) 東臺灣田野調查
<b>課程操作</b>		
*專業課程	*專業課程	*通識課程
*在地協作者到課堂分享	*在地協作者到課堂分享	*密集式課程設計
*場域（村落）參訪	*場域（部落）參訪	*直接進入場域：集體生活與實作
*學生換工	*學生參與部落活動	
*學生行動方案的發想	*學生行動方案的發想	*學生行動方案的構想
*學生行動方案的實踐	*學生行動方案的實踐	
*學生的自我轉化		*學生的自我轉化
<b>行動反思</b>		
*多元生涯發展 vs. 續航力	*跨領域vs. 專業定位	*課程的後續效應
*學生實踐的取徑 vs. 在地承接者	*理論vs. 實踐	*課程的阻力
*學生的自我轉化	*學生的自我轉化	*學生的自我轉化
*授課教師的角色省思 / 轉化	*授課教師的角色省思 / 轉化	*授課教師的角色省思 / 轉化

### （五）場域承接者、課程中介與行動者自我轉化

本文三種課程所接觸到的場域承接者特色各異，包含：組織形態鬆散型的在地青年團體奇客邦，中介轉型的卓溪鄉太平社區發展協會，已有組織規模事業體的東豐有機農場，個人創業試行基地的客城之春；個人工作室形態的一串小米工作室，以及公部門玉里鎮公所、卓溪鄉公所和玉里高中（如表2）。由於場域承接者的特色各異，亦會衍生不同的實作過程與互動樣貌，乃至後續的合作永續性。例如，如果承接者是個人，那麼可能會受到個人生涯規畫因素的影響，讓相

互協作產生中斷；至於社區發展協會則會面臨定期改選後主事者更替與發展方向改變的變動性。

表2 三種社會實踐課程的場域承接者

部門類型		營利屬性	營利	非營利
私部門	個人		個人創業試行基地——客城之春	個人工作室——一串小米工作室
	團體		東豐有機農場	青年團體奇客邦
				
公部門			玉里鎮公所、卓溪鄉公所、玉里高中	

再者，實踐課程操作的過程中，不僅涉及場域關係人／承接者、教師、學生、計畫執行人員等四方的協作互動，也反映出不同行動者如何深入所處的系統結構中的影響，同時要能在此基礎上展開相互協作。行動者作為社會行動的主體，各自有身處的結構系統，社會實踐課程則是將帶著各自結構系統的行動者匯集在一起，從而形成另一個層次的關係系統（如圖1），就此而言，社會實踐課程即是不同異質行動者和關係系統匯集的中介處。在社會實踐課程中不同行動者的共同之處，是「直接面對」共同討論行動方案過程中的諸多變化與協調。此外，場域中承接者的變化，以及課程師生進入對場域的影響，倘若回歸社會實踐課程的立意精神——課程作為一個中介，那麼，教師、學生、計畫執行團隊、場域行動者，各自都能透過課程成為中介並產生自我轉化的可能性。本文雖然在回溯性的反思中未能進一步蒐集或呈現場域承接者的自我轉化，不過，若從日常生活所形構的生存樣態是受到各種社會系統的牽引而處於變動狀態來看，場域承接者和大學／大學師生的合作關係，亦可能進一步牽動其自我轉化的可能性。再進一步推論，實踐行動者各自在社會實踐課程中經由教、學、做，從而融為異質匯集之處，以此創造共同事件的中介，那麼，是否也有可能產生協作合作體的集體轉化呢？這是值得繼續觀察與探究的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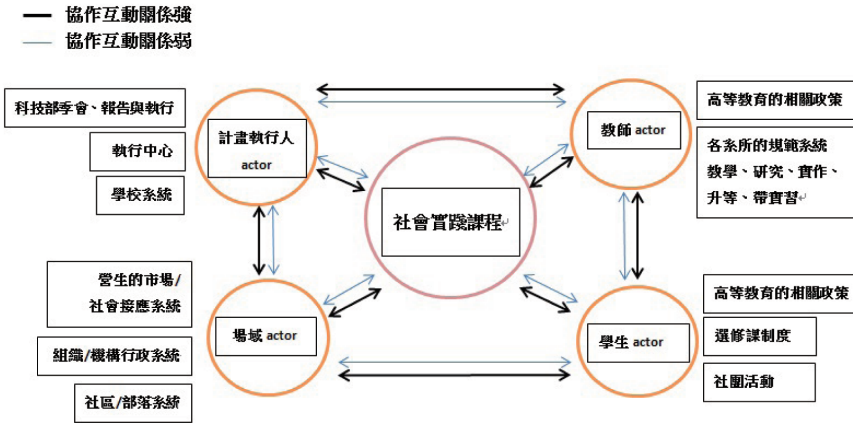


圖 1 社會實踐課程行動者轉化的連動關係結構

## 五、結論：知識主體與實踐主體、行動之「處」和「非處」

東華團隊在執行第一期人社實踐計畫時，以直接進場的行動方式，透過舉辦各項活動，例如，帶領探訪社學生進行稻農探訪，辦理移地式座談工作坊，藉以創造地方或社區的合作關係。這樣的方式適合計畫執行的初期，目的是希望以直接行動的方式，發揮大學對於地方的影響力。然而，舉辦活動的方式不僅缺少延續性，也難以帶動大學內師生的主動投入與反思後的再行動，因此接續的搭配課程採取實地進入場域就成爲必要的工作。

由於正式課程有教師、學生和計畫團隊的協力合作，不僅可以透過共同討論、相互支持，解決在場域中碰到的問題，同時亦能時時回觀團隊的核心目標，以及深入討論行動方案對於地方的實質意涵等。此外，我們也開始思考這些實作方案和大學教育之間的關聯性，乃至進一步探問大學所扮演的角色和定位？透過第一年執行團隊直接行動的方式，到第二年正式課程的導入，大學成爲具有主導權之一的行動者，同時擔任推動地方發展協力的串聯角色。

此外，從英國「大挑戰」的實踐所引發的討論，是否凸顯短期經驗所帶來的學習成果產出，很可能導致學生只追求短期成效，因而阻礙更高層次學術知識學習的疑慮？東華大學團隊執行人社實踐計畫後，發現答案是未定的。短期經驗的學習成果可能同時有阻礙和增進兩個方面，可以說，社會實踐課程同時包含**知識主體與實踐主體**，兩者之間的交集搭配比例，需要依社會實踐課程中，不同場域行動者的互動而隨時調整。換言之，即便單一的社會實踐課程費心試圖串聯不同的行動者，卻也容易成爲教師授課及溝通協調、學生學習、場域承接者的負擔，進而削弱行動者合作的意願。因此，知識主體和場域主體交織而成的行動樣態，仍然有待更多社會實踐課程的經驗累積與反思，如圖2所示。

不僅如此，細究社會實踐導向爲主的課程經驗，主要是以「行動」共同面對社會或制度等結構性的有形問題之「處」。著重以逆向思考的方式，將一般人印象中認爲資源不足、人口老化、青年人口外移的偏鄉意象，藉由積極導入社會實踐課程試圖重新翻轉，將不足之處視爲可以創造的園地，並以此作爲改變惡性循環的契機。社會實踐課程中十分重視過程中的共同討論，以及依照場域的情形調整課程安排，因此，實踐場域可以是課堂討論中的經驗分享，可以是在社區、部落、醫院裡的討論，共同商議可行的行動方案與實地操作方式。

行動除了是明確場域的執行方案之外，另外隱含著看不見的無形「非處」，亦即不同行動者對於場域的積極想像或願景藍圖。可以說，「非處」是伴隨可見的行動之處而存在，行動者的積極想像或願景藍圖正是使個人經驗能轉化成具有主體行動力的動力源。倘若行動者缺乏此一「非處」，欠缺對於場域的某種積極想像，那麼，行動將只是被動地舉辦活動，而非具有主體性的行動力或執行力。Lévi-Strauss 在〈維科的航跡〉一文中即指出，「有些特點是專屬於人類的：想像力和創造力，運用抽象和處理時空遠距對象的能力，還有人類獨創的、語言的二重結構」（2014: 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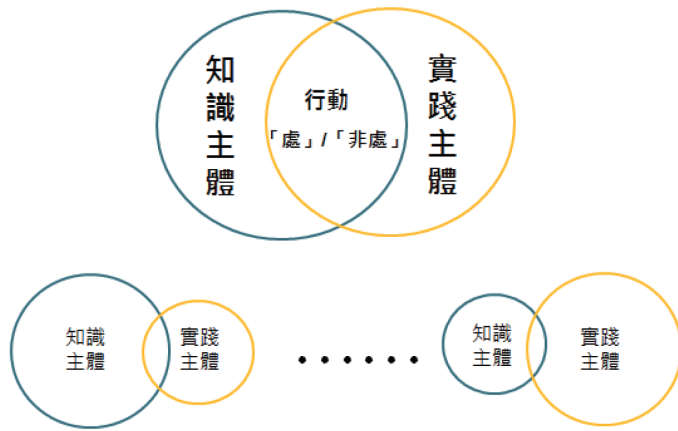


圖2 知識主體與實踐主體共構行動「處」/「非處」

社會實踐課程匯集不同行動者在某個現場經驗的時刻，會觸動主體所隱含的具有特殊經驗的記憶，這些特殊經驗在經歷的當下或許只是平凡的歷程，然而這些充滿軌跡的經驗，很可能成為行動者蓄積能量的地方。就此而言，行動者生命的主體經驗正是最大的力量來源，即便有外在環境的影響或牽制，行動者的主體性也在施展力量的過程之中來回形塑。以此觀之，在社會實踐課程中，必須要回觀教師社群對於大學教育內在的積極想像為何？學生各自在大學所欲學習的積極想像為何？以及地方社群、在地承接者，乃至人社實踐計畫執行團隊，對於地方發展或是未來社會環境的積極想像為何？

本文論述社會實踐課程作為高等教育的大學課程改革操作、挑戰與反思，從三類不同屬性的課程出發，探究如何藉由教學課程內容的變革，使得跨域得以發生。跨域本身也意謂不同行動者藉由社會實踐課程「違犯」(transgressing)各自系統的慣習疆界，例如，場域關鍵人/承接者嘗試和學術界合作，違犯各自習慣的在地運作方式，不再將學術界視為獨立於自身之外的知識壁壘，願意嘗試花費額外的時間進行討論和協力。計畫執行人員「違犯」傳統上只須應付計畫成果報告的執行方式，必須身兼執行者、協調者、經營者、教師等多種角色，不斷在關係結構中拿捏互動關係。教師「違犯」原本單純教學及研究者的疆界，必須不斷

調整課程內容，成為學生、場域和大學端之間的高度協調者。學生則「違犯」以各科系主流課程的慣習學習方式，主動額外花費時間和企圖走進充滿變數的場域。

此外，社會實踐課程也在於挑戰既有的學科意識型態，挑戰了不論是針對學科乃至大學轉型，試圖為高等教育尋找出路的美意，在大學教師評鑑方式尚未改絃易轍，大學學科的規畫與社會發展討論方興未艾，乃至整個國家對於高等教育轉型的願景為何，至今都仍是未定數。社會實踐課程的操作，不僅挑戰大學課程內容的轉型，同時也挑戰當高等教育的轉變仍藉由市場機制推動，且市場機制向來是促成轉化的重要因素時，社會實踐課程能否在市場機制所帶來的轉型過程中，成為不過度市場導向、不過度依賴國家政策，能夠在具有一定程度的市場機制和適當的政策規畫下，形成帶動社會朝向更公平、更良性發展的中介。

就此而言，社會實踐課程提供不同行動者在場域中聚集的機會，而聚集本身就是創造共同特定行動的機會所在。由於場域關係人／承接者、教師、學生和計畫執行人員各自帶著所處系統結構的異質性，這些異質性在面對共同特定行動時都可能是產生變化的要素，加上社會實踐課程具有實際產生行動方案構想乃至實行的特質，匯聚不同行動者共同協商和討論，從而使得社會實踐課程能夠成為不同行動者獲得對自身具有轉化意涵的機會。

在進行社會實踐課程，以及後續的行動反思過程中，我們也關注全球高教的普遍現況，發現在東臺灣的這些高教創新與實踐，能夠與其他國家的高教變革對話，以及延續發展的可能性。例如，美國 Oregon 大學的 Oregon Folklife Network<sup>3</sup> Ohio 大學的 Center for Folklore Studies 所主辦的 Ohio Field Schools<sup>4</sup> 與東華團隊和場域的合作相當接近，他們的作法也提供東華團隊後續發展很好的參考方向，也許未來我們可以致力於和社區一起建立檔案中心（archive center），

---

<sup>3</sup> <https://ofn.uoregon.edu/>

<sup>4</sup> <https://cfs.osu.edu/archives/collections/ohio-field-schools>

成爲永續發展的良好基礎。

在這個學習模式不斷改變的時代，社會實踐課程很適合爲願意自主學習的學生，搭建初步的學習鷹架，學生可以在這個基礎上持續搭建屬於自己的知識系統。在這樣的學習模式中，教師所扮演的角色是關鍵的中介人，促成學生與在地社會連結，以及跨領域的可能性，這個角色對於教師而言亦是相當大的挑戰。高教轉型過程中，透過社會實踐課程操作能否啓動學生持續性的自主學習，教師在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轉換是什麼，大學作爲一個組織是否願意投資社會實踐課程的成本，這三大面向關乎大學社會責任和臺灣社會發展走向的重大課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 參考文獻

- 林美珠，2015，〈生涯探索的理性之「非」：一場解構、共構、重構的教學行動〉。論文發表於「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論壇」，台北：政治大學，2015年10月3日至4日。
- 陳東升，2012，〈社群治理與社會創新〉。《臺灣社會學刊》49: 1-40。
- 楊國賜，2006，〈高等教育的藍海策略：明確定位、有效治理〉。《高等教育》1(1): 1-23。
- 戴伯芬、林宗弘主編，2015，《高教崩壞：市場化、官僚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台北：群學。
- 謝易儒，2014，〈「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之推動〉。《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5(4): 12-16。
- McNiff, Jean and Jack Whitehead 著、朱仲謀譯，2005，《行動研究：原理與實作》。台北：五南。（McNiff, Jean and Jack Whitehead, 2002, *Action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2ed.）
- Schön, A. Donald 編、夏林清譯，2003，《反映回觀：教育實踐的個案研究》。臺北：遠流。（Schön, A. Donald, ed., 1991, *The Reflective Turn: Case Studies in and on Educational Practice*. New York: Teacher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 Lévi-Strauss, Claude 著、廖惠瑛譯，2014，《我們都是食人族》。台北：行人。（Lévi-Strauss, Claude, 2013, *Nous sommes tous des cannibales*. Collection La Librairie du XXLe siècle, sous la direction de Maurice Olender. French: Editions du Seuil.）
- Burkill, Sue, 2015, “Challenging Pedagogic Norms: Engaging First-year Undergraduates in an Intensive Research Informed Learning Programme.” Pp. 71-90 in *Global Innovat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Transgressing Boundaries*, edited by Prudence C. Layne and Peter Lake.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Switzerland.

Layne, Prudence C. and Peter Lake, 2015, *Global Innovat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Transgressing Boundaries*.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Switzerland.

McNiff, Jean and Jack Whitehead, 1996, *You and Your Action Research Project*. London: Routledge.

Ullberg, Eskil, ed., 2015, *New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Integrating Economics, Innov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Switzerland.

## **Social Practice Curricula as Action Reflec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A Retrospective Study**

Yih-Ju Su    Yi-Fang Chen    Meei-Ju Lin

### **Abstract**

As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becomes progressively market-driven, societal disparities and injustices are increasing. Public discourses on this and related topics have criticized higher education as the reason for social disconnection, and encouraged higher education to engage more directly and collaboratively in projects involving local and global issues. This paper examines Dong Hwa University's attempt to initiate social practice curriculums to challenge the pedagogies of various academic domains, and discusses the collective transgression of boundaries between university classrooms and local communitie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potential for shared transformation. Specifically,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ree of Dong Hwa's Humanities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curriculums, their differences from traditional pedagogical practices, and their potential for fostering community-university partnerships. These innovative methods emphasize cooperation among executive project officials, instructors, and learners to meet the needs of local and academic communities. One critical challenge is how to address immediate and visible problems while fostering contextual understanding.

---

Yih-Ju Su, Postdoctoral Fellow, Humanities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Yi-Fang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rts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Meei-Ju Li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unseling & Clinical Psycholog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However, we also note the emergence of creative action plans aimed at supporting professional growth beyond current disciplinary confines.

**Keywords:** Humanities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Project, social practice curriculum



# 6

## 在地空氣品質物聯網推動經驗

戴榮賦、黃資媛、張力亞

---

戴榮賦，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兼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綠活產業組組長。

黃資媛，通訊作者，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專任助理。E-mail: zyhuang@mail.ncnu.edu.tw。

張力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兼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協力治理組組長。

## 中文摘要

2014年埔里PM<sub>2.5</sub>日均值大於35 $\mu\text{g}/\text{m}^3$ 的天數高達146天，超標天數占全年天數的40%，反映埔里空氣品質的極度惡化。埔里民衆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組成埔里PM<sub>2.5</sub>空污減量自救會，呼籲地方民衆關心空污問題，並提出希望了解住家周邊空氣品質的訴求。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將民衆訴求帶回校內，並由資訊管理學系戴榮賦教授提出解決方案：發展微型感測器物聯網，布建到街頭巷尾，藉此協助民衆掌握生活近處的空氣品質狀況，幫助民衆自我防護，進而了解小區域的空氣品質變化。

基於社區共好，埔里民衆積極參與微型感測器物聯網系統的發展與布建。在2015年埔里鎮領先全國，成為環保署指定的第一個空污品質物聯網示範區。本文除了實證此系統具有偵測周邊空氣品質的效能外，暨南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中心、戴榮賦教授結合社區民衆的在地生活經驗，共同解讀系統上PM<sub>2.5</sub>數值變化，發現影響埔里鎮空氣品質的西側重要地理疆界——九份二山山脈。其次，本文觀察到微型感測器物聯網系統具有促動公民共同參與找尋空污問題的潛力，以及此系統需要地方民衆共同參與，方能發揮空污防制效用。

**關鍵字：**物聯網、PM<sub>2.5</sub> 微型感測器、公民科學、埔里、空氣污染

## 一、前言

根據環保署埔里空氣品質監測站的 PM<sub>2.5</sub> 數值統計，2014 年埔里 PM<sub>2.5</sub> 年均值為 32.22 $\mu\text{g}/\text{m}^3$ ，高於台灣年均值標準 15 $\mu\text{g}/\text{m}^3$  的 2 倍、高於世界衛生組織年均值標準 10 $\mu\text{g}/\text{m}^3$  的 3 倍。除此之外，台灣訂定的 PM<sub>2.5</sub> 日均值標準為 35 $\mu\text{g}/\text{m}^3$ ，而 2014 年埔里日均值大於 35 $\mu\text{g}/\text{m}^3$  的天數高達 146 天，超標天數占全年天數的 40%，這些數值反映埔里空氣品質的極度惡化。2014 年 11 月，五位關心空氣污染的女士共同組成「埔里 PM<sub>2.5</sub> 空污減量自救會」（以下簡稱自救會），提出希望了解住家周邊空氣品質現況的需求，後由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以下簡稱暨大）資訊管理學系戴榮賦教授發展物聯網與微型感測器，協助民衆掌握生活近處的 PM<sub>2.5</sub> 數值與空氣品質，進而達成自我防護與健康維護。

早於 2010 年，一群由醫師組成的彰化縣醫療界聯盟即有意識地開始關心空氣污染問題，尤以當中的細懸浮微粒（PM<sub>2.5</sub>）。<sup>1</sup> 由於 PM<sub>2.5</sub> 非常微細，並且容易吸附重金屬、戴奧辛等有毒物質，可透過呼吸穿透肺泡進入血管中，再隨著血液循環至全身，引發各種發炎及病症，因此特別受到重視。有感於空氣污染是全台的問題，彰化縣醫療界聯盟成員之一，同時是彰化基督教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的葉光芃醫師，於 2011 年成立「臺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同年 5 月 5 日，聯盟首次公開並召開記者會，要求立法將 PM<sub>2.5</sub> 列入管制；2012 年 5 月 14 日，環保署發布實施將 PM<sub>2.5</sub> 納入空氣品質標準，是 30 年來重大的空氣品質立法。隔年 2013 年 11 月 15 日，新故鄉文教基金會邀請台灣生態學會秘書長蔡智豪，擔任「蝴蝶風起、生態城鎮」講座第十堂「空氣污染解密」主講人，概述埔里的空氣污染問題成因以及細懸浮微粒對健康的影響，顛覆一般人對埔里「好山、好水、好空氣」的印象，然而，當時空污議題並未受到政府的重視與民衆的關注。

2014 年 11 月初，埔里鎮五位女士相約討論家人因空污而出現過敏與氣喘

---

<sup>1</sup> 細懸浮微粒（PM<sub>2.5</sub>）：漂浮在空氣中類似灰塵的粒狀物稱為懸浮微粒（particulate matter, PM），PM 粒徑大小有別，直徑 $\leq 2.5$  微米（ $\mu\text{m}$ ）的微小粒子，大小約為頭髮直徑的 1/28。



發作的情形，以及埔里空氣品質日益惡化的狀況，決定翌日先在 Facebook 建立「埔里 pm2.5 空污減量自救會」粉絲專頁，<sup>2</sup> 並陸續放上相關訊息和介紹，自救會隨之成立，逐漸透過網路與媒體擴大發布訊息、引發討論，許多長期關心埔里空氣品質的民衆陸續浮現，喚起部分不知情民衆的關注。面對看不見的空污問題，作為在地大學的暨大不能袖手旁觀。2014 年底，暨大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人社中心）開始關心空污議題，並於 2015 年初開始參與自救會，除了定期參加志工會議、討論推動事項，也提供自救會針對空污議題相關行動的對話與建議，嘗試扮演志願性空污減量協力網絡的諮詢與支援平台。

人社中心在與自救會隔週開會、合作交流的過程中，注意到幾位志工提及，當住家周邊發生露天燃燒事件時，空氣品質即急速惡化，但查看環保署在埔里國中教學大樓四樓設置的空氣品質監測站，呈現的卻是空氣品質良好的情況。民衆無從得知自己暴露在什麼樣的空氣品質環境當中，不僅無法即時自我防護，對於老人、小孩、過敏氣喘者，或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族群而言，更是暴露於危險中而不自覺，長期之下將對健康造成影響與傷害。

## 二、以 PM<sub>2.5</sub> 微型感測器物聯網解決問題

### （一）物聯網概念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 泛指具有運算能力的各式各樣的物件，彼此透過網路相互通訊。傳統上有一些研究領域近似於物聯網，包括：Wireless Sensor Network, Cyber Physical Systems 與 Ubiquitous Computing 等。對於物聯網的想像，早在 1995 年就出現在比爾·蓋茲的《擁抱未來》(*The Road Ahead*) 一書中。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自動辨識中心 (MIT Auto ID Center) 的創

<sup>2</sup> 埔里 pm2.5 空污減量自救會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pulipm2.5/>，自救會成員初期對於懸浮微粒並不了解，將專有名詞 PM<sub>2.5</sub> 寫成 pm2.5。

辦人 Kevin Ashton 則在 1995 年創造了物聯網一詞。然而，受限於物件內感測元件（sensor）、致動器（actuator）、微機電系統（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MEMS），以及嵌入式系統（Embedded System）等的成本居高不下，物聯網的應用一直不普遍，直到近年情況才有所改觀（Rifkin 2014）

物聯網運作的架構可以簡單分為三層，由底層到高層分別為設備層、網路層與應用層（圖1）。設備層是最底層，由具備運算與連網能力的物件所構成。這些物件能夠感知外在環境的各種變化，或者本身就是能夠接收遠端命令的致動器。另外，設備層中的匝道器，負責連接與管理小區域內的這些物件。

網路層負責傳遞設備層收集到的資料。目前主要的傳送方式包括：Wi-Fi、LoRa、Bluetooth、ZigBee、乙太網路、3G/4G 等。另外，資料傳送的終點站往往是雲端平台，其上架設各種伺服器、分析工具與儲存空間等，負責處理收到的大量資料，包括：清理資料、儲存資料、建立預測模型、異常警示等。

應用層是根據使用需求而發展出的各式各樣服務。以美國的波士頓槍聲偵測系統為例，<sup>3</sup>市政府在公有財產上布建聲音感測器，包括：電線桿、垃圾桶、公共巴士等。當某地點出現槍聲時，鄰近的監測點都會收到不同音量大小的聲波，並將聲波資料立即傳回資料處理中心。中心彙整不同監測點的資料，運用演算法即時推論出槍聲的發生地點，再由專家確認結果後，即時調度警力前往處理，包括：迅速幫助受害者、保留證據、訪問現場目擊者，以及拘捕武裝的犯罪分子等（圖2）。

---

<sup>3</sup> 槍聲偵測系統官網 <http://www.shotspotter.com/>

應用層	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電網等等。
網路層	雲端運算 傳送方式：Wi-Fi、LoRa、Bluetooth、ZigBee、乙太網路、3G/4G 等等
設備層	匣道器：連接與管理小區域內的設備。 感知器：陀螺儀、三軸加速度計、溫度、濕度、光度、壓力、音量等感測器。 致動器：馬達、繼電品等等。

圖 1 物聯網運作架構



圖 2 物聯網在槍聲偵測系統的應用

資料來源：槍聲偵測系統官網（<https://www.shotspotter.com/>）。

事實上，物聯網不是全然嶄新的技術，有許多技術環節是現有技術的重新整合與延伸。舉例來說，物聯網使用的網路技術中有許多是現有的成熟技術，例如 Wi-Fi；但也發展出一些新的技術與規範，例如 LoRa。另外，傳統的自動控制技術已經應用在溫濕度偵測以及灌溉馬達的自動開關，物聯網則將這些溫濕度偵測與馬達的控制進行智慧化的結合，亦即，物聯網可以根據現場偵測的溫濕度資料，加上外部的氣象資料等，透過雲端平台上的各種分析，做出聰明的判斷，決

定是否啓動馬達。物聯網的出現，帶給人們對於未來世界的許多想像，各式各樣的創新應用正在世界各個角落實驗中。

## （二）研發PM<sub>2.5</sub>微型感測器與物聯網系統

2014年底，暨大人社中心開始關心空污議題，觀察到民衆希望了解住家周邊空氣品質狀況的需求，遂將議題帶回暨大，由戴榮賦提出物聯網與微型感測器作為初步解決方案。2015年1月，戴榮賦將概念轉為實作，以物聯網、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開放硬體（Open Hardware）、創客（Maker）四種概念進行系統規畫，自行開發微型感測器並布建到民衆的生活圈內，收集PM<sub>2.5</sub>、PM<sub>10</sub>、溫度、相對濕度及照度等環境資料，希望藉此幫助民衆掌握生活近處的空氣品質變化，達到即時自我防護、維護自身健康的目的。其次希望透過微型感測器的布建，建置物聯網系統，鼓勵民衆以科學工具觀察社區型污染源，進一步發展出屬於在地的空污減量行動，藉由公民科學的力量，善用群眾智慧解決問題。

環保署監測埔里空氣品質的作法是在埔里國中教學大樓四樓設置空氣品質監測站，屬於國家級的標準監測站，有專業人員長期負責檢校維護，數值穩定可靠，呈現整個大埔里地區的空气品質狀況。然而，此作法最大的限制是不足以貼近一般民衆的生活。有鑑於此，戴榮賦提出物聯網的構想，用微型感測器發展較為貼近民衆生活圈的監測設備。此構想如圖3所示，假設布建16個微型感測器在民衆住家周邊，X1代表左上第一台監測點，A代表由X1、X2、X5、X6四台感測器圍起來的區域，如此一來可以得知住家周邊的即時空氣品質狀況，二來是能立即對地區空污產生全面觀，選擇迫切區域優先投入人力，進行宣導與防制，並即時掌握空污來源發生的大概區域，以便前往了解與勸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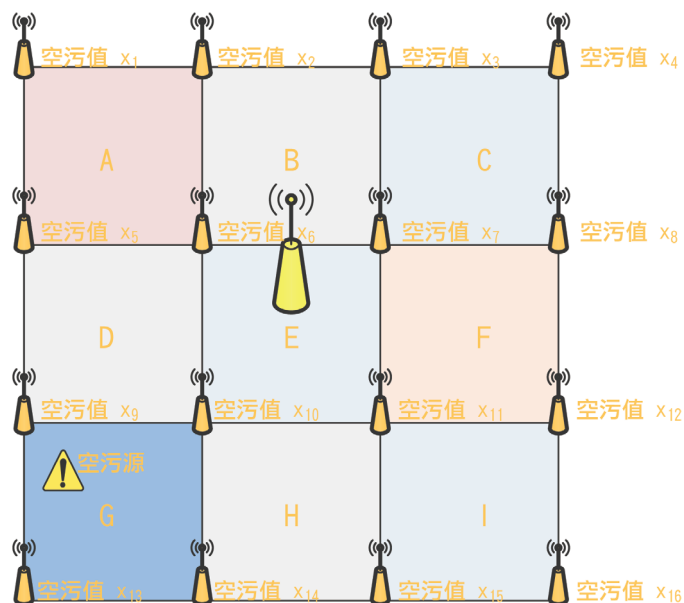


圖3 微型感測器物聯網概念

資料來源：南投埔里地區PM<sub>2.5</sub>監測系統及推動空氣污染防治志工制度計畫期末報告，2016。

物聯網系統運作的方式如圖4所示，微型感測器可以透過 Wi-Fi，將偵測到的環境資料即時傳回暨大計算機中心的雲端平台，並透過自行開發的感測運算伺服器與使用者伺服器，負責接收、管理與派送監測點即時資料，民眾可以透過團隊開發的「在地空氣品質即時地圖」網站與手機應用程式，連上伺服器取得即時資料，即時掌握空氣品質現況（戴榮賦 2016a）。

暨大 PM<sub>2.5</sub> 團隊在 2015 年上半年，以測試國際上各種空氣品質感測器為主要工作，測試研發的過程當中，定期與自救會進行討論會議，除了解說開發進度，討論雛形電路的效能，也邀請自救會共同參與煙箱實驗。在測試過數款微型感測器後，戴榮賦挑選其中幾款，向自救會說明不同感測器的特色與優缺點，共同討論實際需求，並依照設備準確度與成本因素等，共同決定未來使用的感測器。2015 年下半年，在硬體部分陸續著手設計電路圖、製作電路板、組裝雛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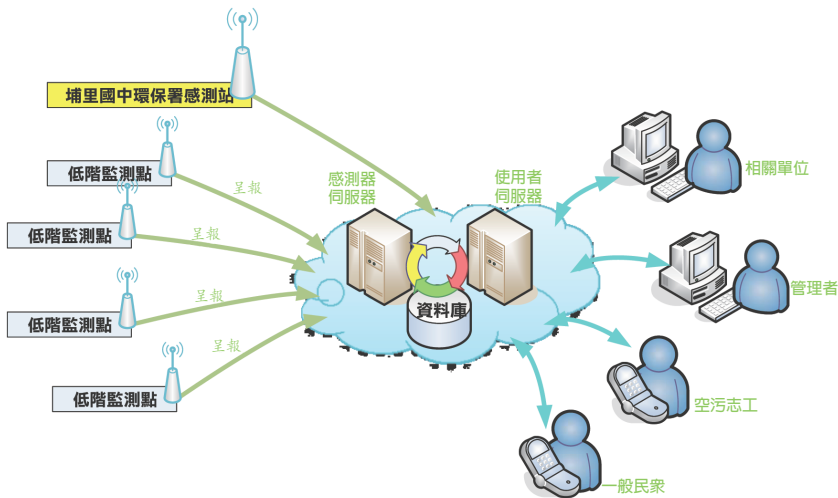


圖4 物聯網系統架構圖

資料來源：南投埔里地區PM<sub>2.5</sub>監測系統及推動空氣污染防治志工制度計畫期末報告，2016。

設備、測試穩定度、設計並製作外殼，以及設計實地安裝方式等；軟體部分，在與自救會的持續互動中，逐步了解民眾功能需求，陸續規畫開發雛形系統、測試系統穩定度。

### (三) 物聯網在埔里鎮的實際布建

當感測器的軟硬體進入研發測試的尾聲，為了發揮物聯網的成效，暨大人社中心、戴榮賦與自救會共同討論如何進行微型感測器的布建，經過多次討論歸納出下列原則：

1. 先以自救會成員的住家為主，讓志工隨時可以觀察與掌握住家周邊的空氣品質狀況，同時建立有興趣與意願固定觀察埔里鎮空氣品質狀況的基本網絡。
2. 為求更進一步了解不同的區域、高度、生活形態、污染來源等是否造成空

污數值的高低變化，討論與選定數間在地店家，並透過志工的人際網絡聯繫與接洽，確認是否具備電源與 Wi-Fi，再由戴榮賦與暨大資管系學生所組成的暨大 PM<sub>2.5</sub> 團隊前往現場檢查架設布建所需的環境並進行安裝。

3. 由於 PM<sub>2.5</sub> 會對健康造成影響，尤其對老人、小孩、孕婦與心血管疾病者的危害更為嚴重，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之下，考量到小學的地點在距離上較為平均分布，因此選擇埔里鎮 13 所國小優先布建微型感測器，由戴榮賦一一致電向各國小校長說明用意，爭取各校校長支持；校長們基於社區共好全數支持布建工作。暨大 PM<sub>2.5</sub> 團隊接著前往國小校園選擇合適地點，並與學校總務主任討論及確認設備安裝和架設環境等。
4. 透過人社中心向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埔里遊客中心說明物聯網概念，日管處基於社區共好，同意裝設微型感測器，藉此觀察從國道六號愛蘭交流下來途經台 14 線的車輛流量，是否對空氣品質造成相關影響。

最後於埔里鎮共安裝 33 個微型感測器監測點（圖 5），依據裝設地點的特性可分為四大類，分別是學校、民衆、店家與政府機關。監測點如下：

1. 學校（16 個）：太平國小、史港國小、水尾國小、忠孝國小、中峰國小、麒麟國小、南光國小、埔里國小、育英國小、溪南國小、大成國小、愛蘭國小、桃源國小、暨南大學、暨大附中（中廊）、暨大附中（側門）。
2. 民衆（11 個）：自救會 1（南安路教會）、自救會 2（陽明大樓）、自救會 3（福興 01）、自救會 5（北梅社區）、自救會 6（梅林六街）、自救會 7（福興 02）、自救會 8（愛華街）、自救會 9（南安路）、自救會 10（虎耳七街）、北門加油站旁、蒙愛教會。
3. 店家（5 個）：虎嘯山莊、阿里婆、加賀屋、籃城書房、山里好巷書店。
4. 政府機關（1 個）：埔里遊客中心（日管處埔里工作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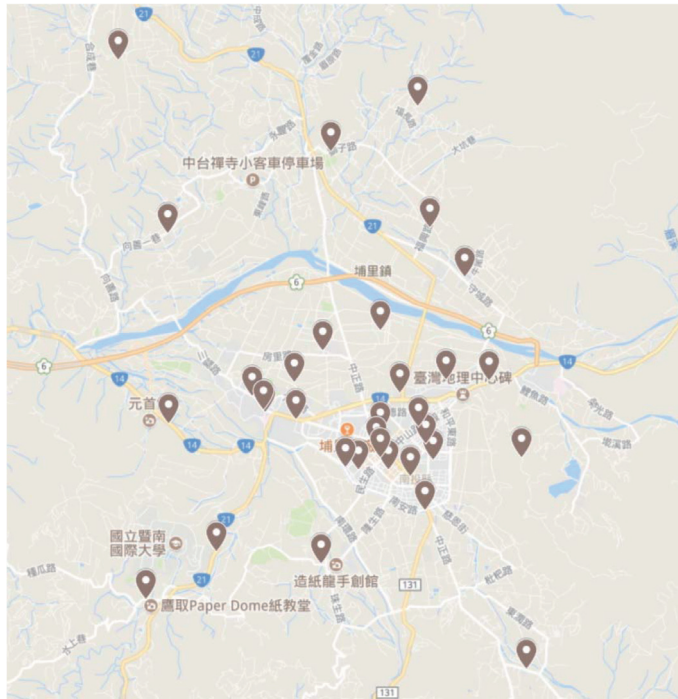


圖5 埔里鎮監測點地圖

#### (四) 建立跨縣市監測網

許多地區得知埔里開始布建微型感測器後，紛紛拜訪暨大希望給予協助。最後增加外縣市布建，包括南投縣、彰化縣、高雄市、雲林縣斗六市等，這四個地區經常是台灣  $PM_{2.5}$  污染嚴重的區域，當地民衆對空污議題的反應也最強烈，因此優先提供布建微型感測器，提醒民衆注意周邊情況，同時了解民衆對於微型感測器的反應。

目前已於全台灣共安裝164個微型感測器監測點（圖6），包括：南投縣66個、彰化縣45個、台中市25個、高雄市14個、雲林縣斗六市10個、新竹市4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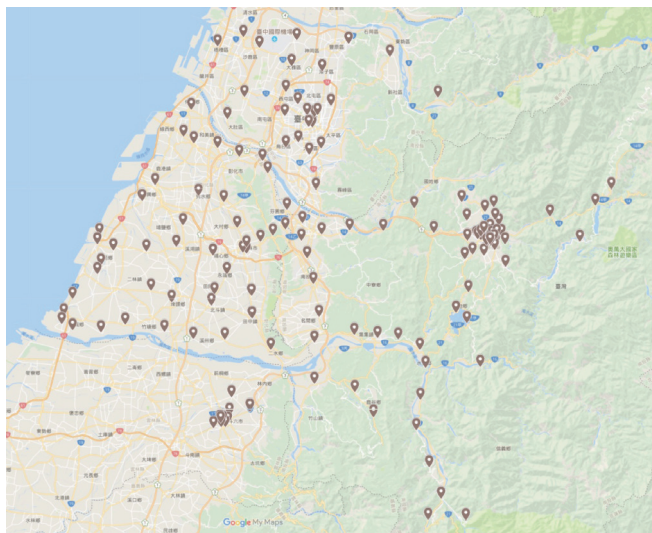


圖6 中台灣監測點地圖

隨著監測點布建完成，建立起橫跨彰化縣與南投縣的偵測系統，以使用更全面的角度觀察從彰化海邊、彰化平原、八卦山、南投平原、烏溪河谷、埔里盆地，到清境山區的在地空氣品質變化，藉此讓民衆清楚知道  $PM_{2.5}$  為外來或是本地產生。除此之外，也透過布建過程找尋各種可能的合作模式，包括：（1）南投縣：大埔里地區與埔里  $PM_{2.5}$  空污減量自救會、學校、店家和公家單位合作；南投縣其他鄉鎮則與南投縣環保局和教育處合作共同推動。（2）彰化縣：與彰化縣教育處合作，透過教育處溝通協商各國小，提供布建上的協助。（3）高雄市：與高雄市教育局合作，透過教育局溝通協商各國中小與高中，提供布建上的協助。（4）斗六市：與斗六市公所合作，由市公所出面協商各在地機構，並由公所清潔隊派員協助。

## （五）國內外的空氣品質物聯網案例

由戴榮賦從硬體到軟體獨立研發的「在地空氣品質即時地圖」物聯網，獲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肯定。2015年11月27日，環保署長親自帶領署內官員到暨南大學了解物聯網的運作，並且指定南投縣埔里鎮為全國首個空氣物聯網示範區。同時，此物聯網系統開發的理念成為環保署「空氣品質物聯網」政策的一環，並列為環保署整體監（檢）測類型當中的戶外微型感測系統。



圖7 環保署官員到暨南大學了解物聯網的運作

全球許多地方與城市都受到空氣污染的困擾。空氣污染的最大特性是，污染源可能出現在任何地方，以及空氣會快速帶著污染四處飄散。因此，運用物聯網的概念解決空污防制的問題是非常直接的想法，亦即，在特定區域內廣布監測點，形成綿密的監測網定位空污來源與追蹤空污飄散路徑。目前全球有許多地區正朝著這個方向努力，許多創新應用正在各地實驗，戴榮賦所規畫與實作的物聯網系統正處於此潮流下。「在地空氣品質即時地圖」物聯網系統，不論在起步的時間點與布建的規模上都緊跟著全球發展步調。此處介紹國外兩個城市的發展案例，由於各地相關應用正在發展階段，查到的資訊多為新聞報導與官網本身的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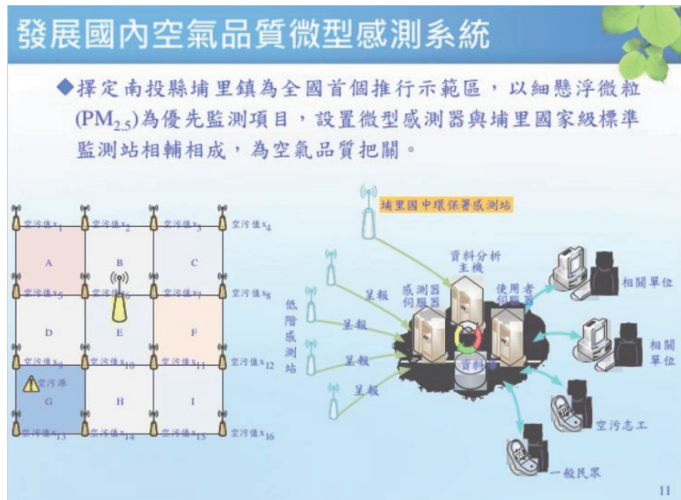


圖8 環保署發展國內空氣品質微型感測系統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官網，〈好空氣 齊努力〉，

<https://www.slideshare.net/epaslideshare/ss-56438921>。



圖9 空氣品質指標整體監(檢)測類型示意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保署空氣品質指標 (AQI) 宣導教材，〈整體監(檢)測類型示意圖〉，

<http://www.tnepb.gov.tw/upload/files/201707201728.pdf>。

## 1.芝加哥 Array of Things

芝加哥於2014年夏季開始布建監測點形成城市物聯網系統 Array of Things，<sup>4</sup> 這個系統由芝加哥市政府、芝加哥大學與 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等共同合作開發與布建。監測點架設在城市的路燈柱子上，2016年架設了46個監測點，預計到2018年可以達到500個監測點。<sup>5</sup> 此計畫分別投入3.1百萬美元與15萬美元的研發經費。2016年監測點可監測的資料包括：數種空氣品質指標、音量、光照、震動、溫度、濕度、氣壓、影像等（圖10）。芝加哥 Array of Things 的目標是，希望運用物聯網收集到的資料偵測出空污事件，長時間了解空污形態的變化，以及建立預測模型預測可能發生的空污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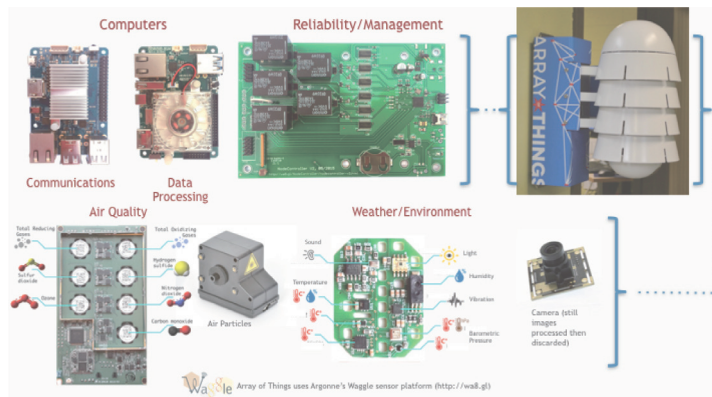


圖10 芝加哥 Array of Things 監測點的監測資料

資料來源：Array of Things 官網，”Current Sensor List”，<https://arrayofthings.github.io/node.html>。

<sup>4</sup> Array of Things 官網 <https://arrayofthings.github.io/index.html>。

<sup>5</sup> CNN 新聞報導 Array of Things，<http://money.cnn.com/2016/08/29/technology/chicago-sensors-data/index.html>；Array of Things 常見問題，<https://arrayofthings.github.io/faq.html>。

## 2.阿姆斯特丹Smart Citizen Kit

2014年3月阿姆斯特丹發表第一版感測裝置 Smart Citizen Kit，<sup>6</sup> 免費讓100位市民帶回家裝設，一起監測都市的環境狀況。<sup>7</sup> 感測裝置主要裝設在市民住家屋外的陽台或窗戶，能夠監測的資料包括：溫度、濕度、聲音、照度、CO與NO<sub>2</sub>等。<sup>8</sup> 裝置會將資料上傳到雲端平台，並呈現在網頁地圖上公開讓大眾查閱 (<https://smartcitizen.me/kits/>)。阿姆斯特丹 Smart Citizen Kit 的目標是，希望號召市民一起關心城市空氣品質，主動參與空氣品質偵測，同時了解空氣品質物聯網對社會的作用與影響。最終，希望能從智慧城市 (Smart Cities) 晉升為智慧公民 (Smart Citizens)。



圖 11 阿姆斯特丹 Smart Citizen Kit 外觀

資料來源：Smart Citizen Kit 官網，“About”，<https://smartcitizen.me/about>。

---

<sup>6</sup> 阿姆斯特丹 Smart Citizen Kit 官網，<https://smartcitizen.me/about>。

<sup>7</sup> 阿姆斯特丹第一版 Smart Citizen Kit 發布的新聞，Supporting decisions through data-collection，<https://amsterdamsmartcity.com/projects/smart-citizen-kit>；iThome 新聞，〈阿姆斯特丹發放免費 IoT 裝置，讓市民住家變身大資料感測器〉，<http://www.ithome.com.tw/news/97980>。

<sup>8</sup> 阿姆斯特丹 Smart Citizen Kit 硬體規格，<https://docs.smartcitizen.me/#/start/how-to-install-the-drivers-on-windows>。

王瑋彤、王瑞庚（2017）針對國內微型感測器物聯網系統進行調查，調查指出目前政府、產業、民間團體等投入感測器的發展。戴榮賦所建立的在地空氣品質即時地圖物聯網系統，其監測點可偵測  $PM_{2.5}$ 、 $PM_{10}$ 、溫度、濕度與照度；布建範圍以暨南大學所在地南投縣埔里鎮為主，向外擴建至中台灣地區，包括台中市、彰化縣、雲林縣斗六市等地。建置此物聯網的初衷是關心環境永續議題，以科技回應在地需求、支援地方團體。目標是引發民衆共同關心短時間、近距離、高濃度的社區型污染源，期盼以社會創新的方式解決環境問題，同時落實大學社會責任，關心在地環境與民衆健康。此系統與其他感測器的異同之處，請參見王瑋彤、王瑞庚（2017）之表1。

### 三、研究發現與系統成效

#### （一）地方民衆參與公民科學

暨大人社中心於2015年初參與自救會，過程中發現自救會志工希望了解住家周邊空氣品質，遂將需求帶回校內，後由戴榮賦以個人專長研發微型感測器與物聯網系統。2015年5月25日，戴榮賦邀請自救會志工參與煙箱實驗，觀察不同感測器的變化，自救會志工主動觀察數值曲線的變化，討論感測器的敏銳度與穩定度。藉由本次實驗與交流過程，釐清並確認自救會志工重視感測器數值穩定性勝過於數值敏銳度。6月29日，戴榮賦於自救會志工會議分享感測器測試情況、分析不同感測器的優劣，由自救會志工評估需求後挑選數值穩定度較高的感測器。7月20日，戴榮賦完成感測器電路組裝與手機應用程式的第一版使用說明，並詢問自救會志工是否需要透過函數轉換，將感測器數值校正與環保署數值一致。自救會志工認為反映住家周邊的即時數值是微型感測器的價值所在，數值不需再校正，依此決議，戴榮賦維持感測器測得的原始數值。

10月上旬，暨大  $PM_{2.5}$  團隊開始於埔里鎮布點，第一階段於自救會志工家

中安裝。11月27日，環保署魏國彥署長蒞臨暨大PM<sub>2.5</sub>微型感測器研發成果發表會，戴榮賦說明系統於埔里的布建情況，自救會志工積極與會了解設備研發結果。12月9日，自救會志工開會討論感測器布建地點，除了現有志工住家外，考量地理區位、地勢高低、特殊污染來源、鎮民主動安裝意願等諸多因素，最後提出20個適合安裝的地點，並主動接洽各地點的聯絡窗口，說明來意及告知安裝條件，主動完成安裝前的前置溝通作業。安裝條件包括：(1) 設置地點以能遮風避雨的戶外空間為主（如，陽台、窗台），且需具備電源插座、網路孔，並可接收一定強度的Wi-Fi訊號。(2) 需自備電源、Wi-Fi無線網路。(3) 需自付電費，每年電費約108元左右。之後再由暨大PM<sub>2.5</sub>團隊致電民眾確認安裝細節，並通知各地點聯絡窗口尋找合適安裝場地。安裝當日，暨大PM<sub>2.5</sub>團隊與民眾到選定的地點評估和討論，確認無誤後才進行安裝。安裝後，自救會志工主動觀察數值與住家周邊環境的變化，觀察各地點間數值的差異以及可能的原因，並於Facebook志工群組中分享使用經驗、交流觀察心得，以及提出軟硬體使用問題與需求，例如，進氣口加裝紗網避免蚊蟲飛入，感測器加上燈號顯示目前空氣品質現況等。志工群組的討論，不僅提供暨大PM<sub>2.5</sub>團隊在設備研發過程上實用的改良建議，同時也建立起學校與民間團體的線上討論機制，藉此觀察民眾的對話方式及參與現象（請參考附錄1至附錄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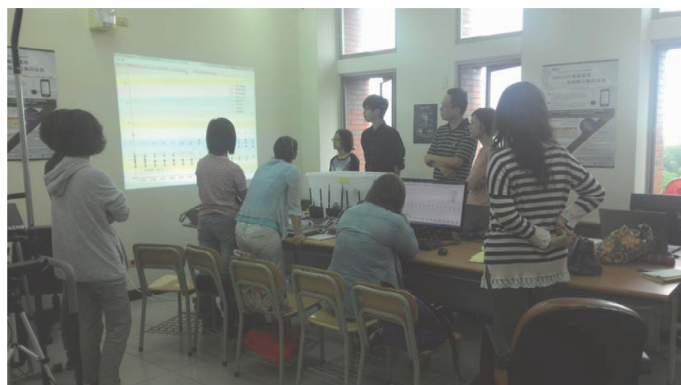


圖 12 戴榮賦與自救會志工進行煙箱實驗



圖 13 自救會志工挑選感測器會議



圖 14 自救會志工評估數值校正會議



圖 15 暨大 PM<sub>2.5</sub> 微型感測器研發成果發表會



Alan Irwin (1995) 的公民科學著作，提到在地群眾介入科學知識的開發過程。根據埔里經驗，微型感測器的誕生始於在地民衆的需求，促使專業者根據民衆需求研發技術物，開發過程中民衆主動關心、拋出需求的態度，引發專業者主動回報進度、邀請測試實驗並參與重大決策。研發與布建過程，雙方以積極的態度互動，共同推動感測器的研發與安裝速度。群眾不是被動的技術物「接收者」，而是「主動地」、「積極地」介入技術物的發展與設計，甚至衍生出屬於在地的科學知識。一般來說，在地群眾介入空氣污染防治的過程中，最主要的障礙是民衆的空污意識薄弱。暨大人社中心、PM<sub>2.5</sub> 團隊與自救會志工針對微型感測器的推動，於2016年辦理「南投地區空氣污染防治創客工作坊」，2017年辦理「竹山地區好空氣志工社群招募暨培力設計工作坊」、「PM<sub>2.5</sub> 微型感測器大數據分析工作坊」、「尋找霾哥——行動式 PM<sub>2.5</sub> 微型感測器與環境教育踏查活動」等。透過上述活動，將感測器結合創客動手做、大數據分析、環境踏查等概念，吸引民衆參與和使用感測器關心空氣品質。除了傳達自我防護的觀念，更重要的是開啓個人空污減量行動。PM<sub>2.5</sub> 團隊歷年舉辦活動，時常面臨招生困難、活動結束後無後續行動等問題，探究可能的原因是民衆對於空氣污染無感，相較於其他容易透過知覺感受的污染，PM<sub>2.5</sub> 無色無味，而且除了敏感族群之外，對一般人的健康沒有立即影響，民衆可能因此忽略其嚴重性。

在地民衆和技術物開發者之間的互動困難，主要是民衆對於技術物抱持錯誤期待，例如，認為透過技術物即可有效解決空污問題，可以立即改善住家周邊的露天燃燒問題。技術物的目的在於呈現科學數值，供民衆參考與掌握住家周邊的空氣品質。當數值升高時，除了加強自我防護保護健康外，更重要的是找出污染來源並做出因應行動，例如，拍下污染事實，向行為人勸說，或者打電話通知稽查人員等。技術物唯有透過民衆正確與持續地使用，才能順利發揮與彰顯價值。

暨大人社中心、PM<sub>2.5</sub> 團隊與自救會志工於2015年開始到各級學校、機關單位、大型活動等，進行 PM<sub>2.5</sub> 空污宣導，藉此提醒民衆留意短時間、近距離、高濃度的社區型污染源。宣導場域除了埔里鎮之外，更逐漸向外擴張到南投縣其

他鄉鎮，至2017年底初估完成一百個場次、一萬人次的宣導。透過宣導傳遞訊息，傾聽民衆意見與溝通觀念，團隊從中觀察與發現在地民衆不參與空氣污染防治過程的主要因素為成見障礙。例如，大部分的民衆認為埔里鎮和南投縣的污染主因，來自外縣市大工廠造成的境外污染，認為解決之道在於管制大工廠、大煙囪，這樣的立場與前述所提及的提倡社區型污染源的訴求截然不同。即使重視境外污染與境內污染沒有衝突，但是當民衆認為污染製造者是他人，未曾意識或不願意識到自己也是污染製造者的時候，就是把自己放到受害者的位置，放棄主宰環境的主導權，漠視可以為環境而戰的問題解決能力。如果民衆意識到自己也是問題製造者，那麼個人能力將重新被賦予。當每個人都能發揮問題解決者的精神，空污問題將不再只是民衆對政府、對企業、對某個特定對象的期待，而將轉化成一股微小而深遠的行動力，最終能改變社會與環境。

## （二）生活周邊的觀察

微型感測器與物聯網布建完成後，暨大人社中心、PM<sub>2.5</sub> 團隊與自救會志工利用物聯網的資訊，在線上進行各種討論，共同解讀 PM<sub>2.5</sub> 數值所隱含的訊息，推敲可能造成空污品質不良的原因。透過微型感測器的布建與數值呈現，不僅更了解住家周邊的空氣品質，同時也能深入觀察和發現埔里地區的社區型污染源。

### 1.埔里鎮中元普渡

2016年8月17日是一年一度的中元普渡。觀察埔里鎮上各 PM<sub>2.5</sub> 監測點傳回的數值發現，當日一早至中午12點，埔里鎮空氣品質都在正常範圍（中午12點時 PM<sub>2.5</sub> 小時平均濃度普遍在 15 $\mu\text{g}/\text{m}^3$  以下），但下午1點過後，各監測點 PM<sub>2.5</sub> 濃度急速升高，下午3點左右達到高峰，最高甚至達小時平均濃度 70 $\mu\text{g}/\text{m}^3$ （圖16），濃度升高達4倍以上，平均分鐘濃度高達 200 $\mu\text{g}/\text{m}^3$  以上。當天下午5點左右，戴榮賦與幾位志工發現埔里某一監測點的數值飆升，最高數值是平均分

鐘濃度達 $1,068\mu\text{g}/\text{m}^3$  (圖17)，戴榮賦致電該監測點詢問，得知原來是隔壁鄰居在燒紙錢。觀察到此一現象，戴榮賦 (2016b) 撰寫社論投稿《蘋果日報》(2016年8月18日)，呼籲民衆在誠心普渡的同時，別忘了自身與鄰居健康，減少金紙使用量以及將金紙集中到指定的環保香爐燃燒 (參考附錄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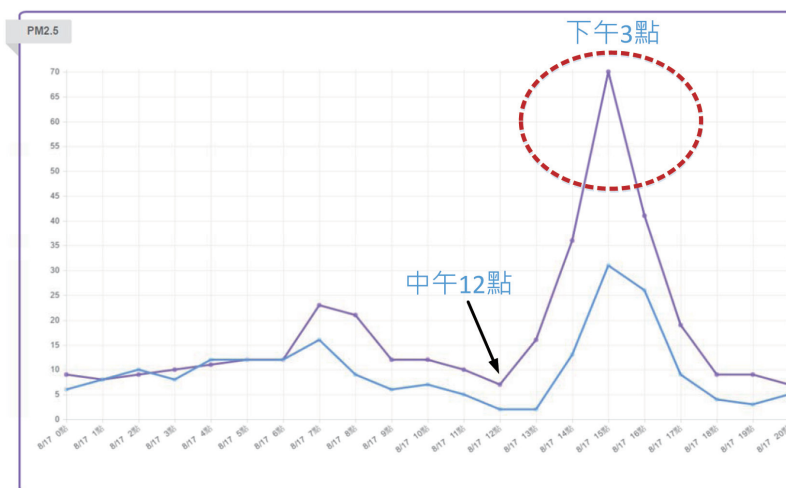


圖 16 埔里鎮 2016 年 8 月 17 日  $\text{PM}_{2.5}$  小時平均濃度變化

資料來源：<http://www.airq.org.tw/Home/Record>。

說明：紫線與藍線各代表一個監測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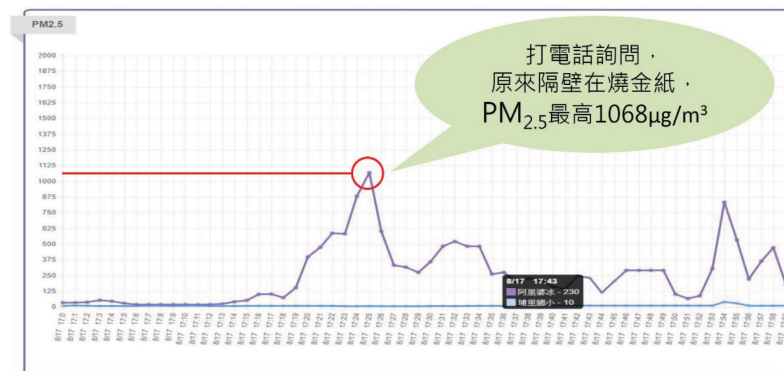


圖 17 埔里鎮 2016 年 8 月 17 日  $\text{PM}_{2.5}$  分鐘平均濃度變化

資料來源：<http://www.airq.org.tw/Home/Record>。

說明：紫線與藍線各代表一個監測點。

## 2. 埔里鎮某國小

2016年10月中旬，自救會志工陸續發現近日埔里鎮某國小監測點數值經常飆到數百甚至破千（圖18）。暨大人社中心、PM<sub>2.5</sub>團隊與自救會志工討論可能的原因，包括：（1）國小附近大部分為茭白筍田，近期正值茭白筍挖根重種，農民有可能將農業廢棄物燃燒處理。（2）國小附近有禮儀社，殯葬儀式若非自家辦理，可能委託禮儀社辦理，便會燒較多金紙。最後由自救會志工連絡某國小校長，請其協助了解。這位國小校長初步猜測數值飆高的原因應該是露天焚燒，因為近日有人整地和鋸樹。這個事件後續透過該國小的替代役觀察得知是美勞老師在燒陶，製陶過程有報紙在裡面悶燒，造成濃煙瀰漫，導致數值飆高（參考附錄2）。



圖 18 埔里鎮某國小 PM<sub>2.5</sub> 數值異常飆高

### 3. 埔里鎮獅子頭

仁愛鄉南豐村往埔里鎮市區路上有兩個監測點，暨大人社中心、PM<sub>2.5</sub> 團隊與自救會志工觀察微型感測器的數值，發現南豐派出所附近的 PM<sub>2.5</sub> 數值經常低於靠近埔里市區邊緣的中峰國小 PM<sub>2.5</sub> 數值。原先推測是否為地形因素，經過長期持續觀察與討論，發現關鍵的分隔點在埔里鎮獅子頭（地名）附近。從霧社下來過獅子頭以後的河谷為收束與轉折地形，此處是從霧社下來的最後一個明隧道，隧道前後的溫度與風有明顯差異。除了些微氣候的變化，身體也會開始出現眼睛癢和過敏反應（參考附錄3）。



圖 19 從霧社下來過獅子頭以後的河谷為收束與轉折地形



圖 20 仁愛鄉南豐與埔里鎮中峰國小之間的關鍵分隔點——埔里鎮獅子頭

### （三）大區域的變化

除了掌握生活近處的社區型污染源，暨大  $PM_{2.5}$  團隊透過將微型感測器設置在分布較平均的小學，同時沿著河谷、地形、道路，從沿海布建到內陸，嘗試觀察與歸納大區域的地理條件、氣候因素、大氣流動等，對於空污數值的變化與影響。

#### 1. 埔里與霧社、清境的相關性

將埔里鎮上的埔里國小、霧社的仁愛國小與清境國小進行比對。埔里國小到仁愛國小的直線距離約 18 公里，而仁愛國小與清境國小約 7 公里。埔里國小在埔里盆地中心，而另外兩校則在山區。團隊根據收集到的  $PM_{2.5}$  數值進行分析，埔里國小與清境國小之間相關係數為 0.715，埔里國小與仁愛國小的相關係數為 0.750，而清境國小與仁愛國小的相關係數則為 0.938。上述分析明顯呈現清境國小與仁愛國小屬於同一空氣品質區域，埔里國小則離兩校較遠。雖然如此，埔里國小與清境國小之間的變化連動性卻偏高。如果埔里與霧社清境連動性高，霧社清境地區是否能倚仗高海拔的優勢，而置身於  $PM_{2.5}$  的危害之外？另外，如果霧社清境這些高海拔地區（分別為 1,100 公尺與 1,500 公尺左右）都受影響，南投縣其他偏遠地方是否能倖免於空污問題？這些問題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以確認  $PM_{2.5}$  氾濫的邊界（戴榮賦 2016a：29）。

#### 2. 九份二山

2016 年 10 月 19 至 20 日，埔里盆地的  $PM_{2.5}$  出現明顯的邊界移動現象。參見圖 22-1 的綜覽圖，10 月 19 日 22 時 38 分，乾淨的空氣推展到「位置 1」，10 月 20 日 11 時 25 分，乾淨的空氣推展到「位置 2」，10 月 20 日 13 時 17 分，乾淨的空氣推展到「位置 3」，10 月 20 日 16 時 07 分，乾淨的空氣推展到「位置 4」。在「位置 1」時，緊鄰的兩點南豐社區與中峰國小之間， $PM_{2.5}$  的濃度數值有極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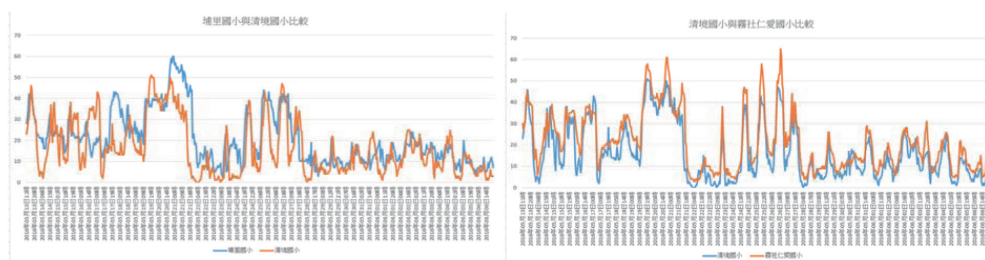


圖 21 三所國小 PM<sub>2.5</sub> 數值比較

落差，分別為1與38（圖 22-2）。在「位置2」時，埔里盆地已經全面變成0，但緊鄰的育樂國小數值仍然為114（圖 22-3）。在「位置3」時，緊鄰的育樂國小社區與雙冬國小之間，數值有極大的落差，分別為0與67（圖 22-4、圖 22-5），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陳有蘭溪沿線。在「位置4」時，不論是烏溪河谷或陳有蘭溪內，乾淨的空氣又往前推進了一步（圖 22-6）。

2016年10月20日當天，自救會於群組中根據上述現象進行討論。自救會成員觀察到埔里地表出現焚風，地面植物的葉子凋萎；高空的雲靜止但地面的風大到無法騎腳踏車的程度。此外，也觀察到從台中回埔里的路途，經過國姓第一隧道時，隧道前的景色一片灰濛濛，出隧道後則豁然開朗。自救會歸納認為，從九份二山連線到集集大山是 PM<sub>2.5</sub> 擴散的一個重要分界，既擋住外來的 PM<sub>2.5</sub>，同時也阻礙埔里盆地向外擴散 PM<sub>2.5</sub>（圖 22-7、圖 22-8）（戴榮賦 2016a：31）（參考附錄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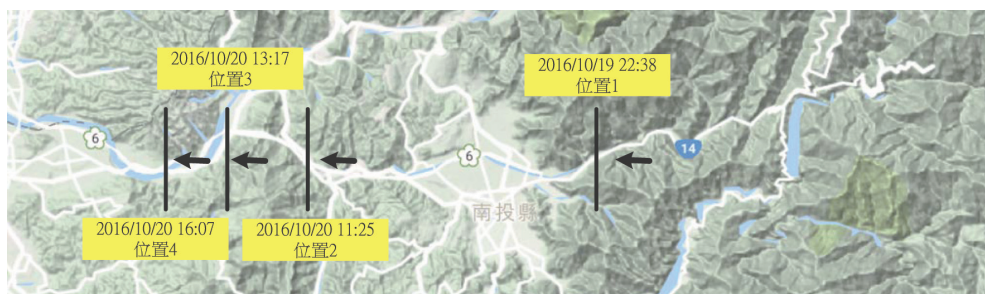


圖 22-1 邊界移動現象綜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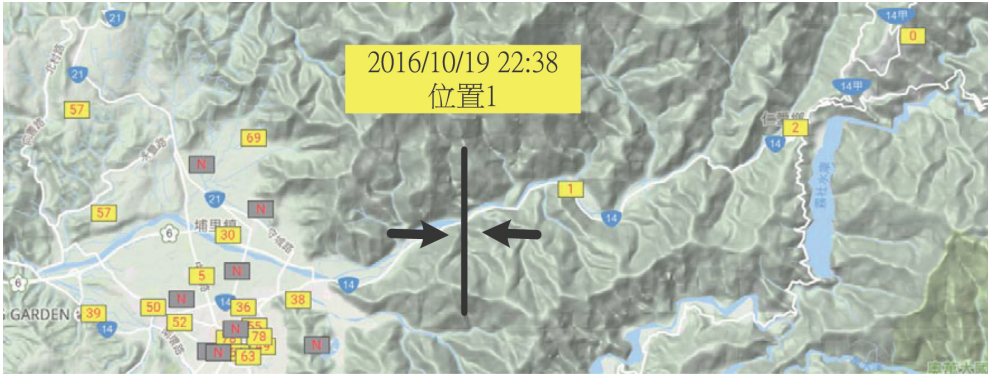


圖 22-2 邊界在「位置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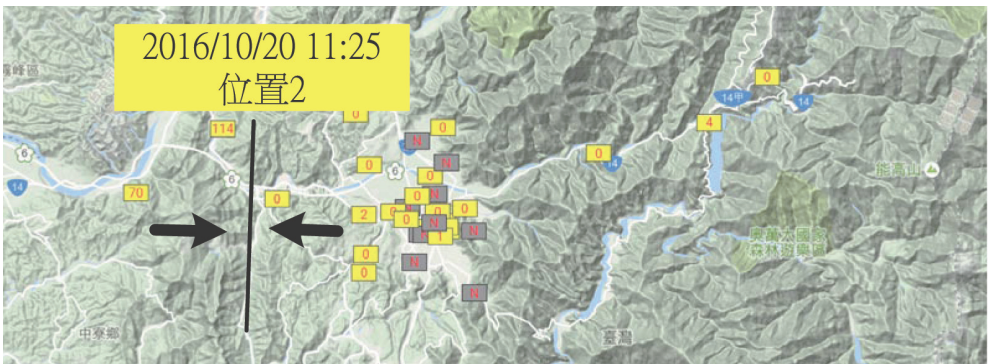


圖 22-3 邊界在「位置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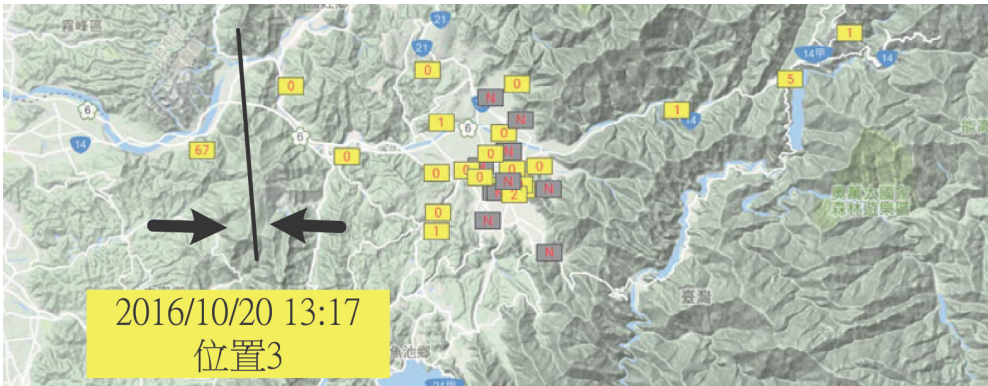


圖 22-4 邊界在「位置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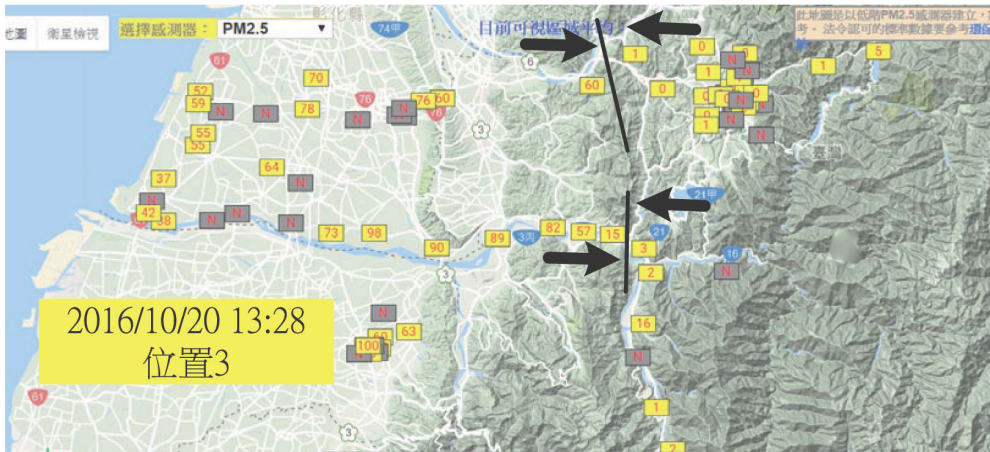


圖 22-5 邊界在「位置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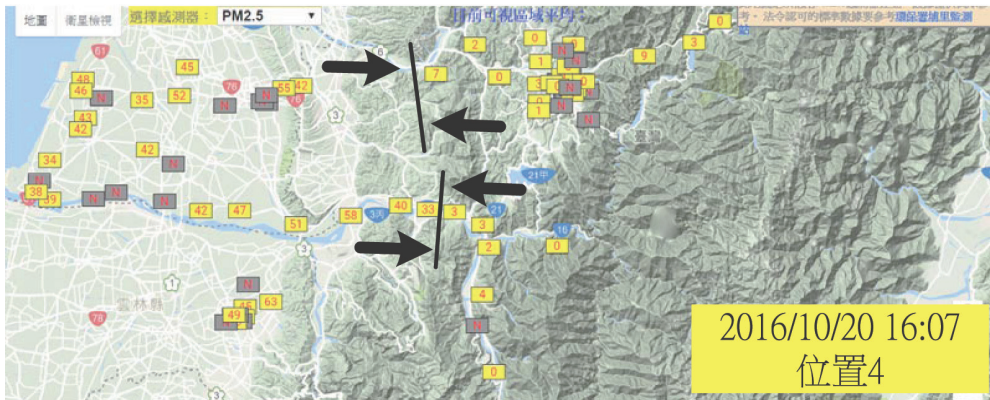


圖 22-6 邊界在「位置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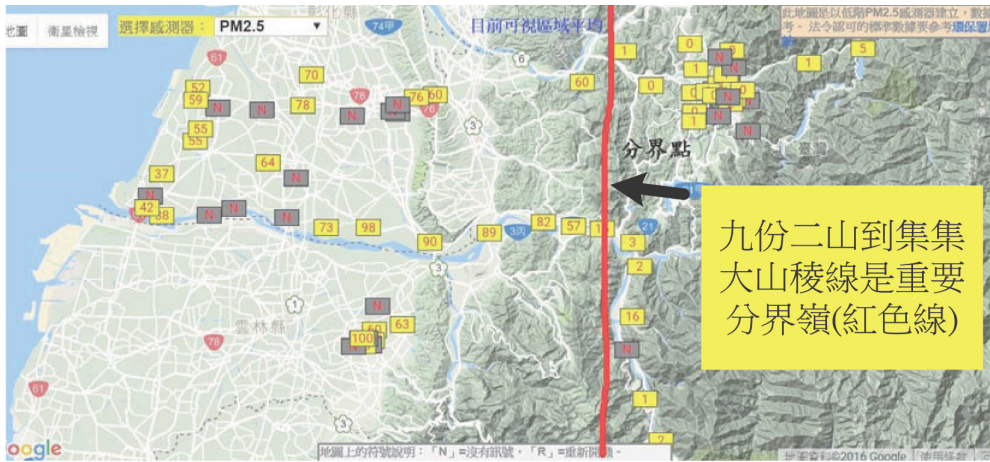


圖 22-7 九份二山到集集大山稜線是重要分界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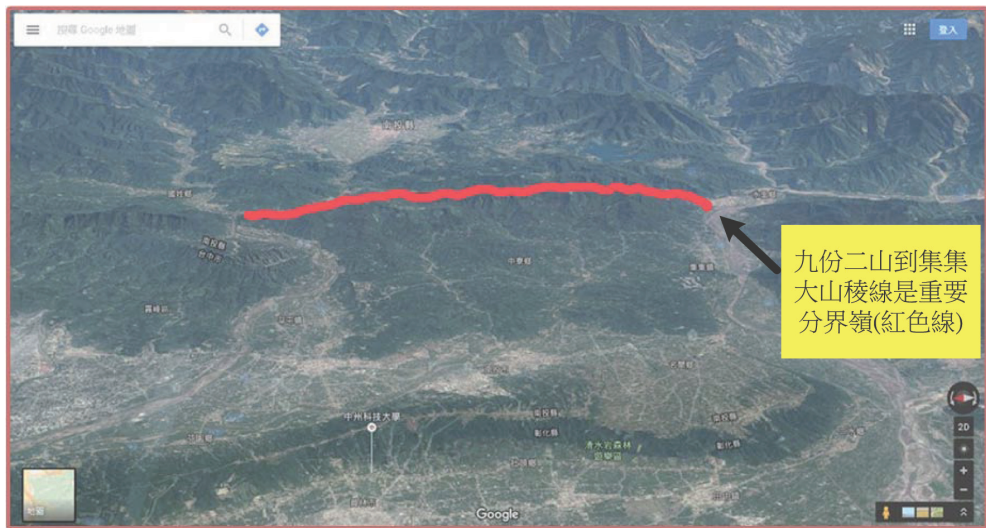


圖 22-8 九份二山到集集大山稜線是重要分界嶺

## 四、結論

暨大人社中心與 PM<sub>2.5</sub> 團隊將研發 PM<sub>2.5</sub> 微型感測器物聯網作為解決在地問題的方法之一，回應民衆想了解生活周邊空氣品質的需求。然而，感測器的布建不僅是硬體設備的安裝，更重要的是，透過感測器的數值呈現，能發現潛藏的社區型污染源。以硬體設備結合志工人力，才能有效將微型感測器的被動式監測功能，轉化為降低社區型污染源的主動式實際行動。透過科學工具觸發公民共同行動，需要長時間培養民衆養成關心每日空氣品質、觀察住家周邊環境的習慣。除此之外，透過物聯網系統地蒐集空污數值資料，還需要借助當地民衆的在地知識與經驗，共同找出可能的解答。這些在地知識與經驗包括：

一、記錄聞到異味或觀察到空污現象的位置與時間，甚至是身體過敏的時間點，藉此觀察空污事件的發生頻率與地理區位。

二、觀察周邊環境設施、回顧過去曾經發生的事件等，藉此分析空污數值高低的可能原因。

三、地理環境、大氣資料、鄰近的工廠設施與人為活動、歷史新聞、檢舉紀錄等，都仰賴當地民衆長期的觀察與記錄。

本文透過 PM<sub>2.5</sub> 微型感測器的數值資料，搭配民衆對家鄉山川人文的知識以及日常生活的觀察，分析環境中影響 PM<sub>2.5</sub> 數值變化的特性，並藉由這種公民參與科學、共同找出問題的方式，培養民衆一起關心空氣品質、觀察環境污染源的習慣，除了基本自我防護的防守策略，也鼓勵民衆共同思考自我減量與污染源改善策略，以早日達成空污減量的目標。

## 附錄1 埔里鎮中元普渡案例線上討論重點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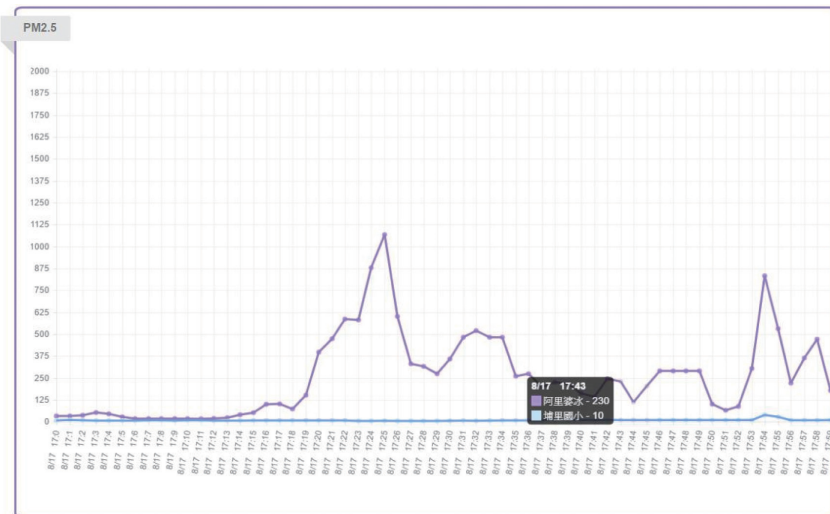
1. 日期：2016年8月17日
2. 時間：18:55～21:09
3. 地點：自救會於 Facebook 上的討論群組
4. 討論內容：

G：今天下午這場雨下得真好。我拿著監測器路過燒紙錢的爐子數據紫爆，車子到某店家前，他們正在燒紙錢，把監測器拿給老闆，PM<sub>2.5</sub> 數據 61，他說因為站在風頭，數據低一些，問他為什麼還燒呢？他說等不到清潔隊的車。我說你應該要拿去鎮公所啊，老闆一臉莫名，他以為（清潔隊）會到家門口收（金紙集中燒）。

C：我家今年沒燒，本來出門前還擔心婆婆偷偷跑去買來燒，果然孫子在家，阿嬤會節制一下。今天在外面聞到煙味整整兩小時頭還在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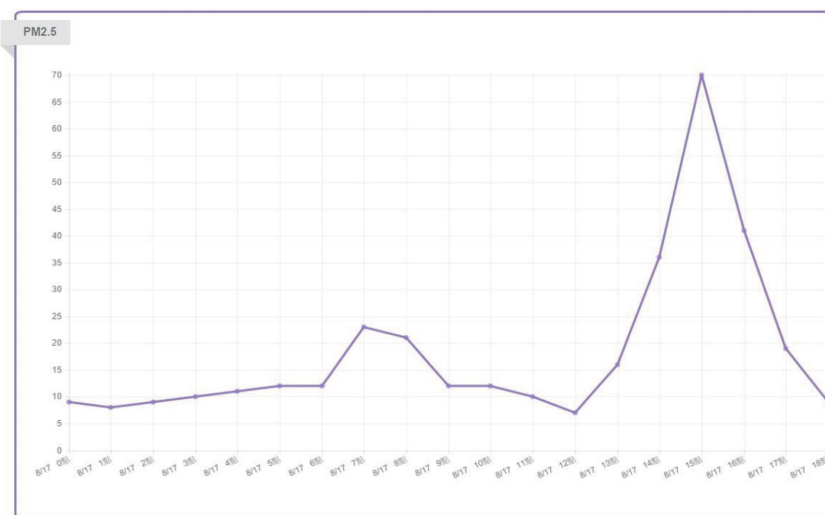
Y：彰化市大街小巷都在燒。

D：打電話去問某店家 A，原來隔壁在燒金，PM<sub>2.5</sub> 最高 1068（附圖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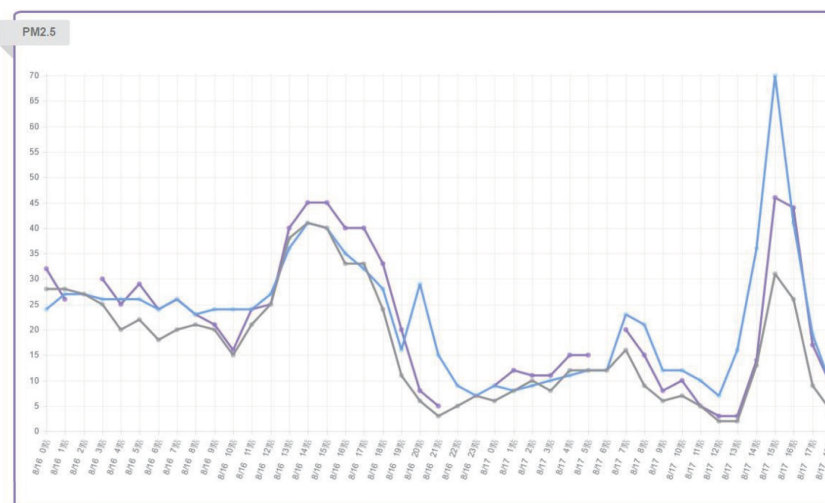
附圖 1-1 2016 年中元普渡某店家 A 的 PM<sub>2.5</sub> 數值

D：某店家 B 的  $PM_{2.5}$  數值於 15:00 最高，高到 200 多（附圖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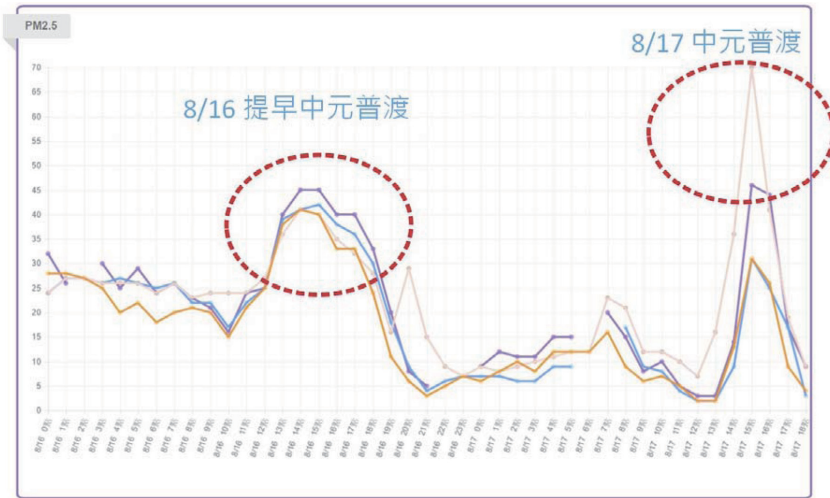


附圖 1-2 2016 年中元普渡某店家 B 的  $PM_{2.5}$  數值

D：今天各點的高點似乎都出現在三點左右，看來拜拜時辰很一致。另外，應該昨天下午就在拜拜了（附圖 1-3、附圖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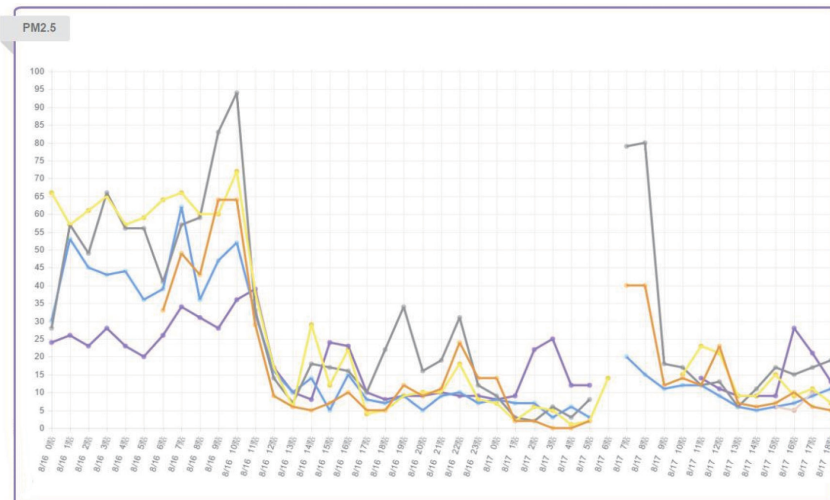
附圖 1-3 2016 年中元普渡埔里鎮部分監測點的數值變化



附圖 1-4 2016 年中元普渡埔里鎮部分監測點的數值變化

C：我出門時是兩點，那時大家剛擺供品，的確會在三點左右燒紙錢。D 說的對，昨天我出門就看到有幾戶人家在燒。

D：斗六的拜拜跟我們埔里好像不大一樣，無法確定斗六何時是燒金紙高峰（附圖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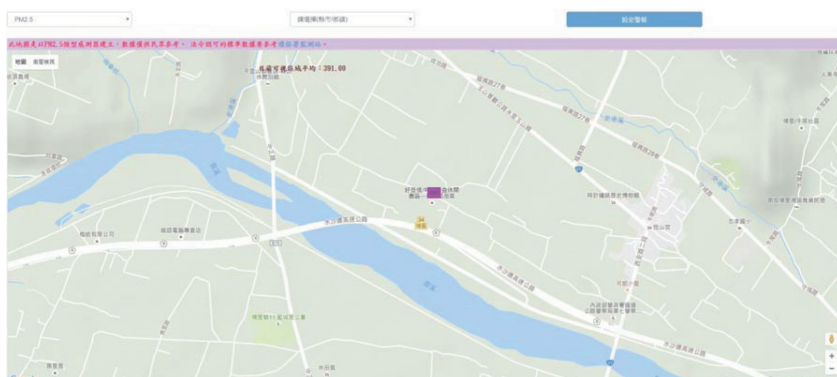


附圖 1-5 2016 年中元普渡斗六鎮部分監測點的數值變化

## 附錄2 埔里鎮某國小案例線上討論重點摘要

1. 日期：2016年10月17日～10月20日
2. 時間：21:34～13:20
3. 地點：自救會於Facebook上的討論群組
4. 討論內容：

L：某國小  $PM_{2.5}=391$



附圖2-1 2016年10月17日某國小  $PM_{2.5}$  數值

C：有人燒東西？那附近很多筊白筍田，現在應該是進入燒的旺季了

D：現在600多，前幾天晚上也有看到

C：可惜附近沒有人可馬上詢問狀況或原因

H：po到「埔里人通通加進來」問問看，會有用嗎？

L：應該是燒田吧，現在筍子收完了

G：某國小有回報？某教會在附近，若需要可請兄弟姐妹幫忙。

G：剛聯絡上某國小校長，他說明天當柯南去找蛛絲馬跡，再回報，初步猜測應是焚燒，這幾天有人在整理農地，鋸樹，也許會再給我們替代役的聯絡電話。

J：同事詢問家人討論出某國小前幾天數值飆高的可能原因：1. 最近茭白筍正挖根重種，可能會燒田。2. 某國小附近有禮儀社，假如沒有在自家辦可能會委託禮儀社辦，會燒很多金紙。

G：回報，昨天某國小校長去研習，打電話問替代役，替代役說當天晚上沒有發現異狀，結果是美勞老師燒陶，陶製作過程有報紙在裡面，所以整個煙瀰漫，以致數值飆超級高。校長說他的電話號碼留我這，有事聯絡他，他會盡力協助。



### 附錄3 埔里鎮獅子頭案例線上討論重點摘要

1. 日期：2017年1月20日
2. 時間：09:28～13:15
3. 地點：自救會於 Facebook 上的討論群組
4. 討論內容：

D：南豐到中鋒國小的關鍵分隔點在哪？

W：是呀，那個點經常性的高！透過微型感測器數值經常可以觀察到，埔里盆地周圍的數據略高於盆地中間的分布狀態，一般來說以地形河谷約在獅子頭，獅子頭過去河谷有個收束跟轉折，那裡有一個明隧道，從霧社下來的最後一個明隧道，過了隧道常可以感覺到隧道前後的溫度與風等等氣候上的微差異。

L：有客人住在仁愛說：「每次下山過了獅子頭，就開始眼睛癢、過敏」。

## 附錄4 九份二山案例線上討論重點摘要

1. 日期：2016年10月20日（海馬颱風）
2. 時間：10:57～15:31
3. 地點：自救會於 Facebook 上的討論群組
4. 討論內容：

C：我老公剛從台中開會回來，他說往台中出了第三隧道，能見度不到一公尺。回埔里時，過了第一隧道，眼前就是藍天。這次埔里又像有防護罩。他竟然可以跟我提一個很特別的理論，來猜看看什麼定律？

L：早上埔里風很大，超大。現在是在焚風嗎？很熱，植物都軟了。

C：風大，但台中、南投、竹山卻依然高污染。這點很怪吧，只有埔里是好的，草屯沒測站，不然也是紫爆才對。對，一早就焚風了。

L：濁水溪線滿慘的，是不是風大揚塵？

C：若  $PM_{10}$  也很高，是有可能。埔里真的相對好很多。

C：我老公說了白努力定律，我第一次聽到把污染物吸走的理論。不過還是要再想想，埔里的地形和氣流，這個之前 W 應該有個圖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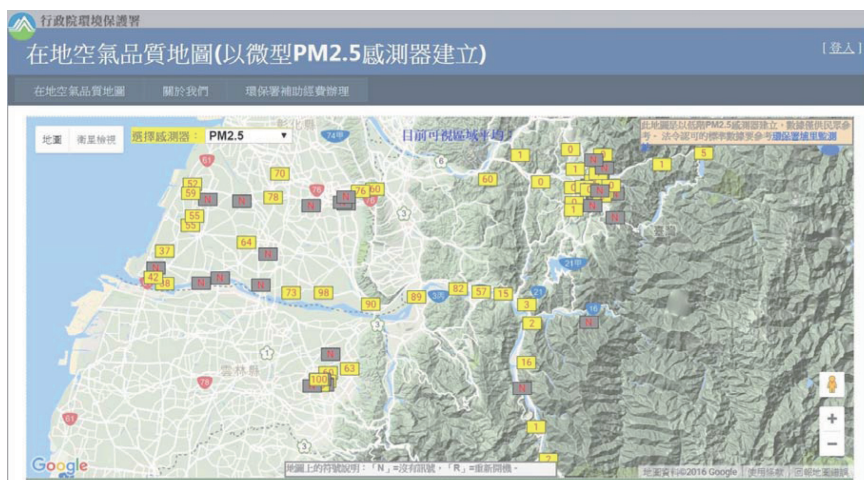
D：今天吹東風。現在 0 的位置移到育樂國小了。剛剛育樂國小還有 100 多，好有趣的現象。昨天晚上，0 的位置出現在南豐那邊。目前，陳有蘭溪那邊也有類似的情況（附圖 4-1）。

H：每次颱風就是這樣。翻過中央山脈來的風，焚風+東風，徹底把髒東西洗刷乾淨。希望可以力道強一點，一路吹到海岸邊。

C：D 的截圖有沒有發現，兩條線在同一個點就突然變好了？

D：我有發現，好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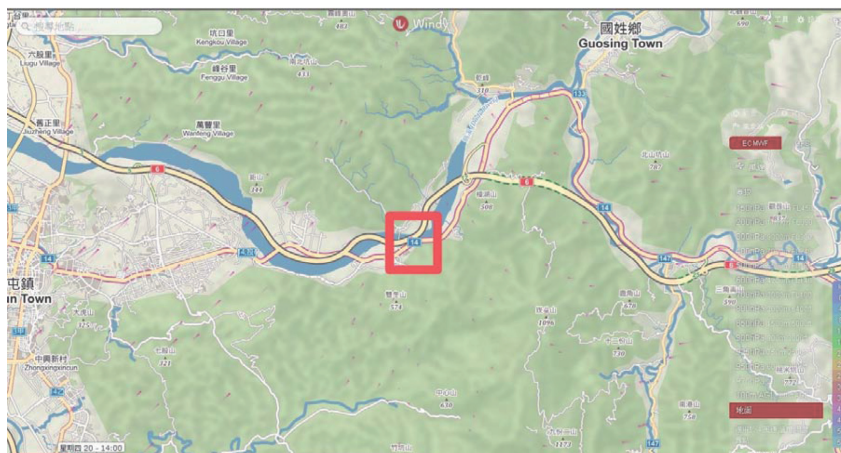
C：那位置是在觀音隧道嗎？若是，就和我老公今天中午觀察的是一致的。那是否可猜測觀音山阻擋西部污染物，加上今天東風往外吹，甚至可說是風在盆地上方吹過，堆積的污染物被帶至上空，所以埔里的空氣相對乾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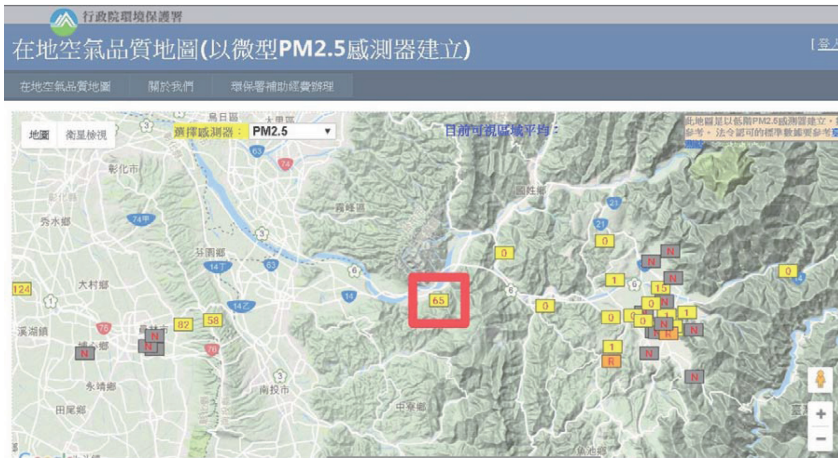
附圖4-1 2016年10月20日海馬颱風來襲時的PM<sub>2.5</sub>分布現象

W：今天高空的雲都沒有動，地表的風大到騎腳踏車會倒。如果有焚風，那風一定是爬過山之後衝下來，那就是往西邊吹。焚風好了空氣、壞了植物。

W：這兩張圖（附圖4-2、附圖4-3）對起來看有點意思。草屯的風往國姓吹，埔里的風往國姓吹。雙冬是今天的交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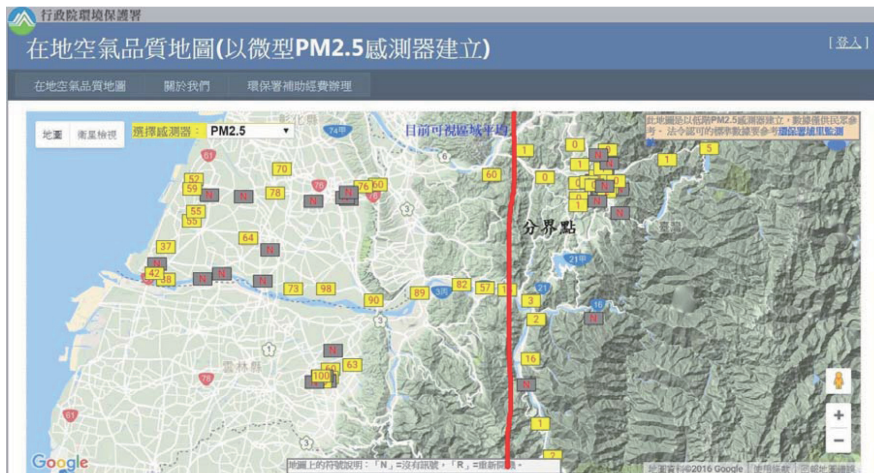


附圖4-2 草屯國姓與埔里地區的風向圖



附圖 4-3 雙冬地區為 PM<sub>2.5</sub> 高低變化的交界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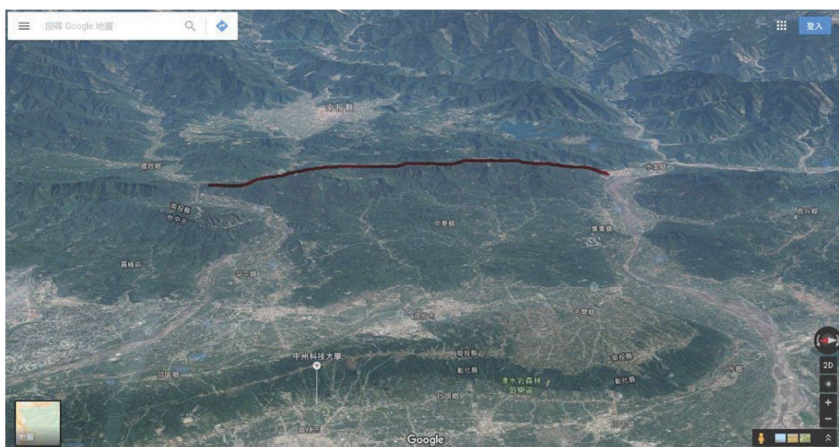
C：那交界點在國姓一帶，就是台中往埔里時的第一隧道（國姓第一隧道）。我老公說真的天壤之別，一過了長隧道，眼前豁然開朗（附圖 4-4）。



附圖 4-4 紅線是 PM<sub>2.5</sub> 數值高低變化的交界處

C：埔里盆地的情形，盆地四周的高山，風從盆口呼嘯而過，所以污染物被帶往高處，隨著往西跑。偏偏到了台中沒有高山，不是深盆，所以風力不足，污染物落在台中盆地。不知道這樣推論對不對？

W：C 畫的紅線（附圖 4-4），就是九份二山連線到集集大山的稜線（附圖 4-5），高約一千公尺出頭，是擋了不給進來，還是進來了不給出去？



附圖 4-5 九份二山連線到集集大山的稜線

## 參考文獻

- 王瑋彤、王瑞庚，2017，〈臺灣空氣污染微型監測之現行建置盤點（三）：微型監測的象徵意義與未來發展〉。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http://rsprc.ntu.edu.tw/zh-TW/m01-3/climate-change/76-air-pollution/662-0512\\_air-pollution-micro-sensor-citizen-science](http://rsprc.ntu.edu.tw/zh-TW/m01-3/climate-change/76-air-pollution/662-0512_air-pollution-micro-sensor-citizen-science)
- 戴榮賦，2016a，〈南投埔里地區 PM<sub>2.5</sub> 監測系統及推動空氣污染防治志工制度計畫期末報告〉。計畫編號：EPA-104-FA02-03-A305。台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戴榮賦，2016b，〈虔誠普渡留意空氣品質〉。《蘋果日報》，8月18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818/931598/>
- Rifkin, Jeremy, 2014, *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he Collaborative Commons, and the Eclips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 Irwin, Alan, 1995, *Citizen Science a Study of People, Expertis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 Promoting a Local Air Quality IoT Monitoring Approach in Puli, Taiwan

Rong-Fuh Day Tzu-Yuan Huang Li-Ya Chang

### Abstract

In 2014, residents in the south Taiwan city of Puli endured 146 days in which the daily average PM<sub>2.5</sub> particulate pollution value exceeded 35 µg/m<sup>3</sup>, indicating a significant deterioration in air quality. A group of citizens organized a Puli PM<sub>2.5</sub> Air Pollution Reduction Self-help Group to make their demands known among neighborhoods and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 Shui Sha Lian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at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NCNU) acknowledged these appeals,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ssociate Professor Rong-Fuh Day proposed the installation of PM<sub>2.5</sub> microsensors along streets and lanes to gather air quality data. Puli citizens enthusiastically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system installment process, and in 2015 the township was designated by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as Taiwan's first air quality IoT demonstration area. In addition to proving the capability of the system to measure air quality, the Shui Sha Lian Research Center and Professor Day succeeded in convincing local citizens to work on ways to reduce PM<sub>2.5</sub> pollution. Together they identified an important air quality boundary: Chiufanershan, located on the city's west side. The IoT system was shown to have strong potential to serve as a tool to be used by citizen groups working on air pollution problems and prevention programs.

**Keywords:** Internet of Things (IoT), PM<sub>2.5</sub> microsensors, citizen science, Puli, air pollution

---

Rong-Fuh Day,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Tzu-Yuan Huang, Project manager, Shui Sha Lian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College of Humanities,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Li-Ya Chang, Project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第三部

# 在地實作與具體實踐





# 7

## 果樹認養行動方案中的社會經濟實踐

鍾怡婷

---

本文為筆者參與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的研究論文，特別感謝共同參與研究計畫與行動方案的工作伙伴，以及合作農家和認養果樹的股東們的貢獻。同時也感謝審查人提供修改建議讓本篇文章在學術上的討論更具意義。最後則感謝編輯團隊的潤校稿，使得本文在交雜著各種在地語彙和農業相關用詞的情況下，使讀者更容易閱讀與理解。

鍾怡婷，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E-mail: yiting.jung@gmail.com。

## 中文摘要

當代農業生產與食品安全問題，除了源自工業化大量生產模式之外，也與資本主義的商品化體制有關。食物的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在物理空間上的距離越來越遠，雙方關係也越疏離、不識和誤解，並且被框架在爭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買賣關係之中。近年來雖然有各式各樣嘗試縮短食物供應鏈的創新方案，試圖促進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直接連結，但若是無法處理商品化所帶來的掩飾效應，或者翻轉主流認知與價值觀，那麼，重新建立起的生產消費關係，仍易淪為資本主義式運作。本文藉由與社區場域的合作伙伴實作「果樹認養」行動方案，探討以社群協力農業為原則而設計的食物生產與消費制度，如何使斷裂的生產者與消費者重新連結，並鑲嵌於社會關係之中。此外，本文亦嘗試指出在此一社會關係之中，參與其中的生產者、消費者與中介者間所展現具有社會經濟意涵的互動和實踐。「果樹認養」方案的運作有以下特點：以利他理念進行號召，重新建構商品交換的經濟認知，並且促使個體化的行動者重新鑲嵌於被建構的社群與規範中。在方案實作過程中，研究團隊發現所有行動者在此一新的社會關係中展現了利他與互惠等富有社會經濟意涵的互動，同時形成相互理解、關懷與支持的社群。即便當前果樹認養行動方案的生產與交換制度無法完全取代資本主義運作，但在社群的支持下，可以為果樹農家帶來部分的穩定與安全感，而消費者也可以獲得值得信任的安全食物，以及被鑲嵌在社會中的群體感。果樹認養行動方案的實踐核心在於創造無法以主流經濟觀點衡量的社群支持與幸福，而這正是社會經濟所嘗試奪回的另一種經濟認知。

**關鍵字：**果樹認養、社群協力農業、社會實踐、社會經濟

## 一、前言

台灣的農產品與食物的生產和交換系統在日治時期即逐步被編入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中。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國家大力資助下更加速了農業與糧食生產過程的工業化，亦即化學肥料和各種農藥（如，除草劑、殺蟲劑、殺菌劑）的普及，同時，農產品與食物（後文以「農食產品」代稱）的分配供應鏈也因為都市化發展而逐漸拉長，意謂消費地／消費者與生產地／農民之間的物理距離越來越遠。

當代的農業與食物研究已說明資本主義經濟運作對農村所造成的問題，包括：農業生產的工業化，農村人口離農與離鄉，以及農村生活領域的商品化。本文所介紹的場域——一個位於台南市東山區的淺山農鄉地帶，也面臨同樣的危機與困境。此一淺山農鄉地帶傳統上以龍眼及龍眼乾（又名「桂圓」）為主要生計，此外亦開墾坡地為梯田以種植稻米，戰後也曾大量種植香蕉跟上台灣香蕉外銷日本的風潮，在1970年代中期後自中部地區引入柑橘類果樹種植，柳橙與椪柑成為龍眼之外普遍的果樹作物，形成立秋收龍眼、冬季收成柑橘的果樹農業經濟。

由於農家擁有將龍眼烘焙成乾的加工能力，在可貯藏以調節供需的情況下，市場價格波動較低，柳橙與椪柑則因為只能以鮮果形式銷售，市場價格隨產量多寡而波動，例如，2004至2008年間，柳橙產地價格曾跌至每台斤5元，使農家辛勤勞動一整年卻血本無歸；而2017年因為沒有受到颱風影響，柑橘類作物大豐收，即便是全台灣最早上市的東山椪柑，價格也大幅下跌，以台北第一批發果菜市場的批發行情價格來說，2017年平均價約為13元／台斤，比前一年少了6元。

山村裡種植柳橙與椪柑等鮮果的農民，大多倚賴主流的市場通路進行產品銷售，農民與其產品的終端消費者間存在各式各樣的中介者，農民只能從下游通路商中理解市場與消費需求，消費者也只能被動地接受市場上由通路商評價判斷所供應的商品。在這個交換系統中，生產者與消費者彼此互不相識，是一種無法直

接連繫、互相不理解，甚至誤會彼此的關係。

2013年下半年，筆者與研究團隊因為參與科計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而在此一淺山地帶展開與當地居民的合作，共同面對台灣農鄉在1990年代後每況愈下的社會與經濟問題，並嘗試可能的解決方案。透過滾動式的方案調整，我們在2014年底確立以朝向農業與食物系統的永續轉型為目標的實踐行動，一方面陪伴當地農民在生產面轉型實施環境友善<sup>1</sup>耕作，<sup>2</sup>另一方面則在產品銷售面尋找主流交換體系之外的出路，此即本文主要探討的「果樹認養行動方案」。

「果樹認養行動方案」是研究團隊在2015至2017年間與三位種植柳橙、椪柑及荔枝農民的合作方案。果樹認養行動方案參考「社群協力農業」(Community-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模式進行設計，消費者預先認購一棵果樹的收成並預先付款，合作農友<sup>3</sup>則採行環境友善耕作進行栽培管理，此外，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約定共同承擔天災與病蟲害造成的損失。

作為社會學介入的實踐型研究，我們的提問是：「食物這類商品，其交換形式是否有資本主義運作邏輯外的另一種可能(alternatives)？」本文以筆者參與實作過程的田野觀察為材料，加上後續蒐集的訪談資料進行分析和討論。以下先討論當代資本主義農食產品交換系統的問題，以及已在世界各地實踐的另類解方，並嘗試指出有別於資本主義運作邏輯的社會經濟概念；其後說明研究團隊的介入行動與假設；最後則說明方案實施過程中參與其中的所有行動者（包含：認

---

<sup>1</sup> 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2017年5月5日公布「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補助要點」，為避免讀者認為本文所稱之耕作模式完全符合此一要點之規範，故本文使用「環境友善耕作」來泛稱各類對生態環境較為友善之農業生產模式，包含不使用除草劑、減農藥栽培、生物防治等等在官方要點規範之外的友善耕作模式。

<sup>2</sup> 研究團隊在農民生產面的介入行動，並非本文的主要討論內容，可參考研究團隊另一名成員蕭惠中博士的論文。

<sup>3</sup> 本文以「農友」稱呼與研究團隊合作的農民，其他則以「農民」泛稱。

養果樹的消費者，參與合作方案的農友，作為組織者的計畫工作伙伴，以及其他被納入參與的農民）在此社會互動過程中所展現的社會經濟意涵。

## 二、當代農食產品交換系統的問題與另類解方

### （一）資本主義運作邏輯下的農食產品交換系統

注重效率與利潤的工業化農業生產模式，以及過於重視商品交換價值的農食產品交換系統，是造成當前農村困境與食安問題的結構性根源。在農業生產方面，許多關注農業與食物議題的研究者指出，二戰後全面推動的綠色革命不僅迫使農民改種高產量品種，亦改變整套的生產系統，包括：推廣大規模單一栽培（monoculture），使用除草劑、農藥與化學肥料等，此一被稱為「慣行農法」（conventional farming）的農業耕作行為，大量仰賴不可再生的化石原料，會對自然生態、水與土壤等環境造成劇烈且難以回復的破壞性影響，農民和家人都是受害者，長期受農藥毒害致使健康受損的情形早已浮現（Goodman and Redclift 1994; Goodman et al. 1987）。台灣的農業亦循著工業化發展軌跡，走向一個生產成本不斷提高、生產環境惡化又必須使用更多外部投入的惡性循環。

本文所介入的場域在1970年代中期後開始普遍種植柑橘類的果樹作物，並以椪柑和柳橙為主要栽培品項。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的官方統計，在過去二十年間，椪柑栽培面積最多為1,082公頃（1996年），2016年約為900公頃；柳橙栽培面積曾經多達3,354公頃（2006年），目前則減少為1,794公頃。以果菜市場的批發價格來看，椪柑與柳橙在1996到1998年間的平均價格仍有30元/台斤，但在1999年之後價格再也沒有超過18元/台斤；在價格最低的一年，椪柑是9.78元/台斤（2003年），柳橙則是7.2元/台斤（2009年）。2016年歉收情況下，果菜市場的批發均價分別是椪柑19.44元/台斤、柳橙16.68元/台斤；2017年豐收，價格下跌為椪柑13.26元/台斤、柳橙16.44元/台斤。

柑橘類水果從生產地到消費端的交換系統大致包含以下三種市場通路。第一種，採收後，農民直接將產品清洗、分級與裝箱，經由農會或合作社集貨，再運輸到果菜拍賣市場進行銷售。每箱產品上都標有農民所申請的代號，拍賣結束不久後便可以知道銷售價格，農民在三天內會收到總售出金額的匯款（通常匯款金額會先扣除掉要支付給運銷中介者的手續費與運費，依單位不同約在5%~10%間）。第二種，採收後，農民將產品清洗、分級與裝入特定塑膠籃，交由「行口」寄賣。寄賣後售出的價格由行口告知，售出金額也未指定在何期間內支付給農民，這種不透明的交易模式純粹依靠雙方的信任。在田野資料中，農民曾遇過故意將出售價格說得較低，並且到整個產期結束才收到款項這類不值得信任的行口。第三種，盤商直接到農場果園批次性地直接買斷產品，雙方現場直接現金交易，價格雖然可能比前面兩種方式低，但由於農民採收後不需要再經過理貨等作業（椪柑仍需經過清洗與分級再出貨給盤商），也少了紙箱與運費等成本支出，再加上可直接收到大筆現金，許多年齡較長的農民偏好這種交易形式。

柑橘農勞動一整年後要在收成季節才會獲得收入，收入多寡便直接與產量連繫在一起，但從集體來看，產量增多卻會造成價格下跌，收入不一定會增加；但從個人利益來看，一般農民仍會追求產量，然後祈求無法預期的氣候帶來普遍性的減產，或賭一把颱風不會掃到自家果園。這是山村裡的柑橘果農在追求產量時的普遍態度，而為了產量最大化，農民會施用大量的化學肥料讓果樹結出最多果實，也會噴灑殺蟲劑與殺菌劑來防止落果，並且讓果實外表無蟲咬痕跡。椪柑與柳橙都是每年二月與三月間開花，結小果後要到十月中旬與十二月才成熟可採收，以慣行農法來管理的果園，在這8至10個月間幾乎每個月都會進行一次農藥防治。為了便於農事進行和管理，除草劑是經常使用的農藥，隨著務農者年事偏高，除草劑的使用越來越普遍。此外，為了在產品賣到市場後有較好的價格，並有足夠的產量能維持收入水準，大部分農民仍然選擇以慣行農法來栽培椪柑與柳橙。

這種追求大量生產以維持生計的農業模式造成嚴重的環境問題，年輕一輩的

農民也看到了這個事實。年約四十歲、種植椪柑的農民阿福便觀察到現在要照顧果樹比以前更困難，他說：「土壤都死了，根本種不出東西。」果樹無法吸收的過量化學肥料留在土壤裡，除草劑殺死了土壤中的微生物，果園土壤流失、硬化等等的問題，讓大部分柑橘農只好用更多的化學肥料將產量硬逼出來。這樣的惡性循環讓當地柑橘產業更加陷入困境。

近二十年來，椪柑種植面積最多的是嘉義縣，平均有2,290公頃，在2016年仍有1,689公頃，第二多原本是苗栗縣，但在2016年只剩下690公頃，台南<sup>4</sup>則是910公頃。柳橙種植面積最多的是台南，平均有2,664公頃，與種植面積第二多的雲林縣相比，平均種植面積多了368公頃，但在2016年，台南市只剩1,794公頃，雲林縣則是1,581公頃。這些數字代表市場上銷售的椪柑與柳橙大多出自何處，也顯示這兩種作物是雲嘉南地區主要的栽培品項。

雲嘉南地區出產的柑橘類水果，經由果菜拍賣、行口寄賣及盤商收購這三類主要的市場通路從產地流向消費端，抵達零售商的攤位或貨架上的椪柑與柳橙，通常有完美無瑕的外表，散發著光澤，貨架後方則標示著售價，例如，「柳丁13斤100元」或「椪柑7斤100元」。消費者對它們的認識僅止於此，再來便是憑經驗將好吃的那顆放進購物袋裡。有時候產地名稱會被標示出來，但零售商不一定會標示真正的產地，而是標示有名的產地，因為零售商也不見得真正清楚這些商品的來源。離開產地之後，也很少人知道這些外表漂亮的水果其實是透過頻繁的農藥施用才能創造出來。

消費者對於生產者、生產地及生產過程等資訊的掌握程度相當低，使得農食產品的生產過程與流通過程變成黑箱一般不為人所知，成為食安問題的溫床。這便是研究農產與食物生產體制的學者所指出的，食物生產過程不透明，為數甚少的垂直集中跨國企業掌控產品流通管道，以及國家法令去管制化等問題，造成層

---

<sup>4</sup> 2010年實施縣市合併之關係，原台南縣與台南市合併為台南市。雖然原屬台南市之地區並未有種植椪柑與柳橙之統計，為避免混淆，故在提到近二十年來之種植情況時，台南部分不註明縣或市，只有在提到特定年份時會標示是台南市或台南縣。



出不窮的食安醜聞 (Friedmann 1993; Friedland 1984)。在資本主義運作邏輯成爲主流的商品交換形式下，生產者、流通業者、零售商等等的行動者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等經濟理性爲決策與行動原則，重視交換價值，卻忽視其所交換的商品是要讓人吃下肚裡，維繫生命與健康的食物。

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中，消費者受到商品拜物教 (commodity fetishism) 的掩飾效應，無法意識到其中的不平等權力關係 (Buttel 2000)，雖然在本文所介入的場域中尚未出現勞動過程的不平等問題，但來自經濟霸權論述的掩飾效應確實存在，使得消費者受到那些保護現有結構的意識型態所操控，接受主流體系所形塑的觀念、想法與價值觀，導致既存結構穩定地再生產而難以被改變。換言之，在當代主流的農食產品交換系統中，食物被視爲純粹的商品化物件，而非生命；以外觀和價格作爲判準來進行消費選擇，因而難以意識到工業化農業發展下所帶來的各式各樣問題，包括環境破壞、生產者被剝削，甚至消費者本身健康受損的問題。

在傳統產銷模式的交換系統中，食物的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是互不相識、相互猜疑與誤解的關係。山村的果農總是說消費者只喜歡外表漂亮的水果，那只好多灑一些農藥來防止病蟲害；消費者則認爲農民沒有良心，只想多灑農藥賺錢卻犧牲消費者健康。農民搞不懂「爲何『歹呷貴』<sup>5</sup>的水果，消費者還會接受？」消費者也無法理解「爲何農藥這麼毒，農民卻還要灑？」在本文介入的場域中，柑橘類與荔枝是商品性格濃厚的農食產品，生產端考量的是如何在市場上換取更多現金回來，當市場運作是搶早上市、外表漂亮才會賣得好價錢時，農民說「聰明人不會跟錢過不去」。消費端則是因爲根本不知道外表美麗的果實依賴頻繁施用農藥，也不知道原來每種水果要到盛產期才是真正的好吃。

資本主義式的農食產品交換系統，以分工、效率、追求利潤極大化等經濟理性的原則在運作，但農食產品作爲一種生命，以及用以維繫消費者生命的物品，

---

<sup>5</sup> 閩南語，意指「難吃又貴」的意思。

是否應有不一樣的交換形式？一種讓生產過程透明、農民與消費者可互相理解的交換過程，是否可能？

## （二）農食產品交換系統的另類解方

針對上述主流農食產品交換系統中生產者與消費者關係斷裂的課題，近二十年來，全球各地出現諸多另類的交換模式，嘗試回應資本主義運作邏輯帶來的問題。這些解方包含：公平貿易（fair trade）、團購（buying club）、消費合作社（consumer co-op）、農民直賣（direct selling）、農民市集、菜箱計畫（box schemes）、社群協力農業等。這些方案都圍繞著短程食物供應鏈（short food supply chain）為目標，嘗試創造生產者與消費者間的直接連結，減少流通過程的中介層級。

短程食物供應鏈的概念不僅是縮短農產食物從產地到消費端的運輸距離，也主張生產者與消費者可更直接地進行產品交換。公平貿易、團購或消費合作社這類的制度仰賴一中介組織／者建立生產與消費兩端的流通，而農民直賣、農民市集、菜箱計畫或社群協力農業則強調生產者與消費者直接面對面的交換。這些有別於傳統農食產品產銷形式的實踐行動，在近年來歐美地區的鄉村社會學研究中稱爲「另類農食網絡」（alternative food network, AFN），被認爲是二十一世紀後對抗主流資本主義式食物生產與交換系統的社會運動，對全球化與工業化的農業生產和飲食消費帶來顯著影響（David et al. 2012）。

台灣在近十年來也出現各式各樣嘗試解決當代食物生產與交換系統問題的另類作法。在生產端，朝永續型農業轉型的農民逐漸增加，以各種不同的農耕形式（如，有機農法、秀明農法、樸門農法、環境友善耕作）嘗試重新建立農業與自然生態的連結。消費端的改變，包括早自1995年即開始的共同購買行動及後續成立的消費合作社，2007至2010年間各地出現的定期性農民市集（賴鳳雲、譚鴻仁 2011），以及衆多讓消費者直接向農民訂購產品的網路銷售模式。

研究團隊在開始與山村果農合作永續農業轉型方案時，農民也很務實地告訴我們，在理念上，農民也認可必須拉近與消費者的關係，讓雙方都可獲利，並可突破受中介業者（盤商）或販運商（行口）對價格的主導權。但在現實面上，農民總會嘆氣說「種不是問題，問題是銷」，他們最煩惱的不是耕作方法與技術上的改變，而是減少農藥使用後所產出的果實，「市場、消費者會接受嗎？」

消費者在這波另類農食網絡興起的浪潮中，扮演著關鍵角色，例如，在食安醜聞頻傳的時代逐漸展開行動，包含抵制黑心或摻假食品的「拒買行動」（boycott）、對抗麥當勞等速食文化的「慢食運動」（slow food movement）等。另外，也有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加入「回歸自然」此一行列，「消費可以改變世界」成爲突破全球化、工業化與商品化的農食系統的行動方針（Murdoch and Miele 1999; Terragni et al. 2009; Weatherell et al. 2003）。這群願意接受以永續型農法生產的食物的消費者，在引導改變與轉型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性日益受到認可，倫理消費（ethical consumption）、綠色消費（green consumption）、反身性消費（reflexive consumption）等概念也在此脈絡中發展出來，以描述消費領域正朝永續性的方向轉型（Boström and Klintman 2009; Brunori et al. 2012; Roff 2007）。

農民如何面對產品銷售與通路，是台灣本地在朝向永續農業生產與食物交換系統的轉型過程中普遍面對的課題。可行的作法可能是推動永續農業生產的一方，也扮演流通中介者的角色，爲產品尋找消費者，例如，同時輔導農民轉型並提供認證，再設立銷售平台。<sup>6</sup> 因此，研究團隊作爲介入者，在推動山村果農轉型施行永續型農業的同時，如何面對銷售課題？我們究竟可以提出什麼回應策略？是「扮演流通者的角色來爲這些產品尋找市場」？或是「讓農民自己面對」？這些問題是我們在尋求解方時不斷自我檢視的問題。

在一個具社會實踐取向的研究介入到農食產品銷售議題時，所應思考的不僅是如何協助農民解決銷售問題，而應包括如何與農民，甚至消費者，共同面對主

<sup>6</sup> 例如，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負責有機農業生產輔導與有機驗證，並結合里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開設實體店鋪與網路商店，協助農民進行產品銷售。

流商品交換系統中的消費惰性。然而，也有諸多研究發現另類農食網絡中的消費行為與消費者日漸失去反思性和批判性，這反映了既存的權力結構又重新奪回主導權。其中包括大型農企業將追求有機的消費市場視為利基（nich market），投入資本進行規模化生產，使得有機農業出現慣行化（conventionalization）現象，仰賴非法跨國移工投入農事勞動，一樣使用大量外部投入，只是以有機資材取代化學資材。在消費端則浮現階級飲食（class diet）的問題，由於有機食材價格較高，使得消費安全健康的食物成為富有階級的特權。此外，消費者仍維持傳統消費主義的思維，只在乎自己的權利，一味要求農民供應安全的農食產品，卻未能理解生產過程中的風險並善盡本身倫理消費的責任（Guthman 2004; Goodman 2004; Constance 2008; Gunderson 2014）。

上述問題提醒我們，若消費者未能翻轉既定的理性選擇觀念，很可能仍然以「性價比」（CP 值）作為消費決定的判準。在場域進行田野工作的過程中，筆者曾聽到農民轉述消費者質疑：「你沒做有機驗證，也沒有農藥零檢出的證明，還敢賣這麼貴！」或是：「顧得醜就說是有機，不要騙人了！」這些反應說明了消費者並不理解轉型永續農業的耕作過程，也因為不理解而無法設身處地站在生產者的立場進行評價，最後還是只能靠第三方的檢驗證明報告來要求品質，或者仍以主流標準來做消費決策。

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純買賣關係，使得原先另類農食網絡興起的背後精神被忽視，兩者再次走回過去只在意產品本身，而不重視生產過程的交換模式。針對這類問題，已有不少研究者提醒我們，需要更強調行動者面對掩飾效應的積極性，並嘗試翻轉那些保護既有結構的意識型態（Marsden and Arce 1995; Murdoch et al. 2000）。對這些問題有所意識，使得我們在針對農食產品銷售課題思考可能的解決方案時，更重視如何促進消費者對生產端的認識與理解，以及生產與消費間的距離待縮短的不僅是物理性的距離，更是社會性的距離。

### (三) 「經濟」的社會再鑲嵌

研究團隊基於對生產與消費關係的反思與理解，在提出介入方案時有意識地思考如何避免再次掉入資本主義的市場交換邏輯運作。此一問題涉及我們如何面對消費者在掩飾效應下受主流經濟霸權概念影響而形構的意識、價值判斷與日常選擇，尤其是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自利」、「理性選擇」與「追求利潤極大化」等主流的經濟概念。

「經濟」一詞在 Gibson-Graham (2006) 的後結構主義視角中，被視為是社會建構的產物，主流的經濟論述作為一霸權形式，極具說服力地根植在人們的認知、價值觀與社會規範中，甚至被視為是自然化意義 (Gibson-Graham 2006: 53-56)。於是，人們將追求自利與利潤極大化、所有權私有化、商品交換、薪資勞動等資本主義式的經濟概念視為理所當然，並狹隘地相信它是唯一。然而，實際上有更多不在主流視野裡的經濟活動仍舊存在，這些經濟活動有待我們重新重視，將「經濟」從主流論述中解放出來，並將之視為多元可能的存在 (Gibson-Graham et al. 2013)。

James Scott 在針對東南亞農村地區經濟活動的分析中指出，在當地的脈絡下，地主與佃農之間的經濟互動存在特殊的道德標準評價。佃農被地主拿走多少產物不是問題，佃農還剩下多少可以維持生存才是關鍵，例如，在豐收的季節，即使地主拿走更多的量也不會受到道德批評，但遭遇歉收時，若地主沒有考量佃農基本生存所需並留下足夠的糧食，農民會為了生存權利而合理化地進行反抗 (Scott 1976)。Scott 的研究指出人類社會對「經濟」的認知架構存在特殊的道德評價與社會規範，而這些評價與規範鑲嵌在一特定社會脈絡之中。Gibson-Graham 在考察來自經濟人類學、經濟社會學與女性主義觀點的大量研究之後，發現在主流的經濟論述之外有更廣泛但卻被忽略、被邊緣化的經濟活動，例如，無酬的家務勞動、維生式經濟、以物易物的交換等等 (Gibson-Graham 2006: 53-78; Gibson-Graham 2008)。

經濟活動的社會鑲嵌（social embeddedness）特質，是 Karl Polanyi 針對市場經濟自律性的批判，他認為人類的經濟活動實際上有特定的社會價值與社會規範進行引導，不能忽略諸如道德責任、義務、自尊等社會動機對經濟活動的影響（Polanyi 2001[1944]）。在此視角下，「經濟」的意涵便不只是主流經濟學下的概念，而廣泛地涉及人類社會中的道德規範、社會價值或各種約定俗成的制度。

更廣泛並富有社會鑲嵌意義的「經濟」，不僅存在於非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裡，近年來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發生危機的社會裡，超越主流概念的經濟運作模式成爲解決問題的創新嘗試。長期關注英國社會經濟的學者 Ash Amin 指出，在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出現危機的歐美地區，諸多另類模式逐漸浮現，例如，非貨幣交換（時間貨幣）、微型貸款、公平貿易或社區企業等，而這些在資本主義經濟之外的另類經濟（alternative economy）或存在許久的合作社（co-operatives），近年來被含括進「社會經濟」（social economy）概念之中。社會經濟的基本運作原則是，不論採行商業模式或非商業模式，滿足社會需求（social needs）或環境需求（environment needs）的考量都優先於利潤極大化，透過讓市場與供應系統更具有社會責任，以需求爲基礎並以利害關係人爲導向，社會經濟試圖讓資本主義更具關懷（caring）（Amin 2009: 4-6）。社會經濟面對所有權私有化和剩餘分配集中化等議題，試圖發展出不同的處理模式，追求人類福祉最大化（社會目標）而非利潤最大化（商業目標），這一點是與資本主義經濟的最大差異。

對「經濟」的認知與運作模式不再局限於主流的資本主義框架，使得研究團隊有機會從批判問題走向思考和實踐對策。我們基於重新爬梳農業生產與食物交換系統的結構性問題，以及近年來的另類發展，嘗試與農民共同面對的問題是：在資本主義根深柢固的商品交換系統中，如何重構經濟的社會性，讓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純買賣關係被改變？主流的經濟霸權概念所帶來的掩飾效應如何透過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直接連結而被揭露與改變？如何在實踐中解構與重思被自然化的「經濟」概念？

### 三、果樹認養行動方案的制度設計與介入過程

#### (一) 社群協力農業作為參照模式

在各種改變或重新建立生產與消費關係的另類嘗試中，CSA 社群協力農業<sup>7</sup> 模式將反省食物的商品化生產與交換置於核心。社群協力農業的運作模式強調人類經濟活動中的社會關係，相關研究也指出 Polanyi 的「社會鑲嵌」概念在此一運作模式中重新受到重視，且被視為是各種另類選擇得以避免重蹈資本主義經濟覆轍的關鍵 (Murdoch et al. 2000)。因此，研究團隊在此考量下選擇參考社群協力農業來設計果樹農家與消費者之間，超越資本主義運作邏輯並具有社會經濟意涵的交換模式。

一般而言，社群協力農業是由生產者與消費者共同組成，運作模式是由消費者預先支付生產所需的費用給農民，待收穫時再共同分享收成的產品。消費者在此一模式中被稱為「會員」或「股東」(shareholders)，<sup>8</sup> 會員或股東有時被要求參與農場勞動，有時必須自行到農場領取收穫或協助產品配送等農事工作。要求股東與生產者一起「分攤風險，共享收成」(Henderson and Van En 2007: xiv) 是社群協力農業與其他交換模式最大的差異。在這裡所強調的是，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並非單純的商品交換關係，雙方必須相互了解、信任與協力，形成一個共享收

---

<sup>7</sup> 一般認為，CSA 的初始模式源自 1970 年代的日本，一群主婦為了購買不受污染的食物而組織起來，直接向農家進行農食產品採購的行動。1985 年美國麻薩諸塞州成立第一個 CSA 模式的生產消費及農食連結的組織之後，CSA 在北美地區開始蓬勃發展，至今世界各地都有農民或消費者陸續組織起各式各樣的 CSA。

<sup>8</sup> 在宜蘭縣員山鄉務農的賴青松先生是台灣最早採用社群協力農業模式的生產者，由於他主要生產的作物是稻米，故以「穀東」來指涉 shareholders。本研究團隊所推動的方案是以水果為主，因此仍將 shareholders 譯為「股東」。

成與付出的社群（community）。<sup>9</sup>

「預先付款」主要是作為保障生產者收入的機制，消費者在收成前預先付款後成為「股東」。在某些社群協力農業的運作模式中，股東平均分攤支付農民或農場一年所需的生產費用；有些則由生產者依生產成本和獲利為產品進行價格設定，股東再依所需的收成量來計算支付金額。不管何種類型，股東預先付款能夠讓農民或農場運作擁有可自由運用的資金，有別於一般市場交換系統中農民得先捱過種植季節，到農作物收成時才能換取現金的模式。在我們所推動的果樹認養行動方案中，與農民的合作前提是提供認養的果樹必須改採環境友善的栽培管理方式，首要作法是不使用除草劑，再來是盡可能地減少農藥使用，並且至少在農藥使用的安全期後才進行採收。合作農民對於轉型改採環境友善栽培的擔憂是，果實外表會有斑點和刮痕，甚至會變得粗糙不光滑，在一般市場上是賣不出去的商品，「若是沒人要買，那麼辛苦一年沒收入，就要吃土了。」採取預先付款的機制等於是已經售出一棵果樹上的所有收成，不管果實外表美或醜，我們假設預先付款機制能夠帶給農民安心與轉型過程的收入保障。

雖然消費者向生產者進行契作也會有預先付款機制，但社群協力農業的另一個特點是「分攤風險、共享收成」，這也是社群協力農業與其他另類農食網絡的不同點。農業生產收成在很大程度上受氣候影響，無法預期的天災會造成歉收，風調雨順則能豐收。分攤風險的作法主要是讓股東在歉收時與農民共同承擔收成減少或甚至沒有收成的損失，股東不能要求退款，在豐收時超出的預期產量也必須照單全收。對生產者而言形同為一整年的勞動提供收入保障，能夠減少自然天候狀況對生計的影響。朝向環境友善農法的轉型過程中，自然條件對果樹本身和產量的影響是農民難以預期的，在農藥使用減少會影響預期產量的情況下，若是遇到颱風、大雨或乾旱等問題，產量會更少，為了讓合作農民不須擔心在歉收時還要賠償股東的損失，股東有「分攤風險」的義務，是果樹認養行動方案中很重

<sup>9</sup> CSA 中的 Community 意義，跳脫純粹空間指涉的意涵，更強調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所形成的人際關係與網絡社群。



要的機制。

參與農事勞動過程是社群協力農業對股東的最大期待，一方面是因為有勞動力的需求，在某些社群協力農業運作模式中，會讓股東以勞動參與來交換收成，或者減少股金，讓較無能力負擔一般股金的消費者也可以較低價格獲得安全且新鮮的食物，此一作法可以鼓勵經濟能力不那麼好的消費者加入（韓德森、凡恩 2011: 196-207, 411-419）。另一方面，消費者透過參與農事勞動過程，可以親身體會食物如何在土地上生長，需要經歷哪些照顧與管理才能收成並成為餐桌上提供人們生命活力的食物，深刻感受到食物也是生命，農民是在培育食物而非生產商品（韓德森、凡恩 2011: 302-306）。果樹認養行動方案因此設計了讓消費者參與到生產過程的機制，並期望股東能因此看見當前被遠距產消鏈隱蔽的事實。

## （二）果樹認養行動方案的制度設計

研究團隊在進入實作場域第二年（2014 年底），展開以農食系統的永續轉型為目標的各項行動，在生產面以共學共作招募與組織農民，在「農友共學堂」裡，與農民共同學習永續農業相關的知識、技術與觀念，組織「五酷山農團」則讓投入實作的農民可以相互交流與分享經驗。面對農民最關心的產品銷售與通路問題，我們展開了「果樹認養行動方案」，以此來探討作為面對主流經濟體制問題的另類選擇的交換模式，如何可能在果樹農家實踐。

由於果樹是長期作物，貿然從慣行農法轉型到無化肥與農藥的栽培管理，可能造成果樹枯死，這是當地農民所觀察到的實例，「五酷山農團」中即有一位農民經歷過柑橘果樹極端轉型後枯死的過程。果樹枯死後再重新由小苗開始栽培，必須經歷至少五年才能有收成，因此，果樹要改採有機甚至自然農法的栽培方式，對農民來說是相當大的挑戰，於是我們鼓勵農民從小面積、從減量農藥開始慢慢轉型，但是必須放棄除草劑改採草生栽培。

相較於短期型作物，果樹農家在朝永續農業轉型的過程中，面臨更多的技術

和天候挑戰，也需要更多與較長期的支持，包括管理技術面和生計層面的支持。果樹認養行動方案因而預設與將面對較大轉型挑戰的果樹農家進行合作。

## 1. 合作農友

研究團隊在2015年時先與種植柳橙的農友阿銘合作試辦，2016年又加入荔枝農友阿志與椪柑農友阿福分別合作推動果樹認養。三位農友年紀都在40歲至50歲之間，除了分別種植柳橙、荔枝、椪柑之外，也以種植龍眼為主要生計。以下分別針對農友背景，種植的作物品項與面積，以及採用的農法等進行簡單介紹，這些會涉及到果樹認養行動方案對他們的不同影響。

阿銘經常被鄰里長輩評價為懶惰的農夫而受到揶揄和挖苦，原因是他並不勤於噴灑農藥，果園裡的草長得特別高。從父母手上接手管理的兩片柳橙園中，有一片在他實施懶人農法的管理下已全部枯死，筆者回顧2014年6月的田野資料發現，當時果園裡的柳橙樹已呈現衰弱狀態。另一片柳橙果園位在村莊外的山坡上，阿銘接手管理後從原本每年噴六至八次農藥到第二年噴五次，逐年減少用藥的情況下，到研究團隊與阿銘相識時，一年只噴三次農藥。然而，一年噴三次農藥的收成量，比起過往少了一半以上，而且外表有痕有疤，這種柳橙在一般市場上「沒價數（bô-kè-siàu）」<sup>10</sup> 會被打成次級品或淘汰」，但是阿銘總說「這樣的柳丁<sup>11</sup> 才叫好吃」。這片山坡果園面積約0.5公頃，大約種植80棵柳橙樹，2014年大盤商進場大批收購的價格是10元/台斤，阿銘將一部分運銷到果菜拍賣市場，一部分透過住在都市裡的親友作為通路，將這些進入市場便無價值的柳橙零售賣給消費者。除了冬收柳橙、夏收龍眼之外，阿銘夫婦另有粉蕉（送果菜拍賣市場）與破布子（交給大盤）等作物可創造收入，多樣化的種植策略讓阿銘一家每個月都有現金收入。

---

<sup>10</sup> 閩南語，直譯為「沒價錢」，即不具商品價值，賣不出好價格的意思。

<sup>11</sup> 「柳丁」是台灣民間通俗用法，農業部門的官方名稱為「柳橙」。

荔枝農友阿志是第一位前來參與共學課程的農民，在認真地全勤參與課程之後，默默地開始投入環境友善農法的實作。阿志主要栽種龍眼及玉荷包荔枝，生鮮龍眼的主要通路為行口，烘焙後的龍眼若逢盤商壓低收購價時便留著自己想辦法賣；玉荷包原本只以鮮果形式銷售，但阿志說他種玉荷包二十多年來只遇過一次價錢好的時候，因此他也開始將荔枝烘成乾來賣。2015年6月的共學課程正逢荔枝產季，阿志拿出新品種「玫瑰紅」荔枝給大家嚐鮮，又拿出以不同袋子套著的整串荔枝來和農友交流防治蒂頭蟲<sup>12</sup>的方法。阿志是一位相當害怕農藥的農民，噴灑農藥時甚至會戴上防毒面具，因此他在投入實作的過程裡積極地尋找其他替代農藥的方法來管理作物。面對玉荷包價格持續低落<sup>13</sup>又管理困難的問題，阿志在偶然機會下取得農業試驗所嘉義分所改良的「玫瑰紅」荔枝品種，在靠近住家約0.3公頃的果園裡種了60棵，一直使用人工割草的方式、不用除草劑。2015年嘗試以套袋方式來取代噴灑防治蒂頭蟲的農藥，成功防治的結果讓阿志信心大增，在技術有所突破之下，他認為只要有消費市場，來年要擴大嘗試套袋防治也不是問題。

農友阿福在從父親手上接下的荔枝園裡種植椪柑，因為小時候跟著父親管理荔枝時總是彎腰低頭，留下種荔枝很辛苦的印象，讓他在接手後將荔枝砍除（只留下一棵做紀念）改種椪柑，而且刻意種得較為稀疏，也刻意不過於矮化椪柑樹，在大約0.5公頃的果園裡種了約300棵椪柑樹，還有幾棵大白柚、佛利蒙柑、砂糖橘等柑橘類。與鄰近的椪柑園相比，阿福的椪柑園較為開闊，樹與樹

---

<sup>12</sup> 蒂頭蟲是「荔枝細蛾」（荔枝蒂蛀蟲）的幼蟲。成蟲會在蒂頭處產卵，孵化後的幼蟲吸食果實為養分。為了在雨季維持藥效，農藥防治會較為頻繁，且有可能會在安全期未過前即採收，是農藥殘留容易不通過的原因。

<sup>13</sup> 每一年玉荷包荔枝最早採收的地方是高雄大樹，一般來說，農產品價格在產季開始的前期最高，中期盛產時價格最低，產季尾聲時價格又會再上升。東山一帶的玉荷包荔枝成熟可採收時，恰好遇上荔枝產期的盛產階段，因而價格一直不高，例外的情況是2016年大樹玉荷包荔枝受寒害影響歉收。

間還能直起身走過。他開玩笑說：「有人說椪柑怕鬼，所以要種密一點。」樹種得少，產量自然減少，對農家而言，姑且不論氣候與市場價格，農業收入與產量多寡直接相關，再加上阿福是以種植椪柑和龍眼為主要生計，種植棵數大大影響著收入。對此，阿福的看法是種得太密通風會變差，連帶地會讓果樹在夏天時太悶熱與潮溼容易得病。這樣的看法其實與工業化農業追求大量生產的作法大不相同。此外，阿福在2011年種下椪柑後便實行人工割草方式，讓果園裡的草相自然演替，他認為土壤是否健康最為關鍵，因此與其他幾位農民合組「永續大地合理化施肥示範產銷班」。在農友共學課程中，阿福的出席率並不高，雖然他的耕作方法已不那麼慣行，也認同永續農業的理念，卻仍然擔心如果不使用農藥來管理，椪柑樹會枯死，因此當時他雖然會參與課程卻總是顯得興趣缺缺，不像阿志總是躍躍欲試。阿福種植的龍眼主要是烘焙成乾後整批賣給盤商，椪柑則是鮮果採收後寄果菜拍賣市場或交行口寄賣，每一年總是要到九月之後才有現金收入。這可能也是阿福不敢輕易在農藥使用上進行減量的原因。

果樹認養行動方案於2015年與柳橙農友阿銘合作試辦後確立可行性，並於2016年正式推動作為面對轉型環境友善農法後銷售層面的另類解方，在徵詢有意願投入轉型實作的農友阿志與阿福後，兩者成為合作農友。到2017年產季結束時，果樹認養行動方案已執行二至三回合。

## 2. 制度設計

果樹認養行動方案對外定名為「加減誠儲果樹股東俱樂部」，以支持果樹農民轉型環境友善農法作為號召。以下簡要說明相關制度設計。<sup>14</sup>

一、環境友善農法：對合作農友的要求是必須轉型改採環境友善耕作管理方式，其中最優先改變的是放棄使用除草劑，並改採草生栽培；其次是盡可能地減

---

<sup>14</sup> 果樹認養行動方案的認股細節可參見「附錄1 柳丁樹認養方案」。

少殺蟲劑、殺菌劑、化肥等化學資材的使用，<sup>15</sup> 並保證收成的水果經農藥殘留檢驗後至少合乎官方規定的安全值。爲了搭配農友的轉型試驗方案，提供認養的果樹棵數不同，柳橙最多爲30棵、荔枝20棵、椪柑30棵。

二、預付股金：每一棵樹爲一股，股金由農友依照平均每棵樹的產量再加上轉型後新增的成本（包含勞動成本、資材）與預期收入，決定認養果樹的實際金額，另外再加上股東到產地參與採收活動的費用（活動保險費、餐點材料費），即爲認養一棵樹的股金數額。例如，柳橙每股3,800元、荔枝每股2,200元、椪柑每股6,800元（2016年時爲4,200元）。每棵樹最多可同時五人認養，但在遇到消費者有經濟考量的特殊情況下，曾調整到十人認養一股的情形（採收活動費已預收五人的費用），在召募股東的活動結束後完成匯款即成爲股東。

三、共攤風險：農業生產容易受自然因素而影響收成，尤其是露天栽培的果樹，最怕颱風一來會樹倒掉果，這類自然災害風險還包括寒害（影響開花與結果率）、乾旱（讓果實缺乏水分）與大雨（落果）等等。此外，在轉型過程中也可能出現無法解決的病蟲害問題而導致落果。因此，在召募股東的說明裡我們明確告知「水果不是工業製品」，受自然因素影響下若歉收，只能保障最低產量（約預估產量低值的七成）。以此讓股東知道自己有責任與農友共同分攤天然災害帶來的損失。

四、股東參與農事：果樹認養行動方案要求股東必須親自採收所認養果樹的所有收成，並且不免費提供紙箱。若是股東無法前往採收，則需另外支付採收工錢、紙箱與運費，並且配合農友採收期程安排，不能指定收貨時間。爲了加強股東親自採收的參與度，於是在股金上預先收取採收活動的費用，若是股東無法參加活動也不能要求退款。採收活動是股東的權利也是義務，因此另外設計了股東召募結束後的「股東產地拜訪暨掛牌活動」，屬於鼓勵性質，邀請股東到個人認

---

<sup>15</sup> 坊間偶爾會聽到柑橘類使用抗生素與制酸劑（退酸劑）等，這是我們推動的方案中要求農民務必要放棄的資材，所幸，直到目前爲止，來參與課程與合作方案的農民本身都堅決不使用這些資材。

養果樹的生產地，透過抽籤方式選定某棵果樹，並掛上寫有自己名字的名牌，活動內容因為包含點心與保險，因此會向報名參加的股東現場收取費用。

**表1 果樹認養行動方案認股情形簡表**

果樹種類 / 農友	年份	股金 / 內 含活動費 (元)	預估收成 (台斤)	認養棵樹	股東數	與計畫 相關的 股東數	非計畫相 關的校內 教職員生	非計畫相 關的校外 大學教師
柳橙 / 阿銘	2015	3800 / 500	100~150	26	22	5	2	0
	2016			28	28	4	7	2
	2017			29	29	8	7	1
荔枝 / 阿志	2016	2200 / 200	5~10	18	16	4	0	1
	2017			19	18	6	0	1
椪柑 / 阿福	2016	4200 / 200	70~100	27	22	3	1	1
	2017			19	19	9	2	0

### 3. 中介平台運作

果樹認養行動方案由研究團隊擔任中介平台，專任助理小君擔任主要的執行者，負責統籌與執行以下工作內容。

- (1) 確定認養方案內容：年初與合作農友確認認養方案的內容，包含定價、棵樹、農法調整等。
- (2) 招募股東：製作與發送宣傳品，以電子宣傳品為主，包括臉書與電子郵件。股東招募的宣傳期間約一個半月，即使未達預設目標數量仍結束招募。
- (3) 辦理活動：辦理掛牌活動（共三場，每種果樹各一場）及採收活動（共五場，荔枝一場、椪柑兩場、柳橙兩場）。活動內容著重股東與農友之間的相互認識與溝通，最重要的是讓來到產地的股東可以了解手中的一顆柳橙、椪柑與荔枝要經過哪些歷程才能成為人類食物。股東來到產地後不是立刻完成掛牌或採果便打道回府，而是大家坐下來相互認識，農

友報告管理計畫或過程，股東回應心得看法等等。消費者來到產地參加的股東大會，內涵其實是一場揭露食物生產過程的食農教育。

- (4) 經營臉書粉絲專頁：除了張貼活動宣傳與記錄外，最主要是將果樹的生長狀況與農友管理過程進行資訊揭露，讓無法到產地的股東也可以知道生產過程。股東可發表關懷與看法，農友也可於此和股東互動。
- (5) 行政庶務：包含認股與活動參加者的報名事務，聯繫事務（與股東或農友聯繫活動相關事宜），代收代轉帳務管理（代收股金、對帳與轉交農友）等。

表2 列出中介平台的工作項細，足見此平台不僅作為股東與農友之間的聯繫橋梁，同時發揮企畫、宣傳、文書、組織與活動主持等功能。此外，為了確實無誤地傳達農友耕作管理上的資訊給股東與其他消費大眾，執行者必須具備基礎農業知識，並且擅於將農友的地方語彙和知識轉譯為普遍大眾易懂的語言進行傳達，專任助理小君相當程度上扮演關鍵的角色。筆者在其中則是扮演社群協力農業相關概念與制度設計的引介者，並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以協力者身分進行參與和觀察。

## 四、果樹認養行動方案中所展現的社會經濟意涵

果樹認養行動方案的推動具有研究者個人的理念和介入成分，我們嘗試探問的是：在農食產品的交換系統中是否有其他回應資本主義經濟運作問題的可能？以及如何可能？我們嘗試在交換過程中重建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讓食物生產者和吃下食物的民眾能直接連結、面對面互動。我們假設在果樹認養行動方案的實施過程中，農民能夠為環境需求而生產，而隱蔽的生產過程被揭露後消費者能成為倫理消費實踐者。此外，我們也預設將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交換嵌入社會關係是有可能的。

表2 中介平台的運作與工作細項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人力
確定認養方案內容	農民年度農務勞務工作與成本訪問記錄、當年度股金計算、股東權益逐條討論、股東權益初稿、農友確認初稿、股東權益完稿	專任助理小君
招募股東	確認招募計畫、執行招募計畫、製作認股表單、製作宣傳DM、印製宣傳DM、張貼&發放DM、粉絲專頁宣傳、公布欄文宣張貼、校內群組信寄發、舊股東宣傳；寄發匯款通知，對帳、寄送認股完成確認信、認股證書製作、寄送未掛牌股東認股證明	專任助理小君+兼任助理阿慧
辦理掛牌活動	籌備期：與農友商談和籌備活動內容、發送宣傳訊息、確認報名參加者、與農友確認開放認養的果樹座落、掛號碼牌、股東名牌設計與討論、招募學生志工 活動當天：安排人力、分派工作、採排順流程、場地布置、掛牌用品準備、活動主持、活動記錄、股東報到、現場收費、車輛接駁安排、交通指引、停車安排、餐點與餐具準備 事後工作：場地復原、活動檢討、於臉書粉專發布活動紀錄	專任助理小君+兼任助理阿慧+團隊其他兩位博士後研究員（4名），以及學生志工（2~3名）、農友的親友後援隊（2~6名）
發布果樹生長與農友田間管理資訊	不定期拜訪農友、紀錄與發布農友田間管理的情形、發布其他產地農作相關情報	專任助理小君
辦理採收活動	略同掛牌活動，但採收活動參與的人數較多，相關工作量增加	同掛牌活動

接下來藉由筆者實際投入場域與行動方案的田野觀察資料，以及2017年產季結束後的農友訪談資料，檢視上述假設在介入之後是否得到回應，並且嘗試回答果樹認養行動方案的推行過程中，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交換模式是否被鬆動與改變，參與其中的農友與股東是否看穿經濟霸權的掩飾效應，以及純買賣的產消關係是否添入非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元素等問題。

### （一）以環境需求為目標進行生產和消費

果樹認養行動方案要求合作農友必須採取環境友善耕作，從放棄使用除草劑



開始，接著是盡可能地減少使用化學肥料與農藥。最終，我們期望每位農友可以各自找出最適切的環境友善栽培農法，並且能夠持續並擴大面積施做。

柳橙農友阿銘原本就採行懶人農法，面對村莊鄰里對這種務農方式的訕笑和不支持，阿銘認為自己堅持這種作法是「『憨人』但不是『笨蛋』」。我們看到他的「憨」，是不在暑氣濃烈的時間點到果園裡工作，在農事較閒的季節有時午覺會睡到三點；或是放任松鼠盡情地享用果園裡的柳橙，說吃剩的我們人類再收就好。更「憨」的是，他還曾經撿回一隻從樹上掉下來的幼松鼠回家養了好一陣子，他太太小婷笑說「是不是柳丁太多怕沒人吃」。即使能以輕鬆的態度看待自己與其他人不同的務農方式，阿銘夫婦仍然對懶人農法沒有信心，因為生產出來的柳橙賣相不佳，每回試著送果菜拍賣市場，結果都是「價格很差」。在研究團隊接觸並提議想和他合作果樹認養時，阿銘的想法是可以試試看，因為他正一年一年地減少農藥噴灑次數，「有人願意在還沒看到東西前就付錢，當然很好」。在實施減農藥栽培的過程中，阿銘認為有機農業的壓力太大，也沒有通路，自己想要少噴農藥獲得健康，但合乎安全用藥並貼上吉園圃標章的柳橙，送到果菜市場拍賣反而價格差，一直以來他的經驗與感受是消費端沒有什麼人願意支持。至於合作推動果樹認養讓一群消費者不嫌遠地跑到產地，親自到果園裡，阿銘的太太小婷每次辦採果活動看到一大群股東在果園裡認真採、認真吃，都會說「感動到起雞皮疙瘩」，她認為這些股東以行動證明「接受我們的作法」。少用農藥、留一點給動物吃的農法，照顧了自然環境，而以此農法栽培出來的柳橙「很好吃」，阿銘夫婦因為這群股東的出現和支持有了信心，現在也敢大聲地跟村莊裡的農民說「不用太多藥就會很好吃」，不像以前面對嘲諷只能微笑以對。甚至在阿銘柳橙園附近的農民也被動搖，開始實行減農藥栽培。

荔枝農友阿志會想嘗試環境友善農法，最主要是因為他和太太兩人都相當討厭灑農藥。「農藥很臭啊，沒有人會喜歡！」但為什麼農民還是得無可奈何地噴灑農藥？阿志與太太小慧說：「如果可以不要用藥，農民也很開心，但市場要求『漂亮』啊！」在1990年代就開始積極報名參加有機農業課程的阿志夫婦，

相當認同農業要對環境友善的理念，經過幾番嘗試他們感受到的是消費者「認同作法但不認同價格」。在產量減少的情況下若是產品賣不出去，便會產生經濟壓力，因此阿志一直不敢再更大膽地轉型。阿志以玫瑰紅荔枝來合作果樹認養，是因為他認可農業要適地適種，於是打算放棄玉荷包改種適合當地的玫瑰紅。阿志說果樹認養的作法，讓他可以嘗試轉型做環境友善農法，而「不用煩惱東西沒人要」。玫瑰紅荔枝的著果率尚未穩定，合作認養的兩年當中，股東收成量差異很大，2017年有位股東從樹上收下17台斤的荔枝，也有位股東讓小女兒在現場邊採邊吃，樹上荔枝就採完了。在與股東互動的過程中，阿志夫婦感受到的是這群股東是有理念的，「從他們一開始會問有沒有其他友善的產品可買，而不是只關心價格，就知道他們的價值觀不同」。消費者能夠理解環境友善的耕作方式，並以行動支持（成為股東），讓阿志夫婦有信心在下一個產季繼續推動玫瑰紅荔枝的認養、堅持環境友善的栽培。

椪柑農友阿福本身對果園土壤的照顧自有堅持，草生栽培外並試驗用落果或淘汰果製作酵素，當作液肥來施用，但對於殺蟲劑與殺菌劑等農藥的使用，遲遲未能往環境友善的方向再做改變。2016年研究團隊與阿福洽談合作時，花了一段時間才得到肯定的答覆，他當時想「如果是做慣行的，就沒意思了」，於是決定使用「有機資材」來處理病蟲害。果樹認養的方式讓阿福可以較無後顧之憂地大膽挑戰有機的管理方式，他曾開玩笑地說他當時想：「也許試了以後樹會死掉，但也還是有收到錢，可以用這錢買新的苗再補。」2016年，阿福使用有機資材防治病蟲害，在快要成熟時進行套袋以防治東方果實蠅，但試驗的結果是防不了病蟲害，最後介殼蟲爬滿椪柑的蒂頭，像住在天堂一樣快樂地繁衍後代。這一年收成不好，椪柑成熟度也出了問題，原本阿福已經放棄，認為椪柑要做有機不可行，但阿志一句「不然要走回頭路嗎？」點醒了他，阿福決定挑戰第二回合。他的想法是，股金一次調整到符合環境友善生產成本和能維持生計的標準，若是這個價格沒有人願意接受，那他就照原本的農法來耕作；若有人接受願意認養，那麼就努力想辦法來解決問題。2017年的椪柑股金6,800元，是一筆不小且

實實在在的支出，他叫他的親朋好友不要來相挺，我們也沒有積極宣傳祭出苦肉計，一如往年只以臉書粉絲專頁和電子郵件發送股東招募的宣傳訊息，最後認養出19股。姑且不論這其中與研究計畫直接相關的人士占了9股是否是被動之以情來認養的，阿福因為這些股東再次有了動力嘗試環境友善耕作。股東預先支付的股金對阿福來說是一筆投資，實質上可以用來購買資材（如有機資材和搭建小型簡易網室），他也說「有收入就可以放心去做」，在此意義上，股東推動了農友繼續朝環境友善耕作方向前進。2017年椪柑大豐收，阿福以整棵樹套網的作法成功地減少介殼蟲與東方果實蠅的危害，經過這一年的經驗，他感受到以環境友善農法耕作的關鍵是要找到願意購買的消費者，他說「顧得健康，但一斤只剩5元，這就是農民最大的障礙」。果樹認養讓阿福可以照顧地球的方式耕作，卻不至於損失太大而影響生計。

合作農友雖然出於自利考量，例如，希望自己不要吸到農藥也不要讓家人接觸農藥，期望多方嘗試並創造多方通路等，但也看到他們關注自然環境與生態的行動，以及持續的轉型行動。參與認養方案的股東雖然是為了獲得安全無農藥殘留的食物，但在每一次辦理的產地拜訪暨掛牌活動與採收活動過程中邀請股東分享心得時，大部分股東都提到加入果樹認養是想要支持對環境友善的農業；也有連續參與三年的股東提問關心什麼時候可以完全不用農藥來進行生產。股東雖然仍有自利考量，但也體現出對公共財（自然環境的永續）的關注。

果樹認養行動方案的訴求不是行銷農產品或幫助農民生計，而是邀請認同此理念的消費者共同來支持轉型，在這三年的實作過程中我們看到農友與股東並非完全的自利者，也沒有追求各自的利益極大化而欺騙或欺壓對方。在上述過程裡我們看到一個以環境需求為目標的經濟活動被落實出來。

## （二）鬆動與重構主流的「經濟」概念

果樹認養行動方案要求股東在共享收成前必須與農友共同承擔風險，意謂著

若遭逢天災而造成農損時，股東預先支付的購買金額不會得到原先預期的收成，也不會退回預付款。此一制度設計挑戰了主流經濟中的「一分錢一分貨」概念。農業生產與自然緊密地連繫，不可預期的氣候變化可能影響收成，而採取環境友善耕作栽培，更可能讓收成因病蟲害而損失，消費者在參與果樹認養過程中體認到付出的金錢與報酬之間，不一定符合主流經濟認知中的交易「合理性」。我們期望在此一制度設計下，能夠與農民及股東共同思索食物生產和消費系統中的「買賣關係」，並重新建構商品交換的經濟認知。

在果樹認養行動方案執行過程中，2016年及2017年遭遇氣候變遷，果樹生長受到影響。冬季氣溫偏高使得需要歷經低溫一段時間才能促進開花的荔枝受到影響，開花率不高，加上開花期下雨又降低了著果率，而著果後雨量不足也讓荔枝果實長得比較小顆；椪柑與柳丁在2016年則面臨夏季缺水又高溫，果實曬傷與水分不足的情形嚴重。

這些天候造成的農產損失，在一般的經濟模式中都由農民承擔，消費端對此感受不深，大部分只會覺得食物價格上漲，若是水果類漲價就放棄購買漲價的水果，改選其他較便宜的水果替代。2016年認養椪柑的股東，若就主流經濟概念來評估會認為他們缺乏交易理性，竟然可以接受投資或支付金錢後得到不對等的報酬。椪柑農友阿福對第一年的收成非常不滿意也自覺對股東相當愧疚，甚至認為股東們可能不會再繼續認養，於是萌生退出果樹認養行動方案的想法。但就2017年椪柑認養的狀況來看，在認養金額調漲2,400元後，仍有股東願意支持認養19棵樹，雖然回流認養的股東只有8股，仍舊給予農民信心願意繼續走向轉型環境友善農法之路。願意與農民共同承擔氣候風險的股東即使不是多數，但他們的行動體現了對食物這種商品的另類交換觀點，認識到食物與其他工業生產的物品不同，食物是生命且隨時受到自然環境變化的影響。

共同承擔風險的機制讓股東在支付金錢後有可能得到不對等的報酬，這樣的不對等有可能是損失；相反地，也有可能是所得超過所支付的，例如，果樹豐收的情況下，股東可以收穫比預期還多的所有收成。另外，產地拜訪暨掛牌活動與

採收活動所繳交的活動費用，通常也會讓股東感到「物超所值」，農友與家族以招待朋友的心態來準備茶水點心，所提供的量和品質都超過向股東收取的活動費用。農友認為不要太計較，讓大家開心才是重點，這是「鄉下人的待客之道」。在果樹認養行動方案的實際運作過程中出現許多非共量性的交換活動，這促使消費者反思「食物是什麼樣的商品」、「該用多少貨幣來交換才合理」等問題，而有機會跳脫原本的消費慣性。

作為中介組織的研究團隊在其中則發揮揭露生產過程資訊的功能。我們認為消費者對生產地與生產過程的不了解，導致只能從消費者權利的面向來看待食物交換，因此，作為中介者的專案經理在一年中不定期地拜訪合作農友，記錄其栽培管理方法和果樹生長情形，再將記錄圖文上傳所經營的網路社群媒體，讓股東和其他消費者得以「看見」果樹一年之中的生長情形，包括各種果樹會遭遇的蟲害或病害，農民的應對方式，以及氣候造成的影響，都是記錄與資訊揭露的重點。藉由網路社群媒體傳達動態訊息之便，讓農友現身說法也是促進消費端對生產端面臨的各種風險與心情，有更深刻認識的方法之一。中介組織的存在銜接生產與消費兩端群體的資訊流通，歐美地區的社群協力農業經驗也顯示中介組織的重要性（Henderson and Van En 2007），但在嘗試鬆動消費者既定的「經濟」觀點上，研究團隊的介入更具有企圖性。

參與果樹認養行動方案的合作農友又如何看待這種非主流的經濟模式？水果在主流商品市場中屬於價格波動的商品，隨著年度豐收或減產、產期前後差異等，價格波動幅度有時會讓農民血本無歸，遭遇天災等農損時即使價格飆漲也可能沒有產品可供出售。消費者共同承擔風險的作法可減緩農民收入減少的衝擊，而農民得到的不僅是股金保障帶來的穩定，還包含被支持的安全感，這是農民在市場經濟系統中最缺乏也最需要的。椪柑農友阿福在2016年面對椪柑產量與品質不如預期時，對於股東能夠共同承擔風險有深刻體會，一群素昧平生的人給予經濟和情感支持，使他感到有一股溫暖力量鼓勵他堅持環境友善農法。

果樹認養行動方案目前的運作並非全面性地取代其他銷售通路，但作為果樹

農家的收入多樣化策略，一群固定股東的金錢與精神支持能夠緩衝市場經濟波動帶來的衝擊。對消費者而言，在參與果樹認養的過程中能夠親身體會食物交換模式並不一定依主流經濟邏輯運作，尤其是「食物」這類商品更容易引發道德層面的關懷，從而可以動搖強調交易理性此一主流的經濟認知。研究團隊作為中介組織，在設計運作機制，生產資訊揭露，或舉辦各種活動時所做的各種嘗試，著重的是交易背後的更多價值能被看見，並期待參與其中的行動者改變對「經濟」的單一想像。

### （三）產消間的純買賣關係多了人情與支持

生產者與消費者在資本主義經濟運作邏輯中是兩個相互對立的群體。日常生活中消費者總會懷疑或猜忌賣方的產品售價與品質，而農民總是覺得消費者不理解農產品生產過程的付出，又愛討價還價、貪便宜。如此不同立場的兩個群體，甚至是相互陌生的人們之間，要如何建立社會關係並組成相互支持的社群？

「果樹認養」方案要求消費者必須購買一整棵樹的收成，並且預先付款。農友對於股東預先付款的行動其實感到訝異，他們認為願意在收到商品的半年前就支付所有費用、願意信任農友，這樣的消費者和他們投入減農藥栽培，都一樣是「傻子」的作為。柳丁農友阿銘的太太曾說，他每次想到這群股東就會感動到起雞皮疙瘩。因此，當股東到產地參與掛牌和採收活動時，合作農家幾乎全家總動員地熱情接待。

關於社群的形成，社會學者陳東升在一篇談論社群治理的文章中提到，「傳遞願意相信別人與值得被別人信任的訊息，會促進合作」（陳東升 2012），果樹認養行動方案中股東的預先付款傳遞了願意相信農友的訊息，使得一直以來投入環境友善農法卻沒有得到鄰里認同的農友感受到被理解和支持，於是願意朝永續型農業轉型。

椪柑農友阿福在六年前開始種植椪柑時，便已採行不使用除草劑的草生栽培

農法，對於是否要进一步減少農藥使用以達到無農藥殘留，卻無法下決心有所行動，但參與果樹認養行動方案，在有了一群認養股東的支持後，他覺得有了後盾可以放手試驗，不必煩惱減農藥栽培下的椪柑會因為外觀品質差而賣不出去。對果樹農家而言，總是要勞動一整年等到收成賣出後才有收入，等待收成前還必須祈禱老天爺不要收走當年的收成。椪柑農友阿福是典型較依賴單一作物的農家，當他在年中收到果樹認養股金時，傳了感謝訊息給專案經理人，表示這是他今年第一筆收入。果樹農家的這種生計模式不同於薪資勞動者，只要每日出勤上班就會有薪資報酬。果樹農家的收入不穩定使得他們沒有條件冒風險改變，以免失去一整年的勞動成果。

預先付款的機制雖然不能完全改善果樹農家的生計，但至少帶來一部分的穩定，並且有基礎條件可在耕作上進行轉型、試驗減農藥栽培。柳橙農友阿銘與荔枝農友阿志都在股東願意相信的情況下，從關注自身健康而減少農藥噴灑，進步到希望消費者吃得安全而追求農藥零檢出。同時，農藥殘留檢驗從有驗出但合格，到零檢出，以及生產過程的透明化，農友都傳遞值得股東信任的訊息。原先立場對立的兩群人最後可以形成相互支持的關係，信任他人與值得被信任的訊息先從某一方發出後得到回應，然後形成雙向循環的作用。在這過程中我們看到，預先付款機制發揮了「啓動」作用，使得「互惠」被實踐出來。

社會經濟強調互惠關係，在果樹認養行動方案的實際運作過程中，可以看見股東與農友之間因為有信任基礎而來的強互惠交換。同時在雙方互動過程中，也發現農友自發性地設計出對自利者的懲罰機制。例如，在果樹認養行動方案中，股東被要求參與採收勞動，並在股金上預先收取活動費用，若日後不能參加也不退回預付款項，這是帶有半強制性質的要求。此外，未能親自採收的股東，需要另外支付採收工錢、紙箱包材和運費，相較之下等於是比親自採收的股東以較高的單價購買了產品。柳丁農友阿銘認為，願意親自來採收的股東值得獎勵，若對方認養的果樹收成量不佳，農民通常會提供另一棵果樹採收，至少可達到預期收成量；至於沒有來採收的股東則委由農民協助採收寄送，會收到平均產量的收

成，而不會更多。在第一次的柳丁果樹認養計畫中，參與採果的股東平均獲得150斤左右的柳丁，超過原先預估的產量，沒有參與採果的股東則維持預估產量120斤。願意前去自行採收的股東不僅幫助農家減輕農事勞動，在果園間農民照顧果樹一整年的心情和感想也獲得認識與理解，同時股東獲得實質鼓勵，雙方發展出互惠行動，使得社群連結可穩固發展。

要求股東參與採收勞動的機制，同時也是鼓勵果樹股東到產地與農友進行面對面的互動與交流。當代消費者普遍對餐桌上的食物是怎麼來的感到陌生，對生產過程、生產地與生產者的疏離，使得消費者只能依價格與外觀來做購買選擇。水果是最容易以外表美觀作為判準而進行挑選的食物，但消費端在追求外觀好看之際又指責農民沒良心噴灑過多農藥生產有毒水果；反之，在生產端，果樹農家若認為消費者只想買外觀好看的水果，那麼，他們就只能噴灑農藥來防止病蟲害造成外觀損傷。外觀有瑕疵的水果，在主流市場上是被淘汰的格外品，<sup>16</sup> 若是不按生長期施用各種殺蟲劑或殺菌劑，果實外表就會受損甚至掉果，柳丁農友阿銘就因為一年只施用一次殺蟲劑，使得產量從慣行栽培時代的30萬斤銳減為8萬斤。阿銘的母親三十年前親手將柳丁樹苗種下並栽培長大，看到產量減少很擔憂柳丁樹會受病蟲害影響而枯死，成為家中反對環境友善農法的人。柑橘類水果自開花結果到成熟，需歷經八至十個月的風吹日曬雨淋與各種昆蟲和微生物的親近，這些發生在農田果園裡的細節，只有親自到產地才會深刻體會。當股東到產地參與活動時，中介組織與專案經理人會特別提醒農友要向股東說明照顧果樹的過程，特別是果樹會遭遇哪些病蟲害，為何不得已需要使用某些化學資材，在轉型的栽培方法上採取了什麼具體措施。聽到這些敘述的股東，通常都會驚呼表示「原來如此」、「我們以前都不知道」、「原來要吃到一顆美味的水果不容易」或「到底市面上這麼便宜的水果究竟是怎麼回事」等等；一位已參與認養方案三年的股東甚至認真地拿起紙筆，記下這些平常接收不到的訊息。消費者直接到產地

<sup>16</sup> 農產品在市場中通常會依其大小、外觀、形狀等進行好壞等級劃分，在最次的等級之外，無法進入市場的被稱為規格外產品，簡稱「格外品」。



面對土地上生長的果樹，會理解到手中食物是有生命的物體，會珍惜和同理種植者的辛勞，也會反思市面上廉價食物的成本是轉嫁給了誰。即使消費者並未真正認識到食物交換流通系統中的不平等權力關係，也會開始對這被蒙蔽的過程產生質疑，那麼，商品拜物教所造成的掩飾效應會逐漸失效。

一位自2015年即加入的股東已連續參與三年並認養三種果樹，在產地拜訪暨掛名活動或採收活動中請股東分享心得時，他總是提到之所以加入果樹認養行動方案是因為喜愛這個地方。即使需要搭公共交通工具前來，這位股東每次都雀躍地報名並帶著朋友一同前來參與活動。農家每當看到去年認養的股東「回來」，就會展露遠房親戚回家一樣的心情，開始思考要準備什麼美味料理來招待。農友與股東之間所形成的連帶，有如家人關係的延伸，發展出家族般相互支持的社群。

位於農食系統消費端的角色以勞動投入來換取食物的模式，有如「多樣經濟」概念所標示出的另類交換模式，亦即「實物支付」(in kind) (Gibson-Graham 2006: 71)。生產與消費兩端的人們因為看見對方的臉孔，會增加熟悉感並增生情感，雙方會知道彼此不是單純的買賣關係，而有更多相互照顧的關係 (Wells and Shelly Gradwell 2001)。果樹認養行動方案嘗試對食物交換此一經濟活動提出另類可能，透過面對面的直接連結，將生產者與消費在缺乏社會鑲嵌基礎的高度個人化消費社會中，重新鑲嵌進社會關係，以連結取代對立、以互惠取代自利，並形成社群。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可以發現社群內部形成共同價值的認同和一套運作規範，使得具有社會經濟意涵的合作行動得以被實踐。

## 五、結論

本文的提問是在資本主義根深柢固的商品交換系統中，如何重構經濟的社會性，讓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純買賣關係被改變？主流的經濟霸權所帶來的掩飾效應如何透過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直接連結而被揭露和改變？如何在實踐中解構與

重思被自然化的「經濟」概念？我們以「果樹認養行動方案」嘗試回應。

在方案實作過程中，我們發現所有行動者在此一新的社會關係之中，在展現利他與互惠等富有社會經濟意涵的互動，同時形成相互理解、關懷與支持的社群。即便當前果樹認養行動方案的生產與交換制度無法完全取代資本主義運作，但在社群的支持下，為果樹農家帶來部分的穩定與安全感，而消費者也可獲得值得信任的安全食物，以及被鑲嵌在社會中的群體感。

果樹認養行動方案的實踐核心在於創造無法以主流經濟觀點衡量的社群支持與幸福，這也正是社會經濟所嘗試奪回的另一種經濟認知。期望食物的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能夠超越秤斤論兩的買賣關係，建構人與人之間的真誠交流與相互理解，填補個體化社會中人們對於集體、社群與社會的需求。

## 參考文獻

- 陳東升，2012，〈社群治理與社會創新〉。《臺灣社會學刊》49: 1-40。
- 賴鳳霽、譚鴻仁，2011，〈臺中合樸農學市集的形成過程：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觀點〉。《地理研究》54: 19-42。
- 韓德森、凡恩著，李宜澤、林震洋、蔡晏霖、許敏鳳、呂欣怡、劉逸姿、林大有譯，2011，《種好菜，過好生活》。台北：商周。（Elizabeth Henderson and Robyn Van En, 2007, *Sharing the Harvest: A Citizen's Guide to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White River Junction, VT: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 Amin, Ash, 2009, "Locating the Social Economy." Pp. 3-21 in *The Soci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Solidarity*, edited by Ash Amin. London: Zed Books.
- Boström, Magnus and Mikael Klintman, 2009, "The Green Political Food Consumer: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and Policies." *Anthropology of Food*, no. S5(September). <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aof/6394>
- Brunori, Gianluca, Adanella Rossi and Francesca Guidi, 2012, "On the New Social Relations around and beyond Food. Analysing Consumers' Role and Action in Gruppi di Acquisto Solidale (Solidarity Purchasing Groups)." *Sociologia Ruralis* 52(1): 1-30.
- Buttel, Frederick H., 2000, "The Recombinant BGH Controversy in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 a New Consumption Politics of Food?"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17(1): 5-20.
- Constance, Douglas H., 2008, "The Emancipatory Question: The Next Step in the Sociology of Agrifood Systems?"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25(2): 151-155.
- Friedland, William H., 1984, "Commodity Systems Analysis: An Approach to the Sociology of Agriculture." *Research in Rural Sociology and Development* 1: 221-236.

- Friedmann, Harriet, 1993,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od: A Global Crisis." *New Left Review* 197: 29-57.
- Gibson-Graham, J. K., 2006, *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Gibson-Graham, J. K., 2008, "Diverse Economies: Performative Practices for 'Other World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2(5): 613-632.
- Gibson-Graham, J. K., Jenny Cameron and Stephen Healy, 2013, *Take Back the Economy: An Ethical Guide for Transforming Our Communit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Goodman, David, 2004, "Rural Europe Redux? Reflections on Alternative Agro-Food Networks and Paradigm Change." *Sociologia Ruralis* 44(1): 3-16.
- Goodman, David, Bernardo Sorj, and John Wilkinson, 1987, *From Farming to Biotechnology: A Theory of Agro-industrial Development*. Oxford: Blackwell.
- Goodman, David, E. Melanie DuPuis and Michael K. Goodman, 2012,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Knowledge, Practice, and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 Goodman, David and Michael Redclift, 1994, "Constructing a Political Economy of Foo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3): 547-552.
- Gunderson, Ryan, 2014, "Problems with the Defetishization Thesis: Ethical Consumerism, Alternative Food Systems, and Commodity Fetishism."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31(1): 109-117.
- Guthman, Julie, 2004, *Agrarian Dreams: The Paradox of Organic Farming in Califor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enderson, Elizabeth and Robyn Van En, 2007, *Sharing the Harvest: A Citizen's Guide to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White River Junction, VT: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 Marsden, T. K. and A. Arce, 1995, "Constructing Quality: Emerging Food Networks in

- the Rural Transiti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7(8): 1261-1279.
- Murdoch, Jonathan, Terry Marsden and Jo Banks, 2000, “Quality, Nature, and Embeddedness: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Food Sector.” *Economic Geography* 76(2): 107-125.
- Murdoch, Jonathan and Mara Miele, 1999, “‘Back to Nature’: Changing ‘Worlds of Production’ in the Food Sector.” *Sociologia Ruralis* 39(4): 465-483.
- Polanyi, Karl, 2001[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 Roff, Robin Jane, 2007, “Shopping for Change? Neoliberalizing Activism and the Limits to Eating non-GMO.”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24(4): 511-522.
- Scott, James C., 1976,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erragni, Laura, Magnus Boström, Bente Halkier and Johanna Mäkelä, 2009, “Can Consumers Save the World? Everyday Food Consumption and Dilemmas of Sustainability.” *Anthropology of food*, no. S5(September). <http://aof.revues.org/6379>
- Weatherell, Charlotte, Angela Tregear and Johanne Allinson, 2003, “In Search of the Concerned Consumer: UK Public Perceptions of Food, Farming and Buying Local.”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2): 233-244.
- Wells, Betty L. and Shelly Gradwell, 2001, “Gender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as Caring-practice.”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18(1): 107-119.

## Social Economy Practices in a Fruits Harvesting Club's Action Plan

Yi-ting Chung

### Abstrac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food safety issues are derived from industrial mass production modes and capitalist commodity schemes. As physical distances between food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have become longer,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have become alienated, misunderstood, and fram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profit maximization. Taiwanese have recently witnessed multiple innovative projects involving food supply chains in an effort to facilitate direct connections between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However, if the masking effect of commodification or dominant recognition of economy cannot be addressed, it is likely that any rebuilt relationships that emerge will revert to capitalist market model. This paper uses an action plan called “Fruit-Harvest Club” to examine the potential for reconnection and the re-embeddedness of 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in institutions created in the name of community-supported agriculture. 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implications of social economy in the interactions and practices of the producers, consumers, and facilitators involved in the plan, and argues that the “Fruit-Harvest Club” reflect the logic of action different from capitalist mode, the reframing of the recognition of commodity exchange and facilitating the individual reembedded in the community. We found that actors in these new forms of social relations represent altruism and reciprocity in terms of understanding, caring, and supportive communities. Even though the Fruit-Harvest Club and others of its kind cannot completely replace capitalist operations, fruit farmers can take little risk and

---

Yi-ting Chung,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of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NCKU (Aug, 2013-March, 2018),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of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Apr, 2018-).

consumers can harvest safe food and gain a sense of belonging in social relations, as well as in efforts to transform the capitalist to social economy.

**Keywords:** fruits-harvest club, community-supported agriculture, sociological practice, social economy

## 8

# 農耕實踐的永續轉型： 成大團隊與東山小農的經驗

蕭惠中

---

本文的完成得力於整體成大研究團隊的協力，以及實踐場域中的朋友與熱情有活力的成大學生。特別感謝於東山實踐場域共同工作四年的團隊成員：鍾怡婷、陳佩君、林睿騏，自第二期開始參與的成大生命科學系李亞夫教授，以及大力支持每位研究伙伴的計畫主持人戴華教授。

蕭惠中，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博士後研究員。E-mail: hueichung@gmail.com。



## 中文摘要

本文以成功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在台南東山淺山地帶，即「大東原地區」農村所進行的社會實踐行動方案為案例，探討社群運作如何促進農耕實踐永續轉型。該方案預設農耕實踐的永續轉型需要重構與積累農人的生態、文化與社會資本，並主張透過集體的共同學習與實作，經營持續運作中的「實踐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來達到上述的目標。筆者作為實踐團隊的一員，借用 Bourdieu (1986) 的場域 (field)、慣習 (habitus) 等概念，爬梳方案的執行過程，以及對研究參與者的影響，來反思上述的行動假設。

本文指出，成大研究團隊所推動的「農友共學堂」與「果樹認養行動方案」，可以說為參與其中的農友建構起一個以環境友善與產消共好為主題的另類農業場域。然而，這個另類的農業場域，在耕作的知識技術成熟度，相關的物質與社會支援網絡的完整性，都仍然在建構當中，加上支持農作生產的生態體系重建需要相當的時間，因而農友在嘗試轉型的過程中，往往面臨主流慣習與另類思維作法之間的拉鋸戰。在行動策略上，本文指出透過有類似理念的農友頻繁地對話與互動，再加上認同環境友善、遠道而來的消費者實質與情義的雙重相挺，建構轉型中農民以環境友善為核心的「新好農人」認同，可以為農民在與生態環境建立新關係的磨合過程中爭取時間與耐性。同時，運用生態系統觀念的「輸入替代」轉型策略，例如微生物應用與生物防治，是讓關注生產的農民認識生態系統與農業之間關聯的有效窗口，有機會協助農民具體地理解並實踐生態化農耕。

成大團隊在沒有農業技術背景的情況下，以建構在地實踐社群平台的協力者角色進場，透過共學共作的社群運作模式，逐漸推進大東原地區有志朝向永續轉型農友的轉型進程。考量到未來成大團隊退場後，在地行動者包括：合作農友、在地既有農業相關組織與新興的創業平台，是否能夠承接此社群串聯與組織的角色，是為在地農業走向「自主調節」(self-regulation) 的重要課題。

**關鍵字：**農業場域、永續轉型、實踐社群

## 一、前言

當代主流的農耕實踐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透過農業綠色革命的全球推展，逐漸建立起來的工業化糧食生產模式，主要的內涵包括：大規模的單一作物種植，使用化學肥料與農藥來控制生長條件，品種改良與單一化，機械取代人力等等。然而，這個宣稱餵飽了不斷上升的全球人口之生產模式，卻同時間嚴重破壞地球珍貴的水源、生物與土地資源，製造大量的溫室氣體（占人類製造總量的二至三成），可說正侵蝕著人類文明生存的根基（郭華仁 2013a；IPES-Food 2016; Third World Network and SOCLA 2015; UNCTAD 2013）。

事實上，對於工業化農業模式的批判，二十世紀初期就有先行者提出，是為有機農業的濫觴（郭華仁 2012）。經過近一個世紀，集結世界各地農民、運動者、研究者與相關機構的努力（Altieri and Toledo 2011; Gliessman 2012），如今聯合國的相關報告亦正式肯認，實現一個以在地生態系統而非石油工業為基礎的農業新典範的必要性。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在2013年發表的「在一切都太晚之前覺醒：於變動的氣候中為糧食保障建構真正永續的農業」（*Wake Up before It Is Too Late: Make Agriculture Truly Sustainable Now for food Security in a Changing Climate*, UNCTAD 2103）文件中，提到要回應氣候變遷這個巨大的課題，人類社會必須從綠色革命為基礎的生產模式，轉移到以整全觀（holism）為基礎的、小規模（small-scale）、再生的（regenerative）、生態農業（agro-ecological）的新典範。更早之前，聯合國食物權特別報告員 Olivier De Schutter（2011）於2011年3月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提出報告，指出生態農業不管在發展中或是已開發國家的案例，都展現出對於在地食物生產與食物權保障方面正向的貢獻，尤其生態農業強調運用在地資源創造高生產力的農業系統，讓貧窮農民也有機會藉此改善基本的生活條件。換言之，農耕實踐的轉型能夠同時對生態與社會永續性的提升做出貢獻。

台灣的農業生產方式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相當程度地受到綠色革命，以及糧食

供應鏈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的影響，不論在農業生態環境、社會公平、食品安全和糧食保障議題上，都有值得擔憂之處。農藥與化肥的過度使用問題嚴重，近年來農政單位已列為輔導農民的主要課題。長期重工輕農的政策之下，農家的務農所得持續偏低，造成青年從農意願薄弱，加上農村人口高齡化、勞動力缺乏，農村的發展嚴重失調。此外，在能源價格高度波動與極端氣候頻繁的狀態下，近年來只剩三成左右的糧食自給率，無疑是將台灣社會暴露在高度風險之中。事實上，近二、三十年來，台灣有許多農民與民間團體關切這些議題，並且力行與推廣農耕實踐的轉型（徐福君 2006；陳信煜 2012；吳鳳慧 2013；羅恩加 2016）。

本文以成功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以下簡稱人社實踐計畫）在台南市東山區的淺山農鄉地帶所進行的社會實踐行動方案為案例，探討社群運作如何促進農耕實踐永續轉型。該方案預設農耕實踐的永續轉型需要重構與積累農人的生態、文化與社會資本，並且主張透過集體的共同學習與實作，經營持續運作中的「實踐社群」，以達到上述的目標。本文透過爬梳方案的執行過程，以及對研究參與者的影響，來審視上述的行動假設。

## 二、實踐理論與取徑：三種資本的重構與「共學共作」

科技部推動人社實踐計畫，宗旨在於推動大學走入在地社區，針對當前社會所面臨的重要議題，進行具有「社會創新」意涵的實踐與研究。因此，執行計畫的成大團隊所扮演的角色不僅是研究者，也是真實社會場域中的行動者，需要帶著人文社會學科的特定價值取向，介入社區的實踐領域，並在實務經驗中與學科領域的理論進行對話與反思，貢獻於社會轉型與改革的實踐工作。

行動研究於是成為研究團隊所採取的研究取徑。行動研究有幾個特點：首先，行動研究的重要目的是改進真實情境中的實踐（to improve practice），並由實務者（practitioner）自身透過研究反思與實際的行動來達成。因此，行動研究的主題必須是在真實社會情境中有意義的、對改進實踐有幫助的。其次，行動研

究的本質是參與的（participatory），研究者必須參與到真實的社會情境當中，與生活其中的社群進行自然地互動，並尋求合作，共同推動實踐與研究的進行。行動研究者基本上認為社會是一個複雜、互動的系統，必須要進入其中、進行觀察與實際行動，才能帶來真正的理解與改變（Craig 2009; Townsend 2013）。

成大團隊自2013年下半年計畫啓動之初，開始接觸位於台南市東山區的嶺南社區，預定作為計畫成員進行實作的場域。嶺南社區是一個高齡化趨勢明顯的農業村莊，社區內的組織與集體活動，因2002年開始、延續了十年的廢棄物掩埋場抗爭行動而活絡起來。團隊開始與社區互動時，掩埋場的爭議已經逐漸平息，當時社區的帶領者關切的問題是：抗爭十年所努力保護的家鄉，誰來繼承？如同大多數的台灣農村，嶺南社區青壯輩的人口幾乎都到都市發展，「十年後你們都市人就吃不到龍眼乾（東山一帶的主要農產）了！」嶺南里長這麼對團隊說。從積極帶動抗爭到選上里長，嶺南里的陳里長很認真地思考社區的未來，因此一方面積極爭取資源辦理龍眼節活動，另一方面嘗試以有機無毒的方式生產農產品，希望藉此提升在地農產的價格，但前者效果有限，後者的試驗結果是自家的柳丁樹不敵病蟲害而大量減產，顯見農業的加值與轉型在現實中有多重挑戰，不易突破。

嶺南社區遇到的是全台灣小農共同面對的結構性問題。在這裡「小農」指的是一般的家庭式經營農戶，他們的耕作面積、<sup>1</sup>資本規模、可支配勞動力比農企業要小得多（黃樹仁 2002），在與市場互動時缺乏喊價的本錢，也難以自行建立品牌與銷售管道，因此賺或賠全由市場決定，無法真實反映成本與農家生計的需求。<sup>2</sup>台灣在貿易自由化的過程中，不斷開放國內的農業市場，亦讓國內的農產

---

<sup>1</sup> 以全國農地平均分配給全國農戶數來計算，台灣每一農戶耕作的平均面積約為一公頃（黃樹仁 2002）。

<sup>2</sup>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台灣家庭收支調查」，2014年農家的平均家戶年收入是984,815元，其中有78.02%的收入並非來自農業（即兼業所得），同年非農家的平均家戶年收入是1,175,586元。

面臨外國農產的低價競爭。消費者主要透過一般的市場管道購買食品，對於食物的生產過程缺乏認識，多以外表與價格作為選購依據，間接鼓勵農民採取可以種出低價多產、外表漂亮農產的種植方式，也就是使用化學農藥肥料的慣行農法。再者，即便農民有興趣採取有機方式進行栽種，農業土地與生態環境長期受到化學物質的干擾，已經無法支持作物健康生長，必須花費數年的時間以及相當的資源與勞力，讓土地與作物恢復，農民也必須付出額外的時間與精力，學習新的知識與技術，以進行有效的有機農業管理。轉型有機需要承擔的各種成本與風險，往往讓多數的小農卻步（葉虹靈 2007）。

事實上，全球的小農都面臨類似的處境：全球化與被少數大企業壟斷的市場，生產端與消費端的距離越來越遠而相互不理解，工業化的生產方式使生產條件受到外部控制並傷害土地的自然生產條件（Carolan 2016）。研究團隊在思考進入東山場域的行動架構時，參考 van der Ploeg（2008）對於世界各地小農運動如何回應與改造當代農食體系的分析。van der Ploeg 指出這些草根小農運動的主要策略，是以在地小農為主體，重建並蓄積被工業化、資本主義的農食體系破壞或削弱的生態、社會與文化資本，降低對於政府與金融、工業資本等外部資源的依賴，建構小農的自主性（圖 1）。

### （一）建構小農自主性的三種資本

這三類資本的建構與積累，成為研究團隊在東山農村場域實踐理論架構的起點。本小節簡述這三類資本的內涵，並帶出 Bourdieu（1986）所提出的文化資本、場域（field）、慣習（habitus）等概念，以建構本文探討參與實踐方案的農民，如何從「工業化慣行」轉型過渡到「環境友善」農耕模式的分析架構。

首先，van der Ploeg 的**生態資本**（2008: 278）指的是農業生態體系如何運作的豐富知識，以及能夠靈活應用這些知識在有效生產糧食的技能上，重建與在地生態共榮互惠的關係；例如，了解自然界能量與物質的循環以及食物鏈的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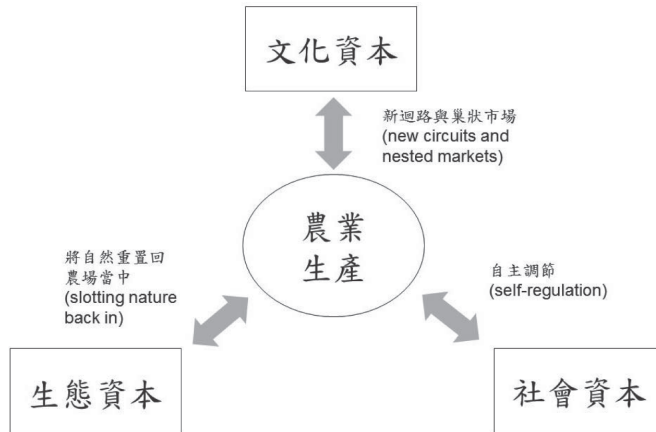


圖1 引領農村走向自主與永續的生態、社會與文化三項資本

資料來源：van der Ploeg (2008)。

並應用在農園的設計管理上。這個定義下的生態資本有兩個主要的來源，一是人類在前工業時代所累積下來的農業知能，二是近代受前者啓發所發展出的農業生態學 (agroecology) (Altieri and Nicholls 2005; Gliessman 2007)。提升農人的生態資本，能夠讓農人在倚靠土地的自然資源情況下進行一定質量的生產，藉此降低農人的生產成本，並擺脫對於外部資金與工業資材的依賴。值得注意的是，以此為基準的農耕實踐，與今日主流的有機耕作模式有別，當代主流有機農耕，相當倚賴外部的資材進行病蟲害的防治，而非生態系統自身的循環與調節。

其次 van der Ploeg 的文化資本 (2008: 279) 指向「好食物」的意涵建構，尤其強調將「好食物」的概念連結至特定的區域風土、歷史淵源、生產與加工工藝、環境永續、社會公平等價值。小農透過生產與銷售這類「好食物」，連結認同這些價值的消費者，共同形成互惠的支持關係與網絡，來取代主流的消費長鏈與市場機制。van der Ploeg 所提出的以「好食物」為論述核心的文化資本，主要是從面向消費者或市場為出發點。相對而言，從生產者觀點出發的農村文化資本，會較聚焦於「好農耕」(good farming) 或「好農人」(good farmer) 的

意涵，尤其關乎農民改變農耕方式的意願，因此亦需要予以關注（Burton 2004; Sutherland and Darnhofer 2012；葉虹靈 2007）。Burton（2004）就指出，農民不願意將農耕模式轉型走向環境友善的模式，除了經濟因素之外，文化或認同因素也扮演一定的角色。農業雖然是生產的經濟行為，亦同時牽涉農業勞動社群對於此行爲所賦予的各種象徵價值。不少研究發現，農民視自己的天職爲「食物生產者」，許多保育環境的農業相關計畫，因爲與此認同相互牴觸，從而降低農民參與這類計畫的意願（Allison 1996; Burgess et al. 2000; Williams et al. 1994）。

Sutherland 與 Darnhofer（2012）同意文化與認同因素是農人採取轉型的障礙，並進一步探究既成認同改變的可能性。他們借用 Bourdieu（1986）所提出的文化資本、場域（field）、慣習（habitus）等概念，探討農人從工業化慣行過渡到環境友善農耕模式的過程中，在農耕的文化象徵意涵（什麼是好農耕），以及自我認同（什麼是好農人）上，所經歷的變化與促成改變的因素。從 Bourdieu 的觀點來看，改變是在慣習與行動場域互動之間發生的（Swartz 1997: 141）。慣習指的是銘刻在身體裡、無意識的行動傾向，是行動者在社會化過程中受到成長背景、教育、社會結構形塑而成。場域是由彼此存在客觀關係的各種位置所構成、結構性的網絡空間，該結構形塑在此網絡空間中所開展的各項行動（Bourdieu 1998: 81; Sutherland and Darnhofer 2012: 233；葉虹靈 2007: 15-16）。

Sutherland 與 Darnhofer（2012）將農業（agriculture）概念化爲 Bourdieu 所說的場域，各種行為者（players）在其中，有不同程度的經濟、社會與文化資本。其中農人的文化資本，主要來自遵循當代所共同認可的「好農耕」意涵，例如，整潔沒有雜草的農場、辛勤工作、照顧土地、有好的收穫與收入等。這些被認可爲「好農耕」的象徵（symbols），形成農村裡的一類「遊戲規則」（rules of the game），遵守這些規則就能獲得社群的認可（亦即文化資本），這使得這些象徵內涵對農人的日常行為發揮無形的影響力，並形塑他們的慣習。如果農業的永續轉型是目標，那麼會需要有新的、與永續價值連結的「好農耕」內涵進場，最終能被農業社群所認可，甚至成爲主流。

Sutherland 與 Darnhofer (2012) 藉由 Bourdieu 的幾個概念建構出理解農業轉型的架構，提示農業轉型是一個鬥爭的現場 (a site of struggle) 本文亦採取此觀點進行實踐個案的分析，但強調在這個新的農業模式與既有的農業慣習進行鬥爭的現場當中，競逐中的不僅是前述談到的「好農耕」象徵內涵，也包括立基於整全觀 (holism) 與系統觀的生態化農業與機械論 (Mechanism)、化約論 (Reductionism) 的工業化農業慣習。換言之，嘗試透過建構農民的生態、社會與文化資本來推動農耕永續轉型的成大研究團隊，也同時涉入與既有農業慣習鬥爭的場域。

在此簡單說明工業化慣行農業與生態農業的關鍵差異。機械論與化約論認為自然系統可了解、可預期、可量化、可化約、可操控，並且放諸四海皆準 (郭華仁 2013b)。依此，科學家將複雜的土壤系統提供給作物生長的養分，化約為氮、磷、鉀三種主要元素及數種微量元素，並創造出各種配方的化學肥料，視為作物生長的充分條件；同理，作物遭受到的逆境被化約個別病害與蟲害的發生，據此創造出來的解方便是各種的殺蟲、殺菌製劑。相對地，生態農業將土壤在內的農作環境中各種物理、化學與生物條件視為一個整體，是相互影響的系統，有效的農耕模式必須關注並利用這個系統內各種條件的相互關係，例如，土壤中的複雜生物系統與作物有互利共生的關係，能夠協助作物健康成長，農人因而透過營造有利於土壤生物系統運作的整體環境來進行生產。對於農業生產環境的整體、系統性觀點，是農耕轉型過程中關鍵性的生態資本，然而，接受或實踐這樣的觀點，對於習於慣行農法操作的農民來說並非易事，這在與研究團隊合作的農友身上也看得到。

回到 van der Ploeg (2008: 279) 所提的第三項資本，他指出小農需要厚植在地與區域社群的自主組織力量，作為基礎的**社會資本**，具體展現在社群內的有效人際網絡，共享的價值，經驗與知識的累積，信任關係的建立，解決衝突的能力，積極地學習與建立願景等。這些區域社群的自主組織力量有助於建構以食物生產者與消費者共同利益出發的社會暨食物交換網絡，這些利益包括農民的生



計、消費者的食品安全、社會全體的糧食保障，以及生產生態環境的永續等。van der Ploeg 主張，應該用上述的社群「自主調節」(self-regulation) 運作機制，取代犧牲上述價值與利益的當代主流農食產銷系統。

## (二) 與農民「共學共作」的行動取徑

在前述行動理論的指導下，研究團隊的主要任務是與實踐場域的農民一同建構上述內涵的三類資本，促進農業經營模式的轉型。在推動實務上，團隊採取「共學共作」取徑，也就是對應上述三類資本，持續地創造農民一起學習與共同實作、相互交流切磋的機會。「共學共作」取徑強調農人是知識的主體，研究團隊所參考的是「農民對農民」(farmer-to-farmer) 與「農民田野學校」(farmer-field school) 這類的計畫，在相關專業者扮演協力者 (facilitator) 的情況下，讓農人透過自主表達、交換彼此的耕作經驗，進行不同耕作模式的田間試驗、觀察與結果解讀。相關研究指出，比起專業人士單向傳授知識技術，這類以農人作為學習主體的模式，更能夠引發參與者對於既有觀念與社會結構關係的反省和挑戰，促成農人農耕實踐的轉型 (Duveskog et al. 2011; Rosset et al. 2011; Schneider et al. 2009; Taylor et al. 2012)。如同「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 理論所主張的，自願的改變與創新是從與他人的溝通、對話和互動而來 (Röling and Wagemakers 1998)。

「社會學習」取徑強調社會變遷的參與過程 (participatory process of social change)。人們透過集體的學習與實作，所進行對話與互動的對象，不僅是參與者彼此，也包括自身行動所處的情境：市場、政策、社會價值與組織的現況或變遷。在此互動過程中，個人或集體有機會重新反思既有的想法與行動，進而做出回應與改變 (Röling and Wagemakers 1998)。這與前面提過的 Bourdieu 觀點是相通的：改變是在慣習與行動場域互動之間發生的。

成大團隊所採取的「共學共作」取徑，除了透過互動式學習與集體行動促成

改變，也意圖建構並強化在地農民的社會網絡與關係（即社會資本），作為未來自主組織、合作推廣共同理念與價值的基礎。Etienne Wenger（1998）以「實踐社群」（communities of practice）概念，指涉那些有共同的興趣，並持續性地透過知識分享與實踐所連結起來的社會網絡和集體認同。這個概念預設探究知識、實踐與社會結構間的互動關係：一群人共學共作促成擁有共同目標、價值與認同感的社群；而社群這個結構，又能回過頭來維繫並促進知識的分享與共同的行動（Morgan 2011）。換言之，經由集體互動學習的方式，社會資本與他類資本的建構和積累會有相互加強的效果。農民間共同的價值與認同牽涉到前述文化資本的建構，而持續生態農業相關的知識分享與實踐行動，可以提升農民的生態資本。

成大團隊自2014年3月開始進入台南市東山區的淺山地帶（後稱「大東原」地區，見後詳述）與在地居民互動，互動協力的狀況大致可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以嶺南社區為主要的工作伙伴，時間從2014年3月到同年12月。團隊在這個階段透過舉辦多次社區的產業工作坊、農友訪問，與社區一同籌辦8月的龍眼節產業活動，以及10月的農村小旅行，認識在地的社區，了解居民所關心的議題與農業（以龍眼為主）現況。第二階段從2014年12月到2018年1月，以對於環境友善農業有興趣的大東原農友為主要合作夥伴，一同共學共作，嘗試建構以環境友善耕作為主議題的「實踐社群」。本文的探討重心以第二階段的實踐工作為主。

團隊在第二階段期間辦理多重系列的「農友共學堂」活動，與在地農友一同探討如何進行環境友善耕作的轉型，相關活動包括「小農復耕經驗交流與分享會」、「環境友善共學堂」、「大東原產業行動工作坊」、「產地認證座談」、「環境友善農場見學」、「共學農友農場互訪」等，同時也與農友合作進行新的果樹管理方法的田間試驗，包括：減用農藥、無藥栽培，微生物菌、酵素培養與生物炭製作和施用，提高農園生物多樣性等。此外，我們也與農友共同執行「果樹認養行動方案」、「農村體驗活動」與市集擺攤活動，創造農友與消費者的對話溝通和關係連結。成大通識教育課程的學生參與了部分的農村體驗活動。

透過上述以環境友善與產消共好為主題的共學共作行動，研究團隊和參與農友作為共同行動者而建立起伙伴關係，以農友的主觀意願為基礎、逐步地推進生產與銷售模式的轉型。本文的分析資料除了前述活動過程的參與觀察以及與農友日常對話的田野筆記，也來自參與農友的深度訪談。

本節說明成大團隊在大東原地區進行社會實踐與研究的理論脈絡，van der Ploeg（2008）的三項農業轉型資本、農民對農民的學習模式，啟發研究團隊以共學共作的社會學習取徑推動「農友共學堂」與「果樹認養行動方案」。後文所進行的行動過程分析與反思，則借用 Bourdieu 的場域、慣習等概念，討論團隊的方案如何影響合作農友的農業轉型之路。首先，第三節呈現當前大東原「農業場域」的現況，簡要地說明當地的主流農耕模式，生產與銷售活動中的社會關係，以及對於「好食物」、「好農耕」的詮釋。第四節同樣以此三個向度，分析參與環境友善農業轉型的在地農友在大東原農業場域中的位置。第五節描述成大團隊如何透過共學共作的實踐方案，陪伴農友逐步建構與累積三項資本，促進其農業經營模式的永續轉型。

### 三、大東原農業場域現況

成大團隊於台南市東山區的工作場域包括位於淺山地帶，以果樹經濟為主的東原、青山、南勢、高原、嶺南、林安、南溪、水雲八個里，總面積約84平方公里，2016年5月的在籍人口約8,250人，常住人口大約是在籍人口的三分之二（圖2）。<sup>3</sup> 東原里是這個區域核心的商業區與貨物集散地，團隊因而稱這個區域為「大東原」。大東原地區有近代台灣農村的典型特徵：1970年代之後，長期處於人口負成長的狀態（圖3），人口結構也朝向高齡化發展（圖4）。大東原主要的現金作物包括龍眼、椪柑、柳丁與咖啡。龍眼是清領時期由渡過台灣海峽的移

---

<sup>3</sup> 此為東山區2010年底的常住/在籍人口比例（資料來源：台南市民政局網站）。

民帶來、具有長久在地歷史的作物，柳丁、椪柑兩種柑橘類果樹與咖啡則分別在 1970 與 1990 年代，由於經濟價值較高而被引進栽種。1970 年代隨著柑橘類經濟作物的腳步，這個區域更多的林地被開發成果園（林思婷 2009），並逐漸引進農藥化肥、龍眼品種改良等現代化的農業資材和技術。漸漸地，帶來較高產量與產值的慣行耕作模式變成主流。



圖2 成大研究團隊的「大東原」場域

說明：「大東原」指台南市東山區大約以國道三號為界，東半邊約占全區三分之二的丘陵地帶。

圖片提供：林睿騏。

根據我們與在地農民的訪談，一般而言，龍眼每年使用殺蟲劑二到七次，施藥越多次龍眼的表皮越漂亮，適合鮮果出售，若是用來入窯烘培成龍眼乾，在不需顧及果皮賣相的情況下，通常會減少用藥次數。柑橘類果樹從三月開花到收穫的十到十二月，化學農藥的使用週期是一個月，甚至是更短的一至兩週，比龍眼需要更多的管理照顧與成本，是農民口中比較「嬌貴」的作物。不少受訪農民都提到，在他們長期的種植經驗當中，晚近農藥的使用量需要下得比早期多，才有

辦法達到同樣的防治效果，柑橘類的管理上這個趨勢尤是明顯。噴灑農藥一視同仁地傷害所有蟲類，即便是對果樹生長有益的也不例外，這除了大大降低果園的生物多樣性，也對東山另一個重要的產業——「養蜂」帶來相當大的損失。在春天的果樹開花季，是養蜂人愉快的收穫時節，卻要擔心蜂群出去採蜜後回不回得來。除草劑也是果園固定使用的農藥之一，農民一般一年使用兩到三次，用過之後果園地面一片枯黃，要過幾個月才會再長出草來。在勞動力稀缺且高齡化的東山，除草劑可說是降低勞動需求的好幫手。然而，過度使用除草劑會讓果園地表土壤失去保護，遇到強度降雨往往造成土壤流失，時間一久連果樹的根系都會裸露出來。

東山的農業產銷結構，主要以大量賣給「販仔」（台語），也就是大盤商為主，這可追溯到百年龍眼產業的傳統。賣給大盤商的好處是可以一次大量、不分等級地賣出，對農民來說是最快速、省事換到現金的方法。在地雖然有農會與三家的農業合作社，但並未扮演協助銷售的角色，對農民來說，主要是作為接收政府農業政策資訊與領取補助的管道。我們常常看到農民使用農會或合作社的紙箱裝載農產品，是因為這兩個機構可以申請到政府經費來補助這些箱子的花費，而不是要通過機構的通路賣出。「寄果菜（拍賣）市場」也是農民會採用的農產銷售管道，其他還包括透過網路、居住在都市的親戚朋友，或是新興的網路銷售平台販售。不論是哪一個通路，農民在銷售的活動上，基本上都是各戶單打獨鬥，沒有相關的合作機制。近十多年來，咖啡產業在東山興起，包括農會以及由業者自行組成的產業發展協會，都透過舉辦產業文化活動試圖打響本地咖啡的知名度，產業發展協會並開辦各種咖啡相關課程，協助農民業者精進產品品質。但這些組織仍然沒有觸及農民合作銷售咖啡的議題。

大東原地區不只銷售活動不涉及在地的社會網絡連結，生產過程也是各家戶獨立完成。曾聽在地人說過去大東原的「放伴」（換工）文化盛行，不只在農事上放伴，蓋房子這類勞動力需求高的工作上也相互提供勞力協助，但如今這種勞力互惠交換的情況已經很少發生。人丁稀少的家戶，果園裡永遠有做不完的農

事，尤其到了勞動力需求最密集的龍眼收穫季，個別農戶幾乎都在跟鄰居搶雇工、跟上天搶時間。我們僅僅在大東原經歷過一次「放伴」的實況，當時我們跟農友說好去幫忙採柳丁，剛好遇到一群資深的農友「揪團」巡迴各自果園，輪流合作採收的盛況。<sup>4</sup>

綜合以上，在農業生產與銷售的過程中，大東原農民所展現的生態資本與社會資本都顯得單薄。那麼，他們如何理解「好食物」與「好農耕」這類概念的內涵呢？仔細區分的話，對農民而言食物有兩種：要吃的跟要賣的。嚴格來說，要吃的是「食物」，要賣的是「產品」，前者農民極少用藥，確保「健康」與「好品質」，但對於要售出的產品，使用農藥變成大多數農民的必要選擇。當團隊成員與在地農民討論農藥使用時，常常聽到的回應是：「你說要我們不要用農藥，但是不用農藥長出來的水果就不漂亮，價格就比漂亮的要差很多，這就是你們都市人喜歡的水果啊。」換言之，對生產者而言，產品的「好」無疑是遵照市場的喜好——反映在農產價格上——決定的。對於要進入市場的食物是好是壞，農人是沒有發言與詮釋權的；掌握市場價格較大決定權的盤商、銷售商與消費者，才是市場上主要的「好食物」的定義者。

至於什麼是「好農耕」，又跟農人靠生產食物維生的身分更有關了。在長期施行慣行農法的大東原地區，在地人如何評價耕作方式的好壞，當「異類」出現的時候可以最明顯地感受到。這些年跟研究團隊一起共學環境友善耕作的農友都有類似的經驗，當他們因為不用除草劑而讓農園雜草叢生，因為減少農藥用量而減產或是病蟲害增加的時候，常常會被父母、長輩斥責，或是被鄰居笑說是憨人、傻子。這些評價背後凸顯幾個價值：首先是勤勞，在農村不勤勞是會沒飯吃的，經常聽到村人看到果園雜草叢生後說：「怎麼那麼懶惰，不會拿除草劑噴一噴！」其次是工作效率，總是背著除草機在果園除草的農人常聽到鄰居說：「怎

---

<sup>4</sup> 龍眼成熟後，甜度在兩週內會退掉，因此農民要搶時間採收。柳丁成熟後，還可以在樹上掛一個月甚至更久，對風味不會有太大影響，採收時間壓力較小的柳丁，因此比較有「放伴」的條件。

麼那麼傻，除草劑噴一噴不是很快。」除此之外最基本的是生產力，有一次研究團隊帶領嶺南社區農民參訪某秀明自然農法（不用藥、不施肥）的農園，有農民進入園子沒看幾眼就興趣缺缺說道：「草那麼高是要吃土（沒飯吃之意）嗎？」對傳統農民來說，草不除掉會跟作物競爭養分、不用農藥產量會減少，生產力高才是好農法。

整體而言，延續前一部分所鋪陳的理論脈絡，大東原作為一個農業的「場域」，在耕作實踐上相當依賴化學農藥來維繫生產，在產銷的社會連結上是以家戶獨立生產、連結大盤商或果菜市場這類長鏈的銷售管道為主。在農耕以慣行模式、銷售以長鏈管道為主流的結構下，什麼是「好農耕」應有的效率、生產力與勞動模式，都被限制在慣行的既有樣貌底下，而「好食物」的意涵則被市場邏輯捆綁，脫離吃食者（eater）在價格以外的需求。

然而，在大東原農業場域的這般主旋律底下，仍然有一些農民不願同調，實踐著不同的農業樣貌。願意與成大研究團隊連結、共學共作的農民，大抵都是這種類型的人。

## 四、大東原環境友善小農群像

為了接觸對於農業轉型有興趣的在地農民，進而發展未來協力合作的可能性，研究團隊於2014年12月到2015年1月間，在東原國中辦理一系列八次的「小農復耕經驗交流與分享會」，以環境友善耕作為主題，進行相關紀錄片的觀賞與議題討論，<sup>5</sup>或是邀請有相關經驗的農民現身說法進行經驗交流。這一系列的交流會最後吸引在地約二十名農民固定參加，參與者有的過去就彼此認識，相互報知一起來參與，也有不少在交流會上才結識，顯示在幅員不大的大東原，有類似

---

<sup>5</sup> 相關議題包括種植技術上的困難，例如，雜草問題、農產加工經驗、行銷通路的建立、外來污染垃圾場抗爭等。

想法的農民不見得相互認識，更不用說彼此連結合作。

在年齡的分布上這群農友偏年輕，四、五十歲區間的農友占大多數，二、三十歲區間的各一位。所有的農友都有其他行業或是在都市生活的經驗，多數是返鄉子弟，有三人（兩戶）是來此地從事農業落地生根的外地人。在生計來源方面，多數參與者是專職農民，其中一位同時經營咖啡館，另有一位專職養蜂人，兼業照顧部分家中的果園，以及一位在台南科學園區上班、在東山有一座農場的假日農夫。此後，團隊於大東原持續辦理農業轉型的講座與工作坊的兩年間，陸續新加入的參與者以退休族群、兼業農及青年農為主，到目前為止常態性積極參與的農戶有13戶，共約24人。整體來說，年輕世代以及有農業以外經歷的群體是大東原農業永續轉型的主力，資深老農似乎是對另類農法最缺乏興趣的一群，卻是整個大東原最主要的農業經營者。

### （一）參與動機：另類「好農耕」的想像

分享會的最後一次聚會，我們請參與農友相互分享想要採用減藥或是無藥栽培方法的原因。他們的動機大致可以分成幾類，首先是許多農友共同的理由：**健康**。他們從自身、家人或是周圍農友的經驗中，辨識出使用農藥對於個人健康的危害，因而開始嘗試減藥或無毒的管理。其次是**農場管理**方面的因素，一方面許多農友指認農藥對農場生產條件的危害，例如，除草劑的使用「對土壤不好」，另一方面則是認為另類的農場管理模式能夠對作物生產帶來正面效應，例如，若增加農場的生物多樣性（包括「作物的多樣性」）能夠降低病蟲的危害與生產銷售過程中的風險。再者是**對另類農產市場的期待**，有農友認為無毒或有機的農產品有助於產品區隔與行銷，有機會讓自家的農產品跳脫低價或是過度波動的市場情境。以上三類的轉型動機又可以分為推力與拉力，拉力指的是轉型後可能帶來的好處。推力則是從農友生活經驗片段，轉化成對於慣行耕作模式的批判，可以看作是促成農友跳脫主流思維的突破口；缺乏這個突破口，農友或難以改變耕作



的習慣。

除了前述屬於務實（pragmatic）的理由，也有農友從比較規範性的層次說明自己的農耕實踐理念，包括：「環境友善耕作、減少碳足跡是農人的社會責任或良心事業」，「爲了下一代要努力走出環境友善的路」，「應該要發展『綠色』產業、用好的環境與人的溫度來吸引人」；更反思了當代資本主義、發展主義的弊病，例如，「只重視 GDP 或經濟價值」，「人定勝天的思維」，指出應該將環境視爲經濟發展的根本與前提，透過減少慾望、過自給自足生產食物的簡樸生活，來停止追求無止盡的發展。有意思的是，在這個層次上提出反思的農友，幾乎都是「新農民」；他們並非因爲世代務農、家族有土地而從農，而是志願選擇進入農業領域，在耕作上直接採取無化學農藥的方法。相當程度來說，這些農友將另類農耕作爲實現上述理念、實現自我的生活方式。

在這樣的對話現場，農友一同建構了有別於主流的「好農耕」論述：「好農耕」是保護農民健康的，是保護農園生產與生態條件的，是有機會做市場區隔而不是低價戰爭的，甚至是反省主流發展範型與生活方式的。這種論述氛圍是有力量的。猶記得有一位數次來參與分享會的農民，在一片對於農藥使用的批判聲中，曾多次發言爲之辯護，沒多久就沒再參與活動了。另一次是聽到農友回饋說，因爲成大研究團隊要帶學生去參觀他們的果園，讓本來由於沒時間人工除草而動念要使用除草劑的農友，打消化學除草的念頭。小群體的理念共識所形成的規範力量，在這些小地方可能不同程度地支持農友在現實的困難中堅持理想。

## （二）多樣的永續轉型實踐

這群在分享會之後持續與研究團隊一同探討、走向永續轉型的農友，以下爲了行文方便，以「友善農友」來稱呼他們。友善農友雖然在農耕實踐上有一致的大方向，在實際的農園管理與轉型的目標上可說相當多樣，反映出每位農友的各方條件與限制，在轉型的道路上已經付出多少努力，以及耕作的永續轉型實質上

可能牽涉的不同路徑。

Gliessman (2010) 指出，從慣行耕作 (conventional farming) 到永續耕作 (sustainable farming) 的轉型有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減藥，也就是透過提高慣行農法的施作效率，減少使用對環境有傷害的化學資材；一般所謂的合理化施肥或安全用藥的技術屬於這個範疇 (表1的「提高效率」策略)。第二個層次是「輸入替代」，以另類的 (例如，生物性或物理性) 技術與資材，替代化學資材，更進一步降低耕作活動對於生態環境以及農民與消費者健康的負面影響；目前一般的有機生產屬於這個範疇。第三個層次是重構農場的生產系統，讓農業活動重新回到在地的生態循環與物種多樣性動態平衡的體系當中運作 (表1的「生態系統運作原則」、「系統重建」策略)；這是自然農法或生態農法所追求的境界。第四個層次是重構農業食物系統的社會關係，讓消費者、生產者與生產食物的土地之間的連結能夠被建立起來。第一到第三個層次，是農民與農作物兩方面逐漸減少對化學資材的依賴，同時加深與在地生態系統連結的雙重過程。這三個層次所牽涉的轉型風險不同，一般而言，減藥的風險低於輸入替代低於生態系統重建，也就是說，採取生態系統重建策略，可能比採取輸入替代以及減藥策略，面臨更高的減產或作物本身的損失。這個風險因素大大影響農民在轉型策略上的選擇。然而在實踐上，三者並不存在互斥的關係，農民有可能同時採取不同層次的耕作策略或方法。第四個層次的轉型則是要透過整個農食系統中重要的參與者、行動者社會關係的再連結，讓前述永續農耕實踐的生態與社會價值被彰顯並受到支持，從而能真正實現。

來參與分享會的多數農友，在表1的光譜裡面，至少都已經在實行草生栽培與初步減藥的工作，使用有機肥取代部分化肥的農友也不在少數。這類轉型作法的共通點是，比較不會對水果的產量與品質產生負面影響，甚至能帶來正面的效益，例如，草生栽培可以保護土壤，有機肥可以改良土壤的物理與生物性質；減藥的程度則視病蟲危害的情況來斟酌，避免過度減藥造成損失。許多農友停留在這個層次沒有採取進一步的轉型，通常是因為對於完全不使用農藥、改用有機資

表1 大東原農民的耕作模式光譜與轉型策略

耕作模式	慣行耕作	←	→	永續耕作		
耕作實踐	高度施用 農藥化肥	草生栽培 <sup>a</sup>	減藥栽培	有機資材管理 (例：KKF、韓國自然農業)	無藥無肥管理 <sup>b</sup> (例：秀明自然農法)	農園生態式規畫 (例：樸門永續設計 <sup>c</sup> )
耕作/ 轉型策略	化學控制	勞力替代 <sup>d</sup>	提高效率	輸入替代	生態系統運作原則	系統重建

a 不以施用除草劑或是抑草蓆覆蓋來抑制農園雜草的生長，而是用人工除草或養草的方式，保持土壤表面的植生覆蓋、增加土壤的有機質與農園生物多樣性。

b 完全不施用藥物或肥料（包括有機資材），僅依據大自然的運作模式進行管理。

c 樸門永續設計是Permaculture的翻譯，意思是「有意識地藉由模仿自然界可見的模式與關係，設計出能充分提供當地所需食物、纖維與能量的地景」（洪葛蘭 2014: 31）。

d 以勞力替代化學藥劑來進行除草工作，維持農園地表覆蓋的草生栽培法。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參考Gliessman（2010）的架構，將在大東原觀察到的耕作實踐模式做更細緻的分類。

材所帶來的技術面與經濟面風險感到不安。農友「產銷班長」就曾提到，他們夫婦十幾年前就曾參加某大學的有機農業課程，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某位老師說：「台灣高溫高溼環境不適合有機栽培」，讓他們一直以來沒有勇氣真的轉型有機。這類型的農友大多是處於壯年的專職果農，以水果收入支撐一家子的生活，再加上農產銷售通路以中盤商、寄果菜市場為主，部分自產自銷為輔，在價格決定上缺乏自主權，很難有反映有機轉型成本的空間，因此農友所採取的轉型策略相對保守。這些友善農友參與成大所舉辦的共學團體，有相當的動機便是希望能夠接收新知，或是創造新的契機，讓自己有機會在轉型的路上繼續往前。

少數友善農友的耕作模式則已經落在完全不使用化學農藥與肥料的層次。做到這個層次的農友大致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實踐永續農法與生活的理念非常強烈，因而願意承擔較高的生計風險、投注百分之百的心力去實現。例如，農友「咖啡達人」早年在台北從事文化事業，進入中年後決定改變生活方式，舉家搬到東山開啓有機的務農生活，偶然的機緣下發展咖啡的種植、烘焙與販賣，並經營自己的餐廳，累積二十多年的栽培經驗與人脈，成就這位東山知名的有機「咖

啡達人」。「咖啡達人」的好友「秀明新農」也是因為追求另類生活實踐，來到東山買農地的移入新農民，他運用「秀明自然農法」的精神，以無藥無肥、營造農園生物多樣性的方式來耕作。對「秀明新農」來說，收入雖然是必要的，但他願意接受運用自然農法所產生的收成短少，在他看來，因為施行自然農法，農園生產了更多其他有價值的東西，包括多元的動植物棲地、豐富的生態，一方面提供他所喜歡的居住環境，另一方面部分資源能夠當作原料製作其他的產品，或是結合教育體驗活動來換取收入。換句話說，這塊農地實質上提供了非常豐富的資源（不再只是單一的水果）給農民，端看農民如何去發掘與運用，以滿足自己的生活與生計。除了努力開發多樣化的產品，「秀明新農」組織了一個有相同理念的小農團體（分布在不同縣市），並且透過親自到消費者集中的都市去宣講理念，招募願意以穩定認養金額來支持這群小農的「股東」。這類型的友善小農，不僅在耕作實踐上採取永續模式，更用心經營與消費者的信任合作關係，並且已經有一定的成績。

另一類型完全不採用化學農藥肥料的農友，則屬於比較沒有生計壓力，能夠較無後顧之憂地開展農耕永續轉型的多種可能。其中，「養蜂青年」是以副業的方式經營家族的果園，他從養殖蜜蜂開始認知到農藥對於生態與健康的危害，於是在不影響主業收入的情況下，逐漸在自家果園實行從減藥到完全不用藥的管理模式。除了在沒有生計壓力下實踐自己對於環境友善的理念，「養蜂青年」也有意將這樣的理念結合養蜂、果樹生產與環境教育，作為自己事業未來發展的藍圖，為此，他在百忙當中進修了環境教育的相關學分，並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假日農夫」是南科的上班族，機電環境工程的背景，十年前在故鄉東山買了一塊砂石開採過後的荒地，開始當起週休二日的土地工人，靠著從小到大的農家記憶與經驗，以及自學的農業方面知識，一邊復育荒地，一邊種植果樹，建構自己理想中的農場。「假日農夫」記得小時候的東山是一個生態非常豐富的地方，但農業形態改變、開始使用農藥之後，「土地就變得不健康了」，因此他決心用無農藥的方式照顧土地與作物。即將屆齡退休的他，有意將農場朝向生態化、

多元化發展，兼顧教育推廣的功能，讓家鄉看見另類發展的可能性。此外，也有幾位退休回鄉的在地農友，在沒有經濟收益的壓力下，選擇以無化學農藥肥料的方式，投入友善耕作的行列。

從友善農友採取的不同轉型策略，可以看到經濟面的風險很明顯地阻礙有意願的農友朝向永續模式前進，因而兼業農或退休農往往能夠在轉型上走得更遠一些。若要堅持理想做到對環境最友善，就要像「咖啡達人」或「秀明新農」一樣，在耕作轉型的同時經營自己的客群，建立能夠支持生計需求的社會網絡。另外，缺乏永續耕作或生態農耕的知識與技術，也是農友無法實踐永續農法的關鍵，一方面大多數友善農友涉獵這個領域的時間並不長，另一方面有機或生態農法在台灣仍是發展中的耕作模式，不論是民間實務界或學術界都還在累積相關的經驗與知識。因此，透過共學共作提升農友的農耕生態資本，以及與消費者之間的社會連結，成為團隊主要著力的兩個面向。

## 五、農友共學堂與果樹認養行動方案

### （一）農友共學堂與生態資本的建構

在充實永續轉型的生態資本方面，研究團隊自2015年開始在大東原持續舉辦開放各方農友參與的「農友共學堂」。活動形式包含：農事講座、農場見學，以及共學農友的農場互訪交流；講座主題包括：雜草管理、合理化施肥、土壤改良，以及微生物菌、生物炭、有機資材原理與運用等。農場見學是安排與其他有相關經驗的農友進行交流，所拜訪的農場有的操作有機農法，有的實踐不同源流的自然農法，包括：來自日本的秀明自然農法、來自泰國的KKF<sup>6</sup>自然農法、來

---

<sup>6</sup> KKF 是泰國「米之神基金會」（Khao-Kwan Foundation）的縮寫，成立於1989年，致力於解決稻農生產困境，並且推廣自然農法。



圖3 「農友共學堂」的果園見學

說明：參與「農友共學堂」的農友，一起到台南官田拜訪使用秀明白然農法成功栽培龍眼的果園進行見習（2015年2月）。

自韓國的自然農業，也曾參訪實踐樸門永續設計的食物森林。這些內容實質反映台灣當前對於另類的、環境友善耕作模式的多樣視野，以及大東原友善農友實際耕作實踐的複雜樣貌，大致涵蓋了表1 由左到右的永續轉型光譜。

講座、見學是向外學習的過程，要真正落實在農作轉型上，需要農友學以致用，形成自己的、在地的經驗，才能夠增進相互交流、達成共學的效果。研究團隊於是鼓勵農友在自己的農園進行新農法的試驗，然而，考量到改變耕作模式所帶來的減產風險，我們建議農友先採取小面積的測試，並且以公認比較「野性」、轉型風險較低的作物龍眼<sup>7</sup>為主要試驗的對象；實際的試驗規模或新耕作方式的選擇，則由農友考量自身條件而決定。2015年，「產銷班長」受到前往見學的秀明白然農法龍眼園的啟發，決定用一塊相對獨立、約8分的龍眼園試驗（仿

---

<sup>7</sup> 龍眼樹若不使用農藥，收成可能會減少、果實外皮較不美觀，但對於果樹本身的健康影響不大，因此轉型風險較低。龍眼也是大多數友善農友都種植的作物。

秀明農法的)無農藥栽培,其他有栽種龍眼的農友則以1-3分的規模來試驗。同時,跟「產銷班長」試驗的8分地相連、種植火龍果的「火龍果哥」,也跟進實施無農藥栽培火龍果。此外,原本就在做減藥柳丁栽培的「返鄉青農」,在團隊搭配「果樹認養行動方案」的鼓勵下,嘗試進一步減少用藥,朝向農藥零檢出的目標前進。2016年,團隊進一步推出荔枝與椪柑「果樹認養」,也是搭配「產銷班長」與「椪柑福哥」兩位友善農友的減藥試驗計畫。

「農友共學堂」的安排與內容,逐步地拼湊出邁向永續或生態化的耕作模式所涉及的各種重要因素,其中土壤性質、微生物菌相、地被草相,以及園區內多樣的生物所串聯起來的生物關係系統至為關鍵(參考陳奕君、林延諭 2016)。這些整合性與系統性地理解農業生產的知識,對農民與研究團隊都是一趟學習與自我培力的旅程。新認知的建立或許相對容易,如何應用在農園當中,並在解決問題的實務上有效,則有實質上的障礙。客觀來說,生態化農法在面對病蟲害時,強調的是透過抑制病害或蟲害的生物關係(例如,病菌或害蟲天敵的數量增加),以及作物自我防禦機制的回復,來進行調節。然而,生物關係與作物自我防禦機制有效且持續性地回復,需要相當時間與條件,<sup>8</sup>效果也不會是全面性的病蟲害消失,而是損害程度降低而已。這與慣行農法中,立即可見且效果強大的病蟲害控制技術相當不同,也是護樹心切的友善農友在轉型過程中最感焦慮之處。而當農友感受到病蟲害因為放棄原化學控制手段而在果園中肆虐時,往往會尋求「輸入替代」的方式嘗試解決,也就是運用所謂的「有機」資材來試圖「控制」病蟲害。

舉例來說,農友「產銷班長」在2015年仿秀明自然農法進行無農藥的龍眼栽培試驗,但在嘗試幾個月之後,龍眼因為蟲害嚴重大量落果。「產銷班長」承

---

<sup>8</sup> 主要的條件是農園中適合生物棲息的環境營造,這牽涉到農園內與周遭生物相的改造:這種系統性的改造與生物關係的重建,亦需要投入相當多的精力與時間的醞釀。例如,台東農場的賓朗果園,大約花了四年的時間才達到轉型成功的效果(陳奕君、林延諭 2016),這也大約符合台灣一般有機或自然農法果園轉型的經驗。

認自己「實在是看不下去了」，但又不願意走噴化學農藥的回頭路，因此採取使用有機殺蟲劑的方法來應對。「椪柑福哥」在2016年啟動椪柑轉型試驗時，一開始就設定用有機制劑取代原本的化學農藥，避免果樹突然失去藥劑的保護，過度影響收成。強調「生態化」耕作的農友「假日農夫」，一直以來都是以人工抓蟲的方式照顧柑桔果樹，即使是如此辛苦的過程，在數年內問題毫無改善跡象，也找不到生態系統裡解決的方法（一直沒有可對治的天敵出現），讓他開始想要尋求有機資材來對抗蟲害。2016年某一次的「農友共學堂」講師，邀請到「假日農夫」推薦的有機資材公司所派出的專員，為農友講解有機資材的產品與使用方法。該次的講座大抵是團隊所舉辦的數十場中，在地農友參與最踴躍的一場（有不少過去不曾出現的農友參加），可見一般農民對於有機資材感興趣的程度。

採取有機制劑來替代化學農藥的轉型策略，基本上相當符合長期使用慣行農法的農民慣習。在病蟲害的應對上，有機制劑的「輸入替代」是依循機械論與化約論的邏輯，採取特定單一因素的對抗模式（如，消滅病原或害蟲）處理。此外，取得的方式也是透過向廠商、資材行進行購買。農民基本上仍然採取熟悉的慣行農法工作與思考模式，只需將化學農藥改成有機資材即可。這樣的「有機轉型」被一些論者指為是「慣行化的有機農業」（conventionaliz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因為其生產系統運作的根本邏輯並未真正轉向生態系統的運作原則與價值，且作物的生產依舊倚賴大量工業化製造、高度商業化的資材（Wit and Verhoog 2007）；換言之，這種轉型模式只是慣行農業體系換了一個「有機」招牌在運作。對小農而言，有機資材所需成本更高，「慣行化有機」的耕作模式無法降低小農生產對於工業系統與資金的依賴，也無助於小農增加農園系統的韌性（resilience）。<sup>9</sup>

在此提出「慣行化有機」這類論述，並非要批判農友所採取的這類轉型策

---

<sup>9</sup> 整體而言，「慣行化有機」對於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較慣行農業小，依然是有意義的轉型努力。



略，而是試圖進一步指出農友之所以傾向如此選擇，是受一些結構性因素驅使。首先是前面所提過的，生態化的農業生產模式需要投入相當多的時間與精力進行調整才會顯現效果，對於有生計壓力的農友而言緩不濟急。其次，面對眼前的問題（病蟲害顯現），農友既有的農耕思維與工作的慣習，會很自然地浮現而成爲試圖採取的解決方案。再者，慣行農業的工商支持網絡（在這裡指的是病蟲害的資材研發製造與販售體系），部分已經完成「有機轉型」，能夠提供農友「方便」的「有機轉型」方案。對農友而言，相對於複雜、抽象、沒有實際經驗的生態系統調節作用，有機資材的替代使用是更容易理解、預期並取得資源的轉型方法，自然比較容易獲得農民的青睞。

那麼，在這樣的結構下，如何引導農民再往更符合永續原則的農耕模式前進？到目前爲止，研究團隊與大東原友善農友共學共作的經驗，尚無法提供上述問題明確的答案，但在實作過程中的確看見一些機會。

研究團隊注意到，採取「輸入替代」的轉型策略，也有不依據慣行農法的化約論邏輯並且不倚賴工業化資材的選項。例如，KKF 自然農法運用簡單的資材與方法培養自然界土壤的微生物菌，讓農民可以自行製作改良土壤的菌液以及進行有效率的堆肥，用來改善土壤性質與增加肥力。例如，也是用來進行土壤改良的生物炭（biochar），亦可透過農村常見的資材與工具來自行製作。「農友共學堂」舉辦這兩個主題的講座時，不僅說明相關的原理，並在現場示範簡便的製造方法，同時提供製作配方，得到農友熱烈的迴響。參與的農友不僅對後續的深入學習表達興趣，也在講座後自發地進行資材自製與施用試驗。尤其本來就重視土壤或是曾接觸微生物在農業上的應用的幾位農友，表現得較為積極。

微生物菌與生物炭的應用，對農友來說可以直接對應到他們的需求，不僅有機會提高土壤改良的效率，也有機會減少購入肥料使用而降低成本，因此形成了誘因。從促進農業生態系統觀念（增進生態資本）的角度來說，這類的「輸入替代」提供了窗口，讓農民有機會重新認識土壤；不僅是把土壤視爲作物吸收氮、磷、鉀等營養成分的介質，而是重新看到土壤是一個有機系統，裡面住著許多微

小看不見或不容易看見的生物，如細菌、真菌、無脊椎動物等，並且理解到這群多樣生物與植物的持續互動，對於植物的生存與健康有著許多正面的重要影響。團隊後續也邀請專業者到「農友共學堂」，介紹蚯蚓與其他土壤無脊椎動物，以及這群生物與農業生產之間的關係。2017年開始，團隊亦與幾位友善農友一同製作在地土壤微生物菌的堆肥，並以對照組與實驗組的方式，比較施用對於作物的影響；初步亦看見對果樹的成長呈現實際的正面成效。

此外，病蟲害的生物防治也是有機會引進生態系統觀念的「替代輸入」法。農友會在學習或運用過程中被提醒：自然環境中有敵人也有朋友，豐富的生態可以調節害蟲的危害，帶來抑制的效果。例如，「椪柑福哥」的果園在2017年曾經引進「草蛉」來對治介殼蟲的危害；團隊成員成大生科系李亞夫老師，則是運用「生態花原」(ecological meadow)的概念，在「假日農夫」的農園以人工方式營造物種多元的開花植物地被，以及蝙蝠、野蜂的棲息空間，企圖引進更多元的物種，來試驗是否能夠降低害蟲對於果樹的危害。這些田間試驗目前還沒有看到具體的成果，但從「草蛉」試驗作為一種針對性的生物防治，嘗試擴張農友思考蟲害的視野，到以「生態花原」來營造多元生物網絡與整體生態平衡，來回應果園生產的需求。

團隊於大東原進行的「生態花原」試驗尚在觀察階段，但相同的概念與試驗，在花蓮的一個有機果園裡已經呈現具體成效。2018年1月初，團隊跟友善農友一起到花蓮瑞穗參觀一個有機文旦果園。果園主人「阿葦」與花蓮農改場的研究員合作，在果園裡成功營造多元地被植物。經實際調查發現，有進行多元地被植物營造的果園，其害蟲天敵的種類與數量，都明顯較未進行營造的果園環境多。換言之，豐富的生態環境，的確可能為果園帶來降低蟲害的效果。大東原農友對於「阿葦」的實務經驗給予相當高的評價，未來這類涉及「生態系統運作原則」與「系統重建」的轉型工作，是否會在農友間開始發酵與開展，尚待後續觀察，也是研究團隊未來持續協力與引導的重點方向。

相當程度來說，成大團隊這幾年透過推動「農友共學堂」，舉辦講座、農場

參訪、定期聚會進行常態的互動學習，經營出立足於大東原的環境友善耕作「實踐社群」，並以這個社群為中心，向外建立能學習與切磋相關知識和經驗的社會連結，形成有別於主流慣行農業的「農業場域」。在這個另類的農業場域中，農友得以逐步地透過經驗交流與實地試驗，習得他們所尋求的「好農耕」所需要的知識與能力，並在此過程中一再確認，這種被大多農人視為「異類」的（環境友善）農耕模式，其可行性與價值的存在，進而有機會突破既有的慣習，建立更具有永續性的農耕模式。

除了成大團隊的陪伴，農友在互動過程中營造出來的「共好」氛圍，亦是維繫這個友善耕作實踐社群的重要元素。事實上，若論及農業永續轉型的知識與方法，幾位在轉型上下過多年功夫的友善農友，參與研究團隊舉辦的活動不見得能夠有太多的收穫，反而比較多的時候是分享自身經驗與想法，提供給這個領域的晚進農友。交流也不限於農場裡的農事，還包括農產加工的技巧，以及各自對於經營農場事業的規畫與想法。例如，「返鄉青農」大方地分享他最得意的龍眼烘焙獨家祕訣給其他的龍眼農友；長久研究蜜蜂生態並學習環境教育推廣的「養蜂青年」，在其他農友拜訪他的農場時，也分享他如何重新將原本的荔枝、龍眼園，在無毒管理的同時慢慢增加生態豐富性，吸引不同的蜂類與昆蟲，以搭配生態愛好者的喜好，來建構新的事業。許多友善農友都說，這個共學團體農友之間不藏私的交流，讓他們印象很深刻，也是他們參與過的農民團體沒有經驗過的感受。「假日農夫」以環境友善的概念持續經營農地超過十年，他說一直以來都是一人獨自摸索，孤單地面對旁人的質疑眼光與話語，這幾年能有這樣的團體一起共學、快速成長，也不再覺得孤單，讓他特別珍惜。「假日農夫」強調，希望未來即使成大團隊從大東原退場，這個農友團隊也可以自主地持續經營下去。

## （二）果樹認養、農村體驗與社會文化資本

成大團隊與友善農友共學共作的另外一個重點，是果樹認養行動方案與農村

體驗活動。這些方案的主要用意，是協力農友開創直接與消費者建立信任、互惠關係的管道，藉此累積環境友善耕作轉型的社會與文化資本，讓消費者社群在理念與實質上的支持也構成另類「農業場域」的一環，成為農友轉型過程中的助力。

果樹認養是一年一度的活動方案，搭配果實的生長週期進行。為了讓消費者有更多機會認識農友與農村，方案在結果初期與收成時節安排消費者拜訪產地，搭配農友對於生產方式與過程的解說，以及農產加工品製作或農事的體驗活動，組合成豐富且具有食農教育意涵的產地旅行。2015年，團隊與減藥方式栽培柳丁的「返鄉青農」合作，以一棵果樹為認養單位、事先交付認養金的方式，招募到20多位消費者。2016年與2017年都擴大辦理，結合三位試驗減藥或有機栽培的友善農友，進行柳丁、椪柑與荔枝三項果樹認養行動方案，招募認養人數各在10幾到20幾位之間。

每次方案的認養人數不多，與三位農友所照顧的果園面積在1到3甲之間相比，所占比例相當小。但對農友來說，能夠在永續轉型的試驗期間接收到消費者的支持與肯定，有著多方面的意義。除了讓農友能夠在果實成長初期就獲得收入的保障，有助於投資所需的資材之外，來自消費者的實質肯定也讓農友感受到心理支持，成為繼續努力的動力。農友尤其感動有消費者願意從北部、中部特別跑一趟、兩趟，走訪他們熟悉到覺得沒什麼特別的果園，並對他們的農事轉型工作表達肯定。「返鄉青農」在表述第一次果樹認養行動方案完成後的感想時，就感慨地說道，他做減藥的農法在村莊裡面一直被說是傻瓜，但他現在覺得作這樣的傻瓜是值得的、是應該堅持的路！隔年要再次辦理果樹認養人招募的時候，「返鄉青農」便主動提出用藥量會再進一步減少，目標是要做到農藥零檢出！<sup>10</sup>

對於消費者的支持，2016年加入果樹認養行動方案的「椪柑福哥」也非常

---

<sup>10</sup>「返鄉青農」第一年做認養方案時，所收穫柳丁的農藥殘留檢驗結果，殘留量都在國家訂定的殘留容許量以下甚多，是安心的產品。



圖4 果樹認養人拜訪農友

說明：研究團隊與成大通識教育課程學生共同支援，協助果樹認養人拜訪農友和果園的體驗行程（2015年5月）。

有感受；他是在研究團隊不斷鼓勵、半推半就的情況下，結成果樹認養行動方案進行椪柑減藥試驗。與「返鄉青農」種植多種果樹、管理面積超過三甲地相比，「椪柑福哥」占地六分的椪柑園是重要的收入來源，而且果樹才種植五、六年，正要進入量產的階段，突然開始減藥栽培風險頗高，令他對於展開減藥試驗有許多顧慮。此外「椪柑福哥」個性害羞靦腆，要面對面地接待消費者對他來說也是項挑戰。答應要做了之後，「椪柑福哥」覺得要做到最好，自己決定從本來說好的減少化學農藥使用，改成全面使用有機資材。這個決定讓他在這一年的椪柑管理過程中吃盡苦頭，在沒有過往經驗的情況下，試用了各種市面上的有機資材，發現與化學農藥相比不僅藥效差、時效短、價格又高。在果樹都已經有人認養、退無可退的情況下，「椪柑福哥」度過了壓力很大的一季。

雖然順利辦完了認養人的採收活動，「椪柑福哥」對於自己2016年這一季的表現並不滿意；面對研究團隊初步詢問隔年的認養方案，他表示要再好好考慮是否繼續。經過兩個月的長考，有一天「椪柑福哥」在他果園的臉書粉絲專頁貼出

一篇公告，表示曾一度想要放棄新年度的友善耕作試驗與認養方案，但在與家人仔細討論過程中，想到所有曾支持、喜愛、幫助他們的人們，又感到惋惜：「一次次的歷練讓我們成長非常多，何況友善耕作對大家來說是重要的；而對我們來說是一種激勵也有一番成就感，不管起初別人的恥笑和困境，我們都撐到了最後一刻……我們怎麼能放棄我們爲了它的努力與付出呢？決定了——我們繼續下去！」在辦理認養活動中全力支援的太太與孩子們，成爲「椪柑福哥」繼續試驗有機轉型的主要推手；而這些推力的背後，是前一季方案執行過程中每一分來自外人的善意。

如果支持農耕永續轉型的文化資本指的是「好食物」、「好農耕」的意義價值建構與流動，那麼我們可以說，在這些認養活動過程中的許多人際互動細節，尤其活動中由農友、認養人分別發表感想與心情的時間，往往都在堆疊累積這樣的文化資本；農友說明管理過程中的辛苦，表達對於認養人支持的感謝，而認養人同理農友照顧果樹的辛勞，也致上對於農友願意照顧土地、照顧消費者健康的敬意。臉書社群的對話空間也能有類似的效果。「椪柑福哥」執行果樹認養行動方案之後，在女兒的協助下開始經營臉書粉絲專頁。專頁內容不僅呈現農場動態，也傳遞農友勞動的甘苦，例如，農場出現的各種昆蟲，農友辛苦地人工除草，欣喜拿到農藥零檢出的證書，解釋新認養方案的定價，也轉貼來自認養人肯定的文字。這些文字都呈顯農友與一起經營事業的家人，重新定義自己所嚮往與實踐的是什麼樣貌的農業，而這樣的農業是與這段時間支持他們的朋友，包括消費者在內，所共同肯定與認同的。

在認養人與研究團隊的鼓勵下，「椪柑福哥」對自己從事「好農耕」、生產「好食物」所增長的自信心，表現在他更勇於直接面對消費者，並爲自家產品訂出高於市場行情的價格。過去習慣將農產交給「販仔」的「椪柑福哥」，往往只能被市場行情決定當季的收入，對於「擅自提高售價」總感到不切實際。2017年的椪柑認養方案，「椪柑福哥」參考前一年的經驗調整管理的方式，同時爲了反映成本，也將認養價格提高。這一年風調雨順、沒有颱風侵襲，造成柑橘類水

果大豐收，與隨之而來的市場價格低落。但這一年的椪柑在農友的細心照顧下，品質有所提升，認養人的反應都相當正面。「椪柑福哥」也透過介紹接了不少直銷訂單，並到附近的果菜市場直接接觸消費者，都以高於一般市價的行情售出。面對消費者質疑售價較高時，他便請消費者試吃，強調椪柑的品質，讓消費者來做選擇，展現出他對於自家產品的信心。

除了文化資本之外，有效的社群網絡、人際的信任關係與價值共享這些社會資本，亦在友善農友之間累積。舉辦體驗活動時有一個特性，是需要不少的接待人力，例如，2015年舉辦的認養柳丁採收季，一次有六、七戶認養家庭進到果園進行採收，當時有幾位熱心的農友一起幫忙協助，使得採收活動能夠順利完成。有了先例之後，往後不同家戶辦理活動時，其他的友善農友得空就會一起參與，有力出力，沒有幫忙的需求就捧人場，讓來訪的消費者看見農村的活力與人情。這也讓團隊看到一種新的農村「放伴」模式，在舉辦體驗活動的需求下可能被開展出來。協力的農友抱著觀摩、幫忙的心情前往，受到幫助的農友在表達感激之餘，也在下次的活動中「回禮」；透過勞力時間的「禮物交換」建立農友之間的互惠關係，以及大家是合作伙伴的感受。未來不論是既有的共學共作方案持續運作，或是發展新的項目，這些互惠的關係、伙伴的感受，都是很重要的基礎。

## 六、結論

成功大學研究團隊在台南市東山區，以共學共作進行社群連結、推動環境友善耕作轉型的行動方案，在三年的實踐過程中，可以說建構起另類的農業場域，讓參與其中的農友與消費者，透過相互學習與自主田間試驗、互惠的生產消費行動，共同推進農業永續轉型的進程。然而，這樣的另類農業場域並沒有能力將農民或是消費者「包覆」起來，滿足他們生活上所有的需求（包括生計與飲食），讓他們從主流的農業場域完全地抽身；而是提供另類的實踐社群網絡，讓環境友

善、食品安全，甚至自主與永續等理念價值，有機會因為社群網絡中的資源分享與互助支持，一點一滴地落實在日常的耕作與飲食活動中。

就是因為以現況而言，另類的農業場域並沒有能力取代主流，團隊所協力的農友事實上仍同時身處兩個價值觀念與作法迥異的農業場域中，時常受兩端拉扯。因此，本身對於主流農業模式存有不滿，並且對於「好農耕」是什麼有不同想像的農民，才有可能進入到另類的農業場域，並在辛苦的拉扯中堅持。在主流與另類的拉鋸戰中，相對容易克服的是理念與價值的維繫；透過有類似理念的農友頻繁地對話與互動，再加上有認同環境友善、遠道而來的消費者實質與情義的雙重相挺，「環境友善」這個「新好農人」的形象，逐漸成為合作農友的集體認同。即使在耕作效率、收成上尚且無法與慣行模式相提並論，理念在社群內的再生產支撐農友面對耕作轉型上的困難與挫折。

較不容易克服的是農耕實踐的生態化轉型。除了尚且薄弱的知識系統與實踐經驗，與主流工業化農業生產邏輯的巨大差異之外，支持農作生產的生態體系重建需要相當的時間，亦是轉型過程中巨大的考驗；不但增加轉型的經濟成本，也加深農民對於新生產模式的有效性之懷疑與不安。換言之，永續農業的場域中，生態系統也是重要的行動者（actor），其運作的機制與實際的狀態，深刻影響到場域中其他的行動者。本文認為，在行動策略上建構以環境友善為核心的「新好農人」認同，可以為農民在與生態環境建立新關係的磨合過程中爭取時間和耐性；同時，運用生態系統觀念的「輸入替代」轉型策略，例如，微生物應用與生物防治，是讓關注生產的農民認識生態系統與農業之間關聯的有效窗口，有機會協助農民具體地理解與實踐生態農業。因此，在農業轉型的學習安排上，在耕作的知識與技術面，應提供這類具生態系統觀念的課程，同時也要讓農民學習如何與消費者建立直接的互動與銷售管道，並且安排農民集體共學的交流網絡，加強新農人認同的經營。

持續共學共作的過程當中，圍繞在食物與農業議題上的社會關係、網絡的建立與累積的確有所成效。然而，成大團隊在其中扮演關鍵的組織與串聯的角色，



若自社群中抽離出來，這個實踐社群的運作是否能夠持續下去，進而發展出常態性的互惠食物生產與交換網絡，仍然是一個問號。目前雖有合作農友初步提出組織化的想法，尚未進入實質討論。此外，團隊亦有成員從2016年起，開始在大東原地區連結在地的農業合作社和農會，並且發起青年創業的平台，嘗試建構在地自主的組織力量，並與農業的永續轉型進行串聯。<sup>11</sup> 這類社會工程的積累，牽涉到對既有的思維與行為模式進行挑戰，以及新行動場域的建立與維繫，並非數年間能夠一蹴可幾，也忌諱揠苗助長，需持續與長期的在地經營。

近年來，政府開始推動大學參與在地社會的發展，要求大學成為社會實踐與轉型的行動主體。成大團隊在大東原地區嘗試以共學共作的取徑，以及建構在地實踐社群平台的協力者角色進場，經營農業永續轉型的議題。即便成大本身沒有農業專門的系所，透過長期陪伴以及連結相關專家與經驗者的社會網絡之建構，依然有機會促成改變，同時也帶來大學內部學術領域相關知識技術的新應用與創新的機會。然而，讓大學長期擔任此地方協力者角色的相關機制與誘因，在高度體制化的大學系統尚待建立；換言之，要為在地社會創造新的行動場域，大學本身也要先對自身的行動場域進行一番改造，才有可能。

---

<sup>11</sup> 主要由團隊成員林睿騏以成立駐地 CoLab:D 工作室，持續推動中。

## 參考文獻

- 洪葛蘭著、吳孟儒等譯，2014，《探索樸門：超越永續的原則與道路》。台北：巨流。（Holmgren, David, 2002, *Permaculture: Principles & Pathways Beyond Sustainability*. Hepburn, Victoria: Holmgren Design Services.）
- 吳鳳慧，2013，《有機茶行動者網絡構成之研究：以坪林地區為例》。台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碩士論文。
- 林思婷，2009，《東山鄉山村生計活動的轉型》。嘉義：嘉義大學地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徐福君，2006，《宗教非營利組織運作環境事業的觀察：以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進行個案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郭華仁，2012，〈有機農業的必然與實現——典範移轉與立法〉。《臺灣國際法季刊》9(4): 81-111。
- 郭華仁，2013a，〈聯合國、台灣與糧食安全〉。《新世紀智庫論壇》64: 20-28。  
<http://seed.agron.ntu.edu.tw/organic/paper/2013-10-12doc.pdf>，取用日期：2016年6月10日。
- 郭華仁，2013b，〈農業生物多樣性與農業永續經營〉。<http://seed.agron.ntu.edu.tw/publication/201305.pdf>。取用日期：2016年6月10日。
- 陳信煜，2012，《小眾農耕的生存之道：以台東縣實施秀明自然農法農夫為例》。嘉義：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環境藝術碩士論文。
- 陳奕君、林延諭，2016，《果園轉行有機農法之綜合栽培管理措施及策略：以賓朗果園為例》。台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東區農業改良場。
- 黃樹仁，2002，《心牢：農地農用意識型態與台灣城鄉發展》。台北：巨流。
- 葉虹靈，2007，《異端的生存之道：台灣另類有機農業生產者的實作策略》。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羅恩加，2016，《原住民知識、農業生產與部落發展：泰雅族石磊部落的自然農

業》。台北：政治大學民族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Allison, Lincoln, 1996, "On Planning a Forest: Theoretical Issues and Practical Problems." *Town Planning Review* 67(2): 131-143.
- Altieri, Miguel A. and Clara I. Nicholls, 2005, *Agroecology and the Search for a Truly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Mexico: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 Altieri, Miguel A. and Victor Manuel Toledo, 2011, "The Agroecological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Rescuing Nature, Ensuring Food Sovereignty and Empowering Peasants."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8(3): 587-612.
- Bourdieu, Pierre,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Pp. 241-258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ited by John G. Richards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Bourdieu, Pierre, 1998, *Practical Reason: On the Theory of Ac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urgess, Jacquelin, Judy Clark and Carolyn Harrison, 2000, "Knowledges in Action: An Actor Network Analysis of a Wetland Agri-environment Scheme." *Ecological Economics* 35(1): 119-132.
- Burton, Rob J. F., 2004, "Seeing Through the 'Good Farmer's' Eyes: Towards Developing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Symbolic Value of 'Productivist' Behaviour." *Sociologia Ruralis* 44(2): 195-215.
- Carolan, Michael, 2016, *The Sociology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 Craig, Dorothy Valcarcel, 2009, *Action Research Essentials*.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 Duveskog, Deborah, Esbern Friis-Hansen and Edward W. Taylor, 2011, "Farmer Field Schools in Rural Kenya: A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Experience."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7(10): 1529-1544.

- Gliessman, Stephen R., 2007, *Agroecology: The Ecology of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Boca Raton, FL: CRC Press.
- Gliessman, Stephen R., 2010, “The Framework for Conversion.” Pp. 3-14 in *The Conversion to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Principles, Processes, and Practices*, edited by Stephen R. Gliessman and Martha Rosemeyer. Boca Raton, FL: CRC Press.
- Gliessman, Stephen R., 2012, “Agroecology: Growing the Roots of Resistance.” *Agroecology and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37(1): 19-31.
- IPES-Food, 2016, *From Uniformity to Diversity: A Paradigm Shift from Industrial Agriculture to Diversified Agroecological Systems*. International Panel of Experts o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 Morgan, Selyf Lloyd, 2011, “Social Learning among Organic Farmer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Framework.” *Th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ducation and Extension* 17(1): 99-112.
- van der Ploeg, Jan Douwe, 2008, *The New Peasantries: Struggles for Autonomy and Sustainability in an Era of Empire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Earthscan.
- Röling, Niels G. and M. A. E. Wagemakers, eds, 1998, *Facilitating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Participatory Learning and Adaptive Management in Times of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sset, Peter Michael, Braulio Machín Sosa, Adilén María Roque Jaime and Dana Rocío Ávila Lozano, 2011, “The Campesino-to-Campesino Agroecology Movement of ANAP in Cuba: Social Process Method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ustainable Peasant Agriculture and Food Sovereignty.”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8 (1): 161-191.
- Schneider, Flurina, Patricia Fry, Thomas Ledermann and Stephan Rist, 2009, “Social Learning Processes in Swiss Soil Protection—The ‘From Farmer - To Farmer’ Project.” *Human Ecology* 37(4): 475-489.

- Schutter, Olivier De, 2011, "Agroecology and the Right to Food." (Chinese version). <http://www.srfood.org/en/official-reports> (Date visited: July 1, 2017).
- Sutherland, Lee-Ann and Ika Darnhofer, 2012, "Of Organic Farmers and 'Good Farmers': Changing Habitus in Rural England."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8(3): 232-240.
- Swartz, David, 1997, *Culture &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aylor, Edward W., Deborah Duveskog and Esbern Friis-Hansen, 2012, "Fostering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in Non-Formal Settings: Farmer-Field Schools in East Af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long Education* 31(6): 725-742.
- Third World Network and SOCLA, 2015, *Agroecology: Key Concept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Penang, Malaysia and Berkeley, California.
- Townsend, Andrew, 2013, *Action Research: The Challenges of Understanding and Changing Practice*. Maidenhead, England: McGraw-Hill Education.
- UNCTAD, 2013, *Wake Up before It Is Too Late: Make Agriculture Truly Sustainable Now for food Security in a Changing Climate*. Trade and Environment Review 2013,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http://unctad.org/en/pages/PublicationWebflyer.aspx?publicationid=666> (Date visited: June 10, 2016).
- Wenger, Etienne, 1998,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Learning, Meaning, and Identi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D., T. Lloyd and C. Watkins, 1994, "Farmers Not Foresters: Constraints on the Planting of New Farm Woodland." Working Paper 27,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ottingham.
- Wit, J. De, and H. Verhoog, 2007, "Organic Values and the Conventionaliz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NJAS - Wageningen Journal of Life Sciences* 54(4): 449-462.

## **Sustainable Farming Transition: A Social Experiment Involving Farmers in Tainan**

Huei-Chung Hsiao

###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of practice” can promote change to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practices by examining an action research project involving a university research team and a group of farmers in the Dongshan District of Tainan City between 2014 and 2018. The project assumed that such a transformation required a specific mix of farmers’ ecolog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capital, and that a collective and social learning approach could facilitate a cumulative process via the construction of a practice community. The author (a research team member) uses Bourdieu’s concepts of field and habitus to analyze how the project contributed to changes in agricultural practices reflecting the project’s action hypothesis.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two action projects (the Farmer’s Co-learning School and Fruit Tree Adoption) represent alternative agricultural fields that emphasiz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farming and reciprocity between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However,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supporting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farming practices that fit the needs of Taiwanese food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are still in the development stage, and more time is needed to construct the necessar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network required to maintain sustainable farms and sufficient livelihoods for farmer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n alternative agricultural field can help farmers adhere to a sustainable transformation in two ways: (a) by constructing and maintaining an alternative “good farmers” identity based on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via dialogue among farmers and between farmers and consumers, and (b) by introducing soil microorganism cultivation and biological control techniques to help farmers understand

---

Huei-Chung Hsiao,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enact ecological farming practices. Project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local farmer participants acquired ecolog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capital for a transformation to sustainable farming. One remaining challenge is the self-organizing of local farmers in a manner that supports the ongoing opera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practice community, resulting in the sustainable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agriculture.

**Keywords:** agricultural field, sustainable transition,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 9

# 能力取徑視野下的大學社會實踐

周睦怡

---

本文將 capabilities approach 譯為「能力取徑」，參考了 Nussbaum 的中譯本《正義的界限：殘障、全球正義與動物正義》內的用法，將 capabilities 譯為能力，而 approach 取其作為理論取徑的功能，譯為「取徑」。在 Nussbaum 書中提供的核心能力架構僅是基本的門檻，而需要實際的案例詮釋讓這個架構能更完整，因此筆者希望維持原本的譯法，較貼近 Nussbaum 提供核心能力基本框架的原意，亦即核心能力是一個基本的且有某種程度開放性（並不是一個固定的和完備的）架構。審查意見所建議的「自我賦能」是文中已經有所詮釋的意涵，在概念上已是較具體的層次了。而核心能力清單的能力在概念上是較抽象的層次，經由本文案例詮釋後，也就是能力在本文案例的脈絡下衍生出來有自我賦能和相互賦能的可能。筆者保留原本譯法，也避免容易跟 empower 混淆。對於 empower 在本文脈絡的理解，請參考本文頁 330。感謝審查者的建議。

周睦怡，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研究員，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推動與協調計畫。Email: muyichou@gmail.com。



## 中文摘要

面對全球化資本主義競爭邏輯下所造成的社會兩極化、環境惡化和民主倒退等問題，劇烈的社會經濟變遷直接影響每個人的生活 and 權益。這些結構性問題不但影響個人，並且導致當代高教體系發展更趨市場化。若不願停留在對高教崩壞的感嘆，大學身處高教轉型的關鍵時刻可以如何尋求突破困境？本文以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為例，探討大學的角色在這樣的脈絡下如何透過社會實踐重新定位並發展特色。筆者採用 Nussbaum 的能力取徑（capabilities approach），把大學的社會實踐理解為促進參與者（包括社區合作伙伴和大學參與者）的能力養成。透過大學與社區共同定義問題，並扣緊核心能力清單中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和促進連帶（affiliation）這兩種能力的發揮，來展開一系列的行動。以社群連結為基礎，但連結社群的方法是以讓參與者能夠發揮實踐理性的方式去引導，也就是考量方案的延續性，方案的設計不但要理論上可欲，也要實際上可行，透過大學社區伙伴研究建構既「真」且「有用」的知識，並且讓一般人和組織都可以執行。雖然「人社實踐計畫」一開始是想與社區伙伴以共學共作的方式，相互協力回應社會問題，但在實際過程中，共學共作到哪個程度其實大家都難以拿捏，既不想落於依賴關係，面對進展緩慢又怕參與者失去信心和耐性。Nussbaum 的能力取徑讓共學共作的意義更為鮮明，讓大學和社區伙伴理解到能力養成的過程本身即是意義。此外，能力取徑也提供行動評估的基礎參考架構，參與者相互賦能，透過一起實踐建立認同、激發動機、並帶動從個人核心能力的養成，到群體形成共同承擔結果的義務，以落實社會正義。

**關鍵字：**能力取徑、大學社區伙伴研究、社區營造、社會正義

## 一、前言

面對全球化資本主義競爭邏輯下所造成的社會兩極化、環境惡化和民主倒退等問題，劇烈的社會經濟變遷直接影響每個人的生活 and 權益，也挑戰各國政府面對這些快速的社會經濟變動是否有能力回應以及如何回應。慎思審議的民主程序是否能夠即時回應如此快速變動的環境？當許多崛起的威權國家在經濟成長和國際影響上明顯地擴張，甚至宣稱是比民主有效率、有魄力的政府，經濟力似乎在資本主義邏輯推波助瀾之下，變成國家統治正當性最重要的來源。經濟力與政治力的緊密結合，壓縮社會力的發展空間和自主性，這樣不均衡的發展，扭曲了對民主的理解和實踐。因此，民主政體回應危機的能力，成為當代民主國家面對的嚴峻挑戰，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意義和價值於是顯得格外重要，人不只是要活著，而且要能夠活出豐盛的人生（human flourishing），這裡指涉的不只是物質條件，還包括精神等其他面向（如：成就感、健康、社會參與、情感連結）的綜合發展，才會讓人感到生存的意義與幸福（Wright 2015: 62; Gibson-Graham, Cameron and Healy 2013: 21-23）。如何從理論的思考提出解決當代社會問題各種可能的替代方案，是「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的原始關懷，以及嘗試結合集體智慧共同打造的「社會創新」（陳東升 2012: 4）。

當今台灣的高等教育無論是大學系所比重、經費挹注和評估方式，都普遍存在重理工、輕人文的失衡現象（謝明彧 2017），經濟和科技快速地發展固然帶來許多生活上的便利和進步，但進步並非沒有代價，因為發展而犧牲生態環境，因為競爭導致社群碎裂，菁英與常民間的認知落差、貧富差距等，並沒有因為經濟和科技發展而消弭，反而因之增長，使得民主深化和社會正義在當代受到有增無減的挑戰。這些困境都難以從單一學科得到答案，面對社會議題的複雜性，跨領域的合作成為一種必要。然而，以專業為本位的大學系所設計，亟需突破系所的藩籬，形成跨領域團隊，走出象牙塔，與在地社區和組織一起透過具體的行動，轉化專業知識共同尋求回應當代社會問題和發展困境的解方。科技有長

處也有限制，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所強調的批判性思考、同理心和包容力的換位思考，以及組織能力，這些都是成為公民所需養成的能力，而理想公民的養成正是民主體制和社會的根基。大學作為高等教育的主要場域，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利益（education for profit）還是為了民主（education for democracy）？儘管目前高教的趨勢嚴重向前者傾斜，但這不該是零和的結果，人文學科與科學應該是相輔相成而非相互敵對（Nussbaum 2012: 1-8）。

「哲學家以各種方式解釋世界，然而真正關鍵的是，改變世界」，<sup>1</sup>馬克思的名言隱含知識的目的不僅在於理解和解釋，更要進一步昇華成行動，對於所處的社會、國家、世界能夠有貢獻。這句話放在當代，尤其是高教轉型的關鍵時刻，仍深具啟發性。2012年科技部人文與社會科學發展司（即前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與社會科學發展處）啟動「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以下簡稱人社實踐計畫），期待大學能走出象牙塔，大學的專業知識和研究能夠與地方社會接軌，與地方社會建立伙伴關係，共同回應重要的社會問題。<sup>2</sup>人社實踐計畫希望透過實踐人文關懷，融入不同專業領域並串聯不同社群，探尋跨領域和跨社群間互動和合作的可能，以創造正向的社群關係作為地方另類發展的基礎。在社會實踐端，大學以校為單位組成跨領域研究團隊深入地方，理解地方的需求和挑戰，與在地居民和地方組織集思廣益，共學共作尋求解方。在學術端，透過行動方案建立理論與實踐的相互反饋機制，並與跨國經驗對話，發展具台灣在地獨特性的理論觀

---

<sup>1</sup> 這句話參考孫雲平（2010）一文的翻譯。

<sup>2</sup> 希冀透過這項計畫的推動，促使受補助的學校組成針對台灣社會及大學所在區域重要社會議題的研究及社會實踐團隊，並且增強學術研究的社會影響，履行學術工作者及大學對於社會公眾的社會責任。相對於生物醫學、理化及大氣科學、工程科學重視研究成果，透過產學合作促進台灣經濟發展的學術實踐模式；人文及社會科學的領域可以發展出學術研究和社會實踐以產生社會影響的模式。2013年國家科學委員會升格為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改稱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司，除了既有的學術研究補助業務外，人社實踐計畫仍是人文司推動的重要工作。

點，創造地方議題對人類社會變遷的價值。再者，人社實踐計畫透過社會實踐行動與理論對話的過程，希冀促成多元研究典範的學術環境，創造大學制度變革和特色發展的可能性。

人社實踐計畫從2013年開始至今已經走到第二期的尾聲，每一期有四所大學，其中暨南大學、成功大學和東華大學是從第一期到第二期的執行大學，團隊在這段時間的實踐與研究有初步的累積。大學社區伙伴研究所重視的主題，包括：大學為什麼要進入社區？大學如何進入社區？大學進社區的意義為何？在這個脈絡下，本文深入探討幾個核心的研究問題，包括：大學團隊如何與地方社會建立伙伴關係？大學團隊如何與地方社會溝通以及帶入想法？人文社會的知識與關懷如何轉化成大學在地方社會的實踐？大學在地方社會的角色為何？這些提問想回答大學社會實踐是什麼（what）以及如何做（how）的問題，試圖提出大學社會實踐的意義（so what）。這對於社會實踐的實作面和研究面都有所啟發，也是本書的重要貢獻。

本文首先探討大學社區伙伴研究在當代的重要性，以及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知識和研究如何搭起跨專業、跨社群的伙伴關係。其次，透過大學社會實踐、社區發展和能力取徑的文獻探討，嘗試搭建本文的分析架構。再者，以本書中暨南大學的空氣品質物聯網推動過程，以及成功大學果樹認養行動方案為例，借用Nussbaum（2006, 2011）的能力取徑，詮釋和說明大學社會實踐如何與地方社會建立伙伴關係，亦即相互協力共學共作。由於是持續進行中的研究計畫，而且是實踐型、過程導向的計畫，不斷調整是計畫持續的重要原則，所以反思和調整是非常重要的環節。因此，本文最後深刻反思現階段人社實踐計畫在大學社區伙伴關係和社會實踐面臨的困境與挑戰。這些深刻的反省，將是持續推動大學社區伙伴研究深化的動力。

## 二、文獻探討

當代高等教育的發展受到新自由主義思維的影響，強調競爭、績效和排名，使得大學的發展趨向市場化、商品化，並且逐漸弱化其促進共善和社會正義的公共角色（林宗弘 2015；曾柏文 2015）。甚至，大學內部的治理也出現許多不公不義的現象，無論是對於校內的教職人員、學生助理或是提供校方勞務的清潔人員（林凱衡 2015；戴伯芬 2015；戴伯芬、吳燕秋、陳思仁 2015）。<sup>3</sup> 現今高等教育越來越朝向科技和財經相關專業發展，這些學科與就業市場和經濟發展相關，而人文學科領域或是較偏向人文關懷的社會科學相關領域，越來越被邊緣化，導致學生和大學越來越傾向將速成、有用、能夠賺錢，變成學習與授業的首要目標，忽略人文關懷、批判思考和想像力的陶冶與啟發，這是美國知名學者 Nussbaum（2012: 2）對於美國高教現況提出的擔憂，甚至以無聲的危機（*silent crisis*）來形容這樣的問題不知不覺地被眾人接受且忽略其代價和後果。

同樣的狀況也在台灣發生，高等教育重理、工、商而輕人文的不均衡現象日漸惡化。這個無聲的危機，影響到我們如何看待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或是被視為公共財，如北歐、德國，或是被視為個人的決定和投資，交由市場去決定，如美國、英國。定位直接影響大學高等教育的目的，要栽培出什麼樣的學生？是具知識理性的專業者，還是具批判思考和包容含納（*inclusive*）能力、深化民主的實踐者？雖然兩者不一定是互斥的，但在學術資本主義邏輯下大學的選擇卻帶來互斥的結果（林宗弘 2015）。當高等教育越來越市場化，知識屬性和服務對象也越來越趨向既得利益方，這將使社會流動、貧富差距越來越惡化，對整體的社會團結帶來更嚴峻的挑戰。再者，高等教育商品化導致高學費和學貸，使得學習的目的和方式更趨利益導向，這樣的學習路徑將阻礙自由想像、批判思考和探索能力

---

<sup>3</sup> 例如，在國家財務考量與人事政策影響之下，學生兼任助理、教學助教、專案教師、兼任教師的相關權益不受保障或是受到剝削等問題。又如，大學將部分勞務委託外包廠商，卻忽視廠商對待勞工的不當作為，勞動權益受損卻無法聲張（洪與成 2017）。

的養成；這些能力養成的機會喪失，最終使人們難以追求各自的福祉。加上在時間和金錢壓力下，成功的路徑變得單一，爲了滿足物質條件必須犧牲生活品質。

高等教育的目的不該只是職業訓練中心，也不該對於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支配失去批判能力，尤其在經濟和科技快速成長之際，有越來越多的群體在過程中被邊緣化且難以翻身。高等教育市場化的趨勢成爲既得利益者捍衛及再複製既有權力結構的機制，這些新自由主義模式的發展對人類社會和環境帶來的負面衝擊將越來越難以控制。然而，人文社會科學可以扮演安全閥的角色，以人文關懷作爲重要的價值與不同學科對話，有機會減緩高等教育趨向市場化所帶來的衝擊，亦即侵害人的自由。

## （一）能力取徑

探討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並主張能力取徑（capabilities approach）的知名學者 Nussbaum（2011: 17-45）認爲，光有法律保障的權利（形式上的）是不夠的，如果無法（實質上的）實現等於沒有意義，因此強調能力的實現才是最重要的，對於 Nussbaum 而言，所謂權利或自由就是能力的展現。上一段文末提及捍衛（不被侵害）的自由，是人們要過有尊嚴生活的基礎，這些自由即是 Nussbaum（2011: 33-34）所提的核心能力（central capabilities）的實現，仰賴政治、社會和經濟環境的配合（Nussbaum 2011: 20）。Nussbaum（2011: 18）提到，能力取徑的相關研究主要是比較和評估人類生活品質並建構基本社會正義的架構。在此，能力指涉的是人能夠做什麼、成爲什麼，有機會和自由去做選擇（Nussbaum 2011: 20）。一個人要能實現有尊嚴的生活至少要有十種能力（capabilities），這個核心能力清單並不是完整的，而是個起點，永遠有更完善的可能。Nussbaum（2011: 33-34）核心能力清單如下：

1. 生存 (life)：能夠活到正常壽命且有尊嚴地老去。
2. 身體健康 (bodily health)：能夠有好的健康，包括：生育上的健康、適當的營養和居所。
3. 身體健全 (bodily integrity)：行動自由、人身安全和需求的滿足。
4. 感知、想像力和思考 (senses, imagination, and thought)：受到教育薰陶，能夠感知、想像、思考和運用理性。透過不同的方式得以表達自我，實踐和忠於自己的選擇。
5. 情感 (emotions)：能夠跟事物或他人建立情感的連結，能夠去愛、悲痛、渴望、感恩和合理的憤怒，不因焦慮或害怕表達情感或感受。
6. 實踐理性 (practical reason)<sup>4</sup>：能夠形成對美好人生（或生活）的構想，並對人生（或生活）規畫有批判的反思，包括保障良心的自由和奉行信仰的自由。
7. 連結或連帶 (affiliation)<sup>5</sup>：能夠關懷他人，參與不同形式的社會互動，同理不同人的處境，可以自由組織和集會。有自尊和不被詆毀的社會基礎，每個人都能夠成為有尊嚴的個體。
8. 其他的物種 (other species)：能夠與自然萬物共存，並且關懷其永

---

<sup>4</sup> 實踐理性的「理性」，在此指的是有「理由」(reasons)的行動，也就是在實際行為中，用理由理解理性；能夠提供理由，要求理由的人才算是理性的人。根據 Nino (1991: 54) 對於理由 (reason) 和原因 (cause) 之間的關係和差異所做的說明：「每個人的行動都會有原因和理由，所有理由都可以是原因，但原因不一定是理由，差別在於理由有正當性，如規範 (norms)、價值 (values) 和客觀性 (objectivity)」。

舉例而言，若學生上課遲到，他的說法是「因為去玩」，而玩樂是基於主觀的慾望，所以是原因，不足以作為理由證成他的行動。相對地，若是因為「生病看醫生」而遲到，就具有正當性，而可稱作「理由」，而這同時也是遲到的原因。

<sup>5</sup> 中文版翻譯成「依附」，筆者認為無法精確表達 Nussbaum 要說的意涵，因為「依附」有被動依賴的意涵，翻譯成「連結」或「連帶」比較貼切，「連帶」有休戚與共以及共同承擔的意義。筆者在後文會根據脈絡的不同而使用「連結」或「連帶」。中文版請參閱徐子婷、楊雅婷、何景榮譯，《正義的界限：殘障、全球正義與動物正義》，頁 86。

續性。

9. 遊樂 (play)：能夠歡笑、玩樂、享受休閒活動。
10. 掌控自己的處境 (control over one's environment)：包含 (1) 政治上，能夠有效地參與關乎自身的政治決定，有權力參與政治並受到言論和結社自由的保障。(2) 物質上，能夠擁有財產、就業權，免於未經受授權的搜索或扣押。在工作上，能夠有尊嚴地工作，運用實踐理性與其他工作者相互認可，並建立有意義的關係。

Nussbaum (2006: 166-168) 以坐輪椅的人舉例說明，針對坐輪椅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對待方式，一種是給予金錢 (或者本身就很有錢)，那麼對方可以請人看顧他，帶他去想去的地方，表面上似乎行動自如。然而，這並沒有根本改變公共空間對輪椅人士的不友善，他們仍然必須依賴別人的協助才能行動或到達想去的地方。無法自主行動會限制坐輪椅人士的能力展現，也限縮他們參與工作、社會互動和娛樂等機會，簡言之，這並不是自主的生活，而不自主則難有尊嚴。若從能力取徑來思考，更重要的會是如何改善公共空間，如大樓、人行道和巴士，能夠有友善輪椅人士的空間或設施，讓他們可以和正常人一般地來去自如。將公共設施改善成友善輪椅人士的公共空間，把他們納入 (include) 社會生活，才是能夠讓他們實現能力且有尊嚴地過生活的方法，而不只是給予金錢就算盡到照顧責任 (Nussbaum 2006: 166-168)。這些能力直接指涉個人，對於群體僅是衍生性的，原因在於人類的能力取徑是以個人為依歸，並非一視同仁，而是每個人都能擁有能力實現自我，這個方式和目標會因人而異 (Nussbaum 2011: 33-35)。這樣的取徑與本文主張的異質共存的條件下，如何促進社群團結的目的相呼應。

這十項核心能力並非相互獨立，也能相輔相成，其中第六項實踐理性與第七項連帶扮演核心能力展現的支柱和架構的角色 (architectonic role)，這兩種能力關乎人性尊嚴的實現，思考自身要實現的生活，並且能行動、反思和調整，去達成實踐自主且有尊嚴的生活 (Nussbaum 2011: 39)。至於連帶，人們透過多樣



的社會互動，去理解和關懷他人，尊重不同的個體，與他人形成連結和合作，而社會合作的重點不是得到利益，而是促進他人與自身的尊嚴和福祉得以實現（Nussbaum 2006: 202）。簡單來說，這兩種能力的展現能夠促進其他核心能力的實現（Nussbaum 2011: 39-40）。這十種核心能力是實現社會正義的必要條件。

近年來，無論是美國、加拿大、澳洲、日本和台灣，都在反思高教的發展和重新定位。這些反思，不約而同地談到促進「社會正義」、「共善」的重要，以及大學透過連結周邊社區和地方社會，回應公共議題和地方需求，展現大學的社會責任（Keith 2015; Nussbaum 2012; Warr and Williams 2016）。更重要的是，該思考在這快速變遷的時代，透過高等教育期待培養出什麼樣的人才。然而，大學的社會實踐，能在多大程度上動搖高等教育的慣行？大學在學術競爭力和社會責任的展現，在思維和運作邏輯上不一定一致，到底大學要有多大的彈性和能耐才能轉換這兩種角色，兼顧甚至讓兩種角色得以相輔相成？這是當前大學共同面臨的挑戰。

## （二）大學與社會

如果人社實踐計畫希冀大學與地方社會建立更多的連結，並且帶動社會實踐的研究能量，那麼，我們必須先釐清大學為什麼要進社區？大學在社會實踐的角色為何？與社區如何建立伙伴關係？面對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對於社會和環境所造成的衝擊，大學可以選擇順應這個趨勢，或是選擇與社會為伍，運用批判的視角結合公民的專業（civic professionalism），亦即在地知識或經驗性的知識，讓學術社群的研究結合地方社會的知識，共同回應社會面對的衝擊並且抵抗剝削，以在地社群為基礎重新建構以永續為前提的社會關係和發展，用在地的思維以及擅長的方式去思考和對應，利用全球的網絡去行動，跨社區、跨界的合作和經驗轉移在世界各地持續擴散中（Reid and Taylor 2002: 20）。如果研究社群的目的不只是解釋已發生的現象，而是進一步想要造成改變，這種實踐型的行動研究，

更強調與社會建立更深的連結和參與其中，與傳統客觀知識建構的研究取徑不同。Sherraden (2000: 2) 談到行動研究、社會實踐研究的挑戰除了要找到什麼是「真」之外，還要「有用」，因此行動介入 (intervention) 必須考量：「(1) 簡單可理解、可溝通和可行的；(2) 可以高度被解釋的，即有意義的影響；(3) 適用於多樣的形式在多樣的情境，符合廣泛的情況、人們、制度和條件；(4) 可藉由社會核心價值來架構；(5) 倫理的；(6) 可負擔的；(7) 政治上可行的；(8) 受到多重檢證的；(9) 受惠超過介入的成本；(10) 一般人和一般組織都可以執行的。」問對問題是行動介入的重要關鍵，而尋找要素間的關聯和良性循環或機制，是行動研究希望找到的既真又實際可行的答案 (Sherraden 2000: 14-15)。在此，理論的角色除了引導思考和行動外，也能透過社會實踐來反思理論的限制並進行修正。

實踐型的行動研究另一個特色是，既然要與在地社會建立更深的連結並回應結構性的問題，需要跨領域合作和協力以回應複雜的現實現象。所謂跨領域研究，並非將不同的專業放在一起，這往往難以真實回應現實的複雜性，跨領域研究要處理的往往是單一專業無法處理的議題，需要超出專業的範疇以跨領域的方式協力探討。這也成為學術典範轉移和新的學術典範建構的最大挑戰：學術社群要如何從單一領域轉換成跨領域的研究？要怎麼問出對的問題？從專業領域到跨領域研究間的關聯性為何？這既是挑戰，也是重要的經驗累積，嘗試用不同的研究方式建構知識。

### (三) 社區發展的取徑

關於社區發展，相信社區有機會轉變的相關研究主要有兩種方法，一種是需求導向的社區發展取徑 (Needs-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method)，另一種是基於有利條件的社區發展取徑 (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method) (Gibson-Graham 2006: 145-146; Kretzmann and McKnight 1993; Stuart 2013)。要

說明這兩種取徑的差別，若將社區譬喻為半杯水，那麼，每個社區都會有這兩面，前者將社區比喻為「少了半杯水」，不足的部分就是社區的需求，因此傾向從外部資源來補足；後者將社區比喻成「已有半杯水」，這半杯水代表社區內部的人、組織和制度所擁有的動能，以及可用的空間和物力資源，都是社區發展的有利條件，發展社區因此是基於社區的能力和有利條件，而不是從需求出發（Gibson-Graham 2006: 145-146; Kretzmann and McKnight 1993; Stuart 2013）。換言之，前者的切入方式是社區的需求和問題，後者則是社區的強項、既有的資源和相關的有利條件。

這是看待社區以及與社區互動的兩種不同觀點和方式。外來團隊以需求為導向與社區互動，了解社區的需求和困境固然重要，但這有可能讓社區方以「不足或不夠」的方式看待自己，因而顯得無力，這樣的印象形成後，往往會導致這些不足和問題需要外力介入和外部資源才能夠改善，因此傾向仰賴外來團隊、相關政府部門的介入或資源導入，來解決需求和問題，這種模式的延續性經常受到挑戰（Gibson-Graham 2006: 145-146; Kretzmann and McKnight 1993）。由於補助方和受補助方的需求並不總是一致，這樣的資源對接，經常難以真正發揮效用，一旦補助停止就無以為繼，反而導致社區難以脫離對外部團隊和資源的依賴。反之，基於有利條件的社區發展，是社區由內而外的改變，當社區看到許多社區本身正向和驕傲的部分，包括能力、特色和物資，將有助於社區內部動員既有的人力和物力，去實現社區成員想要實現的社區生活（Kretzmann and McKnight 1993）。換言之，重點不是別人定義的美好生活，而是社區居民想要的美好，由社區內部展現出來的動力去定義和實現的美好生活。

在需求導向的社區發展脈絡下，社區傾向形成對外依賴，這跟能力取徑所強調的培養自主能力相違背，更重要的是，在這樣的依賴關係下，人們無法過有尊嚴的生活。以社區有利條件為基礎的發展方式，最大的挑戰是由內而外的動力如何形成以及是否有實現的能力，因此，不是以一種封閉網絡的方式進行，社區仍會與外部團隊和資源連結，但連結的目的是為了增進社區的自主性（autonomy）

(周睦怡、熊慧嵐、陳東升 2015)。大學團隊對社區而言是外來團體，如何與社區建立關係，並導向社區能往自主運作的方向發展，成爲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大學與社區的關係並非一成不變，也不是社區的守護者，如何形成互助互惠的伙伴關係，是人社實踐計畫努力探詢的課題。前面談及實踐型的行動研究中，研究者也是實踐者，因此，這類型的研究問題，或是轉換成團隊成員與社區互動和訪談的提問，都會圍繞著如果我們想要讓社區動起來，或者有所改變，我們可以怎麼做？如何勾勒居民嚮往的社區（社群）生活？這些正向的提問方式，有助於參與其中的相關利益方，能夠以積極的態度去看待社區，並且思考各自能夠付出和貢獻的能力或資源。最後涉及的資源和分工，就跟「治理」有關，到底誰才能決定資源要如何分配和運用，人力如何配置和分工？當我們從社會面向看到共同的問題和需求，同時也從個人或組織看到能力和資源。大學研究團隊作爲參與社區的一方，要思考的是如何讓個人的能力（核心能力清單的十項能力）有環境得以實現，以及當某些能力實現的同時，如何帶動其他能力也得以實現。換句話說，這裡所思考的是，從個人的層次如何延伸到群體，以社群爲單位思考，地域範圍不限於單一社區內，而是周邊社區。

以有利條件的社區發展方法或許可以強化個人可實現的能力，以積極的態度看到社區的條件和環境有機會可以改變，並且操之在生活在於此的人們身上。這些以正向提問、思考和建構的社區意識，將有助於居民和參與者對於過程的行動和反思，培養並發揮連結、連帶和實踐理性等能力，修正對於社區美好生活的想像和實踐。在此過程中，個人的能力展現和促進能力展現的制度環境，彼此相互建構，因此，大學團隊在此的角色是，促進能力展現的制度環境得以養成，在讓居民有能力實現自我的同時，增進社區生活的品質，做有尊嚴的人，過著豐盛（flourishing）的生活。

能力取徑強調多樣性，如果要讓每個人都能實現能力，具體展現的方式有可能不同，那麼，制度環境的建構要根據什麼或是如何形成共識？什麼樣的治理方式能夠讓群體回應這樣的問題？由上而下的命令往往壓抑多元的展現而顯得不可

行，代議制度也沒有辦法真實反映多樣的需求和意見。審議制度或許相較之下比較有機會回應這個複雜的治理問題，但重要的是，審議在此的角色不是要有共識，而是促進相互對話、溝通的過程中看到別人的處境而能感同身受，進而去理解、體諒和在乎，然後運用集體的智慧找到大家能接受的決定。換句話說，這並不是零和的競爭，而是因為相互體諒和包容，願意妥協，並且相信不犧牲別人的好或決定，才是大家一起走下去的重要動力。根據這樣的邏輯，社區不需要靠某個人來領導，每位在社區生活的居民都是社區的重要支柱，社區是大家的，一個人無法做到的事情要靠眾人的力量才有機會實現，具高度複雜性的治理亦然。

大學社區伙伴關係的建立和維繫，在實際運作上常遇到的挑戰包括：信任、權力不對等、資源依賴、認知和期待落差以及溝通等問題，這些都是相關研究探討的重要議題（Kindred and Petrescu 2015: 829）。其中跨域合作如何可能？如何促進？是行動研究裡知識建構和行動方案設計中非常重要的一環。跨域合作或跨社群合作要能延續且發揮正面的影響，關鍵之一是讓參與的各方保有自主性與完整性，因此這有別於同質性的高整合性團隊運作，而是一種異質組成、尊重多元和差異以及彼此包容，以不同的方式貢獻共同目標的彈性運作團隊。至於凝聚大家使命的介面則是一連串問題解決的過程，實踐帶給不同背景的參與者共同建構的想像和事實，有助於在異質的參與者間逐漸建立「我們感」或認同，這也是許多行動方案介入拉近社群間的距離，以及進一步串聯和促進團結的重要基礎。

### 三、分析框架

從個人層次到社群層次，本文試圖以能力清單搭配以社區有利條件為基礎的發展取徑，進一步建立分析框架。以需求為導向的社區發展取徑，傾向形成依賴外部團體和資源，難以自主（autonomy），導致難以實現有尊嚴的生活，無論是從個體或群體的層面來說皆然。加上外部投入資源不可能無限，對於資源有限的內部群體，如何分配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如果個體間雷同的需求都仰賴外部資源

解決，彼此之間容易形成惡性競爭，或排他的現象，對於社區社群的團結造成莫大的挑戰。反之，以社區有利條件為基礎的發展取徑結合個人的能力清單，同樣強調能力展現和自主性，較能邏輯一致地從個人連結到群體。更確切地說，如果大學社會實踐的目的是促進個人層次十種能力的展現，過有尊嚴的生活，社區層次就是以社區有利條件為基礎的發展，即社區自主性的展現，透過社群共同建構各自美好的人生。

基於前述的討論，無論是能力清單或是以有利條件為基礎的社區發展取徑，都不是以同一標準套用，而是重視差異性和特殊性會因人、因地而異的發展取徑。關於從個人層次連結到社區社群層次的部分，在十項核心能力清單中，實踐理性和連帶能力的實現，能擴散或促進其他能力的實現，因為這兩種能力的實現隱含自我尊重和尊重他人，以及能感同身受的能力實現與傳遞，是人性尊嚴實現和環境養成的重要環節。Nussbaum 舉例說明，如果一個人被提供良好的營養，但他若沒有展現實踐理性，對自身健康和營養進行規畫並根據狀況進行調整，那麼只是像嬰兒般地被照顧著，而不能算是有尊嚴的生活。因此，實踐理性是人們可以運用能力去規畫與實現人生，這就是實踐理性帶動和促進其他能力實現的關聯性（Nussbaum 2011: 39）。同樣地，在尊重人性尊嚴的環境下，連帶指的是個人如同社會的一分子（social being）且受尊重，這能夠延伸到其他能力，例如，當提供一個工作機會時，若沒有考量到職場關係、相關福利和保障，是不恰當的（Nussbaum 2011: 39）。對於一個美好的社區社群生活的想像，仰賴與社區相關的居民和組織，在彼此尊重之下，共同商討、建構和實踐美好的生活。個人不會因為實現共好而被犧牲，而是自己的能力也有機會在這個過程中實現。換言之，大家會願意參與並一起實現，因為改善或提升自己能力的同時，也一起提升社區的能力和生活的品質。這個理想型有助於我們理解，如何設定社會實踐的議題。大學團隊的社會實踐所回應的議題，連結到哪些能力實現的限制或促進？大學的社區行動方案，對於社區社群生活會造成什麼樣的變化，或往實現什麼樣的共同規畫邁進？如同基於有利條件的社區發展取徑強調放大社區的有利條件，並作為發展

的基礎，下節將以案例說明，如何運用能力清單和基於有利條件的社區發展取徑，促進社區裡從個人到社群層次的能力，實現有尊嚴和希望的生活。

沿著這個脈絡，大學的社會實踐希望能促進從個人到群體層次的能力實現，過去常以「賦權」(empower) 概念來理解這個過程，但本文聚焦在大學、社區的參與者相互賦予能力(賦能)的過程。無論是賦予權利或權力都不足以理解這個過程，除非權利和權力能夠展現或施展。從能力發揮的脈絡去理解賦能，則是將人們應該有卻因為客觀條件限制而無法展現的能力，給予機會施展。移除或改善那些限制能力施展的客觀條件，並建立有益於能力促進的環境，是大學社區伙伴研究希望促成的目標。期望實現自己能力的同時，也幫助別人得以實現能力，這個過程中所經驗的互動和凝結群體的價值，正是社群治理的關鍵。

## 四、案例分析與意涵

本文為本書的最終章，嘗試提出一個架構來說明大學社會實踐的目的和方式。從人文社會科學的視角來看，這樣的介入目的往往與實現社會正義有關，因此本節透過案例說明大學社會實踐如何促進社會正義，亦即促進 Nussbaum 核心能力的展現？研究資料採用本書的文本以及筆者參與式觀察的田野筆記為主，原本在進行方案設計和執行時有其他想要回應的社會問題，但從過程導向去思考行動的意義時，Nussbaum 的核心能力清單深具啟發，因此本文選取本書的兩個案例，嘗試以 Nussbaum 的能力取徑進行詮釋。核心能力清單的內容是抽象的，案例的詮釋可以給予這些抽象的概念血和肉，此外，台灣脈絡與西方脈絡有顯著的差異，這也是行動研究可以深入探討的部分，亦即能力概念如何脈絡化，透過在地的經驗詮釋來自西方的概念，其異同為何。

關於案例的選擇，本書集結的文章以參與人社實踐計畫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大學團隊書寫社會實踐和實作課程的經驗，共包含三個部分：(1) 第一部分是大學制度與地方的角色，〈東臺灣的真實烏托邦實踐：人社實踐計畫、社會賦權與參

與式治理)、〈從港口部落的場域經驗談集體同意權與研究倫理的諮商平台〉兩篇文章，概括性地闡述大學如何思考和扮演社會實踐的角色，涉及哪些議題可作為與地方社會連結的嘗試及挑戰。(2) 第二部分是課程／平台串聯機制，〈公平分配教育資源：鄉村課後學習遠距系統建置〉、〈大學社會實踐課程操作與行動反思的回溯性初探〉、〈在地空氣品質物聯網推動經驗〉三篇文章，透過案例說明大學與地方社會如何形塑 (frame) 實作的議題，如何將意識轉換成行動，以及大學如何建立與地方社會「持續互動」和「共同實作」的平台和機制。(3) 第三部分是在地實作與具體實踐，〈果樹認養行動方案中的社會經濟實踐〉、〈農耕實踐的永續轉型：成大團隊與東山小農的經驗〉兩篇文章，面對地方社會的結構性問題 (如另類經濟的嘗試、友善耕作轉型)，大學團隊與地方伙伴如何透過集體智慧和專業知識以及地方知識的轉譯尋求解方，大學與社區的伙伴關係如何在問題解決的過程中形成、磨合和調整，以及思考所謂的共善共好並具在地脈絡的實踐 (situated practice) (Amin 2009: 11)。

從以上簡略的分類可以觀察到大學的社會實踐至少有以下幾個切入點：(1) 政策制定和政策執行間的落差，或者制度缺位，例如，搭建研究倫理的諮商平台，建立社會賦權的參與式治理。(2) 建構社區發展的支持網絡，例如，建立課後學習遠距系統，在地空氣品質物聯網，大學社會實踐課程的操作。(3) 社區韌性和能力的實現，無論是想要實現另類經濟或生態永續，這些當代面臨的結構性問題直接影響社區和社群生活的品質，社區如何因應顯得格外重要。舉例來說，如何形成可以持續運作的模式，實現社區的自主能力是大學社區伙伴研究的重要課題。本節以第6章暨南大學團隊〈在地空氣品質物聯網推動經驗〉，以及第7章成功大學團隊〈果樹認養行動方案中的社會經濟實踐〉作為案例進行分析，這兩個案例具有明確的社會實踐方案與社區共思和共作，較能說明大學團隊的社會實踐如何促進個人層次能力的實現，以及強化社群間的連結。



## (一) 暨大空氣品質物聯網的推動

### 1. 空污問題對個人能力的限制

埔里素來以好山好水好空氣聞名，但近年來空氣品質  $PM_{2.5}$  持續惡化。根據環保署埔里空氣品質監測站的  $PM_{2.5}$  數值統計，2014 年埔里  $PM_{2.5}$  年均值高於台灣年均值標準的 2 倍、高於世界衛生組織年均值標準的 3 倍。此外，埔里  $PM_{2.5}$  日均值大於台灣訂定標準  $35\mu g/m^3$  的天數高達 146 天，也就是一年有四成的天數都是空氣品質惡化的狀態。空氣品質惡化影響到居民健康，讓越來越多人關注空污問題（請見本書第 6 章：195）。空污問題直接影響人們的健康，尤其對高敏感族群，如老人和小孩的影響更為明顯。空氣品質差也使人們從事戶外活動或運動受限，對於人們的行動、遊樂和生活都帶來限制。受限制的生活會影響人們的情緒，很難想像要小孩子都在室內活動，人們不能親近大自然。空氣品質惡化不只影響人，對於環境和其他物種的危害也都難以避免。每個人都需要呼吸，乾淨的空氣是維持生命的基本需求，當空氣品質持續惡化，直接影響民衆生存的權益。然而，空污既看不到也摸不到，卻又影響大家的呼吸和健康，這種不知道空污有多嚴重、空污在哪裡，以及空污是什麼的恐懼與焦慮，讓人們不得不正視空污問題。簡言之，空污直接影響人們的呼吸，乾淨的空氣是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當失去了這個必要條件，除了健康受到危害外，面對看不到且難以防備的敵人，生活在不安的狀況下，稱不上有尊嚴的生活。空污問題日益惡化，使得 Nussbaum 核心能力清單上的健康、生存、遊樂能力受限，也為其他物種帶來直接的負面影響，這些負面影響也造成人們情緒低落和焦慮不安。

### 2. 大學社區伙伴關係的搭建與社會實踐方案的介入

危機出現時往往也是改變的契機，大學的介入要思考的是如何把危機化為轉機。既然空氣品質惡化會讓多數人受到負面的影響，導致 Nussbaum 的核心能力難以實現。那麼，深受影響的人們要如何改善問題，以實現有品質的生活呢？

2014年五位在地居民發起組成埔里PM<sub>2.5</sub>空污減量自救會（以下簡稱自救會），提出希望了解生活周遭空氣品質的狀態，牽起與暨大人社中心合作的機會，由暨大資訊管理學系戴榮賦教授發展物聯網與微型感測器，讓看不見的空氣污染，透過微型感測器的轉換能夠被看到，並以此為媒介促使更多民衆意識到空污問題，並且轉化成具體的行動，除了進行防護外，也能積極地減少空污排放（195-196）。

微型感測器從無到有，除了是研發的過程，也是社群串聯形成多樣的社會互動的過程。暨大團隊與自救會成員協力回應空污問題，戴榮賦教授擁有研發微型感測器和應用物聯網的專業知識，自救會成員則提出使用者的需求並參與研發的過程和測試，例如，感測器的敏銳度和穩定度測試，選擇感測器、校正數值、布建和宣導等（209-213）。透過感測器的設計，讓看不到的空污能夠被看到並測量，再將這樣的媒介藉由布建，連結埔里周邊的學校、自願參與的店家和民衆，以及公家機關（201-204）。

光有硬體能發揮的作用其實有限，自救會與暨大團隊協力到校園進行宣導，透過偶劇、遊戲問答和桌遊，讓小朋友能夠理解空污問題和影響。對校方而言，保護學生的健康責無旁貸，許多小學在放置微型感測器後也在校園掛上空氣品質指標，當空氣品質不佳時即減少學童的戶外活動。在布建的過程中，不同的參與者也給予暨大團隊實務上寶貴的經驗知識，例如，進氣口加裝紗網避免蚊蟲飛入，感測器加上燈號以顯示當下空氣品質現況，團隊根據這些反饋再做調整，以達到順暢的運作（210）。此外，空污來源的解釋仰賴熟悉地方產業生態和地形地貌的在地人士，例如，某國小附近為筊白筍田，農民有可能將農業廢棄物燃燒處理，或者有人整地和鋸樹而露天焚燒，獅子頭地形能解釋空污的分布（213-216）。空污志工除了面對面聚會討論，也利用社群媒體網絡及時回饋各自的觀察和想法。面對空氣品質惡化的問題，暨大團隊與自救會、參與布建的民衆、店家和學校一起協力，從個人因為空污造成的身體健康影響，轉化成埔里關注空污而連結的社群所進行的集體行動；從微型感測器的研發、測試與布建，空污數值的

監測，空污來源的探討，到空污減量行動方案的設計，這些過程讓民衆不只是資訊的接收者，而是參與其中並參與決定（209-213）。過程中，暨大團隊不只是解決問題，也拋出問題讓自救會、參與民衆能夠貢獻所知和所能。換言之，共同對於空氣品質改善的需求，透過各自擅長的能力，不論是從專業上的或是經驗上的，一起貢獻回應空污在哪裡、是什麼原因造成的、該如何減少等重要問題。這些公共參與和集體智慧的集結顯示居民不只是被動地面對空污，而是展現實踐理性依其所能回應空污議題並轉換成具體行動，如幫忙監測、尋找成因等，發揮實質的公民力量。因為空污議題而串聯的彼此，嘗試理解不同社群的關懷和做事習慣，這些習慣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空污的排放，試圖在兼顧健康、生命的延續和對乾淨空氣的需求，適當地調整習慣，就能在維護自己呼吸健康的同時也成全別人的健康。

### 3. 大學社會實踐方案對個人能力和群體的影響

當人們在便利與空污排放之間必須有所取捨時，人們為何願意犧牲自己的便利而減少空污排放呢？實踐理性意味獨立思考、行動、反思、調整規畫和行動以展現自主性，若個人的行為會造成空氣品質惡化，影響他人和自己的健康，能夠思考調整行為的各種可能性，例如，避免汽機車怠速，將汽機車停放在停車場，步行到市場買東西或到學校接小孩，減少車流量又能減少怠速的時間。又如，過去僅能憑感覺猜測有空污，有了感測器的確切數值能證明空污的存在並探詢污染源。自救會和暨大團隊透過宣導和各種活動，推廣認識空污和空污減量相關知識，加上其他軟性的媒介，如嘉年華會遊行、紙偶、行動劇等，吸引眾人的目光，去重視空污問題，讓零散的個人因為空污議題有機會聚集和互動，並產生連結和連帶。在這個連帶關係裡，個人作為群體的一分子，當顧及到自己的健康並想到他人的健康時，就是將他人視為社會的一分子，顧及到他人生活的尊嚴。當人們參與其中，看到並理解受害者的處境，認知到若不改善也會影響到自己和他人的健康，這樣的考量會使自己與他人產生連帶，思考若自己有所行動能改善困

境的話，是否就能結合眾人一起做一些改變，改善空污並恢復空氣品質。

暨大團隊開發的微型感測器並不能直接改善空污，而是讓人們意識到空污的存在，至於是否能夠有所行動，則須善加動員人們實現的能力，以及擴散這些能力至其他人群並轉化成群體得以相互協力的環境，這體現了 Nussbaum 核心能力清單中促進「感知、想像力和思考」的能力，但不只停留在思考，也依個人的「實踐理性」化為行動，進而參與對抗空污運動。在一連串對抗空污的行動中，促進多樣的社會互動以及社群間的連結，包括：暨大團隊、自救會、布建參與者、居民、學校師生、店家、熱心志工和政府機關，並且透過自救會志工的網絡擴散空污宣導和推廣工作。多樣的社會互動，也形成正式和非正式的關注空污議題網絡，如自救會、FB 社群、創客工作坊（209-212）。這些多樣的串聯方式有機會透過不同的群體和方式，擴散空污議題的公共討論，並且使不同社群間能夠產生連結甚至發展連帶關係，共思能夠有什麼具體的行動去改變。有些商家或居民認為談空污會影響經濟，限制太多會沒有顧客上門消費，但換個思維來想，為什麼不能以環保、環境友善和好空氣作為訴求，變成綠色經濟作為特色？暨大團隊在這裡扮演重要的角色，如何排解問題，如何改變困境，帶動居民有操之在我的感受和希望，這是大學社區伙伴關係建立、經營和維繫非常重要的一環。

大學與社區間的協力若不要淪為依賴關係，則須建構開放的網絡，在行動過程中維持開放，透過不同的行動納入不同社群的參與者，擴大行動網絡。埔里空污的議題仍在持續中，團隊仍持續耕耘朝目標努力，然而，若是沒有透過微型感測器和物聯網讓民眾看見、意識到空污的存在和嚴重性，對抗空污的意識和行動都將更困難，或僅止於有志之士而難以擴散。此外，看見空污問題、理解空污、探討空污來源，讓專業知識和地方知識有機會對話、比對和轉譯，讓專業知識能夠在地化，更能透過科學數據，讓地方的經驗知識得到驗證。解決空污問題的過程，對大學和在地伙伴而言是持續解決問題和共學的過程，共同面對問題承擔責任，形成互助且互惠的關係。

對於埔里空污議題的參與者，這個共學共作的過程體現人們實踐理性的能

力，並且透過多樣形式的串聯和社會互動，形成社群間的連結、感同身受、歸屬和凝聚，這些能力的集結創造一個開放且容納的網絡，讓更多人可以加入並貢獻所知、所學和所能。尊嚴的生活在此呈現的是，民衆能夠一起面對問題、行動、反思和調整，找到解決問題的可行辦法，唯有這種操之在我（們）的自主性和能力展現，才有機會實現改善空污，進而擁有有尊嚴的生活。

## （二）成大東山區淺山農鄉地帶友善耕作轉型的果樹認養行動方案

### 1. 慣行農法和主流市場機制對農鄉個人能力的限制

台灣農業的發展深受資本主義和工業化的影響，雖然這種現代化的生產和交易方式看似有效率，代價是農村人口離農與離鄉，作物商品化，主流市場通路支配訂價和銷售，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幾乎沒有連結等（請見本書第7章：239-240）。交由市場主導的交換關係難以永續，可以從食安問題的浮現，以及土地因大量使用化學肥料和農藥所造成的地力耗損窺知一二，造成消費者和生產者兩者皆輸的局面。從慣行農法來看，大量使用農藥和化肥除了危害農民本身的健康，也對土壤和周遭生態帶來負面的影響（241）。至於購買肥料、農藥和機具等投入的資本，則仰賴大量的作物產出來換取收入的盈餘，但農民並沒有議價的能力，且整體產量增多會使價格下跌，農民收入不一定增加（242）。農民要到採收銷售後才能拿到收入，這跟一般上班族每個月有固定收入不同；一年的收穫可能因為氣候條件不佳，或是天災影響收穫量和品質，這個不確定性讓農民及家人恆常處在收入不確定性之下，對於生活開銷、人手不足、價格波動和氣候狀況等的焦慮，非務農之人難以理解。因為務農工作辛苦，經常是各忙各的，農民間自主發起組織較為困難。實際上，農民多以個體去面對結構性的困境，想要改變形同以卵擊石。轉換成常聽到的語言，即「靠天吃飯」，遇到天災歉收或豐收過剩等問題時，只能仰賴政府協助。但政府採取的方式往往是補助或收購，無法從根本改

善問題，下一次再遇到問題時，農民一樣無能為力。農民對於自身的生存、自主掌控生活和生產的處境都遇到極大的挑戰，遑論有時間和閒情逸致遊樂或參與公共事務。面對個人能力的種種限制，為了生計和家計憂慮，農民以自身的健康換取作物的豐收，而這又仰賴老天爺眷顧免於受氣候天災影響。這一切似乎都難以操之在己的不確定性，讓許多農民的生活難以稱得上是有尊嚴的生活，因此普遍不希望子女務農，離農離鄉於是成為農村面臨資本主義、都市化和生產工業化後難以避免的後果。

主流的經濟模式對於農鄉的衝擊，使得 Nussbaum 核心能力清單上的健康、生存、其他物種和掌控個人的環境等能力受到限制，對於天災和議價的無能為力使得許多農民對生計感到憂慮不安，加上農事繁忙較難組織集結，造成農民獨自面對許多結構性問題，在無助之下僅能委曲求全適應問題。

主流市場的存在讓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連結和連帶關係變得沒有必要或難以形成。農食產品在資本主義的交換體系裡被視為「商品化物件」，以「外觀」和「價格」作為消費的判斷標準，消費者難以理解到生產者在生產端面對「環境破壞」和「被剝削」的問題，這個生產和產銷過程的資訊不透明，使得消費者對於自身所吃的食物安全缺乏信心，直接影響消費者的健康和對食物安全的疑慮（243-244）。然而，面對惡劣欺瞞的廠商，除了求償外也顯得無能為力。近年來食安問題頻傳，凸顯光靠政府把關是不夠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都需要參與進來，了解生產和產銷過程，促進這些過程的資訊透明化。對生產者或消費者來說，問題發生時都會直接影響生計、健康和生存的基本權益，就算有事後的補助或賠償都難以防止類似的問題再發生。面對這樣的困境，農民和消費者如何可能扭轉這樣的情勢？是否有可能形成另類的經濟交換模式，能夠同時兼顧生態永續、消費者和生產者的能力養成，達到更有韌性地面對天然環境和市場的波動？

## 2. 大學社區伙伴關係的搭建與社會實踐方案的介入

面對資本主義和工業化生產方式對於農鄉在經濟、社群團結和環境上的危

害，已經直接或間接地影響 Nussbaum 所談的個人核心能力的展現，雖然許多年齡較長的農民還是持續用慣行農法的耕作方式，以及接受不是最好但還可以接受的果菜市場、行口或盤商銷售的方式，這是主流市場機制下的適應之道（242）。需要深刻思考的是，到底是什麼因素使得農民寧願委屈自己以適應環境，而不是順從理念去實踐？理想與現實難道真的只能是平行的兩端，而不能合而為一嗎？前段提及的結構性問題，往往轉嫁到農民個人身上，不難想像這些問題若缺乏制度性的介入或是社群的集體行動，實在難以改變。

面對這些種種困境，如何形成一個支持體系，讓想要轉型友善耕作的農民能夠去實踐，引起成大團隊思考大學要如何介入。從成大團隊的田野訪談可以看出，農民對於種植的技術有信心，沒有信心的是友善耕作產出的水果外觀有缺陷要怎麼銷售的問題（246）。考量到環境的永續，以及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健康，成大團隊的方案介入，除了以「農友共學堂」<sup>6</sup> 陪伴農友友善耕作轉型外，並以「果樹認養」搭起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橋梁，透過社群關係的連結和重建，一起朝向環境和食農永續的目標邁進。成大團隊與東山農友的合作希望透過社群集結（生產者、消費者和大學）的集體力量，以互助互惠取代競爭，試圖打造另類的經濟模式來緩解農鄉經濟受到資本主義支配的問題。

成大團隊以「社群協力農業」（Community-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模式設計「果樹認養行動方案」，這個方案的社群特別指的是生產者和消費者，嘗試把過去不會見面也沒有連帶關係與互動的雙方，透過果樹認養方式連結兩端，方法是「消費者預先認購一棵果樹的收成並預先付款，合作農友則採行環境友善農法進行栽培管理，此外，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約定共同承擔天災與病蟲害造成的損失。」從2015到2017年共有柳丁、荔枝和椪柑農友加入此方案中（240）。

果樹認養行動方案的設計並不只是連結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交換關係，更重要

---

<sup>6</sup> 關於成大團隊與東山農友在友善耕作轉型和農友共學堂的細節，可參考本書第8章，蕭惠中〈農耕實踐的永續轉型：成大團隊與東山小農的經驗〉。

的是如何透過機制的設計讓沒有關係的兩方產生互信，願意共同承擔風險、共享成果，以形成互助而能互惠的社群（250-252）。消費者透過預先付款釋出對於農民想要轉型友善耕作的支持與信任，這與以往作物生產且售出後才能拿到報酬是不同的，這筆預先付款能夠讓農民更有信心面對轉型過程中的技術方法嘗試、農損和作物不漂亮賣不出去的憂慮（242, 246, 251-252）。至於消費者為什麼願意用比較高的價格去購買數量和外形都不確定的水果呢？有別於一般的商業行為，在社會經濟裡並不是以獲利最大化為目的，而是透過交換關係促進社群內和社群間的團結。因此，對於願意參與果樹認養的消費者，認購果樹不只是為了得到水果，而是透過成大團隊的宣傳和理念介紹，從產地到餐桌這個被隱蔽的資訊，消費者認識到食安議題的重要性，以及過去猶如黑盒子般的生產過程。當這層過去由市場中介的機制由另一種方式取代，有意識的消費者會更有意願去進一步了解，除了食物的產地外，食物到底是怎麼種出來的？果樹認養行動方案鼓勵多人（五人）一起認購一棵樹，認購金額預先計算五人參與採收的活動費用（256）。這樣的設計，意味社群的擴散光靠資訊推廣是不夠的，也要借用關係網絡，讓有意識的消費者成為種子，分享這些理念和活動，除了自己參與也帶動親朋好友共同體驗農事活動和農友的溫暖人情味。

此外，食農教育從學校到產地，從產地到餐桌，為了讓食農議題能深入到「股東」<sup>7</sup>的心裡和身體裡（吃進去），農友也設計體驗活動，讓股東能夠了解作物的生產過程，以及簡易加工的方法，了解如何吃當季、吃在地，而且是道道地地的吃法。這些掛牌、採收或是體驗活動，光靠農友夫婦難以達成，因此，任何一家農友辦活動，除了農友全家總動員外，其他農友也會前往幫忙，漸漸地形成農友間相互幫忙一起接待到產地的股東朋友。這讓以往難以組織起來的農友，為了活動內容而邀請家人、朋友參與，讓原本單一的農作收成，也能展開簡易加工和體驗等休閒娛樂行程，讓農鄉的經濟更多元。這種能夠親近自然、支持友善耕

---

<sup>7</sup> 認養果樹的消費者在此被稱為「股東」（shareholders），請參考第7章，註釋8。



作、保護環境，又能吃到健康的水果和農友準備的在地好料，對於股東的健康、遊憩和家庭關係都有助益。減藥和研發替代技術，讓農友形成問題解決的共學伙伴，加上股東的股金支持，以及親自到產地參與活動的熱情，讓農友更有信心和有能力克服耕作轉型的艱難，這些對農友的健康、自信和土地生態的關係都有正向影響。

### 3. 大學社會實踐方案對個人能力和群體的影響

「果樹認養行動方案」促進農友核心能力的綜合展現，成大團隊的介入讓有心轉型的農友能夠付諸實踐，在此，成大提供給農友的不是金錢或技術，而是透過一連串小型的方案去蒐集農友對耕作的理想和現實的落差，再透過方案設計去拉近落差，甚至創發另類的經濟模式和多樣化經濟的可能。筆者認為這些方案不只是尋求另類的經濟模式，更重要的意義在於社群（農友、股東、成大團隊）能夠因此擁有更豐盛的生活（human flourishing），更具體而言，逐漸養成 Nussbaum 的核心能力。

如上一段所述，圍繞著連帶能力展開其他核心能力的養成。透過多樣的食農教育管道，例如，成大團隊的宣傳，農友設計的體驗活動，果樹認養活動，揭開食物哪裡來、怎麼種、怎麼銷的資訊。資訊揭露之後，除了讓生產者和消費者更了解彼此的處境和狀態，也透過實踐理性得以想像和創造一個更好的可能。由此看來，果樹認養行動方案就是嘗試去建構另類經濟模式，以社群（人）為本，當我們顧慮到彼此，也尊重群體裡每一個人都應該享有健康的食物和得到合理的報酬，生產者會考量消費者的健康，採用友善的方式耕作，這樣的方式同時照顧到土壤和豐富果園的生態；消費者考量生產者友善耕作的辛勞，願意預先付款，讓農友能夠安心並持續投入辛苦但對人與對環境都有益處的轉型工作。這種因為連結、互動而產生的連帶關係和經濟交換，是連結、連帶能力的展現，讓消費者與生產者從主流市場機制下的對立關係，轉變成共同承擔風險、共享成果的互惠關係，雙方都能夠得到安全又有品質的水果，獲得健康，也環境友善，塑造物

種豐富的果園生態體系。這一點體現了核心能力清單中的健康，以及對其他物種和環境的關懷。此外，透過各種體驗活動，來訪的股東能夠認識農鄉的地景、作物和人情，而人情正是社群連結產生連帶關係最重要的基礎，並且是難以取代的部分。有了這層連帶關係，股東與東山的關係不是短暫停留的觀光客，而是會想一來再來的朋友，以及願意透過另類經濟方式為農業永續轉型貢獻一己之力的伙伴。更甚之，食安問題日益嚴重，意味光靠政府把關並不足夠，除了讓生產和銷售過程資訊能夠透明化之外，也要思考如何拉近產銷雙方的認知差距並形成連帶關係，當看不見「他者」變成「我們」的時候，是否也會採取不同的行動？由果樹認養行動方案可以看到當他者轉變成我們，不同利益的社群之間有機會創造互惠的關係，而這樣的連帶關係有助於促進生產者和消費者參與及把關食安議題，而不只是被動地接受政府的執行和決定，這也是生產者和消費者展現實踐理性的一環。

成大團隊與東山農友的合作，使得有心想要轉型友善耕作，但面對眾多不確定的因素而難以行動的農友，透過跟成大團隊的合作，在社群支持下能夠踏出轉型的第一步。在此，大學和農友形成一個共同釐清問題，針對問題去設計行動方案的共學共作網絡，並且一起實踐和調整。這種共學共作網絡讓農友的理想與現實可以逐漸拉近距離，能夠持續打造心中最理想的生產方式，並且兼顧自己、消費者和土地的健康。對消費者而言，除了了解從產地到餐桌的過程，也對生產端面對的困境與挑戰感同身受，把農友當作社群的一分子，願意用股金或活動參與去支持農友往友善耕作轉型。消費者因此不再只是被動地接受市場提供的選擇和政府把關的食安，而是參與到生產和銷售過程中，與生產者互動並共創另類的經濟模式。這樣相對自主的食農體系雖然規模小，但相關利益方都能夠掌握充分的資訊，並且有意義地參與，一起共思更完善的作法，吸引更多社群的支持。對於學術社群而言，以往只能停留在思考層次的烏托邦，透過合作有機會與掌握豐富經驗和知識的農友合作，讓想像的烏托邦能有機會實現，培養研究者田野和實作的能力，共創有溫度且有用的知識。從實踐場域累積的「我們感」，透過社群連

結促進個人核心能力的實現，讓彼此站在一個有理想且能付諸實現的位置，透過有意義的參與和實踐，實現有尊嚴和豐盛的生活。

## 五、結論

無論是暨大團隊的空污微型感測器或是成大團隊的果樹認養行動方案都是尚在進行中的方案，透過前期工作的累積，借用 Nussbaum 核心能力清單去詮釋，大學的社會實踐促進了參與者（包括社區合作伙伴和大學參與者）的能力養成。從案例說明中可以看到，大學與社區共同定義問題，切入的方式其實都扣緊實踐理性和促進連帶這兩種能力的發揮，而展開一系列的行動。更具體來說，以社群連結為基礎，但連結社群的方法是讓參與者能夠發揮實踐理性的方式去引導，也就是考量方案的延續性，方案的設計不但要理論上可欲，也要實際上可行，行動研究的目的是在人社實踐計畫裡，是透過大學社區伙伴研究建構既「真」且「有用」的知識，並且讓一般人和組織可以執行（Sherraden 2000: 2）。雖然在人社實踐計畫一開始是希望與社區伙伴以共學共作的方式，協力回應社會問題，但在實際過程中，共學共作到哪個程度其實大家都難以拿捏，既不想落於依賴關係，面對進展緩慢也怕參與者失去信心和耐性。然而，Nussbaum 的能力取徑讓共學共作的意義更為鮮明，讓大學和社區伙伴理解到能力養成的過程本身即是意義。此外，能力取徑也提供基礎的架構作為行動評估的參考，參與者相互賦能，透過一起實踐建立認同、刺激動機，並且帶動從個人核心能力的養成到群體形成共同承擔結果的義務（commitment）。

大學的社會實踐是與「人」工作的過程，但沒有人是完全一樣的，因此不可能用一種方式或一個模式去套用在不同人或不同社區。能力取徑之所以適用，是因為這種途徑肯認人的差異性，以及可以發揮的能力、選擇的自由，判斷人是否過著有品質和有尊嚴的生活。這比法律宣稱上的個人權利來得更貼近現實，因為理解到規範性的與現實運作的落差，才有助於我們逐步落實實質的正義，即

Nussbaum 核心能力的實現。然而，能力的養成並非只進不退，在社會實踐的範圍裡，社區方、大學方、公部門或其他組織的參與，以及如何參與，都有可能影響能力實現的環境是否更友善或惡化。由於本文的篇幅有限，在此不深入討論，但對於長期地方公民社會的形成和深化，將是下個階段需要探究的課題。

關於大學社會實踐的困境與挑戰，大學社會實踐與社區和在地伙伴的關係是個動態的過程。因此，實作過程中的轉折和問題解決過程，是這個計畫中非常重要的經驗累積。對於大學與社區的伙伴關係建立，各團隊漸漸從點對點，發展成線和面的合作關係，意思是大學也積極串聯周邊學校、地方組織、商家、社福與醫療機構，搭建起區域的生活網絡支持體系，讓想要投入轉型工作的社區，能夠透過這樣的網絡得到支持。儘管如此，各校人社團隊還是面臨不少內外挑戰。對內，包括人員異動和校方支持的態度，都直接地影響團隊的向心力以及對外的工作；促進跨領域和跨社群的合作，也一直是各團隊努力的重點，如何讓異質的組成能夠發揮加乘的協力，而非相互抵銷的拉扯，考驗每個大學團隊的能耐及協調能力，以及根據社區動態調整的彈性和敏銳度。

對外，大學與地方社會的合作越頻繁和深入，互動就越複雜，尤其是在空污減量、在地老化、社會經濟、震後重建、友善耕作與食農教育等議題進行跨專業和跨社群的合作。大學、社區頻繁和深入的互動，能豐富專業知識和地方知識相互轉譯的經驗，但仍須持續地反思下列的挑戰：(1) 社區需求的變動和合作對接的承載力；(2) 大學與社區的行事節奏和目標的磨合；(3) 場域倫理、大學團隊可課責性的機制建立；(4) 面對大學與社區不對等的權力關係，雙邊或多邊的信任關係與伙伴關係如何維繫和深化，同時又能實現社區的自主性；(5) 大學與地方社區這類異質組成的實作網絡如何維持開放性和容納性 (inclusive)，持續產生創新的動力。

就教學和研究層面而言，透過在地實作面對真實的社會議題來促進校內跨學科的合作，連結校外社會團體和社區共同操作，以此豐富理論和實踐的對話。這樣的合作不僅能連結大學學術專業與地方社會社群，促進彼此相互學習，作為台

灣在地研究嘗試提出創新的可能性。近年來教育部啟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目的是推動大學的教學和制度的改革能更貼近地方社會的脈動。與此相關但不同的是，人社實踐計畫以駐點深耕和行動研究為主，更像是研發單位，人社實踐計畫的實作課程強調透過實作方案的探索和試作，帶領學生進入場域學習，強調問題解決的過程和能力養成，而更重要的是以小組為單位的共作，在過程中養成團隊合作的能力，這與社群關係的建立和養成有關。此外，社會實踐不該只是社會服務，大學的社會實踐需要有更清楚的目標和架構，人社實踐計畫累積的經驗裡有一些重要的原則，例如，人文關懷，釐清和解決結構性（社會、環境）問題，以及持續促進改善機制的建立。簡言之，當我們把社群關係和生態環境納入永續發展和韌性社區的要素，這些原則就是在為這樣的目標鋪路。透過課程系統性地帶給學生這樣的意識和共同行動，有助於培養更多可以實現這樣目標的年輕社群。在暨大、東華和成大，都有學生因為參與實作課程或實作方案找到自己的興趣和志業，持續留在地方貢獻己力。<sup>8</sup>

在學術累積和研究能量上，透過計畫推動，地方性的議題與台灣社會面臨的公共議題進行結合。從單一的實作點深入，釐清哪些是地方的特殊性、哪些是結構性問題。各校團隊在不同地方實作，有些重疊的議題，正好提供比較的素材，可以探討從地方性議題連結到理論和結構性問題，以及如何具脈絡化地回應這些問題。

人社實踐計畫從2013年執行至今，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挑戰，不能以線性和穩定發展的方式來理解。相較於成功經驗的轉移，人社實踐計畫更重視借鑑失敗的經驗，畢竟社會實踐工作的在地脈絡性很強，因此要複製成功案例其實很

---

<sup>8</sup> 例如，成大畢業生創立的 CoLab:D 在東原老街投入社區工作，<https://www.facebook.com/CoLabsmile/>；暨大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師生創立桃米野餐社，以當季在地食材研發野餐料理，<https://www.facebook.com/tmpicnic/>；東華學生成立「延長線」團隊關注偏鄉教育，<https://www.facebook.com/onephotoastory/>；團隊與參與實作課程的細節請參考本書第5章，蘇羿如、陳怡方、林美珠〈大學社會實踐課程操作與行動反思之回溯性初探〉。

困難，在實作上較有參考價值的反而是如何避免失敗。與此相關的是大學團隊面對動態的敏感度，以及回應變動與容錯的彈性和應變能力。

無論是學術社群要與地方社會建立信任和伙伴關係，或是要發展研究和教學的特色並促成多元學術典範，都需要長期和持續地投入與深耕。人社實踐計畫運作至今從無到有，在不同的階段各有突破和累積，並以大學為核心建立與地方政府、學校、企業、非營利組織、社區組織和居民串聯的網絡，這些區域網絡的形成也許沒有直接創造能用「價格」換算的經濟產值，但更重要的是，建立社會安全、互助支持和社會創新的地方網絡，共同形塑認同和重要「價值」，並且透過實踐一起去實現，讓地方社會能夠更有韌性，亦即從個人核心能力的實現到社群共同承擔責任和結果的義務，面對社會和環境變遷帶來的挑戰，也讓投入地方永續發展的彼此能夠一起走得更長更遠。

## 參考文獻

- 林宗弘，2015，〈學術資本主義崛起：新自由主義與臺灣社會結構轉型〉。頁 2-33，收錄於戴伯芬編，《高教崩壞：市場化、官僚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台北：群學。
- 林凱衡，2015，〈學術黑工：被剝削的研究助理〉。頁 258-292，收錄於戴伯芬編，《高教崩壞：市場化、官僚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台北：群學。
- 周陸怡、熊慧嵐、陳東升，2015，〈在地社會創新網絡：以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執行團隊在地實作為例〉。論文發表於「大學的社會實踐研討會」，台北：政治大學社會實踐辦公室烏來樂酷計畫，2015 年 11 月 12 日至 13 日。
- 洪與成，2017，〈政大又傳清潔工「被」自願離職 學生呼籲正視工作權〉。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65765>，取用日期：2018 年 8 月 7 日。
- 陳東升，2012，〈社群治理與社會創新〉。《臺灣社會學刊》49: 1-40。
- 孫雲平，2010，〈柏林大學的學院與學制〉。通識在線第 31 期，[http://www.chinesege.org.tw/geonline/html/page4/publish\\_pub.php?Pub\\_Sn=38&Sn=1044](http://www.chinesege.org.tw/geonline/html/page4/publish_pub.php?Pub_Sn=38&Sn=1044)，取用日期：2018 年 8 月 7 日。
- 曾柏文，2015，〈後冷戰的高教變遷：歷史脈絡與三組核心問題〉。頁 xiv-xxxvi，收錄於戴伯芬編，《高教崩壞：市場化、官僚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台北：群學。
- 戴伯芬，2015，〈教授無法承受之重：限年升等與評鑑〉。頁 134-160，收錄於戴伯芬編，《高教崩壞：市場化、官僚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台北：群學。
- 戴伯芬、吳燕秋、陳思仁，2015，〈新科博士的悲歌：畢業即失業〉。頁 162-197，收錄於戴伯芬編，《高教崩壞：市場化、官僚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台北：群學。
- 謝明彧，2017，〈60 億補助怎麼分 依舊重理工、輕人文？〉。遠見雜誌網路版 11

- 月號，<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0757>，取用日期：2018年8月7日。
- Nussbaum, Martha C. 著、徐子婷、楊雅婷、何景榮譯，2008，《正義的界限：殘障、全球正義與動物正義》。台北縣：韋伯文化國際。（Nussbaum, Martha C., 2006, *Frontiers of Justice: Disability, Nationality, Species Membership*.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Amin, Ash, 2009, “Placing the Social Economy.” Pp. 3-21 in *The Soci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Solidarity*, edited by Ash Amin. London: Zed Books.
- Gibson-Graham, J. K., 2006, *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Gibson-Graham, J. K., Jenny Cameron and Stephen Healy, 2013, *Take Back the Economy: An Ethical Guide for Transforming Our Communit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Keith, Novella Zett, 2015, *Engaging in Social Partnerships: Democratic Practices for Campus-Community Partnerships*. New York: Routledge.
- Kindred, Jeannette and Claudia Petrescu, 2015, “Expectations Versus Reality in a University–Community Partnership: A Case Study.”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6(3): 823-845.
- Kretzmann, John P. and John L. McKnight, 1993, *Building Communities from the Inside Out: A Path Toward Finding and Mobilizing a Community's Assets*. Chicago: ACTA Publications.
- Nino, Carlos S., 1991, *The Ethics of Human Righ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ussbaum, Martha C., 2006, *Frontiers of Justice: Disability, Nationality, Species Membership*.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Nussbaum, Martha C., 2011, *Creating Capabilities: The Human Development*



- Approac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Nussbaum, Martha C., 2012, *Not for Profit: Why Democracy Needs the Humani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eid, Herbert and Betsy Taylor, 2002, "Appalachia as a Global Region: Toward Critical Regionalism and Civic Professionalism." *Journal of Appalachian Studies* 8(1): 9-32.
- Sherraden, Michael, 2000, "Asking Questions Well: The Role of Theory in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Keynote Address presented at Twelfth National Symposium on Doctoral Research in Social Work, College of Social Work, Ohio State University, April 14. available from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jsessionid=46ECB2DE1220E8F658472EB2D59B00E5?doi=10.1.1.591.2741&rep=rep1&type=pdf> (Date visited: August 7, 2018).
- Stuart, Graeme, 2013, "What is 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BCD)?" Sustaining Community Website, <https://sustainingcommunity.wordpress.com/2013/08/15/what-is-abcd/> (Date visited: August 7, 2018).
- Warr, Deborah and Richard Williams, 2016, "Two Steps Forward, One Step Back: Achievements and Limitations of University-Community Partnerships in Addressing Neighbourhood Socioeconomic Disadvantage." *Gateway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ty Research and Engagement* 9(1): 22-40.
- Wright, Erik Olin, 2010,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London: Verso.

## Social Practice from a Capabilities Approach Perspective

Muyi Chou

### Abstract

Challenges stemming from global capitalism have led to increasing gaps between rich and poor,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democratic setbacks. The logic of capitalism also infiltrates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rendering education as more of a product than a right to be exercised. Nussbaum describes education for profit rather than education for democracy as the most important silent crisis currently facing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with universities feeling increasing pressure to accept and adapt to this trend. This chapter uses The Humanity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Project to show how social practices conducted by a university-community partnership are reshaping university tasks and research agendas. Nussbaum's capabilities approach is used to analyze university social practices to cultivate the core capabilities of participants. The main premise is that universities and communities can form partnerships and work together to identify problems and find solutions based on "practical reason" and "affiliation." Such partnerships are aimed at constructing knowledge that is not only theoretically meaningful, but also workable in practical terms. However, cross-disciplinary and cross-community collaboration is labor-intensive and time-consuming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communication and differences in working logic and cultures, therefore properly managing and sustaining university-community collaboration without generating a sense of dependency or losing patience are the most challenging tasks for university teams. Nussbaum's capabilities approach provides a strong framework for co-learning and co-working in university-community partnerships, since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participant capabilities is the primary aim. Further, a capabilities approach

can also serve as a standard for adjusting action plans—that is, social justice can be realized by cultivating the participants' central capabilities and the solidarity of engaged communities.

**Keywords:** capabilities approach, university-community partnership, community empowerment, social justice

# 作者簡介

(依章節順序排列)

**蔡瑞明** | 美國康乃爾大學社會學博士，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曾任東海大學系主任、研發長、副校長。Carnegie Mellon 大學、UCLA Fulbright 訪問學者、東京大學訪問學者。研究興趣為社會階層與不平等、勞動市場、高齡社會、生活品質。曾執行歐盟 FP6 計畫，並擔任台灣代表；曾任《台灣社會學刊》主編，現任《新實踐》集刊主編。

**謝國興** |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曾任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副所長、臺史所所長；主要研究領域為臺灣社會經濟史、臺灣民間信仰文化、近代中國產業經濟史。

**陳東升** |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研究興趣為科技與民主、參與式預算和審議民主、社會設計與社會創新、經濟社會學。參與推動社會實踐和直接民主的工作，希望建立一個在地合作經濟與直接民主的公民社會。

**戴興盛** |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自人社實踐計畫第一期第三年起加入東華計畫團隊擔任共同主持人。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生態系統韌性、環境治理、集體行動，並特別著重於東臺灣地區之相關議題研究。

**鄧湘漪** |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研究專長領域為全球化與移民／難民移動、文化與民族社會工作、國際發展與社區工作、原住民族文化照顧。長期關注東南亞、南亞及非洲社會鄉村發展、無國籍與難民議題，近十年投入印度流亡藏人屯墾區之田野工作，完成流亡者生存難題與族

群心理分析之寫作。目前，著手進行文化照顧論述發展，企圖自族群日常生活與文化慣習探究集體相互關照的照顧體系。著有《流亡日日：一段成爲西藏人的旅程》專書。

**謝若蘭 (Bavaragh Dagalomai)** |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教授，臺南西拉雅族，美國亞利桑納州立大學司法正義學博士。以社運者視野跨入跨領域學術圈，持續在性別 / 階級 / 族群結構交錯中，務實思考公平正義的可能出路。自人社實踐計畫第一期參與東華計畫團隊，並擔任共同主持人。著有《在，之間。in between 認同與實踐之間的學術研究儀式》(稻鄉) 與 *Collectiv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Identity-Based Movement of Plain Indigenous in Taiwan* (Routledge) 等專書。

**謝柏宇** |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碩士。於2014年10月至2018年6月任職於國立東華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專任助理。

**賴富庭** |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於2014年10月至2018年6月任職於國立東華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專任助理。

**程廷 (Apyang Imiq)** | 於2015年7月至2018年2月任職於國立東華大學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專任助理。

**吳勁毅** | 於2013年8月至2016年6月任職於國立東華大學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博士後研究員。

**要之璘** | 於2015年4月至2018年6月任職於國立東華大學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專任助理。

**鍾文觀 (Sifo Lakaw)** | Lohok 部落阿美族。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執行長。長期關懷原住民族語言復振、教育，以及健康與跨文化理解等研究議題。

**張灝之** |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及澳洲麥考瑞（Macquarie）大學地理與規劃學系雙聯博士候選人。

**莊慕華** | 於2015年10月至2018年6月任職於國立東華大學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兼任助理。

**翁裕峰** |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助理研究員。實踐社會正義除了思辯論證社會現象、事實的邏輯之外，還需要有效的對應行動，一路從臨床心理師、國會助理、職業健康社會學、醫學人文教育、生技產學利益衝突、科技風險治理累積到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案例顯示，目標接近了。

**蘇羿如** | 國立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博士，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第一期博士後研究。現任職國立空中大學花蓮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陳怡方** | 畢業於英國 Edinburgh 大學，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助理教授。學術專長與研究領域包括：人類學、物質文化研究、文化遺產與博物館研究、地方工藝產業研究等。

**林美珠** | 美國 Purdue 大學博士，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教授，曾任國立東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學術專長與研究領域包括：諮商師教育與督導、敘事與心理研究、夢工作與諮商、生涯諮商等。

**戴榮賦**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研究專長為人機互動與眼球追蹤，資訊專業興趣為物聯網系統開發、大數據分析與程式設計。在人社中心的研究方向為，以社會設計為出發點，開發出適合在地與鄉民可負擔的物聯網系統。

**黃資媛**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專任助理。近三年致力投入地方型 PM<sub>2.5</sub> 空污減量志工的教育推廣與友善市場的推動工作，期盼讓越來越多人加入營造好空氣的行列。

**張力亞**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兼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協力治理組組長。研究領域：府際關係、地方治理、鄉鎮的社會創新、永續社區營造等課題。

**鍾怡婷** | 以農業與糧食系統做為主要研究關懷，於參與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期間，以其鄉村發展及食物與農業社會學等學術專長，投入大台南地區農業生產與飲食消費之議題與實踐工作。2018年4月後任職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參與台灣農村社會文化調查計畫，主責農村社會創新專題研究。

**蕭惠中** | 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博士後研究員，英國蘭卡斯特大學環境與社會博士。研究興趣圍繞在環境與社會發展，近年專注在生態農業、社會經濟與社會創新的研究領域，並有幸在南台灣的鄉間走跳，認識努力與土地和解的諸多朋友。

**周睦怡** |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研究員，參與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推動與協調計畫。研究領域為公民社會、政體轉型、社會經濟、中國社會組織、基層治理。長期關注中國社會組織和公共治理議題與台灣公民社會和民主深化的發展。

# *New Practices and Local Societies*

## **Contents**

Ruey-Ming Tsay, Editor

<b>Introduction</b>	<i>Ruey-Ming Tsay, Kuoh-Sing Hsien</i> .....	<b>1</b>
<b>Chapter 1</b>	<b>External Structures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s in Local Taiwan Community Social Practices</b> .....	<b>17</b>
	<i>Dung-Sheng Chen</i>	
<b>Chapter 2</b>	<b>Practicing Real Utopias in Eastern Taiwan: The Humanity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Project, Social Empowerment an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b> .....	<b>53</b>
	<i>Hsing-Sheng Tai, Hsiang-I Teng, Jolan Hsieh, Po-Yu Hsieh, Fu-Ting Lai, Apyang Imiq, Chih-Ying Wu, Chih-Lin Yao, Sifo Lakaw, Ena Ying-tzu Chang, Mu-Hua Chuang</i>	
<b>Chapter 3</b>	<b>From Collective Consent to Consultation Platform: Indigenous Research Ethics in Makota'ay</b> .....	<b>95</b>
	<i>Jolan Hsieh, Sifo Lakaw, Ena Ying-tzu Chang</i>	
<b>Chapter 4</b>	<b>Distribution Justice in Education: Establishing an After-school Learning System in a Rural Village</b> .....	<b>121</b>
	<i>Yu-Feng Wong</i>	
<b>Chapter 5</b>	<b>Social Practice Curricula as Action Reflec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A Retrospective Study</b> .....	<b>159</b>
	<i>Yih-Ju Su, Yi-Fang Chen, Meei-Ju Lin</i>	



<b>Chapter 6</b>	<b>Promoting a Local Air Quality IoT Monitoring Approach in Puli, Taiwan .....</b>	<b>193</b>
	<i>Rong-Fuh Day, Tzu-Yuan Huang, Li-Ya Chang</i>	
<b>Chapter 7</b>	<b>Social Economy Practices in a Fruits Harvesting Club’s Action Plan.....</b>	<b>237</b>
	<i>Yi-ting Chung</i>	
<b>Chapter 8</b>	<b>Sustainable Farming Transition: A Social Experiment Involving Farmers in Tainan.....</b>	<b>275</b>
	<i>Huei-Chung Hsiao</i>	
<b>Chapter 9</b>	<b>Social Practice from a Capabilities Approach Perspective .....</b>	<b>315</b>
	<i>Muyi Chou</i>	